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

Thomas W. Laqueur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

[美] 托马斯·拉科尔 著

杨俊峰等 译

文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

Thomas W. Laqueur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

[美] 托马斯·拉科尔 著

杨俊峰等 译

文景

Horiz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拉科尔（**Laqueur**， **T.W.**）著；杨俊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

ISBN 978-7-208-06844-5

I.孤… II.①拉…②杨… III.性**-**文化史**-**研究 IV.**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4983**号

书名：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

作　　者：[美]托马斯·拉科尔

责任编辑：雷静宜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6844-5/G·112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导言 坦荡的性，文化的性

第一章 开篇综述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从一本《手淫》小册子至整个文明世界

第三章 《手淫》出版之前的手淫文化

第四章 手淫问题之所在

第五章 手淫缘何成为问题

第六章 20世纪的独自性行为

译名对照表

导言　坦荡的性，文化的性

谈论手淫需要勇气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体像，李敖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它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实说，也就是李敖才敢这样"宣淫"，敢公然写"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的文字，别的中国人，谁敢这样谈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说中虽偶有写到手淫的，但以我见闻所及，从未有浓墨重彩加以描写者。

现在的西方人，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时，一般来说胆量当然比我们大些，不过当美国人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写这部新作《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Solitary Sex：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时，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美国报纸上谈论这部书时所用的夸张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粪淫没有使他们忧虑，鸡奸没有使他们犹豫，乱伦甚至使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好不好？"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拉科尔试图将医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神学、文学等等熔于一炉，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手淫的文化史概要。他到哈佛去做这个主题的演讲，给哈佛的"历史与文学"这个系列讲座带来了活力。《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上说："现代手淫大师"来哈佛演讲。但是其间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指导讨论会和提供辅导的教师颇为神经过敏。这些教师尽管也早已经深谙世情，并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但一想到这样一种场景——要他们面对和学生讨论手淫的历史，许多人还是会脸色苍白。还有一个教师宣称，他的良心反对他指定学生阅读拉科尔的新书，或让他们参加讲座。他承认，这不是因为题目不重要，但这只应在他称之为"非强制的框架"内被讨论。

至于学生，恐慌并未在他们中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处在看《情迷索玛丽》（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的年纪，早已经见怪不怪。《情迷索玛丽》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爱情喜剧影片，女主角玛丽温柔美丽，风情万种，但主要是下面这个情节确实与众不同：玛丽的另一个追求者，不怀好意地告诉男主人公，与女孩约会前应该手淫一把，这样就不会在约会时欲火中烧，难以自制，以至于在女孩面前丧失风度了；男主人公听信了他的话，真的在和玛丽约会前努力手淫起来，结果精液射在自己耳朵上，闹得丑态百出。

另一条有趣的言论，则是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他说他在手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反映了"管理政策和我自己的信念之间的

区别”。

关于手淫引起的道德焦虑

排列一下人类的各种行为，在唤起强烈焦虑方面，手淫堪称独一无二。

根据拉科尔观察，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手淫引起的焦虑，这也不是西方文化遥远源头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手淫可以成为一时困窘和嘲笑的题目，但它只有很少的或干脆没有医学的意义。

拉科尔还在本书中表明，也很难在古代犹太教思想中发现手淫的焦虑。在《圣经·创世记》第38章，我们读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这是一个使上帝恼火的行为，所以上帝让俄南死了。体外排精（Onanism）实际上是手淫的同义语，但对撰写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们来说，俄南的罪过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绝（为他的兄弟）生育。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责浪费精液。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则有着明确的概念，认为手淫是罪恶。但是拉科尔宣称，这不是一个他们特别重视的罪恶。除了五世纪约翰·卡西恩修道院（Abbot John Cassian）的例外，他们更多地是考虑拉科尔所谓的“社会的性之规范”，而不是孤独的性之规范。修道院将焦虑集中在鸡奸，而不是手淫上；而世俗社会则更关心乱伦和通奸。宗教改革并未根本改变关于手淫的传统观念，也未强化对此问题的兴趣。新教徒激烈攻击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们看来，诽谤婚姻就是鼓励手淫。

当神学家评论《创世记》第38章，主要不是谴责俄南干了什么，而是谴责俄南拒绝干什么。所以圣奥古斯丁解释说，俄南是这样一种人，他未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学家不赞成手淫，但他们并不高度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性本身，不仅是无生殖目的的性，都在应该克服之列。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学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这种刺激比他们的妇人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性交的欲望。结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这些事情都应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已经发现一个15世纪早期的、并未广泛流传的文献——3页的手稿《手淫自供》，被归属于巴黎大学长官简·德·吉尔森（Jean de Gerson）名下——指示牧师如何引导对手淫之罪的忏悔。

中国通常认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体面的事情——尽管并未上升到罪恶。相传龚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阁柱上书一联：“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所谓“非法出精”，是佛教对手淫的称呼。在《西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指头儿早告了消乏”这样的句子，说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现代性学的观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这可以释放性张力，缓解性饥渴。考虑到现代社会男性婚姻年龄通常比古代大大推迟，如果这些男性要遵

守“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道德戒律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强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将偏偏没有性满足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来说，适度的手淫更显得必要而且有益。

现代性学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手淫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什么危害的话，那这种危害只能来自手淫者自身的观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会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手淫就会给他（或她）带来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将损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当它回事儿它就是回事儿，不当它回事儿它就不是回事儿”。只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现代的观点，手淫就不会有任何伤害。

手淫曾经被作为一种疾病

拉科尔提出了一个“现代手淫”——将手淫视为一种疾病——的观念，他认为“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确地定出日期”——它开始于“1712年或此年前后”，以伦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为标志。该小册子有那个时代常见的冗长标题：《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后果，给两性中那些已经在这项令人憎恶的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的精神及肉体方面的告诫，以及给这个国家两性青年的及时警告……》（Onania;or，The Heinous Sin of Self Pollution，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in both SEXES Considered，wi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And seasonable Admonition to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of Both SEXES…）。小册子的作者，拉科尔判定是约翰·马尔顿（John Marten），一个招摇撞骗的庸医，出版过平装本的关于医学的色情文学书籍。马尔顿宣称，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虔诚的医生，此人发现了治疗手淫这一迄今无法医治的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昂贵的，但是考虑到疾病的严重性，它们物有所值。读者被建议指名索取这些药物：它们是“增强剂”和“多子粉”。

拉科尔认为，这只是一个推销骗局：后来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于手淫，并证实专利药物的疗效。但仅仅用商业因素不足以解释为何“手淫”（Onanism）及其有关的术语开始出现在18世纪伟大的百科全书中，也不足以解释为何法国最有影响的医生之一，著名的大卫·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将手淫视为一种严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释为何提索1760年的著作《论手淫》（L’Onanisme）迅速成为欧洲文学中耸人听闻的内容。

拉科尔认为，提索“决定性地提出了手淫”，并将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医学界曾归纳出了一张冗长的关于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结核、癫痫、丘疹、疯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认为手淫是“远比天花更恐怖的”。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可怕的焦虑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释，因为并无新的医学观测、发现，哪怕假说，能够解释为何手淫会被看得如此危险。

拉科尔认为，“现代手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提索和他博学的同事们之前，对于最普通的民众，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阵内疚而已。提索之后，任何放纵这一秘密愉悦的人，都相信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了。手淫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理性和婚姻的伤害，甚至是对自我愉悦的伤害。对于启蒙时代的医生来说，手淫是一种谬误的愉悦，一种对真实的颠倒，因而它是危险的，需要严加防范。

中国明清时期有些危言耸听的礼教文字，历数情爱文学或戏剧的罪状，其中最严厉的指控之一，是说这些作品将导致青年男性的遗精或手淫，这些现象被说成“暗泄至宝”——因为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认为精液

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贵的物质，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应该被耗费。从下文所引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措词，也可以看出这个观念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所以手淫之类活动的后果，被严重夸大，被认为是“斫丧真元”。这些说法有着某种医学的外衣，曾经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现代的观点认为手淫本身对健康并无任何伤害——当然不能过度，任何事情过度了都会对健康有伤害，就连吃饭睡觉也是如此。

手淫的文化史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将手淫看成是对精液的浪费：

不懂节俭的可人呵，你凭什么

在自己身上浪费传家宝——美丽？

（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自然希望这年轻人将他的美貌传给下一代；不要拒绝生育能够遗传他美貌的孩子。手淫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是对遗产的不正当的滥用。这个年轻人只是在消耗他自己的财富，而财富是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的：

你这样一个人跟你自己做买卖，

岂不是自己敲诈美好的自己么？

造化总要召唤你回去的，到头来，

你能够留下清账，教人满意么？

美，没有用过的，得陪你进坟墓，

用了的，会活着来执行你的遗嘱。

（屠岸译《十四行诗集》第4首）

这首十四行诗中的年轻人，是一个（精液的）“无益的使用者”，最终算总账时，他将是亏损的。这里也许有一点遗传因素在起作用——莎士比亚自己和他的父亲有时都是高利贷者。但是莎士比亚也预见了一个拉科尔所注意到的“现代手淫史”上的主题：从18世纪以降，手淫被指为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生物学上的陋习。当然这都是对莎士比亚的现代解读，以前人们不会这样理解上面的诗句。比如1958年，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珍妮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推许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时，她还说：“纳博科夫先生在结语中告知读者，《洛丽塔》没有道德观在内。笔者只能说，亨伯特的命运是古典的悲剧，完美表达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道德灼见。”她所提到的那首十四行诗现在被认为正是谈论手淫的。

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诗人只能表明，完全现代形态的手淫那时还未存在：通过“跟你自己做买卖”，这个年轻人在浪费他的精液，但是事实是，这并不会损坏他的健康，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

拉科尔还表明，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些对手淫的观察，着眼点在快乐而不

是避免怀孕。

说起关于手淫的讨论，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个很难被指责为假正经的人：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这个威尼斯的冒险家和浪子班头，174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曾和一个著名的土耳其哲学家，优素福·阿里（Yusuf Ali）有过一番关于手淫及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对话。

卡萨诺瓦坦率地表示自己“喜欢美妙的性，希望享受其中的美味”。优素福认为，“你们的宗教说你这样将是要被谴责的，而我敢肯定我自己则不会（受到谴责）”。他问卡萨诺瓦：手淫在你们那儿也是一个罪行吗？卡萨诺瓦说这是“一个甚至比通奸还要严重的罪行”。优素福表示对此难以理解：“这总是让我惊奇不已，对任何立法者来说，他公布一个法律却无法使人实行，那就是愚蠢的。一个男人，没有女人，而他又健康状况良好，当专横的自然使他有此需要的时候，他除了手淫还能干什么呢？”

据说卡萨诺瓦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年轻人放纵于这项活动会对他们自己伤身促寿，在许多团体中他们都被紧紧监护着，使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自己犯下这项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为它违背神圣的律令——卡萨诺瓦对这种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为它对于本人有害，就像吸烟或肥胖对于我们有害一样。

优素福·阿里对监护年轻人的企图同样表示轻蔑：

监护别人的人是不学无术的，那些为此支付费用的人是白痴，这种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们打破如此残暴和违反自然的法律的愿望。

这一观察看来是不证自明的，而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医生和哲学家来说，违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这种活动。

这种对于青年手淫的监管，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准色情小说《金屋梦》（号称《金瓶梅》的续作）第五十回中，写到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专业训练期间，为了防范她们手淫，“临睡时每人一个红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个绢掐儿，掐得那物紧紧的，再不许夜里走小水。”至于这种监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坏处女膜，二是因为相信女孩手淫会导致阴道宽松，“就不紧了，怕夫主轻贱”。

启蒙时代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手淫

拉科尔认为，启蒙时代认为手淫不正当和反自然有三个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为都是社会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体中发生，或由邪恶的仆人教唆儿童——在它的高潮时刻总是无可救药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对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而是一个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瘾之后永无餍足，难以节制。“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突然发现一条途径，可以像拥有罗马皇帝的特权那样无限满足对快感的欲望。”

拉科尔指出，私密、虚幻、不知餍足，这三条中的每一条都是启蒙时代认为应该恐惧和厌恶的。当狄德罗（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于世故的“百科全书派”作者贡献他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们承认，适度的手淫，作为对于急切而又没有满足之途的性欲的缓解，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适度的手淫”是一个矛盾的表述：奢侈逸乐的、欲火攻心的想像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抑制的。

孤独的性是危险的。手淫是文明社会的恶习，是逃脱自我约束机制、寻求快乐的惟一途径：手淫无法停止、无法抑制，而且彻底免费。男孩们先是访问妓院（完成他们的性启蒙），然后以手淫来排遣性欲，“强奸他们自己的身体。”

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有一个文化创新——公共剧院，是被激烈攻击的。道德家宣称，剧院是“维纳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观众，在演出结束时涌入附近的小旅馆或演出大厅后面隐藏的密室中做爱。在17世纪后期，约翰·邓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黄昏寻找淫荡妇人的漫游者》（The Night-walker，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 1696）的作者——在剧场结识了一个妓女，进了她的屋子，试图给她一个关于贞节的训诫，但被妓女断然拒绝了。妓女说她通常往来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说他们会假扮为安东尼，而她则假扮为克丽奥帕特拉。

18世纪的医生们，利用古代对想像的恐惧，使人们确信，当性冲动是由某种不真实的、不是确实存在于肉体的东西所引起的，这冲动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险的。这危险被它的上瘾性质大大强化：手淫者，就像小说读者，可以固执地动员想像，产生和更新无穷无尽想像的欲望。这种愉悦是极坏的。

至于社会观念中对手淫看法的变化，拉科尔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义性学，尽管他也知道其实在关键问题上是何等复杂

和矛盾。弗洛伊德放弃了他早先关于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观点，代之以“婴儿手淫”普遍性的激进观点。然后他从“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ism，亦可译作手淫）开始，围绕着他谓之“不正当的性冲动元素”的压抑来构造他整个的文明理论。拉科尔指出，在这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中，手淫“成为个体发生的一部分”：我们经历手淫，我们依赖手淫，我们走向性成年。

《孤独的性》以对压抑理论的现代挑战的概述结尾，从1971年鼓吹男女平等不遗余力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Our selves），到一些小组的形成，这些小组的名字像“SF Jacks”——“一种趣味相投的喜欢手淫（jack-off）的男人团体”——如其主页上所宣称的和“墨尔本手淫者”（Melbourne Wankers），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照片表明，手淫对这些当代艺术家，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Vito Acconci等，显示出离经叛道的魅力。拉科尔甚至断言：“艺术制造，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手淫。”

结语

拉科尔的这部《孤独的性》，实在是一部勇敢的文化史。书中那些渊博的论述，除了向读者提供相关的文化史知识之外，从整体上来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缓解公众对手淫的焦虑。一个对手淫仍然抱有某些陈旧观念的读者，当他见到手淫这样一个听上去相当“恶心”的词汇，竟能被如此坦然、如此富有“文化”地谈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可能一举改变他先前对手淫的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对手淫的焦虑——如果他先前存在着这种焦虑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拉科尔十几年前写的那本《制造性》（Making Sex）相比，这本《孤独的性》事实上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江晓原

2006年12月25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第一章　开篇综述

第一章开篇综述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追溯到一个十分精确的年代，这种精确程度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它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位狂放不羁却又十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诞生在同一年，或者说几乎是同一年。它的出现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早期作品几乎同步，也与首次股市崩溃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读者或许还记得那个经典的笑话——在斯威夫特1917年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他写道："贝茨先生，我的主人。"；"我善良的主人贝茨先生。"）。这一时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时期。

在现代史上手淫是低俗可耻的。手淫不仅仅是一个会导致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疲惫、残疾、疯癫甚至失明的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它是人类性生活中极特殊的一种。在手淫中，潜在的、不受限制的享乐欲望冲撞着社会道德的制约；习惯性的作为和"再来一次"的欲念挑战着良心和道德的约束。在这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欲望和幻想淹没了道德和原则；强烈的自我意识冲破了性欲的荒原，进入到一个手淫者自己幻想出的奢华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淫一直徘徊于社会的不齿和自我的满足之间。

大概在1708年至1716年间——"1712年左右"——当时的一位匿名作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冗长的书名，即《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以及在两性中产生的严重后果，对那些用此种可耻手段伤害自己的人们提出精神以及肉体的忠告，并郑重劝戒全国的年轻人，无论男女……》。正是这本书名命名了一种新的疾病，一种具体而完全现代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疾病不断催生出罪恶、耻辱和焦虑。作者在书中警告说，"一种频繁出现、且急需矫正的罪恶"正在广泛存在。但导致这种罪恶的却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这一个原因——"淫秽书籍、交友不慎、爱情故事、色情言谈以及其他导致淫乱和放荡的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手淫是一种流行甚广的行为，因为沉迷于此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错误的行为，以为这种行为不受良心和社会的约束，不会导致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无知是导致手淫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由于"放荡"，或是因为"寂寞无聊"，或是通过同伴的引导，一些年轻人开始学会通过手淫来放纵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一举动不仅错误，而且极其有害。手淫行为不为人所知的特点是导致无知的一个原因。"其他不洁的行为往往会被人察觉，而手淫则不会。"手淫的人无须感到羞耻或罪恶，更不会受到传统道德的制约。一个不敢接触女孩的羞怯男孩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同样，女孩不仅可以通过手淫"抵制强烈的欲望"，并且可以在"隐瞒自己弱点"的同时，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不合适的配偶。此外，手淫的传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不会像鸡奸者那样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像乱伦或通奸那

样会被送进监狱或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或者说，至少那些手淫者是这样认为的。手淫是不折不扣的自我玷污行为，除此之外，对于这种令人生厌的，但人们又避而不谈的罪恶的存在再无法作出其他解释。

准确说来，这个长久以来被大众所忽略、却在近代西方对于自我和性的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叙述来概括：

这是一种在两性中通存的违反自然的行为。实施者无须通过他人，即可猥亵自己的身体。他们通过各种不洁的幻想，意图模仿并获取感官上的无上快乐。而这种快乐本是上帝为延续人类的繁衍，令男女两性通过互相交融才可获得的。

潜在的手淫者数量很大，“无论男女”，并且无须借助他人。与发生在夜间的鸡奸行为或其他不洁行为不同，手淫者不分男女。在所有非正常的性行为中，手淫是传播最广泛的一种。手淫者只需沉浸于自己“丰富的幻想”，便可获得高潮体验。在后来的300多年里，这种曾经被认为微不足道的行为却越来越能够展现少男少女以及成年男女的内心世界，并对实施者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虽然匿名，但随后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撰写隐晦色情文学的外科医生——是第一个将“自愿的自我放纵”与《圣经·创世记》中“俄南”（Onan）的故事联系到一起的人。在《创世记》中，俄南没有将他的种子播撒到他的寡嫂体内，而是将它们撒在了地里，并因此被处死。这就是手淫行为的起源。同时，这位医生还认为，手淫所导致的后果将如《圣经》中所述说的那样——死亡。死亡并非是上帝给予的处罚，而是源自于手淫者被扭曲的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淫和后来其他的一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犯罪容易，抹去犯罪的印记却很难。那种认为手淫不会被人察觉、不会受到惩罚的看法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某种意义上，1712年前后的这一时期在现代对于性及自我意识探索的历史中，与医学史上的某一片断不谋而合。据前面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说，他写作的初衷原本是为手淫者提供一些宗教的疗法。但随后，他将其书交给一位虔诚的内科医生阅读，并告诉他有很多人正在被一种秘不可言的罪恶所折磨，而且对此束手无策。这段遭遇虽无从考证，却从此改变了历史。这位虔诚的内科医生——与作者一样不知其名——“告诉我（即小册子的作者）两种极为有效的药”。一种专门医治男女各种非性病原因的体液外溢、夜间遗精以及排泄时伴随的体液溢出；另外一种则医治各种不育症和性无能，不管是否因性病而起。

出版商瓦热内先生在征询了这两种药的名字后，建议取名为“强力大补药”和“多子多春粉”。而且，这两种药还各有配药，例如，“强力大补药”若与“煎药”或“注射药”同时使用，效果最佳。在这里，医学似乎替代了道德的作用。由于这本小册子难免有推销药品之嫌，作者因此特意在

书中声明，是那位内科医生而非他本人出钱印刷了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印刷就付印2000本。作者还声称那位医生“因此药而名利双收”。[1]

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将手淫视为医学疾病并借机赚取高价药费的举动虽然有些令人不齿，但却开创了一门独特的医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成为启蒙时期医学的柱石之一，而且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现代性学研究。因此，无数的论文、文章、百科全书的词条、各种小册子，甚至包括名人的巨著都将1712年视为一个起点。在200多年之后，当人们逐渐开始怀疑是否手淫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一位知名的法国医生依然坚持，他可以找到上百种症状来证明手淫的严重后果。[2]

但是，这一段医学史所展现的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就在1712年前后，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罪恶的行为会导致身体上的伤害。医学被视为是一种道德的指引，是肉体的伦理之道。18世纪时，随着道德规范的制定越来越源于自然而非神圣的宗教权威，道德准则也越来越多地由学校、医生和其他教育者来传播，而并非由教士、牧师来传道。医学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忧虑被理解为医学疾病这种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例如：“文明病”往往是由各种不良行为所引起——过分的奢侈、过多的脑力活动而缺乏身体锻炼、滥用同情心、小说阅读得太多而导致身体或精神紊乱，以及纵欲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自太古时期起，过度纵欲就被视作医学问题。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自1712年起，手淫开始成为医学问题，又或为什么在1920年时，人们不再认为这种行为会致病。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性欲享乐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的同一时期，为什么手淫这种自我的性享乐追求会成为如此令人困扰的道德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喻示着一种道德转变，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手淫的讨论恰好体现了这一道德转变。

事实上，在手淫不再被认为会残害身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然被视作现代人性生活中与道德紧密相连、并令人深思的话题。即便在今天，情况依旧如此，尽管连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已经不再坚持手淫行为会导致失明、疯癫或其他疾病。在过去，对手淫者不仅有道德上的谴责，还有医学上的警告，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虽然多数人不再认为手淫对身体有害，但对手淫这种孤独的性行为的争议和忧虑（1712年首次出现）却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詹姆斯·帕格特（Sir James Paget）曾在1879年著书写道：手淫行为的危害其实是“性疑病症”的一种形式。医生应告诉病人（无论成年与否），它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与同等频度的正常性交带给人身体的影响大致相同”。虽然默许，帕格特医生对这种行为也深为痛惜。他表示，手淫是罪恶深重的行为，“肮脏、不洁、道德败坏、且人神共弃”。那么，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一种在医学上被认为是良性的行为，却被痛斥为“肮脏……人神共弃”？[3] 弗洛伊德及其同行曾经激烈地讨论过手淫行为是否会妨害性高潮体验，以及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问题。尽管弗洛伊德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显得有些过时，但几乎所有研究

精神分析学的学者，无论是开山鼻祖，还是他们的后辈，都一致认为，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对于了解自我探索的历史，以及它在社会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都意义重大。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乔斯琳·埃尔德斯（Jocelyn Elders）被解职。原因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学校的孩子们是否应该在合适的卫生课或社会学课上学习有关手淫的内容时，这位部长踌躇片刻，回答说“是”。换句话说，作为性生活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手淫现象，一直是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在1712年前后（启蒙运动的初始时期），为什么手淫这一话题会从道德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道德问题？几千年以来，与其他关于肉体欲望和道德的话题——如婚姻内性享乐的目的和节制问题，以及同性恋问题——相比，此话题一直默默无闻。几千年以来，无论医生、哲学家、犹太教士，还是牧师，他们对两性伦理的阐释也集中于成年男性。然而，这所有一切都在几十年间全然改变。随着手淫话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和注意，未成年人——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尤其是女性，被认为是从事这一行为的主体。不仅在欧洲，在任何一个自我意识得到启蒙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以及它无法言传的吸引力。手淫是中产阶级追求现代性体验的一种表现，它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行为。那么，对这样一种对少男少女及成年男女都具有致命诱惑力和满足感的性行为的节制为何会如此令人担忧？而在此之前，就其讨论程度而言，手淫只是存在于成年男性和寺院僧侣中间的一个边缘问题。

自1712年起，这种被《手淫》描述为“令道德受伤的苦恼问题”，这种“自渎的深重罪恶”（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成“罪行”一词）逐渐变得清晰、明朗，并且尖锐。手淫成为社会焦点这一现象也由此成为历史记载中有关文化变迁的一个有趣片断。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手淫从一个一开始只是穷苦文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慢慢地进入百科全书的殿堂——百科全书的出现被视为文化启蒙运动的一大成果。这一变迁显然不是宗教人士和文化保守派的功劳。现代手淫文化讨论诞生于一个全新的、不为宗教所束缚的道德世界。手淫现象所折射的恰好是这个世界隐秘的另一面。启蒙运动倡导的对自由的追求将这一最隐秘、最私人化、看上去似乎无甚大碍且不易被人察觉的性行为，推向追求幻想、欲望和自我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舞台。

在我看来，转折点出现在17世纪末期或18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手淫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道德观念被理解为自我掌控的时期。这种理念认为，所有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道德身份，但却有各自具体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4] 在那段时期，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文化逐渐形成：“这种文化推崇自由意志，认为自我探索的过程至关重要……而且，它对美好生活的诠释通常包含着个人的付出。”提出这番论断的人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当时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自主，且无法进行自我探索的世界，那时的幸福生活决定于物质，而非我们自身。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从这样一个世界脱离出来。广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之前，是非

标准往往由上帝、宗教、政府而决定，概括地说，就是由个人与抽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决定。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一个人只有和朋友和谐相处，才是幸福的。“如果他孤独一人，生活将会十分艰难。”他的话道出了社交活动的准则，也是现实世界所认可的幸福生活的标准。就人类天性而言也是如此。换言之，无论以何种形式，人类与宇宙的联系往往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在17世纪末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正生存于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社会。然而，自17世纪晚期之后，人们越来越难以认可这样一种生存联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与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这个问题显然应该留给现代社会来回答。[5]

然而，对于什么是所谓的“现代自我”，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我想说的是，在我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无论知名与否，都不约而同地十分关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个体的自发性如何与个体和他人之间的联系互相协调？或者换言之，这些人一直都致力于发现一种内在的法则，以使个人主义和自由成为可能。

回顾近200年的文化历史、性别历史，以及个人主义历史，究竟是什么促使手淫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中心话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五章、第六章详加阐述。在这之前，我需要先阐明其他的一些问题。首先，在下一章，我将追寻手淫发展的足迹，阐述其作为一种引起文化共鸣的性行为，从18世纪早期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进程。这一章的内容不仅展现《手淫》这本小册子是如何从一个小范围的生存环境，以极大的适应性传播至一个国家，进而一片大陆，最后遍布整个世界的，也将阐释这本小册子所反映的问题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话题的全过程。（同时，作为一项创新之举，我也会透露给大家这本开创了先河的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的真实姓名。）

现代手淫文化是如何成为现代性学研究的重要话题的呢？为了阐述清楚一问题，我认为，对于手淫现象的研究始于1712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手淫这一行为始于1712年，或者说从1712年才开始讨论这一行为。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讲述的是1712年之前手淫的历史。起初是从医学角度，进而延伸至性学以及伦理角度。这一章的内容由《圣经·旧约》中俄南（手淫Onanism一词因他而来）的故事而起——尽管也许他本人并非是一个手淫者，还包括后来犹太文献中对于俄南是非的评价，以及2000多年以来，一直到启蒙运动前期，基督教文献中有关手淫现象的评论。与1712年之后的历史相比，这段早期历史显得略微苍白、凌乱，也许有些偏离主题，而且，谈论的主体也无外乎成年男性。然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其他性行为的严肃思考，这一章所揭示的是性伦理中受到遮蔽的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三章的内容与本书的其他内容是几乎相反的。如果说手淫现象在18世纪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章则揭示了为什么在此之前对它的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它证明了对手淫的讨论完全属于现代性学的范畴，手淫是第一个在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两性机会均等的恶习。

下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早期，究竟是什么使人们突然对手淫这一问题如此惴惴不安？肯定不是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施这种行为。不管当时情况是否如此，我们已无从得知。18世纪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对手淫的反感也并非出于对性享乐的反感。那种认为手淫会导致精液损失的论调更是古代医学的陈词滥调，也并不能构成人们对少男少女以及女性的手淫行为感到困扰的原因，因为女性在手淫这种高潮游戏中所得到的只是幻想和欲望。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说来，有三个因素可以被视作是这种自我性游戏使人们产生恐惧的原因。一、在一个推崇透明的年代里，手淫是一种隐秘、不可见人的行为；二、这种行为如同上等的可卡因，容易导致无节制的纵欲，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性行为都无法相比的；三、这种行为无法在现实中被限制，因为它纯粹是幻想的结果。

在第五章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正如我先前所言，手淫的历史部分地反映了道德上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是如何形成以及发展下去的。具体而言，对于为什么手淫问题会变得如此紧迫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种行为的核心本质——幻想、纵欲、孤独、私密——会令人如此担忧。现代文化鼓励个人主义、自我主张，却容易导致为我中心论和恣意妄为。这种文化认为，社会个体总是不满足于现实或本身所有，而幻想拥有更多，但同时他们也懂得适度的克制和调节自我的欲望和幻想。现实的准则并非来源于外部世界，而是来源于自身。手淫是自我优越心理的性行为体现，是为达成现代文化目标而斗争的心理战场。

本书第六章将主要阐述当今的手淫文化讨论。首先，我们从这一章节中可以得知，18世纪早期至20世纪早期，性行为学和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那种浓厚的传统。手淫被视作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在合适的时间摒弃这种行为成为迈向成熟、形成健康心理、遵循社会传统的一个标志。弗洛伊德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成为众多研究争议的焦点。

20世纪的后四五十年里，对手淫文化的讨论再次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自50年代起，随着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受后来的性别战争及最后20多年里掀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运动的影响，手淫文化逐渐成为广大社会争议的焦点。从来没有一种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可以不受限制地恣意妄为，与家庭或遗传也无甚联系。手淫所具有的时断时续、充满幻想、完全自我的特质曾一度令18世纪的学者们感到极为困扰。之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它又被理解为一种人类自婴儿时期就具有的性能力，普通正常人随着文化的积累，则完全可以摆脱它的影响。而在今天，手淫被理解为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行为，一种实现自由的手段，或者在某些人的观点中，是堕落和绝望的一个标志。这种自我愉悦的性游戏在某些人看来是人人追求的理想天堂，在某些人眼中则是万人唾弃的卑鄙行径。在这一章中，读者既能读到惠特曼（Walt Whitman）对手淫浪漫极致的描写，也能看到对这种行为“自我放纵、自我中心、恣意妄为”的痛斥。

由此可见，手淫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卢梭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仍然备受推崇。首先，在18世纪时，手淫这种个体性行为就被理解为展现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好比一个十字路口，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如果缺乏细心的照料和正确的引导，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那里，他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幻想以及自我投入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选择虽不至于罪恶深重，却会导致病态和堕落，因为它是一种不受宗教所控制的恣意妄为。之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带来一场革命，也使手淫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手淫不再是一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挣扎，摆脱这种自体性游戏的影响，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自我。在手淫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手淫行为被认为是自恋、自爱的一种体验，也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它使每个人在与他人形成各种关系的同时，不会丧失自我。这种曾被哲学家们认为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现在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与远古时期不同的是，这种曾经只属于有闲阶层或贵族男性的性游戏，在当今社会几乎可以被各种人群所接触。当然，关于手淫文化的这些发展并不总是脉络清晰、直线向前，其中也有迂回曲折，反反复复。但首先，让我来细述手淫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展现这样一种隐秘的恶习是如何在3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备受关注的性学话题的。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从一本《手淫》小册子至整个文明世界

探讨手淫文化的第一本书——《手淫》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那正是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这本书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激起人们对一种令人恐惧的罪恶的关注和议论。然而，如果不是当时的图书和药品交易繁荣发展，如果不是出于盈利的动机，对手淫文化的讨论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手淫》这本书可不会这样写。作者在书中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主要是想告诫大众“自渎”这种“令人可鄙的行为”所产生的对精神和肉体的危害，并附上一些“著名医生”开的药方，以治疗手淫所导致的疾病。[6]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作者提供的这些药方的成分往往贵得惊人（作者也在书中对此表示同情），而且药方的配法十分复杂，非一般病人可以掌握。更没有人会拿着药方去药房，请求药剂师为这种见不得人的疾病配药。因此，作者在书中说道，他已经配好了一大批这种药，并将其转让给一个“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此人是他的一个医生朋友，而这位朋友则自己掏钱印刷2000册的《手淫》作为回报。想必这位医生在一开始是免费提供这些药品的，但此举后来证明代价太高。当时，每本书都配有治疗这种性疾病的药剂，而且价格不菲：整个药方要价12先令。在当时，这个价钱可以在咖啡店里买到290杯咖啡（外加点心），并且相当于一个男仆两周的薪水。（18世纪末期时，《手淫》一书不再被捆绑进入药品买卖市场，只是作为隐晦色情文学的一个独立作品而存在。）后来，读者们被建议用自己的名字申请，在《手淫》的出版商和书商那里，都可以申请购买这种药剂。

这个故事尽管在开头部分有些故作慈善之嫌，但整体看起来并非难以置信。在当时，书籍附带赠品和用廉价书籍（一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册子）推销药剂是十分普遍的做法。例如，治牙痛的“止痛项链”、起清火通便作用的小糖果，以及各种各样治疗痛风、风湿和性病的药方。这些东西在推动手淫文化的传播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7] 出版商和书商不仅出版、销售书籍，还顺带出售药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个文人负责创作书籍，另外一人负责制药，他们与从事书本贸易的人一起策划了这一运作。

然而，在《手淫》的运作中，道德主义者——那位没有什么医疗背景的作家——和“强力大补药”、“多子多春粉”的制作者之间的区分被打破。读者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通过零售商约见并咨询书的作者，“当然是要付费的”。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都期望书卖得好，[8] 于是，在对书的需求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虽然独立，却与书的需求紧密相连的新的市场需求——对此书所附带的药剂的市场需求。

1716年前后，有关这本书、这种药，以及该书的增订本的广告开始频繁

出现于伦敦的周报上。从形式上看，这些广告与其他广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豆腐块大小，与现代的招聘广告有些类似，印有《手淫》一书精美的封面，并不断地出现关于这本书再版和畅销的最新报道。有时还刊登诸如“该书新版附有女读者来信探讨闺中秘事”的新闻。在一个印刷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里，这本书和其他流行产物一起，互相依存，而又彼此竞争。例如：在某一周里，《手淫》的广告被夹杂在两篇流行报道之间，一篇是有关一个哑巴绅士的报道，这位绅士能够记住所有他曾遇见过的人的名字；而另外一篇则是一部新书的发布公告，这本新书的内容是关于即将崩溃的教皇统治。《手淫》的商业成功在当时是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我十分渴望一睹为快，因为这本书不仅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再版了多次。”这是1724年一位评论家的言辞（出于嫉妒，他在当年对此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在报纸——如《星期天邮报》——可以传播到的地方，对于该书的讨论和争议也如影随形（上面的例子来源于我随意找到的一份1718年10月28日出版的报纸）。《手淫》的声名也远播国内的各大城市。事实上，在英国印刷史的早期，这本第一部指出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进行“不洁的手淫”的书是最先得到广泛宣传的书籍之一。[9]

《手淫》一书的热卖令人津津乐道。一封被公开出版的信札（出版于1723年1月25日——对于这个日期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的作者曾提到，他第一次见到这本书以及手淫一词，就是通过一个刊登在《伦敦杂志》（London Journal）上对于该书第六版的广告。当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阅读该杂志。“我问一个朋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随即告诉了我，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于是，像其他人一样，他买了一本书。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畅销以及现代手淫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洲早期大众传播的大肆宣传，和当时所营造的公众空间。据统计，伦敦在1700年时已拥有近2000家咖啡馆。在1739年，还出现了关于某个特定区域的更详尽的数字。在一个被称为“道德区域”的地方——这是几个教区的统称，它们自16世纪以来就开始统计本教区的死亡人数——就有551家咖啡馆。咖啡馆不仅是刊登《手淫》和其他流行文化书籍广告的报纸流通的地方，同时也出售《手淫》的读者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药。由于当时邮箱还并未出现，邮单的投递、包裹的领取都是在这样的信息和贸易集中的公共场所。很多大城市在17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咖啡馆。[10] 咖啡馆的出现成为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

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手淫》及其《补遗本》大为畅销。两个版本互相吹捧、互相得利。例如：一个没有具体日期的《补遗本》大肆推销《手淫》原书的最新版：“无论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学问高低、职业贵贱，不管是否有过这种受到攻击的性行为的体验，都应该一览此书。”简言之，所有人都需要购买这本书。当时的一个书商为了吸引读者，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将其描述为“前所未闻的由闺房秘事引发的奇异事件”。

这种自卖自夸衍生出一种常见的套路。在这本书里，为吸引读者注意而被描述成“奇异事件”指的是书中两个修女的故事。这两个人被发现具有

超出常人的巨大阴蒂。教皇于是命人进行调查，看她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因为这种行为曾有过先例。调查人员随后呈上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颇似当时流行于市井并带有些许淫秽意味的医学书籍——这种书籍也是《手淫》及其《补遗本》中大部分故事的来源——的内容。报告说，这并非是奇人异事，事情的真相并没有“超越自然界的范围”。这两个修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频繁地模仿性行为而对阴蒂造成异常的刺激，因此使阴蒂脱出并增大，如同阴茎一般”。这段内容中的“性模仿”一词暗示了手淫行为。这种被正统文学视为糟粕的内容，对《手淫》来说却是难得的素材。 [11] 为最大程度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关于女性自淫的描述多采用比喻手法——这也是18世纪色情文学常见的描写手段。“离这些城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CLTRS的城市”，深受女子的喜欢——一本指导人们了解女人身体的手册如是说——“那儿的王宫是一个可以尽情享乐的地方”，一开始地方并不大，但“当女子们在那里感受到极乐之后，便使它越来越广阔了”。 [12] 这段比喻其实讲的就是修女的故事，类似这样的隐晦描写还有很多。

流行文学的常规流通渠道是《手淫》得以广为传播的另一功臣。出版或出售该书的人都是18世纪早期出版业的重要人物，他们控制着整个印刷和宣传的命脉。例如托马斯·科罗奇（Thomas Crouch），他在出版《手淫》一书的同时，不仅为其配上了据说具有滋补作用的“挥发性的香气”，并在封底宣传了自己的新书《300年来关于公正与仁慈的奇闻怪事》。另外一位出版商保尔·瓦热内（Paul Varenne）曾出版若干法语及拉丁语作品，其中包括《公祷书》的译本。1718年，他与科罗奇共同出版了一部关于性病的书，虽然该书并未涉及手淫话题，但却在醒目位置为《手淫》的第四版做广告，因为他拥有这一版的利益分成。 [13]

合伙出版科罗奇和瓦热内书籍的两个出版社早在几年之前——确切地说是1708年——就曾共同出版过一位叫约翰·马尔顿（John Marten）医生有关性病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手淫”一词的现代叫法“masturbation”首次出现。虽然这次提及十分简短，但切中要害：导致夜遗、性无能和不育的因素，包括“未成年的学校男生过度用手进行自淫”，而且“女性的自淫”也会伤害她们的身体。一年以后，这对组合再度联手，出版了马尔顿的另一部作品，一部“令人脸红的作品”——《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这本书激起轩然大波，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并被高等法院指控为淫秽书籍。然而，这次指控最终以失败告终。 [14]

这起事件并未对《手淫》的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它激起了大众窥探他人隐私的猎奇心理，并使《手淫》的再版从中获利。在马尔顿的书中，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女性的自淫，并写道“男人若看见这种行为，定会难以自抑，并且会渴望得到同样的享受”。他尤其提到“阴蒂”一词，无论作为名词或动词，“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探求性事秘密的向往”。而且他认为手淫可以“减轻女性对于性的强烈渴望”。虽然从马尔顿的书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出他对于手淫的反对态度，然而他在书中对“两性短暂而贪得无厌的性享乐”的描写却过于细致，以致令人作呕。 [15] 从某种意义

而言，是约翰·马尔顿将现代手淫文化和隐晦色情书籍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经常与一些其他著名的色情书籍编在一起，如1703年被译成英文的法国人尼古拉斯·韦奈特（Nicolas Venette）的作品《揭秘婚姻之爱》，风靡意大利，并在1653年轰动英国的色情作品《难睹的真相》和《未上锁的性爱密室》。简而言之，《手淫》的出版商看准时机，将其引入了一个业已成熟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由他们一手营造出来，而且已经作好准备，接受并繁衍手淫文化这一新生事物。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手淫》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当中。作为一部书信体小说，它不断地添加着一封又一封真伪难辨的书信，内容全都是关于青少年自淫行为，这些少年们无一例外地都承受着手淫所带来的恶果。面对非议，这本书竟然大为畅销。虽然作者许诺“不再为此书添加新的内容，只是有可能再版”，《补遗本》的第十五版和第十六版却仍然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解释说是因为要驳斥对此书的“下流诽谤”。[16] 那位至今我们仍不知其姓名的作者一再否认他是一个创作了有史以来“最下流文章”的“虚伪、满腹牢骚、伪善的传道士”，声称自己根本不是在说教。同样，对于那些关于他对手淫的讨论其实是为通奸和嫖妓进行辩护的指控，他也加以否认。有人说，他故意夸大手淫的危害性，将其形容为“最顶级的淫秽行为”，其真实目的是为推销那些治疗手淫所引起的疾病的药剂。面对这种指控，他谦和地表态说，也许他确实对通奸、鸡奸、兽欲、乱伦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但这些问题已经被许多人所讨论，而手淫却“从未被任何作品提及”。作者还在书中说，如果手淫只是为了排除多余的精液，那么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当有人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时，作者解释说，这种恶行最大的害处在于它是“不纯洁的幻想”，而且没有人能够在“摆脱不洁幻想”的情况下作出这种行为，因此，完全有益健康的手淫活动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来源于当时一个近似荒诞的传闻：有一位新郎，由于岳父大人不允许他与只有13岁的新娘同房，只好用手淫来舒缓自己的欲望。这一传闻似乎恰好证实了他的批评者的观点。）直到18世纪20年代末，《手淫》一书一直难以登上文化研究的大雅之堂。

在匿名300年之后，是那些关于这种恶行的文艺批评让我们最终发现，究竟是谁撰写了这本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山之作。1712年，一个笔名为马修·罗索斯（Mathew Rothos）的作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为卖药而做的促销——论M先生所作的〈手淫补遗本〉》。[17] 此书的出版商曾于1723年和1724年公开对《手淫》进行批判。这位出版商和《手淫》、《补遗本》的出版商一样，弥补了高雅的宗教说教作品和下流的半色情文学之间的空缺。[18]

谈起该书的创作动机，罗索斯解释说，他是因为M先生没有对先前的批评作品——《审视〈手淫〉》做以回应。出于对这部批评作品的拥护，他决定加入到这场文艺争论中来。或许，这一文艺争论事件反映了当时的舆论争议。当然罗索斯也有其他动机。或许是对手淫是最恶劣的性行为的说法感到沮丧，因为这一说法将那些旧的论调撇在一旁；或许是因为《手淫》里对于这种私密的自渎行为的描写过于详细而令人反感；或

许，作者同样也希望从《手淫》所激发的巨大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文艺市场逐渐繁荣起来。罗索斯的语言华丽而充满感染力。他写道：从一部充满了“恶意的、颠倒黑白、不着边际的谎言和互相矛盾、淫秽下流语言”的作品中，从一个编造了“许许多多看起来似乎真实可信、但其实令人羞耻的来信”的作者那里，从一个“自吹自擂”的俗人那里，到底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位M先生的作品毫无价值可言，他的观点缺乏有力支持”，而且“语言下流、粗俗不堪”，一味迎合那些品位低俗的读者的口味。

M先生因此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当然并非毫无理由。他被批评为“用尽文字的力量来煽动青年人的放纵行为”，并借机推销一种神秘、昂贵的药剂，用以治疗这种放纵行为所引起的疾病，而这种放纵行为正是作者在书中极力想要煽动的。未婚私通会导致性疾病这一说法已是陈词滥调，而手淫会导致疾病却是令人惊异的新发现。更为恶劣的是，在某些人看来，M先生完全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他一再否认，但他一面在高呼手淫是“最顶级的淫秽行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的同时，自己不仅很可能也这样做，而且“从中获利颇丰”。对于手淫，他的厌恶是“假惺惺的、捏造的”。在他看来，所有人——无论男女、无论成年与否——都有过这种行为，因为其本人和家庭是这样的。

M先生究竟何许人也？这个神秘人物终于在1727年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约翰·马尔顿，那个在1708年出版了《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一书、并被指责为淫秽、下流的外科医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尔顿的早期作品和《手淫》出自于同一出版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语言以及行文风格几乎完全一样。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很少像这样令人感到如此不堪。但是，即便《手淫》一书并非马尔顿先生而作，那么，那个代表了某出版集团利益、自称“马修·罗索斯”的家伙，和代表了另一出版集团利益的《手淫》及《补遗本》之间的文艺战争，为当时的商业文化以及印刷业的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并为手淫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

《手淫》一书的发行量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在它的两位出版商过世之后，该书也一直大为畅销。但此书对手淫文化的垄断却很快不复存在，大量其他的作品以及人物纷纷参与进来，使这一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而且越来越有利可图。18世纪20年代中期，一位家族史上经营咖啡馆生意的盖洛威夫人（Mrs.Garroway）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由此创建了伦敦当时最成功的药品生意。盖洛威夫人的公司以制造、销售“张伯伦医生的儿童牙痛止痛剂”为主，同时还经营各种其他药品，如：痛风药、有通便作用的糖果、疟疾药膏、藏红花含片，以及可以治疗眼病的烟草。自盖洛威夫人进入手淫这一领域之后，她的事业飞速发展起来。她所制造的可以治疗手淫及其他性疾病的药品，可以在伦敦及各大城市买到——不仅零售还可以批发，甚至还可以邮购。无数的书刊、杂志、报纸不但将这种药品的名声广为传播，还同时宣传了手淫文化。简言之，在《手淫》开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后，追随者纷至沓来。[20]

尽管牙痛止痛药仍然是盖洛威夫人的主要生意，但手淫无疑提供了巨大的赚钱机会。盖洛威夫人于是与另外一位刚踏入此行业的亨利·帕克尔（Henry Parker）联手，一起着手经营这一广阔市场。1724年左右，一些三四十页厚的小册子相继出版，如：《自淫》、《论〈圣经〉中珥和俄南对婚姻之爱的滥用，以及俄南和珥的罪行》和《自渎的恶行》。在这些小册子的封页或封底，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推销治疗手淫药品的广告。与《手淫》一样，这些小册子的目的是为让大众了解，手淫行为不但是一种恶行，而且对身体极其有害。当读者认识到这一点，并需要提供帮助时，这些商人们会不失时机地介绍治疗这种行为的药品，当然价格不菲。在当时，由于饮食不当、饮酒过度、低度感染，或生活压力等原因，很多人都觉得疲惫不堪、萎靡不振，而且经常有头痛或各种身体紊乱的病症出现，因此，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他们的病很有可能是因手淫而起，如果想要恢复健康、振作起来，这些药是十分必要的。[21]

在这些小册子的内容中，并没有具体提到《手淫》一书，虽然有些章节有明显的抄袭成分。例如，关于这一恶行的定义，小册子中写道：“用自我模仿的方式来到达肉体欲望”——这与《手淫》几乎一字不差。[22] 同《手淫》一样，这些小册子都将手淫看做是一种新近才被发现的恶习，而非那些常见的、被人们视为大敌的性行为。有很多文章都探讨了“不洁行为的各种形式及其罪恶，但对于这种最常见的恶习的讨论，却寥寥无几”。而且，这种新的性恶习“比任何一种行为对于人的诱惑都更大”。它之所以令人格外担忧，是因为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会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到任何惩罚——“手淫尤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比起其他性恶习，所有人——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们尤其指出，不论男女——都更容易屈服于自淫这种行为，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手淫总能给人带来无法抵御的欢娱”（这其实是《手淫》中原话的再加工）。这些小册子的另外一个与《手淫》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用词都强调“自身内在”，如：“秘而不宣”、“自我行为”、“暗自玩弄自己的身体”等等。最后一个与《手淫》的共同点是，这些小册子在宣扬道义的同时，穿插了很多关于疾病、死亡以及救赎的小故事。

但是，与《手淫》相比，《自淫》和《论〈圣经〉中珥和俄南的罪行》此类的书显得更为拙劣、低俗。书里充满了大段的抄袭，文章的内容也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虽然这些书都是免费发放，书里推销的药品却不是。一剂灌肠药的价格是7先令6便士，贵得令人咋舌；如果与“特效专门药”搭配使用，则需21先令。除此之外，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充分迎合了读者的偷窥心理，从中他们可以窥探到“那些邪恶的怨妇们在一起自渎”的最活色生香的故事，还有“牧师、神父、旅行者，以及那些妻子不在身边的人进行自我性享乐”的最隐秘细节。从来没有任何书籍能够如此满足这些人的邪念。这些小册子来源于贫民聚集的区域，那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手淫》却并非如此。1724年，它的第十版——“前九版共销售了近1.5万册”——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出版社在北美殖民地出版发行。在此一年前，清教神父考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关注手淫问题许久以后，

终于对这种恶习发起抨击。然而，有关他为何会对这一问题感兴趣，我们却无从得知。[23]

1728年，《手淫》终于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以简陋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的20年之后，手淫这种行为以及“手淫”一词，终于进入了18世纪百科全书之中。在钱伯斯《百科全书》这样一部学术巨著中，“手淫”（Onania，Onanism）一词得以出现。（从《手淫》的后来版本得知，Onanism一词来源于一部失落已久的小册子的书名，这本小册子对第三版的《手淫》进行了批判。因此，Onanism一词的出现和《手淫》的出现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后来，Onanism一词的法语译义成为18世纪一部畅销小说的书名。）《手淫》和“手淫”一词，都是新生词汇。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被后来的经验主义者定义为自渎行为的专用名词。《圣经》中曾提及，俄南因从事此行为而受到死亡的惩罚。”但是，这个词条的作者对手淫和《圣经》中俄南故事之间的联系心存怀疑。在另一词条“自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俄南，以及（一些评论家认为还有）珥，他们因将自己的精液洒在大地上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行为被后来的经验主义者称作‘手淫’。见‘手淫’一词。”在一部现代巨著中，手淫文化的先驱被认为是那位匿名江湖医生，并认为他的作品值得关注。[24]

“自渎”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完全崭新的。当时的评论家以英国新教在讨论其他宗教时所持有的冷静、客观态度告诉我们，“猥亵”或“玷污”如果单独使用，意为“亵渎神圣”。它的隐含意义在印第安文化、犹太文化、或古罗马文化中也有提及。如，犹太人认为，女性的月经和触摸尸体会使人受到玷污；古罗马人认为，如果“被血或精液玷污”，就需要去教堂重新拜祭。“自渎”一词似乎从这些古老的迷信中吸取了部分含义，并衍生出新的意义。百科全书中写道：“‘猥亵’或‘自渎’也被用来特指用摩擦或刺激等方式，并通过艺术幻想从而产生射精的自淫行为。参见‘射精’。”在这一定义中，“通过艺术幻想”这一说法尤其值得重视。这是第一次让人们意识到，手淫行为是手的反复摩擦——更是幻想——的结果，这一发现令人们开始关注手淫，并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传统地位。从1728年英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开始，“手淫”及其讨论不断出现在18世纪后来近20个《百科全书》的版本中，更不用说国外的译本了。手淫文化自此进入学术讨论的高级殿堂。[25]

1743年，《手淫》穿越英吉利海峡，出现在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Johann Heinrich Zedler）编著的《德国百科全书》之中——这本书在18世纪三大百科全书中排名第二。在这部共64卷、包含了所有新旧科学常识的巨著中，“手淫”这一词条出现在第36卷，和英国《百科全书》的词条几乎完全照应。手淫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在首次博得关注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进入到欧洲当时的文化中心——德语文化。早在1736年，卡尔·大阿尔伯特·卡鲁斯（Carl Albert Carus）就翻译了《手淫》英文版的第九版，而德文版在1800年之前又再版了至少5次，因此泽德勒对于“手淫”的某些注解有可能来源于卡鲁斯的译本。我们无从得知卡鲁斯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将《手淫》一书译为德语，也没有人对《手

淫》、卡鲁斯的译本，以及后来出现的一部用德语原创的、关于手淫话题的书籍之间的联系进行文献学上的研究。这部后来出现的德语作品叫做《对所有不洁淫秽行为的告诫和警示》，作者是一位哈雷虔信运动的忠实追随者——齐奥格·萨格耐克（Georg Sarganeck）。这部作品一经出版，立即在德国几个大城市的报纸报道中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这本书和《手淫》有很多相似之处，两本书的总体框架也基本相同——都是以医生朋友帮助宣传道德风尚的故事陈述者的形式，并且都随书提供药品，来治疗手淫导致的疾病。然而，无论以何种形式，无可置疑的是，《手淫》一书随着德国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也变得十分活跃。到1740年，《手淫》的译本一版再版，以萨格耐克为代表的同类的书籍也一拥而上，表面上虽表现出一种卫道士的姿态，但实际仍然瞄准了利益丰厚的药品销售市场。几年之后，“手淫”讨论终于出现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和英国的情形相同，手淫文化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令人注目的讨论话题。无论是流行的商业文化，还是高雅的学术领域；无论是宗教伦理，还是世俗道德，手淫文化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26]

手淫文化的下一站是法国。《手淫》一书何时、通过何种方式来到法国，真相无人知晓。18世纪时，在法国似乎还没有出现此书的全译本。1775年，当《手淫》在德国莱比锡引起轰动时，法国才出版了第一部法语原创的关于手淫话题的作品。[27]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萨缪尔·奥古斯都·大卫·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启蒙运动中著名的医学家——位于洛桑的私人图书馆里，珍藏着钱伯斯《百科全书》的第一版和1752年发行的第17版，此外还有《手淫》一书。[28] 1757年，正是这位著名人物对手淫文化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手淫文化之所以会引起这位著名人物的兴趣，或许是因为由著名哲学家和学者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所翻译的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在其著作《医学词典》的第二卷中提到了“手淫”一词；或许狄德罗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将“手淫”的文章编入了他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或许狄德罗被詹姆斯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所吸引——一个男孩陷入手淫这种“反常的自娱性行为”、“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不能自拔，于是写字越来越小，以至于最后几乎完全失明。医生诊断为：非眼部明显损伤的失明状况。[29]

但这一切只是推测。我们知道，在狄德罗编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中，曾出版《论手淫》等长篇文章的著名内科医生让·雅克·门纽特（Jean Jacques Menuret de Chambaud）说道，尽管《手淫》一书内容杂乱无章、乱七八糟，但正是它的出现使手淫文化得到了应有的关注。1765年，在一个匿名庸医第一次著书警告世人手淫这种隐秘的、不为人所知的行为50年之后，正是他的书使手淫文化得以登入18世纪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手淫》终于从贫民窟登上启蒙运动文化研究的最高殿堂。[30]

然而，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对手淫文化进行讨论的文章，其来源并非那本内容低俗的《手淫》，而是一本学术性更强、更受尊敬的作品——由18世纪最著名内科医生大卫·提索所著的《论手淫》。这本著作的法语版出版于1760年，比1759年的拉丁语版篇幅长出三分之一。虽然提索

这部著作的标题和主线与之前的《手淫》如出一辙，但他对《手淫》的评价却并不高，说它是“一部乱七八糟、内容毫无关联的庸俗之作”。提索坚持认为，自己的作品和《手淫》一书全然不同，告诫人们千万不要仅仅因为两部作品“书名相同”而将两本书混为一谈。只要读一读这两本书，就会马上发现他们的不同点。但是，无论他如何抗辩，《手淫》的影响毋庸置疑。[31]

提索在书中解释了那位英国庸医的作品是如何渗透进学术领域的。自他的作品出版之后（提索在这里指的是拉丁版出版之后，法语版之前），一位学术权威告诉他，《手淫》一书里有些内容并不真实，而且那本书曾被斥之为下流淫秽作品——虽然这种指控是错误的，而且，它的德译本曾因无法获取特权而被禁止发行。[32] 因为这些原因，提索曾考虑过删除有关《手淫》评论的部分。因为，虽然有“假象的成分”，但总的看来，《手淫》的内容“过于真实”。另外，提索还对当时的一些德语版本提出批评。然而，最终提索还是在书中提到《手淫》，对提索的这一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封来自当时著名学者约翰·鲁道夫·斯特林（Johann Rudolph Stehelin）的来信。这封信里讲述了德国哈雷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所经历的一个病例。（霍夫曼教授以“精气”学说而著名，他认为，人体中存在着如“精气”一般的液体，从各神经传送到肌肉组织中，并且保持在一种挛缩的状态中。这一观点广为流传，并认为，手淫由于过度损耗“精气”，所以会导致下颌松弛，四肢无力等症状。）信中说，霍夫曼的一个病人因过度手淫而患上疾病，在采取了《手淫》作者推荐的药品和疗法之后，病情大有好转。简言之，《手淫》不但在手淫患者之间广为流传，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据我们所知，当时瑞士有一个手淫患者，曾经特地赶到法兰克福来购买此书。[33]

但是，提索的《论手淫》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它的出现在欧洲学术界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与《手淫》不同，这本书根本不推销药品，与卖药毫无关联。而且除了告诫人们不要从事这种行为（如果已经开始，则应马上放弃）之外，并无其他建议。这本书所开出的“药方”也无非是：健康生活、保持良好的性伴侣、适当进补。在此意义上，《论手淫》完全独立于《手淫》所引起的药品推销风潮。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具体原因将在后面章节中作以探讨，《论手淫》一书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大众的视线。

关于提索《论手淫》的具体版本，迄今并未有完全而系统的文献资料统计。但就我们所知，仅18世纪就有数十版之多：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巴斯、都柏林；在提索的故乡洛桑；在伯尔尼、日内瓦；在法兰克福、莱比锡、奥格斯堡、汉堡，以及埃森纳赫；在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鲁汶；在马德里、费城、维也纳、威尼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版本（意大利语和希腊语至少各自有一个版本）。[34] 这一长串名单中还不包括节选本以及抄袭之作。仅从数量上而言，《论手淫》可以算得上是18世纪的畅销书。光法语版就有35版之多，各种语言的译本共61种，此外还有其拉丁版的6个版本和4个译本。这个数字可以和卢梭的畅

销小说《新爱洛伊丝》相提并论——《新爱洛伊丝》仅在18世纪就有137个版本。简言之，这本关于手淫话题的第一部“严肃之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而且在19世纪仍然为人们所关注，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更多语言（例如，1855年时，该作品已拥有5个俄语版本[35]）。

在《论手淫》一书出版之时，提索就已经是一位名人了。他不仅在18世纪的医学领域做出了独到的研究，而且还翻译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生物学家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的作品。1754年，提索撰写了一部有关天花的医书，被世界广泛认可，并被《百科全书》誉为“奠定了预防接种学的基础”。《论手淫》出版的当年，提索被提名进入皇家科学院，并于次年出版了著名的《对健康生活的忠告》。这本书的出版令提索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他所提倡的医学哲学——手淫也包含其中——风靡了整个欧洲。约翰逊医生有一位朋友瑟莱尔夫人，她家中的仆人生病，这位夫人对儿子说：“给我拿布肯的《居家医学指南》来……算了……还是拿提索的书吧，他的书更好。”“好的。”她儿子回答道，于是把《对健康生活的忠告》拿了过来。这个小故事绝好地说明了提索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本书在18世纪共出版了130个版本，被翻译成至少14种语言，其中包括两个印度泰卢固语的版本。卫理公会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对此书作以删节之后，在“乡村和城市的卫理工会教堂里”出售，并赞誉道，提索是一个“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学者。此外，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译者注）第一部医学丛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此书的德语和希伯来语译本。[36] 这本书和提索其他的著作一起，使提索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明星。苏格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曾提到，在1768年7月25日——那天是一个星期天，他躺在床上，花了大半天时间阅读提索的这本《对健康生活的忠告》。这本书“给予他一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当然会这样，因为这本书以严谨的态度描绘了一些疾病产生的缘由，这些疾病都是因一些长期的心理问题以及手淫（此行为令鲍斯威尔感到极为内疚和反感）而引起的。[37]

提索毫无瑕疵的行为、崇高的声望，再加上与提索经常保持书信往来的人群中，有很大部分人是知名学者或欧洲的王亲贵族这一事实，使手淫文化逐渐进入欧洲的主流文化中。提索曾经说，他对手淫的讨论是有限的，他对手淫问题的兴趣并非是将其视作一种“罪行”、一种道德上的混乱行为或是一种“罪恶”——这些词汇虽然在过去的宗教讨论中经常出现，却都是他或他的同行们尽力避开的。手淫在他看来，首先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提索的研究方向是人体病理学，即关注手淫以及手淫行为所导致的疾病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但是，提索的话存在着虚伪的成分。提索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医学角度。“医生所关注的只限于医学范围”，他引用贺瑞斯（Horace）的话说。但由于宗教一直是事实意义上的权威，科学也是为宗教而服务，因此，提索也无法摆脱这一局限。启蒙时期的医学认为，当人的社会行为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时候，疾病就会产生。医学是一种——甚至

是惟一的一种（尽管有所争议）——道德科学，因为对于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自然规律这一问题，医学具有专业的鉴定。如果对于道德准则的制定不是以宗教圣经作为依据，而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如果对于是否违反了这种行为准则的界定由医学或病理学来完成，那么，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医生就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权威。德国著名医学家约翰·乔格·齐莫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是提索的一位好朋友，对于这种医学伦理学有着精辟的描述。在他的书中，这位学者警告少男少女们，手淫行为危害无穷，并且宣称“没有人能像医生那样填补道德家因知识的局限所造成的缺失”。与此同时，他还就“孤独”这一话题撰写了一部著作，论证自我反省在这个文明日益加深的社会的重要性，并因此书而蜚声欧洲及美国文学界。对于像齐莫尔曼这样发掘“人类心灵深处秘密”（此引用出自提索的传记）的人来说，在孤独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孤独的性行为。[38] 医学，从某种意义而言，是道德伦理的代言人。

于是，对手淫的讨论很快便不再仅限于医学伦理学，它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对于启蒙运动中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手淫代表了社会心理的一种扭曲，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即便没有伤害，这种行为也是十分可怕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每当谈起这个话题也是兴致勃勃。与提索一样，伏尔泰认为，由英国医生所著的《手淫》一书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同时指出，《圣经》中并没有说，俄南体外排精的行为是为了避免怀孕。他还承认，《手淫》一书虽大获成功，“发行80多版”（不知伏尔泰从哪里得到的数字），但是“这一惊人数字”也只是“书商用来吸引读者的常见手段”。对于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历史，伏尔泰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他对于那位来自于洛桑的学者——提索——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赞他将手淫文化从杂乱的贫民窟文化中提取出来，并赋予了清晰而系统的研究。伏尔泰之所以对提索的观点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被手淫所导致的医学疾病而吸引，而在于这一观点可以成为他反对教权主义的有力武器。基督教所提倡的独身、违反自然的禁欲都会导致扭曲的性享乐行为——前者催生了后者的存在。因此，在修道士、牧师和修女之间，手淫现象屡见不鲜。此外，伏尔泰以他攻击基督教的一贯语调讽刺说，那种宣称上帝出生于一个充满妓女和小偷的部落、俄南为标榜自己的不同，而将精液遗在地上的说法实属荒诞可笑，但基督教学者长期以来企图强加给教徒的解释则更为荒诞不经。然而，当要求伏尔泰对俄南的这一罪行——即手淫——进行评论时，他只是简单地说这种行为出于“扭曲的自我爱恋”——英国哲学家和性科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曾将这种“自我爱恋”定义为“自恋”。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大多数现代手淫文化的开创者一样，对这种自体性行为表示出焦虑和担心，因为它是与正常的社会道德背道而驰的。[39]

让·雅克·卢梭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彻。1762年7月8日，提索将自己的《论手淫》一书寄给卢梭。在两个月之前，《爱弥儿》——这部被公认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教育理论最著名的作品——得以问世发行。提索必定马上阅读了此书，并意识到自己和作者的观点有很多共识。于是，他

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并很快得到回音。提索后来曾说“我与您（卢梭）的交往是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他将自己寄给卢梭的《论手淫》与《爱弥儿》划归一类，并写道，“在《论手淫》中，您将会看到，对于您在书中猛烈抨击并勇敢地将其公诸于世的这种恶行，一位医生则揭露了这种恶行将会给人体造成的所有危害”。这番话其实指的是手淫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卢梭这部著作的主角——爱弥儿，就时常受到这种性行为的困扰。不仅是爱弥儿，从广义上讲，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存在着这种困惑。卢梭在自己的作品中直白地说道，“只要有一次，他（一个教育家的学生）用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愉悦”来满足自己的性快感，“他就会迷失自我。”他不仅“至死都无法摆脱这种会给少年带来无穷危害的恶习”，而且这种行为令他无可救药。药物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但身体和心灵必然将受到侵害。更严重的是，通过手淫这种行为，爱弥儿无可救药地变成自己身体的奴隶。也许有人认为，少年手淫总强于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但卢梭认为，如果与不良妇女发生肉体关系，少年还有得到挽救的可能。但如果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情欲和满足感的来源，要想从中解脱出来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卢梭对于社会在决定个人身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怀着复杂的态度，社会仍然提供了救赎的余地。纯粹的自我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而用自体性行为来挑起无尽情欲，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求纯粹自我的行为，则完全走上了极端。[40]

卢梭作品的主题是手淫和自我塑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手淫文化是如何传播至世界范围的。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对手淫这一道德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大众医学和学术医学的范围，对它的提及也不再仅限于教育学文章、反教权主义言论和百科全书中，它醒目地出现在《爱弥儿》这样一部文学的畅销书籍里。1762年末，《爱弥儿》的法文原版就已经印刷了3万多册，到18世纪末近2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无数的译本。18世纪德国两位著名教育学者曾评价卢梭的《爱弥儿》“教会了思想家如何思考”。[41] 由于这本书的影响，手淫这种在1700年还不敢公开谈论其名字的行为，在不到100年以后，已经为无数读者所熟知。人们被告诫，这种行为将会给个人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

1762年7月22日，卢梭回信对提索表示感谢，感谢他寄来《论手淫》一书。在收到此书之后，想必卢梭一定很快地阅读了该书，因为该书的主题正合他心中所想。在他的感谢信中，卢梭写道，虽然那时他已经不再大量阅读书籍——尤其是医学书籍，但自从他拿起《论手淫》这本书，便深深为它所吸引。他很遗憾没有早点看到此书，不然，他将引用书中的内容以深化他在自己作品中对手淫的讨论。[42]

是什么使卢梭开始关注手淫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尽管他在《忏悔录》中记载了自己的手淫行为，并描绘了这种行为如何影响了自己的性生活。这段著名的描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反思。[43] 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18世纪60年代，一位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最知名的医生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起，使一个50年前被普遍认为是淫秽下流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点。在接下来

的一百多年里，提索——那位著名医生——的作品仍然被无数知名学者所引用。而卢梭以自传的形式对于手淫话题的思考则成为手淫文化讨论的定式，至少在教育领域是这样。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是另一个卢梭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名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给他的朋友考珀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罗斯金恳请考珀夫人作他的说客，劝说罗斯陶奇家族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请考珀夫人向陶奇家族解释，他与前妻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因为他不能享受床笫之欢，而是因为他只是不能同那个女人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他以自己的手淫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罗斯金力图说明的是，他手淫的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他已经完全从这种行为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考珀夫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 [44] 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段生活却成为证明他正常性能力的有利证据。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

另一位名叫高斯（Goss）的人撰写了一部《论健康》（至1830年至少再版十多次）。在书中，他引用了提索的观点，并声称女孩同样也会受到手淫行为的伤害，其伤害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因此，女孩也应得到帮助，而他的公司就可以提供专门的药品。19世纪末另一个著名的江湖庸

医——詹姆斯·霍德森（James Hodson）在其无耻的自我推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其他医生们所不具备的高超医术”，各种“所谓的医生”都曾经试图窃取他的作品和成果，而且宣称他所研制的“波斯大补丸”对那些“被某种秘不可言的恶习所困扰”的人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霍德森还借鉴了早期止痛项链的做法——在繁忙的咖啡馆里进行销售活动——他提供固定的场所进行销售，并使其成为一个书信交流的中心——寻医问药的信件、提供病例的信函，以及定购药品或书籍的邮单都可以在那里获取。繁荣的市场助长了手淫文化的传播。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版又一版与《手淫》类似的丛书，一边提供健康建议，一边以高价推销药品。[45] 直到20世纪，提索的《论手淫》在欧洲一直行销不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书的大获成功无疑也为报纸广告中各种药品的销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世纪中期时，治疗手淫的药品市场中不再仅限于药剂和药丸，各种医疗手段都介入进来。出于对手淫问题的焦虑和罪恶感，只要能够阻止手淫对身体造成伤害，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于它的需求总是源源不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也使治疗手淫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例如：阴茎勃起报警器、可以把阴茎锁起来的小盒子、睡觉时用的手铐、可以使被子不覆盖生殖器部位的摇床、防止女孩子将两腿叉开而将两脚捆在一起的脚绊……仅在美国就有至少20个这样的专利。[46] 许多健康丛书则督促家长要时时提高警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1712年被发现的疾病给广大的医疗市场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各种治疗手淫的专门产品和不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政策的争论，使手淫一直成为关注的话题。虽然他们的言论往往出自于不同的缘由，但在一个观点上却形成了共识：手淫行为是对人类性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全盘否定，它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是所有罪恶、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根源。19世纪的一位颅骨相学家福勒（O.S.Fowler）撰写了一部关于所有性变态行为的书，这本书也发行了近50万册。书中说道，手淫是“罪中之罪，恶中之恶”，它将导致无数的“性败坏、性无能、各种疾病以及道德败坏，其总数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各种非正常性行为的总和”。虽然福勒并不否认这种行为会产生自我愉悦，其他的人却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的医疗改革运动发起人、麦片王国的创始人凯洛格医生（J.H.Kellogg）认为，手淫是人类所有性怪癖中最恶劣的一种。他毫不掩饰对手淫的反感，称之为“人类的大敌”，是比私下性交易的“丑恶行径”更加“令人憎恶的恶行”。著名的薄脆饼干的创始人希尔维斯特·格兰汉姆（Sylvester Graham）也曾表示过同样的观点。[47]

将医学和道德教育相混合的18世纪学术传统依然在延续。由于手淫对身体的伤害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这一行为的警告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20世纪初出版的《童子警探》就对少年精英以及那些先前没有读过关于手淫文化著作的人提出警告。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Baden Powell）说道，如果这种“淫猥”的行为成为习惯，那么它很

快就会“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被这种行为折磨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最终将注定“进入疯人院”。在另一部流传甚广的小册子的前言中，美国童子军的领袖警告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只有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因过度手淫而不得不被送入疯人院。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即便是大一点的男孩也无法幸免。一旦加入皇家海军，每个人都会被发给一本邱鲁比著的《健康童年》，书中告诫大家，不正确地玩弄私处会导致神经错乱，这种行为是任何一个正常男性都应该自觉抵制的。[48]

女孩得到的警告则更为严重。曾为男孩著书警告的一位作者在专门为女孩编写的小册子中告诫说，如果她们手淫，将会精神完全崩溃，不仅像男孩一样要被送进疯人院，而且很有可能“早早离世”。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美国妇女俱乐部联盟社会健康协会主席的大力推荐。美国劳工儿童部在一本小册子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建议母亲们提高警惕，以免自己的孩子“一生不幸”。[49] 总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淫》所产生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也被越来越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道德健康的组织所关注。

手淫也出现在关于“体外排精”的医学道德讨论中。1000多年以来，对于几乎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学者来说，“俄南的罪恶”在于性行为中断。在19世纪更为专业的天主教医学道德讨论中，“体外排精”一词被定义为“当性交开始之后，在射精之前，将阴茎抽出，并排精于体外的一种避孕方式”。[50] 而且在19世纪，体外排精的含义还包括几乎所有的避孕措施。然而现在，体外排精的含义由于同下流低下的“手淫”联系在一起，变得邪恶起来。有人于是在“体外排精”之前加上“夫妻”一词作以修饰，然而却使得这种行为看上去更加邪恶。

但是，医生们对手淫行为所产生的罪恶并不感兴趣。把手淫是否有罪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医学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手淫不会产生的东西。例如，法国一直十分关注人口问题，因此有人要求专门成立一支警察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自渎”行为，即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突击检查，以确定这些孩子们身体健康。[51] 这种做法首先可以使孩子们远离手淫，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这种会让他们丢尽颜面的行为。而且，最起码，这种检查可以阻止手淫更加泛滥。但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在美国发起的反体外排精运动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角度出发，这一运动来源于他对手淫行为的罪恶感和敌意，因为手淫带给人的性享乐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性交行为来获得。

手淫对于那些体外排精的支持者来说，也不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行为。这些人支持体外排精也许出于不同的动机，如：认为少生孩子可以改变穷人的命运、担心人口过度增长、还有因为各种文化原因而导致的拒绝生育。但无论理由如何，这些对手淫言论的支持者却与那些认为所有拒绝生育的性行为都是错误的人惊人地一致。支持或反对“为性享乐而性交”的人，对于手淫这种自体性享乐行为，观点都是大致相同的。[52] 手淫是“少生还是多生”这一争论的底线。一方面，有争议认为，体外排精

是危险的，因为它将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手淫”。19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曾说过，一个经常手淫的女性，其内部器官的状况与一个采取体外排精措施的女性几乎完全一样。她早就对女性的自淫行为提出严重警告，并反对一切阻止受孕的方法。她认为，温柔的爱抚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因为通过爱抚，大脑可以向身体提供进行性行为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手淫是在没有爱抚刺激的情况下索取这种能量，而体外排精虽然形式不同，其本质与手淫完全一样。[53]

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争议的观点全然不同。这种争议认为，生理学已经证明，人类的生殖欲望本能——即追求性交的欲望——“高于一切，无论是在正常的性交行为还是在强暴行为中”（这句话出自于18世纪德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这一观点所引发的并非禁欲论，而是引发了对不受怀孕所困扰的安全性行为的追求。如果在传统的异性性交行为中不能找到一个对社会和个人都健康安全的出路，那么对性交本能的追求则会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用一种“有害的行为”来满足自我。因此，体外排精不仅可以避免怀孕，还可以避免手淫的发生。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在认识到性饥饿的严重性等同于食物饥饿之后”，我们已经不能依靠马尔萨斯所提倡的道德约束——独身和晚婚——来阻止性交行为。让缺乏性约束的严重后果蔓延开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文明的发展极不相称（马尔萨斯曾认为，饥荒、死亡和极度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正面有效的行为，因为它们可以使人口和食物提供保持平衡）。而那种“有害的行为”，即通过“手淫来获取满足感的非自然行为”，则绝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淫是一种“背离社会道德的堕落行为”，它并不能给实施者带来“心灵上的解脱”，相反，它使实施这种行为的人“身心受损，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手淫所产生的后果是“罪大恶极的”，相反，体外排精则是一种有节制的、自然的满足“生殖欲望本能”的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意外怀孕，而且“可以带来愉悦的享受”。简言之，体外排精可以防止手淫的发生。因此，无论是“体外排精”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手淫是人类的大敌，是万恶之源。[54]

推销治疗手淫的药物以及对手淫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成为当时专业出版物、医生论文、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书籍的一个惯例。正是通过这种医学与道德相结合的形式，无数普通大众开始意识到手淫行为的危害性。数百篇在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将新发现的这种或那种疾病归咎于手淫；所有的重要医学参考书都列有关于手淫话题的条目；泌尿学、妇科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性医学的专业书籍为普通文学作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关于手淫材料。在其他的参考书籍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对手淫的讨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个话题几乎无处不在，无法回避。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位关注时事的居民，在某天拿起一份地方医院的报告时，会发现这样的告诫：“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这种被广泛关注的罪恶”（即手淫），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或对公众为驱除这种恶习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反对，都应被视作违法行为。[55] 对手淫问题保持沉默即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反抗，因此，有人甚至对制衣

厂的女工表示担忧，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观察，女工在操作缝纫机时会大腿摩擦，这完全可能是一种“自淫”行为。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代表了现代工业和自由主义的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的行为和操作缝纫机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对手淫的焦虑。[56]

20世纪早期，“手淫致病论”的影响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医学—道德危害论，这一论调蔓延至新的领域。性健康成为优生学的一部分，而优生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世界流行的“人种竞争论”中，是保障人口质量的重要手段。优生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手淫。例如，在日本，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将性教育和优生学引进了日本教育，手淫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日本第一家女子医学院的创立者曾经这样说，“手淫是所有性欲本能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性交的基本目的是繁衍健康的后代，因此手淫不仅会对个人的生殖能力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还将危害社会。在那些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57] 西方关于性健康的一本指南中曾经有这样的警告，人一旦“违反自然规律”，将永远失去生殖能力。对于那些实施此行为的轻率少年，手淫不仅会对肌肉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而且那些不洁的幻想也会使他们道德沦丧。因此，这本指南建议说，在这个信奉个人主义的年代里，母亲们要提高警惕，但更重要的是，“男孩子们必须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获得自我救赎”。[58]

然而，旧的手淫致病论的影响仍然存在。1900年，由于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已经不再把肺结核的病因归咎于手淫。但是，反射生理学和对新陈代谢的生化研究却为手淫致病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心脏杂音、眼球痉挛以及各种神经及心理疾病被认定与手淫行为有关。直到20世纪，现代生物学才不再坚持手淫致病论，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手淫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堪称青少年心理研究开山鼻祖的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第一所邀请弗洛伊德开设讲座的大学）校长史丹利·霍尔教授（G.Stanley Hall）曾经说过，“手淫是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是人性弱点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而且是一系列神经及心脉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一言论至今仍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他看来，手淫这种堕落的行为是所有重大罪恶——无论是社会罪恶还是个人罪恶——的根源。霍尔教授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文化评论的主流观点（第六章中将有详细的阐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由《手淫》一书开创的手淫致病论这一医学传统，经过提索的系统整理后，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到达鼎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消亡。

然而，医学——无论是专业医学还是大众医学，只是推动《手淫》遍布世界的两大原因之一。纯粹的商业理由、医学—道德论的公共讨论、或是对手淫致病的传统研究都不能作为惟一的原因来解释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真正缘由。如所罗门医生、高斯以及霍德森之流的畅销书虽然不具任何学术意义，但他们表达了与卢梭《爱弥尔》一书相同的观点，即手淫对伦理道德危害深重，正是在道德危害的基础上才产生出医学的危害。那么，普通大众是如何理解并接受这些哲学家、学者，甚至如所罗

门医生之类的庸医所提出的道德警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手淫如何从伦敦传播至整个世界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心急的读者可以跳至第四章和第五章寻求答案）。但是，有关手淫的道德讨论有着自己的传播渠道，这些渠道在手淫致病论的影响逐渐消亡之后，逐渐得以增加和扩张。

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高雅读物都一致认为，手淫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行为自我满足的特质。它使人们幻想得到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性享乐成为可能，无需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因为所有必需的物品——欲望以及满足感——都存在于个体自身。“手淫者身上永远具有实施这种罪恶所必需的手段、工具以及动机”。“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恣意妄为地任自己的身体受淫秽欲望的摆布；支配他们的是幻想，而非自然”（后面这句话翻译自四十年前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关于手淫话题的文章，几乎一字不差）。阻止某种恶行发生的一贯性做法——避免受到诱惑——对于手淫这种完全起因于内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与此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手淫行为十分猖獗，因为这种罪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而且没有任何制约的方法。此外，由于手淫总是由个体独自私下进行，也有些异端分子聚众手淫，因此对于某些人而言，它似乎是惟一可以逃脱社会谴责，并不受惩罚的恶习。人们通常认为，惩罚是制约恶行繁衍的有效手段。（《手淫》作者也曾宣称，他之所以著书将手淫这种恶行公布于众的原因之一，也是为揭露这种行为的私密性。）例如，有些女子由于惧怕丧失名誉而不敢偷情，但是她们却可以通过手淫来毫无顾虑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癖好频繁发生呢？”[59]

若想打破这种隐秘性质，就需要依靠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学校和教师们应该公开这种恶行，因为恶行一旦公开，就会引起重视——虽然，我们也许会对此提出质疑。首先，学校的数量，无论是男校还是女校，比起以往都大为增加。因此，处于成年人监控之外的青少年性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起来。而且，在18世纪，青少年教育是追求自治、自我决策、道德自我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教育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爱弥儿》的广泛传播以及对这本书的热烈讨论使手淫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另外一种从教育意义上对此进行的讨论则进一步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英国作家、坦布里奇学校的校长维塞斯莫·诺克斯（Vicesimus Knox）在1783年写道，学校的教师们在进行反手淫的教育中，无论怎样恐吓都不为过；他建议“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大肆渲染手淫的严重后果”。诺克斯1793年因为公开宣扬反对反革命性质的法国战争而被保守分子从布赖顿驱逐，他支持天主教的解放学说。由此可见，在现代新思想中，手淫是罪恶深重的。

《手淫》在德国掀起的热度是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致力于发展公民文化的德国教育学者们对手淫这种私密的恶习给予了充分关注。齐莫尔曼教授与提索、歌德，以及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精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当时最具进步意义的期刊上（在这份期刊上，哲学家康德曾发表

过“何为启蒙”的著名文章）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章中，他郑重告诫说，女孩同男孩一样，也存在手淫行为；而且手淫对女孩所造成的伤害毫不亚于对男孩的摧残。以教育文章著称、并将“偏执行为”一词引入医学实践的萨缪尔·高蒂·凡戈尔博士将手淫对男女两性的危害分别列出来，并指出手淫对女性的危害要远远超过男性。[60] 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德国教育家沙尔斯曼（C.G.Salzmann）曾就手淫这一话题撰写了一部300多页的著作，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令人震惊不已。这本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女权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玛丽·伍斯托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就曾经翻译过——更准确地说，是修改过——沙尔斯曼的主要作品。她也曾在别处发表文章，阐述了与她的德国同行相同的观点。她认为，人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会产生真实的社会后果。尤其是，“男性世界对贞节的不重视……是许多给人类造成磨难的身心罪恶的根源”。男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这种“肮脏而不体面的小把戏”不仅“使身体日益虚弱，而且令大脑越来越迟钝”。她在文章最后总结说，“这种自我满足的行为使人的大脑很早就受到污染。”“手淫这种个体性恶习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害。”[61] 无论这位英国女权运动者的观点是否受到沙尔斯曼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沙尔斯曼在教育界声名赫赫，他撰写的长达314页的《论青少年的隐秘恶行》在西方有着重要的影响。[62]

沙尔斯曼在书中说，在手淫现象刚刚出现萌芽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作品，那时“手淫”这个词汇还未被大家所熟知。在开头的一个故事里（这本书以很多封书信组成，大多数信件来自于受手淫行为困扰的年轻人，每封信之后还附有作者的评论），一个男孩说，他不断地听到“手淫”这个词，但并不清楚它的含义，他曾经以为这个词指的是“兽性”。但令他迷惑的是，为什么人们放着现存的词汇不用，而用这个“含义生涩”的词呢？的确，沙尔斯曼也承认，“手淫”在德语中是一个崭新的词汇，德语中更常用、并更具有描述性质的词汇是“自渎”。此外，就像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件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老师和家长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手淫是万恶之源，或者说，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这一点。因此，沙尔斯曼认为，自己有理由将这种新的恶行公布于众。对于恶行，尤其是亟待解决的恶行，决不可轻描淡写，等闲视之。[63]

另外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德国，以及在世界各地，手淫现象一直存在，并等待被发掘。对于手淫行为，需要不断地批评、谴责并提出警告，不能只依靠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外在的约束对这种恶行丝毫不起任何作用，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廉耻心和罪恶感来自我约束。这种廉耻心和罪恶感是由不断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手淫恶习一旦染上，就会上瘾。因此，对这种行为需要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谴责。手淫经常被比作吸烟，为满足无穷无尽的自我欲望，沉溺于这两种恶习的人都会越陷越深。但是，与吸烟不同的是，手淫行为中不存在交换，也不存在经济上的控制。沙尔斯曼认为，在所有恶行当中，手淫第一眼看上去是最不严重、最不普遍、也最不具危害性的行为，这也揭示了为什么1000多年来它几乎完全不受关注的原因。自《手淫》一书开始，每一种有关此书的质问都集中在这本书如何地引人误入歧途，以及因此而导

致手淫泛滥猖獗。一位校长在给沙尔斯曼的信中写道，“我问了94个学生”，49个承认有手淫行为。这位校长继续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相信，其他的45个学生没有那种行为”。[64]

校长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实施了这种行为，是因为再没有任何一种恶习比手淫更具有诱惑力，而且更容易进行。它可以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悄然实施，而且，“进行手淫的机会永远存在”。它完全不受公众的监控，因为“若想不为人知，实在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中通常用来阻止恶行的方法对手淫丝毫不起任何作用，阻碍定律和惰性定律也并不适用。“至少”——沙尔斯曼在这里表达了与卢梭在《忏悔录》中相同的观点，《忏悔录》在德国面世要比沙尔斯曼的著作出版早两年[65]——“在异性性交中存在种种约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在其中阻碍着。……必须确定时间和地点……必须做好安排，以免被人发现而名誉扫地；总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由于手淫往往是独自私下进行，因此这种无法摆脱的恶行完全有可能禁锢人的灵魂，等手淫者意识到这种恶习的危害性时，已为时晚矣。沙尔斯曼的书里充满了忏悔者的故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告诉大家，他们想尽办法试图摆脱这种恶习，却总是无奈地又一次陷入其中。手淫像毒品一样，令手淫者一再上瘾，无法自拔。和海洛因以及其他具有致命诱惑力的毒品一样，只要沾染上一次，手淫就会令无数无辜的人一步一步地变成瘾君子。

18世纪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腐败因素——学校、交友不慎，以及心怀不轨的保姆或仆人——令年轻人走向不归之路。但沙尔斯曼却同弗洛伊德一样，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清楚地阐明，手淫行为完全起因于人的内在欲望，只有羞耻心和罪恶感才能挽救这些迷途羔羊，并将这种轻率的自我性行为转化成需要更多责任感的社会性行为。换言之，手淫这一恶行的内在结构——无尽的欲望、不为人知的私密性——需要尽可能多的社会批判和谴责。正因为手淫是一种偷偷摸摸、暗地进行的龌龊行为，教师们应该以异常激烈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

“我并不是由别人引导而沉溺于这种行为的，”一位年仅13岁的男孩这样写道，他完全是自己学会的。在给沙尔斯曼的信中，这个男孩继续写道，“我从未听说过手淫这个词，我甚至并不知道它和异性性交有任何区别。”他说，“许多年来，我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在他看来，手淫行为毫无害处，就如同和同伴互相呵痒、嬉笑打闹一般简单。他说，他只是觉得这样做很舒服——每两周一次，或者更频繁些，并且觉得这种行为完全无辜，如果父母问起，他也会如实相告的。这个孩子的想法看起来如此幼稚，但却是自体性行为危害的绝佳体现。在弗洛伊德创立性个体发生的模式之前这种模式认为，手淫无处不在，只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不会造成危害和灾难，批判手淫的言辞激烈地就像一场战争，似乎永无尽头。[66] 手淫，如同生物学上的单性生殖一样，似乎完全是由人的身体所激发，甚至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如此。

卢梭在《爱弥儿》中对世人发出的警告越来越令人担忧，每一次警告都

使手淫这种恶习为更多人所知，令更多人恐惧。19世纪初法国的一部医学百科丛书写道，“从这种行为诞生之日起”，它的破坏性就极大，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出版这部医学百科的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出版社，他们还曾经出版了著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如果出于某种偶然”，或是因为“外在的接触令孩子们（通常指男孩，但并非总是这样）发现生殖器官那里隐藏着令人兴奋的力量”，那里“汇聚着生命的所有能量”，那么一切就无可挽回了。“他将会被愉悦的假象所欺骗，沉溺于某种恶习之中，这一恶习将迅速把他引向一条不归路，或是带给他比死亡更痛苦的折磨。”“最终一切将无可挽回”，医学百科中这样描述道，同样的话也曾出现在《爱弥儿》中。“外在的接触”在这里指的是长久以来误导人们的一种传统做法，一直以来，护士们通常采取拨弄婴儿小鸡鸡的做法让婴儿安静下来。

在对手淫文化的发掘中，我想，好像从未有人对这一做法表示过担忧。早在17世纪初期，路易十三的医生就曾经毫不在意地向世人介绍，路易十三小的时候总是哭闹，每当这时，奶妈就会拨弄他的小阴茎使他安静下来。对于这种公然的手淫行为，这位医生并没有进行任何谴责，尽管他对于当时宫廷里的淫乱之风颇为痛恨。在比这更早的16世纪，意大利著名解剖学家法罗皮欧（Fallopius）曾经鼓励当时的父母们要不断地摩擦小孩的阴茎，令其一次又一次地勃起。据说，这样做可以使阴茎变大，令他未来的妻子易于受孕。[67] 然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在18世纪的后30年里，由于提索和卢梭的影响，《手淫》所揭露的这种“道德受伤所带来的痛苦和困扰”得到广泛认同。手淫此时所附带的道德影响力范围之大，在一个世纪之前几乎无法想像。手淫文化也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的文化讨论中不断向前发展。对什么是道德自治主体有着最深刻研究的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出于复杂的原因，也曾就此话题展开评论。对于康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我们探讨他的观点之前，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康德常用的几个术语。在康德的词汇中，“道德自我意识”、“自尊”和“道德自我认知”同属一类，“自我放纵”与它们不同，和“自我糟蹋”同属一类，其含义为“暴饮暴食而导致的自我麻木行为”。手淫是一种对自我的放纵，而康德一直试图创立的正是自我的道德基础。手淫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是世俗性欲贪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于它对新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新秩序正是以道德作为立足点的。

基督教道德理论关注的焦点——婚姻内的性——在康德看来，并不存在很大问题。这一观点似乎有些令人惊异。康德的观点认为，性爱是一种空洞的“爱”，更确切地说，只是“对某一物体最强烈的感官享受”。所谓的性爱与道德之爱或仁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它只是“欲望的最高层次——激情”的一种体现。而且最重要的是，性享乐是一种无耻的、“利用他人使自己得到享受”的行为。这种对他人的利用是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这一观点也可以用现代的理性伦理观来解释。从根本上说，理性的男女双方——他们是平等的契约行为者——对利用彼此的做法以谋求回报的做法可以互相认同。他们可以订立婚姻契

约，通过这一契约，他们不仅“互相赋予对方一定的义务”，并且可以将性享乐“与道德之爱在现实理智的有限条件下结合起来”。

换言之，激情是由公民社会所掌控的。人在社会中承担的各种义务和责任会阻止为享乐目的而利用他人——或自己——的自私行为。对于早期性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欲”、“淫秽”或“贞操”等话题，康德并未发表任何议论。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性交行为——出于生殖目的之外的性享乐——虽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并非难以处理，因为它只是在表面上看来违反了自然规律。但手淫——道德神学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却全然不同。康德认为，手淫是道德的错乱，严重地“背离自然规律”，而且，是对道德主体的彻底毁灭。用手淫来亵渎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兽性。[68]

康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通过婚姻和另一人达成协议，利用他（她）满足自己的性享乐，但是，他可以和自己订立这样一个协议吗？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是否应该有责任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利用的物体，尤其是，不让自己成为一个为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而被利用的物体？康德的答案显而易见。再没有任何行为可以比手淫更能触动道德存在体的核心。它被称作“亵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自我人性的堕落”。追求自我享乐的本能叫做“肉欲”，这种恶行叫做“秽行”，而“与这种感官本能相联系的”品质被称作“贞操”。换言之，“贞操”已经不再是一种与他人有关的操守，“从今以后，应被视为一个人对自己应尽的职责”。

在手淫这一问题上，没有似是而非，一切都纯净透明。很明显，“对于每一个人”，这种对自己身体的自渎行为是“对道德最严重的违背”。只要一想到这种行为，就令人作呕，以至于“连提到它的名字都会觉得有失体面”。康德指出，在这一点上，“自我糟蹋”行为则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并不惧怕他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些丑态”。当然，在谈论性享乐——即便是婚姻之爱——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词谨慎，“为这种行为蒙上一层薄纱”。但是，手淫是一种甚至连名字都不敢提及的巨大罪恶。虽然中世纪神学家也曾猛烈批判过鸡奸（手淫曾被认为是鸡奸的一种），但用这样的激烈言辞批判手淫行为的人，除神学家外，康德是第一个。

在康德看来，手淫比自杀性质更加严重，因为它违背了理性准则：自杀只是对个人生存规律的违背，而手淫是对更高层意义上的种族生存规律的嘲弄。更重要的是，引起这种行为的冲动本身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淫欲是自然规律所不允许的。康德进一步解释说：

一个人的手淫欲望，并非由真实的对象所引起，而是由这个对象挑起的幻想所激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欲望的真实目的相违背的，因为这一对象是由他自身所创造。幻想所带来的欲望完全不同于以繁衍生息为目的的性行为……或者说，与婚姻所订立的共同享乐的契约也是相违背的。

弗洛伊德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对自身的迷恋，这种自恋的性行为属于变态行为。

最后，和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一样，康德还回答了有关不以自然繁衍为目的的纯粹肉体欢娱行为的问题。他的回答虽然不很直接，但也意义深刻。康德认为，尽管这种行为是对性欲望的误用，但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正常的性欲望可以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控制，然而，手淫却是对理性和社会的双重背弃。这种行为并非如医生所说，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更准确地说，它应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错乱。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康德的观点，是因为他对道德自治的现代本体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康德定义了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抛弃一切童年的道德枷锁和桎梏，从而变成能够自主决策并且用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从这一框架来理解，手淫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与康德怀有相同见解的人还有很多。1786年，Berliner Monatsschrift杂志在刊登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两年之后，进行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主题为“青少年如何能够身心安然地不受淫秽恶行，尤其是手淫恶习的侵扰？又或，如若已经受此恶习困扰，青少年将如何应对？”一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友人”为这次活动设立的奖金高达60德国银币——相当于一个雇佣劳工一整年的收入。当时最著名的教育改革者坎帕（Joachim Heinrich Campe）受邀担任评判。坎帕阅读了大量征文，最后选出4篇，全文或部分地刊登出来，并收编进他正在进行的一个有关德国教育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重新编定教育纲目，以适应新的公民社会的要求。这类以征文形式出现的获奖征文不断被刊登出来，并在杂志、周刊和报纸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这样一来，对手淫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极大危害，几乎人人皆知。[69]

由于康德、坎帕以及其他关注此现象的学者的共同努力，手淫文化成为当时道德讨论的中心。但在此之前，这一文化就已经在西方世界稳稳立足了。在18世纪末期，它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种性行为。对于手淫现象的讨论和现代主义的发展一起，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当然，教会除外——尽管人们希望这样，这座道德说教的堡垒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加入进来。它生怕自己的提醒会使那些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心生好奇，而且，从传统上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令神学感兴趣的问题。直到1844年，一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才公开斥责教会没有给予手淫现象足够的重视。然而，他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他作为医生的职责之上，而非神学职责。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从医学和生理学书籍上搜集到的那些因手淫而致死的恐怖故事。这位牧师说道，这些故事可以让道德神学了解手淫这种被忽视已久的恶习所产生的危害。[70]

虽然手淫文化并未如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出现在道德神学和宗教领域，它却已经在19世纪时遍布整个文化范畴，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艺著作中。它的提及更多地是被用作比喻，将18世纪对自我本性的质疑——不受外在世界约束的心灵生活——用疯癫和掩饰伪装起来。这令我想起拜伦（Byron）对济慈（Keats）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毫无

任何意义”，“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简言之，就是“诗歌的手淫行为”。济慈的诗歌充满了幻想，他给浪漫主义的幻想赋予了无尽的欲望，并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就曾经批判他的诗歌“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刺激”。这指的是济慈诗歌中常见的想像手法。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在自己创作的诗歌《自我赞歌》中歌颂手淫，从而被现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之为惠特曼诗歌的“真正丑恶之作”。[71]

当然，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讽刺。无论是广义的文学，还是浪漫主义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似乎都会引起手淫。这样认为的人大有人在。然而，伦理学家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并非凭空捏造。俄国现实主义创始人、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评论家之一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曾经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承认，他在19岁第一次阅读拜伦和席勒（Schiller）的作品时，就曾经因此而手淫。[72]

不管文学或某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手淫，“手淫”这一词汇却从此被赋予比喻意义，直到19、20甚至21世纪也是如此。它总是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或是指想像力过度，或是指不够严肃认真，甚至还可以用来比喻缺乏理性、合理及教养的行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对于这一词语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巧妙地将这一词汇的本义和比喻意义结合起来。瓦格纳不仅对于手淫所引起的道德败坏、身心伤害进行批判，还特别指出，犹太艺术存在着“手淫”的性质，即自娱自乐。他以拜伦攻击济慈的同样手法说道：“（犹太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艺术。”瓦格纳并非是这种观点的惟一持有者。最早将犹太文化与“手淫”联系在一起的是阿比·格里高利（Abbé Grégoire），法国革命文化政治的推动者，也是犹太解放论的倡导者。在一本小册子中，格里高利将所有拒绝同化的犹太人称为“手淫者”，声称这些人只有被世俗同化之后，才能成为公民——才能拥有体面的性生活。19世纪末期的文化反犹太运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以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为代表）的艺术总是只指向艺术本身，缺乏民族基础。犹太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自娱自乐（与“手淫”近义）；而犹太人自娱自乐，是因为他们堕落。而且，尽管瓦格纳十分清楚犹太诗人西尔多·阿佩尔（Theodor Apel）双目失明的原因是因一次意外坠马事件，他却仍将这位诗人失明的原因归咎于“手淫”。[73]

手淫文化在18世纪末已经完全成熟，并被引喻至各个文化领域。不仅如此，在政治领域，它也成为对大小政治事件的攻击手段之一。1793年，革命激进分子在对玛丽·安托万内特女王（Marie-Antoinette）罪行的指控中，就曾攻击她教唆她的儿子、年仅9岁的皇太子进行手淫。法国法学家阿贝尔（Hébert）对法庭说，皇太子年幼多病，而这种自渎行为无疑“对他的病况造成致命的影响”。当皇太子被问到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罪恶行径”时，男孩回答道，“是母亲和阿姨教会了他这种行为”。[74]
玛丽女王或许因叛国而有罪；当时的贵族阶层淫乱之风盛行，玛丽女王与她的密友玻丽歌公爵夫人（Duchess de Polignac）或许也有私情；但就手淫来说，玛丽女王是无辜的。革命者将叛国罪名与手淫罪名并列在

一起，其用意显而易见。在玛丽女王的政敌看来，手淫行为隐秘、肮脏、极具欺骗性质，再没有比手淫更适合的性淫乱行为可以和女王的政治罪行、古老政权的腐朽堕落，以及这位异国王后所带来的腐化罪恶相匹配的了。玛丽女王正是想用这种肮脏行为使她的儿子堕入深渊。

一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手淫”又成为神智学会两个不同派别互相攻击的武器之一。据说学会中某一派别的一位教师利德比特（C.W.Leadbeater）——该派别的创始人安妮·贝桑（Annie Besant）后来曾为他的行为辩护——教导男孩们手淫，以此作为预防更恶劣的性行为的一种方式。神智学会的美国分会于是对利德比特的变态行为提起控诉，以表示本派别的清白。[75]（1991年，以塑造皮威·赫曼［Pee-Wee Herman］这一喜剧形象而家喻户晓的演员保罗·雷宾斯Paul Reubens，因在成年人电影院手淫而被逮捕，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受到重创。看来，似乎没有比手淫更令人耻辱的行为了。）

这样一种不可告人的行为很容易——至少在想像中看来——被当做敲诈勒索的依据。19世纪一家英国报纸也曾经报道，向这些受到惊吓的手淫者兜售药品的公司不断地胁迫手淫者购买更多的药品，如若不从，就会把手淫者的资料公布于众。[76]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塑造的那个贼眉鼠眼、脸上长满疙瘩、面色灰黄、不可信赖的龌龊人物尤来亚（Uriah Heep），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手淫者形象。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形象，如在狄更斯作品中也出现了其他关于手淫的有趣描述。如在《雾都孤儿》中，他引用了斯威夫特那句经典的玩笑：“查理·贝茨，查理·贝茨大人，贝茨大人”（原文为Master Bates，读音和masturbates相同——译者注）。在《远大前程》中，有大篇幅关于匹普如何试图掩藏他的“邪恶秘密”，“隐藏在裤管之下的秘密”的描写。[77] 狄更斯由此开创了一个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手淫者从外表上就能判断出来。“面无血色，四肢无力，胸部凹陷，全身发软，耷拉着脑袋……脸色如死灰一般……眼神暗淡无光，眼睑低垂”。许多广泛流行的医学书籍如此描绘手淫者的形象，并配有插图[1]。而这些描述似乎还不完全足以刻画手淫者的猥琐形象。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曾经看见并且在给他未婚妻的书信中所提到的那个18岁的英俊少年，也被这一“违背自然的恶习”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一生已经全然被毁，只落得形单影只，终生残疾的下场”。最近，有人对18、19以及20世纪德国文学中所涉及到的手淫现象展开了一次广泛调查，却仍然难以完全统计清楚。在一些论文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有关手淫的讨论。手淫者已经成为公众嘲笑或愚弄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感到惋惜或恐惧。因此，沾染了这种行为的年轻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恶习。[78]

在如上对手淫者的描绘中，医学与道德伦理互相吻合。但是，那些对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感兴趣的医生们，即使他们对于“手淫致病论”并不认同，对手淫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例如，美国第一位女性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充分运用了现代医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她认为，手淫是导致“所有其他违背自然的恶行”的两

大罪恶根源之一，另外一个是家庭暴力。这一论点是“贞节运动”的主要观点——布莱克威尔曾著书支持这一运动，但是却与“手淫致病论”无关。事实上，布莱克威尔把手淫看做是推动一次政治提议的武器：在一次大的立法运动中，手淫成为女权主义抨击双重标准的核心问题。布莱克威尔认为，男女双方对性的欲望是相同的，因此，那种认为男性需要用嫖妓服务来宣泄欲望的观点毫无根据。“用嫖妓的方法来宣泄男性欲望”是《传染病法案》的支持者所倡导的。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19世纪的英国采取像法国那样由国家颁发嫖妓许可令的荒唐制度。布莱克威尔还认为，对于男女双方来说，手淫危害无穷，不仅因为这种行为会使性本能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手淫过早地开发了人的性本能，而且因为手淫会削弱人的自制力。而人的自制力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由于手淫很容易令人沉溺其中，因此在所有性行为中，它是最不容易受理性控制的一种。不仅如此，手淫还提供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性生活模式，是最严重的淫秽行为 [79] ——这就是它的危害所在，与肺结核或精神失常并无必然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已不再相信“手淫致病论”了，它只停留在无知者的迷信观念和民间说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完全覆灭，因为这一理论给现代手淫文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个始终位于西方性文化研究中心地位的话题——手淫。在与医学疾病完全脱离干系之后，手淫文化以三种互相独立却彼此相连的方式，进入到20世纪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潮当中。

首先，在人类学、动物行为学、性医学、精神病学，动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读物和学术著作中，人们发现，手淫行为在青少年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长期以来十分明显的事实，并引起无数人的担忧。不仅如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中，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这一行为也十分普遍。甚至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如：马、威尔士矮脚马、熊、雪貂、狗、猫、猿猴、臭鼬和鹿。不仅是欧洲人，巴厘人、埃及人、非洲霍屯督人、印度人、泰米尔人、巴苏托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有手淫的历史；不仅学生，无论男男女女，无论精英学校的学生，还是教养院的少年，都普遍存在手淫行为。当然，因为性别或种族的差异，也许方式会有所不同。此外，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女性自淫现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于性用品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对那些“沉溺于某种性愉悦方式”的人来说。然而，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强大的事实：每个人都会手淫。对于如此纷杂的研究材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从中提炼了“堕落学说”——一种风行于19世纪的观点，认为手淫和嫖妓是人类退步的表现。还有人提出一种假说，即在生殖能力形成之前，性意识的过早启蒙会使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宣泄性欲的出口。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十分必要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人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就持有这一观点。德国性医学家布罗赫（Iwan Bloch）则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尼采（Nietzsche）的观点：一个文明人需要为自己的本能找到合适的出口。有一些研究借用了动物界自淫的资料，而另外一些则没有。但总的说来，这些在欧洲和美洲可以广泛阅读的新资料

极大地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发展。那种认为手淫只是青少年的道德败坏行为，只要有正确的教育、只要不结交心怀不轨的朋友、只要避开恶仆的影响就可以预防这一恶习的观点，已经被证明完全是个谎言。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手淫不仅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而且是普遍存在的。[80]

手淫文化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主要渠道主要建立在上面所述的那些新资料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新资料为手淫增添了重要的心理学上的意义。1899年，英国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发明了“自体性行为”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没有外在刺激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因另外一个人（或物体）而发生的”所有性欲望。“自体性行为”的含义是广阔的，不仅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因性行为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异样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各种病态行为，还可以指代所有我们认为是高级文明产品的艺术成果，即赋予生活丰富色彩的艺术和诗歌行为。简言之，所有关于性的幻想——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就认为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大量性幻想——都可以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事实上，所有试图从身体内在获得性满足的企图，无论有意无意，都可被概括为“自体性行为”。[81]

当然，在“自体性行为”的广泛含义中，手淫仅仅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艾利斯指出，人们只有将这种行为视作“自然界众多事实行为中的一种”，才能够真正领会它的文化重要性。在这种事实行为的一端，是动物的自淫行为。虽然艾利斯引用很多文献来证明动物中也存在自淫行为，但这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他对动物的自淫行为进行研究是想证明，人从自身寻找性愉悦的癖好其实来源于自然界，因为野兽也有这种行为。但这种癖好也是文明作用的结果。正是那些令我们成为“人”的特质令“自体性行为”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此，在“自然界普遍事实行为”的另一端，是一种融合了想像力、性欲和艺术的人类行为。在艾利斯的定义中，手淫是精神性行为的体现，如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所言，是一种能对文化造成影响的性行为，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的幻想。[82]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手淫的危害性在于它的不可告人性以及缺乏社会及道德的约束。然而，这种行为现在却被定义为众多正常行为的一种，完全不必受到时间、地点、社会和责任义务的限制，并且可以通过任何一种精神活动而获得，对它的道德评判现在也取决于个人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曾经将手淫比喻为“中产阶级的脑力性行为”——这也是查太莱夫人情人的魅力所在——的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手淫只是真实的两性性交行为的虚假代替品，那些抱怨少男少女们过早进行性行为的人们其实是在哀叹“他们本该被分开，用手淫来代替真实的性交”。性的欲望必须找到合适的宣泄口，在“我们这一灿烂的文明里，出路就是手淫”，换言之，就是精神的性行为。劳伦斯指出，现代的流行文学和流行娱乐似乎都在暗中推动这种隐秘的行为，而在这种行为的进行过程中，人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具行尸走肉”。[83] 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令劳伦斯对手淫产生反感的并非是手淫所具备的精神幻想特质，和18世纪的评论家一样，让劳伦斯厌恶的是这种行为的隐秘性令人

感到羞耻，“比身体的排泄物更加不可告人”。

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对艾利斯的理论表示出更多的支持。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在手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幻想，维达尔额外还注明，会产生与他人性交的幻想。从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手淫》一书遗留下来的影响。维达尔评论说，“很少有人会承认，为了获取或维持性快感，人们在性交过程中会制造一些想像的情欲画面来作为肉体的补充”。卢梭所声称的“危险的补充”在手淫中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似乎颇有益处。当然，维达尔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正确。他认为，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所有人呢？——为使手淫行为更加意味深长，在“行为初期，他的脑海中会呈现出类似酒神节狂欢的场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果幻想得太美妙，那么与异性的性交就会显得索然无趣。18世纪时，这种担忧非常普遍。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幻想行为，无疑将会成为培养丰富想像力的温床。[84]

在纪德自传的第一页，他描写的关于自己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淫”。据纪德的描述，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和一个仆人的儿子躲在餐桌底下偷偷手淫。虽然纪德觉得十分享受，但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这一段回忆注定成为纪德发现自我以及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手淫”成为“幻想力”的代名词之后，这段回忆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行为的惟一原因，是性心理的发展”，纪德这样向文学家罗歇·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解释道。同时，纪德将这一行为描绘为“一种虽然特别，但是完全自然的性情”，意思是说，他的需求和性能量需要通过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情欲亢奋将其释放出来。这些情欲亢奋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主宰一切欲望、得失、成果、享受，甚至包括他的爱好——文学和雪茄。他认为，如果没有完全到达高潮，罪恶就不会过于深重。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经常是一整夜，却从未令他犯下最高程度的恶行”。将手淫视作探索自我过程中必经阶段之一的观点最早出现于卢梭的《忏悔录》中，200年后，又重新以直白的语言形式再次出现。

令手淫文化成为20世纪热点话题的第三个渠道——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手淫成为人类心理发生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令手淫地位如此突出的人并非只有弗洛伊德一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艾利斯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例如，性学研究的创始人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虽然对于手淫对身体的危害毫不在意，但却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比手淫更加污染人的心灵”，换言之，手淫在所有性行为中，最有可能导致“对异性的扭曲心态”、以及对欲望的变态心理。这种扭曲的心态和同性恋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婴儿期的手淫心理中解脱出来，将会径直走向人性的扭曲。[85] 美国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G.Stanley Hall）也认为，青少年时代的几乎所有逆行，从对电影的过度迷恋到吸毒等，其根源都可以归咎于手淫。但是，是弗洛伊德清晰而明确地告诉世人，手淫是性的秘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学术飞跃，是因为弗洛伊德洞察到，人类的性欲望并非“顺其自然”地被引导到繁衍生息、或是所谓的异性性交行为上。若想使肉体和肉体欲望转变成有用的、能够繁衍后代以维持种族生存的男女两性关系，文明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从广义上说，将婴儿期形成的、无序的性能量转化为成年时期有组织、有条理的性生活的过程，也是欲望本身受到约束和引导的过程。人类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是追求艺术、音乐、文学，以及所有类型的文化，就必须完成这一蜕变。转变婴儿时期所产生的自体性行为就是蜕变的开始。通过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以及对该理论的无数诠释，手淫文化终于从18世纪评论家所制造的梦魇中解脱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手淫可谓是被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也是与他的基本观点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曾经认为，精神病症的根源在于实际存在的精神创伤，也就是所谓的“诱引说”。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精神病症的产生是个人性欲望受到压抑并产生罪恶感的结果。弗洛伊德对手淫的研究则可被看做是架通这两种理论的桥梁。1905年，在他经典的“少女多拉的分析”中，他将多拉不断受到幻象困扰的原因解释为未能成功摆脱婴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86] 在多拉性意识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手淫行为的不断斗争是给她造成心理创伤的根本原因。

弗洛伊德理论的演变诞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手淫是性欲表现的基本形式。它在性心理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完全自然而且合乎常理的行为，但是必须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将这种行为摒弃。正是在和手淫的不断斗争中，文明将性欲望引向正确的途径。相反，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一欲望，注定将会是完全的毁灭。1897年末，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怀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写道，“我逐渐领悟到，手淫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是人最基本的一种嗜好”。而且，就与对香烟、酒精或吗啡的吸嗜成瘾一样，这一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弗洛伊德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时写道，手淫的作用和赌桌上的赌博行为类似。他指出，赌桌上常用的词“play”（赌，玩一把）和幼儿园中常用的“play”（玩弄生殖器）是同一词。[87]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涉及“自体性行为”的。而且，弗洛伊德不时地将焦虑症、强迫症、自恋症、神经性呕吐、婴儿期性欲压抑、甚至罪恶感（尽管对此有争议）都归结于性满足感的基本途径与心理因素互相斗争的结果。但是，与其说手淫是成年性成熟的劲敌，不如说它是性成熟的预兆。婴儿期的手淫行为其实是在宣告，生殖器——如弗洛伊德所言——“注定会在将来成为伟大的物件”。人作为性个体的整个组织构造是由自体性行为协调完成的：“由这一性感应区域所引起的未来性交行为的满足感，正是建立在婴儿期手淫行为基础之上。”[88]

手淫这种曾在道德上受到质疑而且被医学认定为极其有害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成为心理发展模式的必经阶段之一。它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并要以正确、有序的方法实现超越的一个阶段。同时，手淫也是真正性交行为的重要演练，“是为成年性行为而进行的预先准备”，弗

洛伊德的追随者、心理学家玛丽·波拿巴特（Marie Bonaparte）这样说道。[89] 但是，对女性而言，这一说法却并不成立，因为她们早期的手淫行为和成年之后的性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为了走向成熟，女孩子们所要摒弃的不仅仅只是手淫这种行为，还有婴儿期所感受到的性高潮体验。也就是说，要摒弃刺激阴蒂的性行为，而学会体验阴道性行为；要抛弃主动性行为的幻想，而接受女性在性交行为中被动的现实。在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中，手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几千年以来被忽略的女性手淫研究在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多年来，手淫一直遭受着文化的批判。如今，历史终于被改写，这种自体性行为被定义为塑造自我的重要因素。在旧的历史和新的发现之间，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他们而言，手淫文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研究领域。1910年，维也纳心理学研究界的学者们曾聚集在一起，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对《手淫》一书进行讨论，最终因为分歧太多而无法刊登关于这次座谈的任何成果。两年后，他们又相继召开了9次座谈会，但依旧很难找到共识。弗洛伊德在会谈报告的结尾处只好写道：“关于手淫的讨论的确永无止境。”200年前，当手淫文化从贫民窟产生出来时，它曾被形容为“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行为”；200年后，手淫却成为“欲望本能和现实压抑的斗争表现”，用弗洛伊德的同行、德国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的话来说，是带有现代印记的性行为，是塑造自我的巨大潜在力量。[90]

在第一代的心理分析学之后，无论承认与否，手淫在心理学领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体性行为是人类性学研究的典范”，著名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戏谑道，“这是个一再被提起、却屡次被忽略的事实”。无论是对相对正统的理论分析学者，还是对后来的女权主义作家而言，弗洛伊德对手淫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权主义者露丝·伊利格拉芙（Luce Irigarav）就曾经对弗洛伊德用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对女性自体性行为进行诠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小女孩“并不会对自己手淫，对她进行手淫的其实是阴茎的等同物”，并以此作为依据来重新定义“女性”群体，使其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事实上，也正是女性与自体性愉悦之间的独特联系定义了什么是女性，或者说，它至少是女性发掘自我、发掘自身感触的一种直接、不受干扰而且持续不断的渠道。“对女性而言，不需要任何调节，她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内在”，她“可以不断地抚摸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因为女性的性器官是由不断接触的两片阴唇构成的”。[91] 伊利格拉芙认为，虽然手淫仍然可以算是成年性行为的雏形，但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想像，是成年女性性交行为的雏形。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迅速蔓延，远远超出这一领域的学科范围。从幼儿科学的教科书到道德神学的讲义，在解释到“性”的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发展观点的影响。在这种对手淫崭新的诠释中，手淫行为不再像启蒙运动时期和18、19世纪的评论那样，是全民公敌。它在个人成长和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说道，它“既非疾病，也非罪恶”，但值得人们广泛关注。

[92] 对手淫致病的担忧一旦烟消云散，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也就变得更为清晰。既然“已经十分清楚手淫对健康无甚伤害”，美国一位著名的分析家评论道，就应该对手淫展开广阔而全新的心理研究。弗洛伊德的启蒙观点认为，手淫应被视为青少年的一种自然行为，是性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常人在成年之后就会抛弃这种行为。然而，如果“成年人还继续手淫”，则可被视为性心理发展受到压抑的标志之一。手淫不是罪恶深重的恶习，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它只是失败和落魄的象征，是内疚感和不满足心理发出的讯号。没有幻想的手淫行为，只是为减轻“身体里爱恋欲望的紧张感”；而带有丰富幻想的手淫，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欲发泄，并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意义”（人们一般认为，性行为的精神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成熟公民”）。因此，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含义丰富的时期。它的一端是“自然的”婴儿期自体性行为，另一端则是迈向成熟所要经历的痛苦挣扎。在这一时期，手淫从“性启蒙”的一个符号转变为另一种象征，象征着手淫的实施者未能获得正确的欲望目标，更广义地说，象征着手淫者不能与社会的需求形成妥协。 [93] 一个人与手淫的斗争历程，其实就是携手文明、共同发展的进程。

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诠释推动了性别斗争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成年之后依然手淫的做法被看做是一种正面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这种理论的新动向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代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这一报告在更广泛意义上令人们对存在已久的一个事实更加印象深刻——手淫这种所谓的“变态”行为实际上非常普遍。并非像某个19世纪的观察家所预言的那样，手淫仅仅广泛存在于文化层次低下的人群当中。事实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尤其是女性，越存在着手淫倾向，或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至少《金赛性学报告》是这样说的。并且，大多数的手淫行为并未削弱婚姻内正常性行为所带来的性愉悦感，虽然18世纪的批评家曾经这样担忧过。手淫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性交行为产生的满足感似乎是相当的。

《金赛性学报告》并未就自体性行为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正如同报告中争议颇大的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数据一样，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被我们原本质疑为变态的性行为其实只是从正常行为到反常行为的性活动曲线的一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性学研究学院举行的联合调查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其受关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性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手淫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弗洛伊德之后的手淫文化研究始于1966年。威廉·马斯特（William Masters）和维吉尼亚·琼森（Virginia Johnson）合作出版《人类性反应》。这部著作后来不断再版，并被译作多国文字得以广泛流传。虽然这本书以及之后的那些观点并非是为手淫行为正名，但却给女性手淫者留下了这一印象。首先，它认为，弗洛伊德所持有的女性成年后不再会有阴蒂性行为——即手淫——的观点是错误的。马斯特和琼森进行了许

多访谈和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女性在经历性高潮体验时，仍然有刺激阴蒂区域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在异性性交过程中，纯粹的阴道性行为并不能带来完全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认为，至少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手淫体现出女性性行为的真相所在。他们在书中写道，女性"并不仅仅满足于在阴蒂自我刺激行为中所体验到的快感"，如果可以摆脱"社会心理因素的干扰"，完全把精神集中于"自身的性欲要求，忘记所谓的'阴蒂伴侣'的存在"，就可以体验到极致的快感。马斯特和琼森并不是在提倡这种没有任何"干扰"存在的性体验，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女性在性交过程中，通过在做爱时加入手淫行为来获得完全的性满足感。很明显，在这一观点中，自我刺激是享受愉悦的金科玉律。马斯特和琼森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激进女权主义的倡导人、《女同性恋者的国度》的作者吉尔·约翰逊（Jill Johnson）就曾经引用他们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她认为，阴道的外三分之一处是一个能给女性带来极大快感的地方。弗洛伊德所持有的"阴道快感是更成熟的快感"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能带来这一快感的并非只有阴茎，自慰棒，甚至是一根香蕉，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他人操纵，都会达到与阴茎相同的效果。[94]

由于这些理论的出现，手淫文化首先受到女权主义者的青睐，继而又被男同性恋运动所吸纳，作为一种体现自由、自主意志以及反抗现实传统的行为。它在性别政治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巨大。手淫不再是堕落的象征，它首次被认可为虽与正常做法不同，但仍然具有正面意义的行为。它象征着自主意志、甚至自给自足。它不再受人非议，引起恐慌，而是宣扬解放自我、有益于健康，而且魅力非凡的行为。

在手淫文化走出市井，成为现代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化讨论热点的最后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本书的出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其前身是由波士顿女性健康编写组（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编写的一本油印小册子"女性和她们的身体"。这本书一经出版，大受欢迎，总计销售约400万册，直到2002年仍然还在出版发行。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至少16种语言，意大利语译本出版于1974年，日本及丹麦语译本出现于1975年，西班牙语译本出现于1977年，德语译本1980年，荷兰语译本1981年。1973年，这本书甚至还出版了一部英语盲文版。[95]

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作者一开始就对流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对手淫大为谴责的观点进行反思和批评，并认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其实是对手淫的新的批判，而且是一种反女权主义运动的观点。书中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故事：在她小的时候，她迷恋上了这种令人有罪恶感，但却十分愉悦的行为。她认为，父亲的炎症和可能造成截肢的后果肯定是她享受这种罪恶的快感所造成的，如果她不及时停止这种行为，父亲就会死去。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摒弃手淫行为（尤其是阴蒂手淫）及其带来的快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也进行了广泛批判，并为自体性行为作以正面的辩护：手淫并不是性交行为的替代品，"它只是不同于两性性交行为，但绝不比性交行为更为低下"。[96] 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的传统理论遭到有史以来最猛烈

的攻击。然而，在一本有关单身女性情感问题的书籍里，作者劳拉·赫顿（Laura Hutton）——一位来自塔维斯托克诊所的临床医师却相当坦率地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手淫其实和去妓院嫖妓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在手淫行为中，“没有利用其他人来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在这种“多少有些无意识的自恋行为中”，总是缺少点什么——即便这种行为的低劣性并不被广泛认同——那就是，“（手淫其实是）向婴儿期自体性行为的倒退”。[97]

赫顿医生斥责的“从自身获取感官享乐”的手淫行为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中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观点。书中说，自爱是女性自我认知的起点，是今后所有其他行为的根源。手淫是“接触自己身体首要的、最容易的，也是最方便易行的手段”。它是一种纯粹的愉悦享受，是意志行为没有受到干扰的体现。换言之，手淫可以使人从现实的条律约束中暂时解脱出来。这本书随后还介绍了如何进行手淫，并且对性幻想的意义所在进行了讨论。此外，此书对18世纪有关手淫文化的探讨和弗洛伊德的研究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重新诠释。从书中我们看到，手淫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行为（卢梭认为这正是手淫的危险所在），也不再是心理倒退行为的体现，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些真相”，让我们知道如何“接受自己的感觉，并试图去理解它们”。[98]

70年代时，在女权运动领域涌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评论，对被视为现代权威的弗洛伊德学说作出了全新的诠释。1970年，安妮·科德特（Anne Koedt）的论著《阴道高潮的神话》首次将手淫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公布于众，为医学领域的这种自助性质的行为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她的观点很快影响到众多更大众化、批判意味不太明显的各种评论。[99]例如，贝蒂·道森（Betty Dodson）在《解放手淫：对自恋的反思》中就直白地阐述道，自体性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行为，也是个人意义上的解放自我。道森的著作自出版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六次再版，最后一次为1996年。（她的其他作品，如《自恋和高潮》、《一个人的性：自恋的喜悦》也是关于同一主题。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手淫讨论的录音或录像带。）道森的观点超越了波士顿妇女健康编写组。她不再仅仅将手淫看成是对阴道性行为的批判，是为更大程度获取异性性交快感而采取的行为，而是认为手淫是自我意志的一种体现。《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依据的是社会基础，是一个我们需要其他人才能实现性愉悦的基础。而道森则不同，她认为“手淫是我们首要的性生活，是一切性行为的基础。我们除此之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我们适应性生活要求的选择方式”。不仅如此，她的观点也超越了马斯特和琼森的理论——他们认为，阴蒂刺激并非是为行为本身，而是为两性性交过程中体验完全的性高潮而服务。

70年代末期，关于手淫文化的讨论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既有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批判，又夹杂着将手淫看做是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意志手段的观点。手淫这种曾经令卢梭万分担忧的性幻想行为在此时已经变成一种美德：追求自我愉悦是实现自我认识、自我探索、塑造精神自我的必经之路。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淫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各种性用具

和性刺激——性玩偶、振颤器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性用品店广为出现。各种性用品和众多的性生活指南可以邮购或直接购买。当然，这些性用品并非全部用于手淫，但绝大部分都是，而且市场需求非常之大。著名的快乐振荡器性用品公司始于1977年，其第一家店位于西海岸，在随后的10余年里，营业额节节上升，从而到处广设分店。在最初的几年里，这家性用品店还没有开设分店，每年的年销售额仅为1.5万美元。但到1995年，其年销售额已增长到547.2166万美元，截至2000年，已超过800万美元。仅2000年一年，这家公司销售的振颤器总数就达到13.4万个，估计约占市场总量的10%。从这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美国境内振颤器的总销量可达百万之多。世界上另一大性用品制造商约翰逊医生也有相当不错的业绩。1990年至2000年间，它的销售额从每年800万美元上升到每年4500万美元。而且，据该公司称，在1999年至2001年仅3年的时间里，它们的销售额就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仅为批发销售的数据。通常来说，性用品产业的零售加价率为150%—200%，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其零售销售额大概在每年10亿美元左右。在美国，拥有如此规模——雇员超过100人——的性用品公司就有三家；在欧洲，这样的公司至少有数十个。）除此之外，对于口味挑剔的顾客，还存在着一个专业市场。例如，一家花哨的网站就提供100%全硅材质的性玩偶，其外形模仿众多著名宗教人物，如：耶稣、圣母玛丽亚、甚至还有释迦牟尼。这样的玩偶恐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无法接受。当然，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其他地方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例如，欧洲最大的情趣用品经销商——碧雅特优稀——在1998年时的年营业额为10亿美元，至2000年时，这家公司的营业额已经增长至10.5亿美元，拥有近300家分店，并提供商品邮购服务。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数据中究竟有哪些是和手淫产品——情色书刊、振颤器、自慰棒（自慰玩偶）——有关，但这些手淫产品都被陈列在店中的显要位置。（这家公司的创立者罗特蒙德是一个战争寡妇，起初以骑车沿街销售避孕方法维生，后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情趣用品经销商。）[100] 换言之，这种独自一人的恶行已经成为追求自我愉悦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而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还没有包括蓬勃发展的色情产业——也许是互联网上惟一盈利的行业，它的存在是为了产生更美妙、更丰富的性幻想，也就是说，是为手淫而服务的。[101]

由于道森和巴尔巴赫（Lonnie Barbach，心理学家，著有《为了你自己》和《女性发现性高潮》，其观点与其他女权运动倡导者基本相似）的书大都通过特殊渠道来销售，因此，让那些甚少光顾性用品店的人们了解到手淫行为的本质——手淫是为探索自我和纯粹的自我愉悦而服务，其功劳应归功于畅销书作家，如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由于他（她）们的努力，自恋得以正名，惟我论失去了锋芒，一种全新的、古希腊似的自我关爱由此诞生。泡一个热水澡，在浴缸四周缀满蜡烛或镜子，放松自己，任幻想信马由缰……巴尔巴赫甚至还建议女性对自己说“我爱你”，[102] 用完全发自内心的声音。

比起前人来，弗莱迪的作品虽然观点不够尖锐清晰，但却赢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她在书中描写了大量女性的性幻想，这些性幻想被包装成一个

个讲述女性如何走向性成熟的故事，或者描写女性如何探索自我、发现自我的经历，或者对女性解放大颂赞歌。弗莱迪将这些性幻想贩卖给那些想要无穷尽获取的人们。随着手淫道德价值的完全转换，手淫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之一。弗莱迪在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我的秘密园地：女性的性幻想》。书中认为，曾一度令手淫备受质疑的隐秘性幻想其实正是骄傲所在。这本书大获成功，到1998年再度出版时，已经是第25版了。两年后，弗莱迪又出版了《被禁止开放的花朵》，以及其他同类型的作品。在观点上，弗莱迪对弗洛伊德以及新弗洛伊德模式进行了批判；在形式上，她借用了18世纪流行一时的书信体，但重新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弗莱迪的信中没有死亡、没有病痛、也没有愧疚或耻辱，取而代之的是从自我愉悦行为中获得的生命、健康和自豪感。确切地说，弗莱迪作品中那些信件的作者虽然也时常说自己会感到内疚或耻辱，但感官上的愉悦是如此震撼，因此他们认为，为这样一种无害的行为感到羞耻完全没有必要。人们应该从这些书信中学会如何转变自己的观念——“从耻辱到骄傲”。因为弗莱迪的作品十分畅销，她的小说被先后译成法语、波兰语、汉语、德语、荷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流传世界各地。受她的影响，手淫已经不再是200多年来被斥责为有辱身心健康的“丑恶行径”，也不再是弗洛伊德及其门徒100多年来所认为的正常心理的偏差行为，它被视作是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最安全而且最令人愉悦的行为方式。[103]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次文化上的反击，这支队伍主要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真正的或虚假的妇女解放言论者们所组成。由凯瑟林·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丽·德沃金（Andrea Dworkin）发起的反色情运动和反性行为运动就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她们认为，男性手淫的主要目的是为真正的性侵略提供演练，手淫并非性能量的宣泄方式，20年代的威廉姆·斯特科认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渠道释放性能量，将后患无穷，并且是更危险行为的预兆。正是这样的观点指导了反色情运动和反性行为运动。麦金农就曾经断言，“色情刊物是手淫者的刊物，因为它为手淫服务，所以它就是性行为”。（手淫行为究竟是宣泄的方式，还是恶行的预兆，我们无从得知。但最近南非政府的做法显然受到斯特科观点的影响。南非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让我们加入到这场武装斗争的队伍中来［这里所玩的文字游戏是用于反种族隔离的词句“拿起武器去战斗”］，不要再凌辱我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这一口号拉开了一场正式战役的序幕——“要手淫，不要强奸”。）[104]

令人遗憾的是，20多年以来，这些女权主义思想并未给男性带来任何触动。弗洛伊德学说中对于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男人的理论显然只要求成年男性放弃手淫行为，却并未让他们放弃先前所体验到的生殖器快感，因此，他们无须像女性那样放弃阴蒂高潮。但是，对男性而言，是他们背负着2000多年来对手淫者的嘲笑，和200多年来的手淫道德罪恶说。他们被不断告诫，男性手淫是愚蠢的行为，真正地能找到女性做性伴侣的男人根本无须手淫。人们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些意为手淫的其他词汇，如“wanker”、“jerk-off”等，来嘲笑那些手淫的男性或男孩。男性的手淫行为也被更广泛地理解为“性无能”。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接受《现实主义者》杂志编辑、政治讽刺家保罗·柯拉斯纳（Paul Krassner）的采访（该杂志在70年代初被屡次再版），谈及手淫问题，并因此声名狼藉。他说：“手淫是一种罪恶行为，关系几乎所有问题——性高潮、两性性交，关系作风、关系立场、关系展开一场正义之战。”简单地说，它与男性的本质极不相容。“一个在少年时期手淫过的人，在迈向成熟的青年阶段时，也没有成熟的男性意识”。对于梅勒这种似乎连强奸都胜过手淫的论断，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击（更多内容详见第六章）。由此可见，虽然手淫文化已经深入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性政治运动中，但对男性而言，对手淫的看法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改变。[105]

在艾滋病发现前夕，曾经有一些观念改变的迹象。60年代时，亚兰·杜根（Alan Dugan）的诗作“为手淫而歌”就宣扬了一种独立的主张（亚兰·杜根在2001年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

我为自己找到了

这个角落，我是自己的主宰……

可以任意妄为。

但是，发生的两件事情扭转了这一趋势：艾滋病的传播和公共浴室的倒闭。由于这两种原因，手淫成为男同性恋者的新选择，而且曾一度被认为是次最佳的选择。然而，90年代末，手淫又附带了一层新的自我意识，被视作两性正常性行为中的一种选择。遍布世界的同性恋手淫者俱乐部不仅仅是公共浴室的第二种选择，也是男性可以共同手淫的场所。就像旧时绅士聚会一样，这种带有自我意识的行为逐渐形成了团体。至少在同性恋者中间，手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同18世纪批评家们私底下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广泛的认同实际上就是承认曾被认为是个人私密行为的手淫其实并不那样私密。它是“以错误方式进行”的社会行为。[106]

然而，一个人的错误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幸运。由于与同性恋运动的联系——或者出于妇女运动的影响，手淫公开成为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且在更广泛意义上，成为自我性表现的一种行为方式。如今，教导人们如何进行自慰的诊所已经出现，就如同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的女性情欲场所一般。虽然如一位记者所言，各种不同的手淫方式区别很大，密宗手淫也许和广义上的手淫完全不同，但在每一种精神现象中，我们似乎都可以找到手淫的影子。手淫文化玄妙不可言，评论家伊夫·塞奇威克（Eve Sedgwick）这样写道：“让这样强大的一种性行为穿越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的性意识的堡垒，只是手淫的缪斯向我们揭示的关于手淫的神秘之一。”[107]

到目前为止，我对于手淫文化的历史回顾并未涉及通俗文化领域，如：电视（如臭名昭著的电视连续剧《宋飞传》）、电影（2000年，在《美国派》和《情迷索玛丽》中，出现了青少年因被发现手淫而感到羞愧的

片断）、录像带、流行音乐、网络上数以万计的色情网站，以及各类性用品商店（快乐振荡器性用品店举办全国手淫月活动，海报张贴在街头巷尾）。在过去的300年中，再没有其他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具有如此深刻的文化意义，遍布如此广泛的地域、涉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也没有任何一种性行为像手淫这样如此大众化。性伦理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和孩童，在现代手淫文化的探索中，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性主体，他们的性心理发展也许受到阻碍，从而堕落；也许正常深入，从而得到净化和升华。1712年宣告诞生的这种“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如今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或者说，已广为谈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手淫并不存在。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就是与此有关。

第三章　《手淫》出版之前的手淫文化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手淫的现代文化史开始于18世纪初——“1712年前后”。如果我对于这种个人性行为的看法，以及对于个人与现代社会关系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对于这一历史的起源也就毋庸置疑。但是，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在更早的时期，手淫（或许有其他叫法）就已经存在：犹太拉比们（研究犹太经义的学者——译者注）也许不会公开说出这个词，但神学家们肯定会；作家和画家曾经描述过；医生甚至还在某些场合讨论过。普通人或许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行为，或许因此而曾经嘲笑过别人。

本章的内容是追溯过往，追溯手淫在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重大话题之前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可以被看做本书观点的一个反证：通过探讨手淫文化为何在启蒙运动之前无人问津，我们可以了解为何它会在后来具有如此重大的文化意义。心急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本章的细节讨论过于繁复，若想更快领略手淫文化的现代意义，不妨直接跳至第四章，去了解18世纪之后个人性行为的故事。

1712年之前的手淫和医学

让我们从医学研究开始，因为这一部分的历史相对比较简单而且不存在太多争议。在19世纪最详尽的医学百科全书中，“手淫”词条多达26页之多，词条后还列有一长串的参考文献。在词条中作者写道，从未有过任何医学问题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和医学家的关注，这也许就是作者耗费大宗篇幅对此详尽阐述的原因。作者认为，手淫是个有关个人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话题，是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体现。但是我们知道，作者的观点是全新的，只有现代人才能理解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古时候的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对手淫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即使有人议论起该话题，那也一定是讽刺诗人或情色诗歌的作者。从医生那里，我们听不到只言片语。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著名医学家、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经谈论过不受约束的性享乐的危害性，但仅仅针对新婚夫妇；古罗马医学家盖仑（Claudius Galen）也曾就节欲话题发表过简单的评论。中世纪的医学家们“对任何问题都只关心是否‘过度’”，而这一点在手淫问题的讨论中，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医学百科全书里的这篇文章还说，只有在18世纪，手淫才变成一个重要的话题。“一本名叫《手淫》的小册子（文章作者宣称，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贝克尔（Bekker）的医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8] 事实也的确如此。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个细节问题。提索起初认为这位《手淫》作者贝克尔先生是一位作家，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1800年之前最详尽的文学文献资料里，贝克尔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回，而且指的是一位荷兰教士巴沙萨·贝克尔（Balthasar Bekker）。巴沙萨·贝克尔于1698年逝世，所留下的惟一英文作品是一部批判笃信女巫、幽灵和恶魔存在的迷信观念的著作。这听起来并不像一个敢于开创文化先河的勇士。[109] 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清楚《手淫》的作者究竟是谁。而且，在18世纪之前，也有少数一些医生曾经在诊病时，怀疑过手淫行为是否是致病的一种诱因。1650年前后，一位不知名的伦敦大夫在自己的私人日志上曾经提过，他的一个病人患有阴囊瘘管，病因可能是夜遗，或是病人“有时强迫自己排精”[110] 的原因。这个医生并不十分出名，但总的来说，19世纪评论文章的作者却对此笃信不移，而且他们在当时的医学研究中找到了“手淫致病”的依据。因此，手淫被看做是医学问题起源于18世纪早期。[111]

《手淫》自然是大力宣扬这一观点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痛苦会（而且经常会）降临到那些正在（或曾经）实施过自渎罪行的人”，《手淫》的作者引用了若干著名医学家的评论。[112] 其中离我们年代最久远的是“贝纳德医生”（应该是指爱德华·贝纳德［Edward Baynard，1641-1719］）。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引用并不完全真实。爱德华·贝纳德是一位游走于巴斯和伦敦之间的名医。他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一首被反复出版的关于健康的长诗——“如何获取、保持并恢复健康”。

此外，他还有一部关于冷水浴的著作也十分畅销。但对于手淫，他并未发表过多言论。在长达450页、讨论冷水浴各种益处的书中，只有一个段落提到了手淫，也仅仅只有一次。那一段是说，“阴茎不能勃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淋病未能治愈”，以及“该受到诅咒的邪恶的手淫行为，这一行为令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惨遭不幸”。据贝纳德医生说，他已知有20个这样的病人通过冷水浴的方法获得痊愈，“让生命的时钟回到正常的轨道”。除了贝纳德医生，《手淫》还声称引用了一位近代医学家“埃特姆勒先生（Mr.Ettmüller）”。这位“著名的医学家”强烈谴责手淫行为，认为它对身心健康危害极大。其实，《手淫》的作者所引用的这位麦克·埃特姆勒（Michael Ettmüller）是一位在莱比锡接受了专业训练的医生。他的论文发表于1663年，并在17世纪70年代编纂了一部集合了医学和化学的拉丁文汇编丛书。1699年，这部丛书被节选，并译成英文出版。在600多页的内容里，提及手淫的只有区区两个词。书中写道，造成生殖器体液不自觉排出的原因有三：体液过多、动作过于猛烈，以及“稀薄而多水”。造成第三种情况的原因是性行为无度，尤其指少年时期，以及“手动所为”。这就是提到手淫的地方，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详细阐述，也不涉及女性或少女。[113] 由此可见，《手淫》的作者，庸医约翰·马尔顿，完全凭空捏造了这些引用。但从当时的医学角度而论，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博学的提索也在试图为手淫，以及他对手淫的研究找到一个历史悠久的渊源。与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一样，提索非常看重自己书中的脚注，因为如果自己的观点能与伟大的医学前辈博学的智慧和超凡的远见卓识相一致，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势必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惜的是，在手淫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学术历史可以追寻。提索未能找出手淫的学术渊源这一事件，也折射出横亘在18世纪医学和古典医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提索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古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盖仑曾经提到的两个病例。一个是因过多的精液分泌而导致精神错乱，另一个是在与妻子性交过程中突然暴毙。然而，这两个病例并不能作为提索观点的依据，因为他们都并非因自我刺激而惹祸上身。最终，似乎连提索本人对自己的努力也都有些心灰意冷。

实际上，古罗马时期的医生对于手淫这一话题几乎缄口不言。这一点令人十分惊异，因为他们在当时对一些疾病提出了广泛的医疗建议，而这些疾病在1712年之后都被视作自渎行为的典型症状。例如，“淋病”——一种睡时或醒时都会不自觉溢出精液的疾病，以及纵欲过度后引起的精神疲惫、无精打采。这些医者提供的处方也大致相同，即多进冷食、多做运动等等。这些治疗措施也正是提索建议用于治疗手淫的方法。显然，手淫这种新的疾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古罗马时期一些同类的疾病，而且病因也大致相同。古罗马学者认为过度纵欲是危险的，尤其是精液的遗失。但是在他们的言论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手淫。无论是对于这种行为本身，还是对于它会导致的后果，古罗马时期的学者大多都保持沉默。

在我们探讨手淫是如何在医学史上一跃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的时候，上述发现的确令人难以理解。这是因为，18、19世纪的众多伪疾病及其治疗方法都来源于古罗马时期，而且与18世纪一样，古罗马时期的医学不仅仅只涉及血液、疾病和死亡，更重要的是，手淫不同于其他性行为。在启蒙运动之前，手淫还算不上“医学领域”的事。医生们对此话题闭口不谈，因为它对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而言，并非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里，上层阶级男性几乎拥有所有可以令他们放纵的条件——奴隶、妓女、无尽的美食、可以不受约束地宣泄怒气或施加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手淫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114]

对于青少年性行为，从约翰·马尔顿到提索和卢梭，从19世纪的医学家到后来的弗洛伊德和霍尔教授，每个人都对此问题倾入了许多关注。然而在古罗马医学家的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并不存在。他们重视的是成年人，尤其是成年男性的性行为。他们致力于研究性高潮、遗精、或精液滞留这样的细节，并将其作为人类食、色、性等基本要求的一部分。对于这些行为的益处及危害，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宝贵精液的遗失，医生们都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此外，他们还对射精行为进行探讨，因为在他们看来，身体的需求和欲望其实是人体内部体液活动的一种体现。如何令自己的体液达到平衡状态，对人的健康、幸福和生殖能力至关重要。在这一问题上，年龄是个关键问题。射精对年轻人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年老的人；在兴致高昂时射精也要比与妻子例行公事时射精危害更大。比起持续的性高潮，应该更提倡短暂的性高潮。因为性高潮从医学角度而言是一次小型的大脑充血过程，如同癫痫一样，如果不加以注意，很可能会导致中风或死亡。医生们还提醒说，对精液的节约远远重要于其他行为节约；对性欲的放纵也比其他形式的放纵更加伤身。此外，古罗马医生们还对性欲望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减轻性欲望的方法，如饮食、按摩，以及其他类型的交往等等。

简言之，性欲不仅会给肉体带来巨大的负担，也会给沉溺于其中的人们带来道德上的压力，因为它潜在的无节制性对人的身心都会造成巨大伤害。但在几乎所有的古罗马医书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手淫的描述，也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将其作为过度纵欲的一种具体有害的形式而大加批判。在整个古典医学领域，无论是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文献，还是因此而衍生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研究，都没有像《手淫》那样对世人发出警示。 [115] 现代性学研究所强调的欲望并非来自于外在诱惑而是来自于自身状况的主张，在古代医学中完全没有任何体现。正是这一意识上的缺失使18世纪的医学家们将手淫这一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性行为仅仅诠释为一个崭新的医学术语。

在古罗马医学时期，关于手淫曾经有过两次沉默的时刻，但却没有一次能够与现代手淫的文化讨论扯上任何关联。相反，它们站在了现代性文化的对立面。这两次提及都来自于盖仑这位医学名家。面对手淫，盖仑毫不犹豫地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广泛的医学伦理领域中进行讨论，即讨论如何处理过剩精液的问题。从现代观点来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建议令人咋舌：多余的精液需要尽快且平静地处理掉。因此，手淫是一种相

对安全，而且不会使人过于亢奋的解决方式。显然，盖仑的这个观点并未考虑到作为性欲宣泄方式的手淫将会导致的道德问题。而且，他不仅没有对手淫有可能造成的身体损害提到只言片语，相反，还认为此举有益于健康。盖仑对手淫的这一看法影响着从公元2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手淫讨论。但提索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却只字未提。

盖仑提到的第一个故事只和男性有关。在盖仑看来，著名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哲学犬儒派奠基人——译者注）是世界上最有克制力的男性。但即使是他，也“沉浸于性愉悦中”。第欧根尼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从中能得到额外的享受，而是因为和所有人一样，他也需要将生命过程中堆积出来的多余体液排出体外。这种形式的性欲望可以被理解为是由肉体中多余而亟待释放的体液所引起的一种渴望和焦躁。这个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天，第欧根尼与一个妓女约好见面。我们可以推想而知，他并不是那种选择“婚姻性爱”的人，因为婚姻关系无论是从心理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太过复杂。对于他这样独善其身的人来说，拥有一个妻子所带来的复杂性显然不适合他。但不管如何，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这位犬儒大师解决自身问题的事实行为。由于妓女没有按时赴约，第欧根尼于是十分平静地“用手摩擦生殖器，将精液排泄出来”。后来，那个妓女终于出现，第欧根尼却将她打发走，连她的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告诉那个女子，他的手“吟唱了《婚礼进行曲》”。对于这个故事，盖仑评论道：

很明显，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不会因享乐的动机而性交，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祛除自身的烦闷，即使这一行为本身毫无快乐可言。[116]

在盖仑出现100年之后，古希腊作家第欧根尼·勒尔逊斯（Diogenes Laertius）再次提到这位犬儒派大师在公共场所手淫的故事，不过，这一次是用赞许的口吻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诠释的。他认为，因为吃早餐不是荒诞行为，所以在公众场所吃早餐也不会被认为荒诞。[117] 第欧根尼“在公众场所用手采取的行为”是希望自己能像揉肚子解决饥饿问题一样，简单地满足自己的性渴望。因此，在公共场所手淫的行为，如果是在正确的思想引导下，其实就相当于在集市吃早饭一样正常。在禁欲主义者看来，手淫和婚姻内性行为一样，都应该依照自然规律来实施。而且手淫这种自体性行为要比与他人一起发生的性行为更容易得到控制，因而也更有可能对这种行为采取节制。很显然，这一观点与1712年之后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第欧根尼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但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医学和哲学环境。在英国莎士比亚时期的一本畅销健康手册中，“第欧根尼的那种行为”成为“手淫”的代用语，并被这本手册的作者托马斯·高根（Thomas Cogan）与私通、鸡奸和乱伦并列为排除身体多余体液的四大违反常规的行为。高根生怕读者错过这一暗示，还额外添加了这样的语句：“触摸外生殖器以达到射精的目的。”他还以典型清教徒的口吻向人们发出郑重警告：手淫这种行为是天主教提倡禁欲的一大恶果。不仅如此，在第欧根尼当众手淫2000多年之后，在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阐述为什么应该让市场来调节性交易（以及其他欲望）的文章中，这个故事再一次出现。（曼德维尔认为，可以提倡完全的性自由，通过共享女性的方式提供无穷无尽的性来源。这一观点与第欧根尼的主张大相径庭。）在他看来，即使是哲学家也无法摆脱性的欲望，虽然第欧根尼当众“用手来解决自己的欲望”，但他当时势必在想，和异性形成事实上的性交行为肯定要远远强于只是在幻想中和异性交欢。[118]

盖仑对女性手淫的观点比较狭隘，但他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他认为，女性手淫和因体液潴留而导致的医学问题有关。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处于生理学和道德上的原因，女性的这类问题要比男性更加严重。一方面来说，女性往往更为矜持，因此不大可能来排除多余的体液，尤其是如果月经——体液通常的出路——受阻的话。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女性用性交来排出体液的这种方式也有诸多限制。尤其对于孀居的女子、丈夫不在身边的妻子，以及成年却未婚配的女子来说，她们几乎无法找到合适的男性来进行性交。（在16世纪的英国，“单身女性”几乎是“妓女”的同义词，而性生活活跃的单身女性则被称为“荡妇”。）[119]

由于女性宣泄情欲的出路着实有限，因此人们认为，女性比较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病症。也就是说，这些病症来源于女性对所谓的“性能量”——古代人称之为“有毒的体液”或“滞留的刺激体液”——的长期压抑。盖仑在讲述第欧根尼故事的同一篇文章里，对这些女性病症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治疗方法。首先，要让身体温暖起来，然后“触摸自己的外生殖器”。这一举动会使“全身颤抖，一种虽痛楚但愉悦的感受涌遍全身，随后，多余的黏稠体液就会排出。在那之后，就可以摆脱所有的罪恶感”。简言之，对身体的摩擦刺激可以制造性高潮，可以导致射精，可以令郁积的欲望和“精液”得到释放。[120]

也许形式上有些变化，但盖仑的这一疗法在2000多年以来一直是治疗女性手淫——无论是自己而为，还是借助他人帮助——的良方秘药。13世纪神学家、哲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曾经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一群14岁左右的女孩们由于欲火中烧，如何压紧双腿，任欲望为所欲为的过程。这一行为的后果——并没有体液的排出——是生殖器充血肿大，并且伴有强烈的想要行为放荡的愿望。后来的评论家们从这一行为中发掘出一系列的恶果，如：萎黄病——这是一种由于体液滞留而引起欲望、焦躁和压力的病症，并且把手淫定义为一切不贞行为的生理学基础。盖仑在其著作中写道：“她们用手指或其他器具反复刺激，直到通道变得炙热，完全打开，体液和欲望一同涌出。随后，鼠蹊部位冷却下来，她们又重新变得贞洁了。”换言之，在缺乏正常性交行为来释放多余的体液和欲望的情况下，个人对自己生殖器进行摩擦刺激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且，性交本身也是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为一种方式的刺激并不比另一种方式的刺激更加高明或更加拙劣。盖仑认为，在手淫之后，女性变得更为贞洁，因为身体内在的压力和躁动得到释放。盖仑的这种理论在18世纪的学者看来几乎完全不可理喻。18世纪的观点认为，真实的性交行为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而且可以抑制自淫行为的发生。

但手淫从本质上来说，并不能令人完全满足，它只会使人产生更多的性渴望。因为欲望永不休止，所以手淫行为也无法轻易摆脱。然而，在中世纪时期，手淫问题的讨论焦点并不在于这种行为中充满了虚假的、充满幻想的欲望，而在于如何排解多余的焦躁情愫。当时的医学认为，这种躁动一旦被释放出体外，就永远不复存在。对年龄稍大一些、已经有月经出现的女孩来说，这种欲望更加明显，她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释放身体的躁动。于是，她们并拢双腿，“阴部互相摩擦，产生的不仅是愉悦的享受，堕落也由此开始”。[121]

盖仑建议女性用刺激生殖器——特别是阴蒂——来舒缓身体压力的做法在女性群体中一定十分普遍，尤其对那些并不在意用手来解决问题，或是对购买假阳具不以为然的女性而言。19世纪一部天主教医学神学手册中曾经描写一个女子“在反复地刺激和摩擦阴蒂而引起的痛楚中，感受到极大的安慰和快感”。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书中的下一个章节中写道，这样的触摸行为并不能算是堕落行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堕落，因为对女性而言，这种行为不可能导致堕落。它的道德败坏之处在于，它纯粹是为感官愉悦而产生，无论手淫的女性如何解释自己的动机，这些动机其实并不存在。在他看来，盖仑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122]

与18、19世纪对手淫的医学讨论相比，古典医学传统对这个话题的涉及少之又少，而且也仅限于非常狭窄的领域。没有谈及手淫的任何危害，没有指出手淫带来的性快感会令人虚弱，也没有任何文章探讨女性及青少年手淫问题。这并非因为古典医学认为手淫十分安全，尽管除成年男性之外，医生们并不担心手淫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事实上，手淫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也自然没有引起医生的兴趣。手淫不仅只是一个编外的道德话题，在医学领域，它也是一个边缘问题。

古典文化中的手淫和性伦理

对于18世纪初被称为“手淫”的这种行为，古希腊人也许并没有专门的术语来称呼它，但他们显然知道这样一种行为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鸿沟。在古希腊文化遗留下的一个黑色的陶瓶上，我们可以看到三尊半人半兽神的彩绘像，每一尊神都用手握住其巨大的生殖器。其中两尊为侧面像，另一尊则正面全裸，半蹲在地，两膝分开，手放在巨大的生殖器上。坐在中间的神名叫Terpekelos，意为“阴茎的愉悦”；他左边的神名叫Dophios，名字取其动作之意，即“揉搓自己”，就像人揉面时的动作一样。比起它所描述的这一行为，这个名字似乎更加具有艺术气息（在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中，也曾用Despesthai这个名字来指用手揉搓自己的行为）。右面的一尊神名叫Polas，意为“阴茎勃起”，在画面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他阴茎上的包皮向后翻起。这幅彩绘中的三尊神用的都是两只手，但古希腊文化中其他的神——古希腊文化的瓶绘图案上有很多描绘手淫的画面——大都只用一只手。彩绘上的文字和动作也简单清晰，令人一目了然。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时期，有关手淫的绘画也十分常见——通常都是姿势怪异，形态扭曲，看上去十分丑陋。很显然，“手淫”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2 3] [123] 。公元84、85年至103年间，也就是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创作《警世言》（Epigrams）的同一时期，罗马文化中出现了“手淫”一词——masturbor和masturbator。这两个词可以看做是现代英语“手淫（masturbate）”和“手淫者”（masturbator）的前身。虽然手淫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关注，描述这一概念的词语却和现代词汇几乎并无二致。

虽然拉丁文中只有两个关于手淫的词汇，但却没有妨碍人们对手淫的提及。但是，这种词汇的缺失现象却折射出手淫在当时不被重视的社会地位。作家们在提到它时，通常只用俗语，以便和这种行为的低俗道德意义保持一致。其他一些常用的术语，依据文章的不同性质，可以指手淫，也可以指由他人来进行性刺激的行为——爱抚、口交、性交中的互相摩擦、抚弄他人阴茎等。例如，Frico（摩擦）是指代手淫的最常见用语。其他被广泛使用的还有tracto（握在手中）和contrecto（用手抚弄），当然还有一些委婉语。例如马提歇尔曾经写道，因为丽塔格斯没有赴约，“我躺在那里很久，身体紧绷，极度亢奋，那时，是我的左手，而不是你，为我提供了救援”。古希腊神话中的生育之神普力亚普司（Priapus）也曾郁郁寡欢地说：“还是让我的手成为自己的情人吧！”他所哀叹的是身边没有美丽的森林女神或水泉女神做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手淫”一词就已经像现在这样，被赋予了些略带滑稽或下流的含义。但不同的是，在当时，这一行为无须背负任何道德伦理上的负担。[124]

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确实存在手淫行为，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称谓。但是，当时的手淫却不具备1712年之后手淫产生的影响。古罗马或希腊学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也只是澄清说，这种行为绝非有教养

的绅士所为，因为它违背了提倡节制的性法度。因此，若有人沦落到需要用如此不堪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定会受到他人的嘲笑。拉丁文献中对女性手淫几乎只字未提，古希腊文学和艺术对此也仅是寥寥几笔。这是因为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性伦理和性地位的讨论只限于男性——对女性贞操的讨论除外。女性手淫之所以不能成为引起关注的道德话题，正是因为在古典文化中，女性被认为是不完美的男性，她们不具备男性所具有的高贵品质。

在古典文化时期，手淫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在那时，这种行为并不具备它在1712年之后被赋予的那些道德含义。古典文化时期对自我和性文化的探索另有其路。

在古希腊时期的性伦理研究中，具有"荣誉感"以及与其对立的"羞耻心"，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的性生活应该与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称。手淫自然不是合适的行为，但似乎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指明这一点。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为找到手淫的起源，曾试图将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古希腊演说家——译者注）对著名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的指控看做是对手淫的指责。埃斯基涅斯曾经指控狄摩西尼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滥用自己的身体和生殖能力"。这种不体面的方式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并未具体说明，但20世纪的学者们曾普遍认为就是指的手淫。埃斯基涅斯的这一指控意在羞辱狄摩西尼，并阻止他担任国家公职。但事实上，当时的雅典公民可能并不了解这一指控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行为。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并崇尚荣誉的社会里，这些公民可以联想到任何一种与绅士身份不相匹配的性行为，例如：与妻子进行肛交、在肛交中处于屈从地位，即没有维护男性主动地位的尊严、用口进行不体面的行为等等。他们惟一不会想到的，就是手淫。[125]

对古希腊时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克己，即对自我的克制。"克己"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ōs（意为"正直、安全、健全"）和《荷马史诗》中的phrenos（意为"头脑"）。Phrenos也是现代英语词汇phrenology（颅相学）的词源。因此，从字面意义上来看，绅士应该"头脑、心智健全"。手淫自然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应有的作为，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崇尚"克己"的人的所为。（当然，还有很多性行为或其他行为也非绅士所为。）而且，在关于"克己"的人应当如何作为的文章里，也从未对手淫进行过任何批判，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手淫"一词仅次于古希腊时期的古老用法见于1623年，一本早期的英语词典将"手淫"定义为"触摸私处的不体面行为"。）对古希腊人来说，手淫是令人羞耻的，因为它与文明人的身份不相匹配。[126]

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神之所以手淫，是由他们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这些神大多是拥有巨大生殖器的怪物，有着无穷尽的性欲望，却没有什么教养。因此，他们当然会手淫，不然又会怎样呢？总不至于期望他们像某些人那样，和男童发生某种微妙的性关系；或是像某些绅士一样，从妓女那里获得事实上的快乐。神灵们手淫，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

找到别的出路来满足性的贪婪，也许是为和指定配偶的媾和进行预演。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么他们就不该被指责，而是应该予以同情。而后一种原因则纯粹是笑谈，因为这些半人半兽神总是在爱情的道路上受到挫折，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另一半。据说，手淫这种行为就是天神首先传授给这些半人半兽神，之后又通过他们传递到人类最微贱的群体中。据古希腊神话记载，牧神潘恩（Pan）在求偶之路上屡屡受挫，因为林间仙女艾蔻（Echo）——还有其他仙女——对他的求爱毫不理会。于是，潘恩的父亲、赫赫有名的赫尔墨斯（Hermes）出于对他悲惨遭遇的怜悯，教会了潘恩缓解受挫感的方法。随后，潘恩又把这种行为传授给在长期寂寞生活中需要慰藉的牧羊人。[127]

此外，奴隶们也是公认的手淫行为的行家。他们手淫的原因和半人半兽神非常相似，或是因为不具备自由人所拥有的性宣泄渠道，或是因为他们本性就十分放荡——这一点在东方文化的传说中尤其突出。在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中，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将自己幻想成一个波斯奴隶，当他的主人与一个舞女在奢华的地毯上调情嬉戏时，他在一边沉浸于自己的游戏中。在另一部戏剧《和平》里，阿里斯托芬也塑造了一个无精打采、游手好闲的波斯奴隶Datis的形象。他总是在下午时分对自己手淫，被认为是现代手淫的“鼻祖”。总体说来，手淫的波斯奴隶形象恰好构成了男性理想公民形象的反面教材。

关于普通自由人——相对于半人半兽神和奴隶而言——手淫的陶器彩绘十分罕见，而且即便是有，描绘的也是粗鄙乡下人的形象，城市公民手淫的画面从未出现过。

同样，女性手淫——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的画面也是凤毛麟角。女性手淫者一般都被刻画成滑稽的、无法从别处得到满足的性贪婪形象。传统瓶绘上的女性手淫者大都是独自一人（或与同伴一起），一个男性生殖器插在阴道里，另一个往往在嘴里或肛门里。阿里斯托芬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中描述道，身边没有男性陪伴的女子用一种长约8指的“皮质辅助物件”来寻求慰藉。“给带皮的狗剥皮”这一说法也常被用来指代替代真实性交行为的手淫。这些替代品象征着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幻想，并加深了阴茎在性交过程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相对而言，纯粹为女性感官愉悦而进行的手淫（阴蒂性行为，而非阴道性行为），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4]

拉丁文学中提到手淫的地方要远远多于古希腊文学。但即便这样，大多数的文章对手淫的态度要么觉得它滑稽可笑，要么觉得十分可悲。当然，古罗马哲学家和医生们也曾经对各种无节制的纵欲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克制和中庸才是理想公民的形象，任何行为上的偏差都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因此，手淫这种自我放纵行为纯然是一种低贱的行为，甚至完全不值得在严肃的道德讨论中提及。[128]

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手淫的确是以“非体面行为”的代名词出现，而且往往都意味着与个人身份不相符的堕落。在马提雅尔的作品中，一位手淫

者以嘲弄的口吻哀叹着自己的命运："朋友都是相似的"，这位诗人讽刺地写道："你身上穿的是用最好的羊毛编织成的华丽长袍，我穿的却是连被扔进牛栏里激怒公牛的稻草人都不屑穿的破衣裳；你的披风华丽精致，我的披风一文不值；你用的是用象牙支撑的利比亚书桌，我用的是瓦片堆砌起来的榉木桌；你拥有无数奴隶，可以为所欲为，我能做的却只有手淫。"（原句是"我的手取代了美少年，对自己实施拯救"。其实，诗中的"你"才是马提雅尔真实生活的写照。）[129] 这和阿里斯托芬戏剧中那些笑话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有极度贫穷、可怜、无力支付嫖娼或娈童费用的人才会对自己手淫。他们的行为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可悲，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马提雅尔本人就曾数次和娈童发生性行为。）

和古希腊文学一样，拉丁著作对手淫的态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嘲讽、夸张或恶作剧般地戏弄，再无其他。受挫的手淫者总是被嘲弄的对象。例如，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曾经描写过生育之神普利亚普斯的故事：普利亚普斯偷偷地走到仙女洛提丝（Lotis）的身边意图不轨，却被一头驴的叫声令他的企图归于失败。他不得不悻悻离开，在月光的照耀下"本就巨大丑陋的生殖器变得更为巨大而坚挺"，他也因此遭到了每个人的嘲笑。在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对这个关于手淫的著名故事的重述中，说普利亚普斯从此以后"手中总是握着巨大的权杖（指生殖器）"。于是，这个关于粗俗的半人半兽神和长着巨大生殖器的天神强奸驴子并且有趣的手淫故事便流传下来。这个故事并非要引发对手淫文化的思考，而只是告诉世人：如果被发现用手去握持已经勃起的阴茎，至少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令人极其丧失尊严。[130]

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地位和教养的因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手淫被认为是违反性节制法度的行为。一个有教养的绅士不应该，而且事实上也不必手淫，因为他有无数的选择：奴隶、娈童或幼女、妓女，还有社会底层的妇女。值得争议的是，手淫是否真的是比其他需要挑起情欲或投入兴奋的方式更好的一种排泄精液的方法？也就是说，从排精的纯医学角度来说，手淫似乎比与异性性交更加健康，因为如果自己就可以把精液排出，那么就不会引起太强烈的情欲亢奋。但总体而言，对一个生活富足又有教养的公民来说，任何一种方式都比手淫更适合他的身份和地位。

俄南和犹太传统文化中的手淫

这一节中所要谈论的手淫文化和上一节中的状况大不相同。在上一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存在着与今天类似的手淫概念。只是他们认为，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医学角度，手淫都并不是一个严重到令人关注的话题。然而，在希伯来文化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与拉丁文化中意义相近并表示手淫的词汇，甚至连委婉语或隐晦的说法都没有。这一点本身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在19世纪末“同性恋”这一词汇产生之前，同性恋现象不也已经存在很久了吗？但是，文化中某一特定词汇的缺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清楚。或许是该文化缺乏这一概念？也或许是因为某种行为太过于普遍，所以反而不需要专门的词汇去形容？但我们这里想要探讨的却不仅仅是构词法的问题。

即便手淫的概念在犹太传统文化中的确存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相关的文章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也十分有限。现代学者中对手淫文化进行研究的极少，这其中即使是最博学、最细心、最优秀的学者，在研究犹太法典中涉及“性”的章节时，也无法从中找到关于手淫的只言半语。如果正如奥古斯丁（Augustine）所言，犹太人毋庸置疑是一个贪享肉欲的民族，那么在犹太文化对肉欲主义的顶礼膜拜中，我们也并没有发现手淫的身影。[131] 而且，我们所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讨论有生育能力的成年男性，即已婚男性。这对于大多只和儿童或青少年有关的手淫行为来说，并非是适合研究的人群。此外，也没有任何关于女性的讨论，而且，即使我们认为也许会存在这样的讨论，最终也不得不面对事实。例如，犹太拉比们（研究犹太经义的学者）认为，俄南的妻子忒玛（Tamar）有过“用手指摩擦身体”的行为。他们说，这一行为解释了为何她在与犹大（Judah）——俄南的父亲——第一次同房之后就怀孕的原因。尽管如此，犹太拉比们依然没有谈到手淫。他们引用这段故事是为说明，忒玛并不是一个处女，因为处女是不会怀孕的。但是，另一位犹太拉比指出：“难道没有和俄南以及珥同房吗？”意为“她不是已经两度发生过性行为了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就隐含着另外一种意思：“她与俄南及珥的性行为违反了自然”，也就是说，他们进行的是肛交。[132] 这个故事里对女性话题的探讨明显偏离了手淫的轨道。而且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对少年男女发出手淫警告的文章。

为何在犹太文化历史悠久的传统中——无论是《圣经》还是法典的诠释中，都难以找到对手淫的讨论？其主要原因既不是词汇的缺失，也并非社会因素，而是概念上的差异。这种概念上的差异把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旧约》中的世界、公元2至6世纪犹太学者创编的《犹太法典》和米德拉西（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讲解布道书，编纂于公元400年到1200年之间，根据对《圣经》词句的评注、寓言以及犹太教法典中的传说而写成——译者注），以及11、12世纪犹太神秘哲学中的世界割裂开来。在《创世记》的编写者眼中，手淫完全没有讨论的意义。它处于犹

太学者关注的两大问题的夹缝中。这两大问题之一是有关精液及其正确用途的复杂问题，另一个则是关于情欲被唤起，也就是阴茎勃起，以及有可能导致精液浪费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男女两性或青少年为获取性快感而自发挑起自身情欲的行为——即为追求感官享受本身而进行的手淫行为、被《手淫》定义为“通过不洁的幻想，模仿并获得上帝为延续人类的繁衍、令男女两性通过互相交融才可获取性快感”的行为——找不到任何立足的空间。因为手淫虽然似乎和这两个问题都有牵连，但却无法完全划归为其中的任何一类。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对精液的解释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完全不同。它认为，精液如果被排出体外，就会释放恶魔，并使人的灵魂无家可归。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概念里，我们显然无法找到对手淫问题的任何关注。

据《创世记》第38章8—10节中记载，俄南“让自己的种子撒在了地上”，上帝得知后怒不可遏，于是将他处死。我之所以引述这一故事，并非因为我们知道俄南手淫——这一行为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手淫之人。恰恰相反，我引述这一故事，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俄南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在《圣经·旧约》中没有任何俄南手淫的暗示，也是因为后来无数的犹太学者对俄南以这种行为触怒上帝并丢掉性命的故事有不同的诠释。不仅如此，这段故事还被经常引用以探讨关于精液和情欲唤起的一系列复杂的相关问题。

俄南拒绝在他寡嫂的身体里延续香火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后续的版本。在那个社会，“撒播子嗣的种子”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对一个群体、在俄南的故事中则是对一个家族的延续。由于拒绝与寡嫂同房，俄南实际上就断绝了惟一的延续家族香火的机会。这种近似于谋杀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完全不是基督后来解释的关于他浪费精液、将种子撒在救世主后花园的罪行。当然，至于俄南为何不愿履行职责，在《圣经》中并未提及，而且这与我们的主题也毫无关联。

从《创世记》中俄南的故事里，还衍生出另外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俄南拒绝为其兄传递香火的行为事实上违反了希伯来文化中的“叔娶嫂制”（古希伯来法律规定：一个女子当其丈夫死后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而亡夫的兄弟也有娶她的权利和义务。——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俄南若非一个手淫者，也至少是一个不愿履行义务、传递香火的不负责任的年轻人。然而，在《圣经》的研究者看来，这一过失显然不算什么，而且，俄南为逃避责任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没有被提起。

在俄南的故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叔娶嫂制”在《创世记》第1章第28节的训诫中被专门提到：“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布大地。”至少，这是对婚姻以及繁衍子嗣的训诫。从空间的角度来讲，它划定了一个令上帝创造人类的计划与人类肉欲相吻合的范围。这一领域虽然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探讨空间，可是却似乎没有手淫的立足之地，除非出现在逻辑推断里。《犹太法典》的编订者对上帝“要生养众多”的训诫和“对不必要的浪费精液”的行为的警告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进行任何阐述。惟一令人觉得模棱两可的是关于“不必要”的定义。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中，手淫似乎又再次被尴尬地置于前面所述的两大问题之间的灰色地带中。

《圣经》中关于手淫的叙述几乎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手淫的始祖。在《圣经》中，精液被认为是导致堕落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不洁的根源”。但堕落的不同程度因不同的情况而异。首先，不正常的精液排出——如因尿道感染而溢出——和经血一样，在人们眼中是污秽之物（我们后面要谈到的《犹太法典》中关于在阴茎发出信号时，对其进行检查就是这种情况）。和正在月经期的女性一样，一个漏精的男性也有每月7天的不洁时间。在这期间他碰过的任何东西或者他的体液所触及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视作污秽之物，并同时也成为携带污秽的传染源。《旧约·利未记》中的第15章第1—15节中对种种“不洁”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其次，夜间产生的精液溢出也会令人不洁，但这种不洁只会维持一天，而且程度不太严重。《旧约·申命记》第23章第10节中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在第二天天黑之后，将自己的身体沐浴干净，方可回来（后来，文中的战营被换成寺院）。而且，即使是正常性交行为中的精液排出也会令人不洁。排射精液的人会有一整天不洁，而且会将这种不洁传染给食物，但不会传染给盛食物的容器或其他人。他的性伴侣也会不洁，是因为精液的原因，而非性行为的因素。但是，没有射精的阴道性行为不会产生不洁。为什么性交的女性会不洁净？这是一个令许多学者感到疑惑的问题，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外部的接触才会导致不洁。这也许是上帝为了不让学者们自以为已经完全读懂了全部经义，而遗留给世人的一个谜题吧！但不管如何，在所有这一切的叙述中，都没有手淫的位置，也没有对洁净和不洁净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划分。当然，这一部分的阐述区分了体面行为和不体面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看来完全无辜、值得一做的正常性交行为——为繁衍后代的行为——所产生的精液排泄，在《圣经》中是不洁的。[133]

此外，任何情况下的精液溢出都不是错误的。这样说也许太过简单化了。总的说来，圣经学者们并不认为婚姻契约内的感官愉悦和感官享乐是错误的，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行为是否适当得体，而且合乎礼仪。

学者们首先争论的，是关于排精的男性——男性因为这个原因与月经期的女性一样不洁——是否可以对自己的阴茎进行“检查”的问题；如果可以，那么该如何检查？用木片、陶片、还是厚厚的布片？这个问题也许会令人迷惑。但就我们的主题来说，犹太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er）的理论值得一提：“在小解时手握阴茎的男性，就好像要将洪水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种将精液比作洪水的比喻似乎有些不祥的征兆。在俄南的故事里，出现了“败坏”一词，这个词的使用暗含着强烈的意义。在《创世记》第6章开头部分关于洪水的故事中，也使用同一个动词，“所有的人都出现了败坏行为”；不仅如此，它还出现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7节中，上帝对摩西（Moses）说，他的族人因为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已经“道德败坏”、“行为堕落”了。这一系列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用词的角

度来说，俄南的行为与大恶同属一类。这也是为何犹太拉比约翰南（Rabbi Yohanan）会认为俄南犯下的浪费精液的罪行罪大恶极，应该被处以极刑的原因。[134]

《犹太法典》中有一章着重讨论了犹太拉比埃利泽的主张。文中提出若干问题，例如：射精后如果用一块软布检查阴茎是否会导致再次射精？如果男性排尿时不手持阴茎，尿液溅洒在长袍上，人们是否会认为他有不洁的行为？或者，大家会认为他的阴部有一漏洞，从而无法生育后代？犹太拉比们还就排尿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如果一个人在犹太教堂的栏杆前排尿，就不太可能会被挑起欲望而导致精液的浪费，因为那里太高太危险，而且那样一个性质的地方也会减轻人的欲望。此外，如果有师长在跟前，情欲也不太可能被挑起；已婚男人被激起欲望的危险性也较小，因为他的欲望可以在法度允许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在这种分析中，最后一个关于已婚男人的观点是由拉比纳赫曼（Rabbi Nahman）提出的。

在关于无谓射精的讨论中，有些观点认为，手持阴茎这种行为本身就会挑起情欲，因此这种行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精液是否浪费并无多大关系。在对排尿行为的讨论中，拉比阿米（Rabbi Ammi）曾经将射精比作偶像崇拜。这里指的是《旧约·申命记》中第12章第2节的内容：以色列人接到命令，要把他们所驱逐的人们侍奉神灵的地方完全毁坏。这一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圣经》中写的是“任何刻意令自己情欲高涨、身体紧张的人都应该被放逐”，而不是“令自己情欲高涨、身体紧张的行为应该被禁止”？我想，这段评论可能是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手淫行为的评论了。它的原文是这样的：“令自己的肉骨（阴茎）被淫秽的幻想（或放荡的想像）任意摆布的人（显然只指男性）应该被革出教门。”这一禁令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样做的人“煽动了自己内心的邪恶欲望”。这些人的内心缺乏道德的指路明灯，完全被暂时的肉体欢愉所控制。

然而，正当我们暗自高兴，以为找到了手淫的最早历史记载时，我们的希望又重新幻灭。在犹太拉比尤西（Rabbi Yosi）引用《创世记》第38章第10节后不久，据说拉比埃利泽质疑道：“为什么《圣经》中写道：‘你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以赛亚书》第1章第15节）因为这些人用手进行了通奸的恶行。”但紧随其后，拉比文学的一位权威又解释说：“无论用手还是用脚，都不会被判为通奸罪。”而且，《圣经》中还提到，“皈依者和那些玩弄幼童者将延迟见到圣主”。在这些文献中，播撒精液（也许并不是手淫）再次成为被讨论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对“手淫”的定义中，它也是“玩弄幼童”的一种方式。但在希伯来文化中，“玩弄幼童”指的是“（阴茎）在腿间的性行为”，也许这指的是性交行为？其他两种“玩弄幼童”的方式是屡受批判的鸡奸以及与未到生育年龄的幼女完婚。这些都是无法繁衍后代的性行为，所以我们就又回到了精液以及如何运用精液的老问题上，离手淫的主题又十分遥远了。

那么，犹太拉比们是否曾经思考过手淫问题？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种行为

的呢？显而易见，他们不可能持赞同的观点。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一行为太令人恐惧，以至于都不能提到它的名字。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如我前面所言，现代意义上的手淫无法被划归为当时的任何一种概念意识中进行讨论，无论是偶像崇拜、不洁行为，还是生殖繁衍。对无目的的性愉悦的讨论也许会出现在犹太拉比们对盲目崇拜的各种警示中。但这样一来，话题又重新回到讨论各种情况下的射精行为——或者，处于即将射精状态的阴茎行为。我们所认为的犹太文化对“手淫”的讨论只是我们想像的，它其实并未清晰地存在过。而且，对于不洁行为和情欲唤起的讨论目的也不是因为手淫。因此，只有当我们所定义的罪恶不是相对神权而言，而是像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认为的那样，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时候，手淫文化才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

基督教和手淫

在基督教学者的著作中，手淫的地位并不像它在《圣经》学者作品中那样似有似无。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在谈到手淫时总是躲躲闪闪，但总算是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不再是全然漠不关心的态度。12世纪时，有关各种性罪恶的词汇就已经非常精确。在所有恶行中，手淫被认为属于第二等的罪恶，这一观点一直持续至18世纪。手淫是更大恶行的先兆，是其他恶行的帮凶，但却并不被世人广泛担忧。世俗欲念和偏离了上帝指示的灵魂总是会通过不受控制、四处散佚的性欲念表现出来，这正是基督教学者的担忧。基督教所提倡的，是单身时清规戒律，结婚后则要谦恭有礼、相敬如宾的有序生活。在现实行为中，学者们关注的是那些会对上帝的教诲形成巨大威胁的性行为：乱伦、包养情妇、兽性、鸡奸、未婚私通以及婚外情等。而手淫这种隐秘的、来源于个人内心的恶行则只出现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中。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一直到近代个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被学者们所重视的时候，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受到关注的一直都只是社会性行为的道德伦理，而自体性行为的道德伦理却从来无人问津。基督教认为，个人私底下对自己的作为也许会大逆不道，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它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的根本。

俄南的故事，即《创世记》第38章第8—10节的内容，在后来几百年对《圣经》的注解中并未引起非常的重视。例如，直到12世纪，才有人开始引用这部分的内容，但是是对避孕进行抨击。又如，直到公元9世纪，在天主教的《苦行赎罪书》——针对教士编写的指导丛书，教他们如何为各种罪行划分等级，并为不同等级的恶行提供赎罪的方法——中，才提到了“将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的行为，即性交中断，但也没有和手淫联系在一起。圣哲杰罗姆（Saint Jerome）曾经对避孕药的发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对俄南的罪行却只字未提。即便是在读者们以为会找到关于俄南行为的某些线索的中世纪非宗教类性医书里，也找不到任何有助于理解手淫文化的内容。[135] 14世纪的一位骑士曾经为他的女儿撰写了一本有关婚姻的书，书中清晰地阐述了未婚私通、婚外情等内容，但对俄南的行为，这位骑士也只是评价说，这是“一种邪恶行为”，再无其他。[136]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从12世纪开始直至18世纪《手淫》的出现，关于俄南的罪行的评论只出现在了基督教徒——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抨击避孕措施和堕胎的相关文献中。在天主教的道德神学理论中，“手淫”只是“性交中断”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却应与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如婚姻的目的、生育繁衍的义务等。对教会来说，手淫并不是一种个人欲望的表现，也并非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隐秘的恶行。

在基督教文化中，关于手淫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基督教继承了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传统。在基督教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教会虽然对性和人体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但在手淫这一话题

上，却和前人一样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关于手淫的任何印记。之后，大约在7世纪至12世纪，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针对手淫的禁令。当时教会对手淫的态度十分谨慎，用词也躲躲闪闪，并总是将手淫夹杂在对其他一些微小过失行为的讨论中。而且，手淫者就算被发现，也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第三个阶段起始于1100年左右。教会开始把手淫和其他一些性质恶劣的性罪行并列在一起，例如，违反自然的人兽交或鸡奸行为。但在这些恶行当中，手淫毫无疑问是最无辜的一个，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所受到的关注要远远小于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和从前一样，手淫始终是一个边缘话题，很少受到如其他行为那样的关注——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手淫要比其他的某些性恶行性质更加恶劣。这种自体性行为虽然一直被认为是“恶行”，但从未真正像“恶行”那样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末期开创了基督教的学者们从当时的医学伦理领域吸取了很多概念。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认为，感官愉悦只是生殖繁衍本能行为的附属品，虽然它对繁衍后代来说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令人不悦的东西，是“灵修实践”的人必须要抑制的一种情愫。基督教就吸纳了这样的理念。不仅如此，古典时期对于如何保持灵魂与肉体紧密关系的理论在基督教起始时期也得到大力提倡，并在世俗行为中被一再体现，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例如，法国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曾经说过，仅提倡“只为满足身体欲望，而不触及灵魂”的性交行为有些过于苛刻，但是他认为，婚姻内的性欲望如果从深层次去分析，会发现一些不合礼仪的东西。蒙田曾说，“几乎没有人会和情妇结婚；若是真的结了，也没有人不会后悔”；“我从未见过比因受美色和淫欲所诱惑而仓促结合更快破裂的婚姻”。[137] 他也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男人应该“稳重且冷静地”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观点表示赞同。从古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基督教严苛的教义中，还是在新古典主义温和的评论中，性伦理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男女两性关系（古典时期也曾关注过男性和娈童之间的道德问题）。手淫几乎从未出现在讨论者的视线范围之内。

基督教文化提倡克制性欲、保持婚姻的忠贞，对那些立志献身宗教的人来说，则应该纯净个人的单身生活。在这些与欲望有关的约束里，几乎没有人曾经对手淫表示关注。这一点可以从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关于单身僧侣抵制堕落凡人的不洁欲望的描写中略见一斑。圣哲杰罗姆的尖锐批判也是一个绝佳例证。他曾经写道，单身僧侣们的“脑海里充满了因身体而起的熊熊欲火”，似乎看见“美丽的女子翩翩起舞”，身体“因长时间缺乏性生活而变得干枯消瘦”。他们身着肮脏的麻布衣服，与“蝎子、猛兽”为伴。肉体的苦行淹没了手淫的特质。而且，手淫的孤独特性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它只被视作众多性欲望的一种。在一个强调共同的社会里，手淫也许会导致的自我主义危险似乎遥不可及。[138]

如果暂时抛开禁欲主义者以及那些致力于苦行修炼的人——即单身男性——的问题，就会发现，与纵欲行为站在最大对立面的就是婚姻。在学

者们用婚姻作为武器不断与纵欲行为进行斗争的大背景下，手淫文化被忽视似乎是非常正常的。无论手淫被划分为哪一类道德问题，天主教道德神学和宗教关注中几乎没有任何手淫现象的讨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社会的前夕。在18世纪之前，未婚的年轻人，即那些被看做是青少年的人群，在性文化的研究中几乎从未被关注过。

中世纪教会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即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婚姻关系只是实施罪恶的一个借口。奥古斯丁曾经简练而直白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婚姻只有三个益处——繁衍并培育后代、保证肉体上的忠贞并履行其他义务和婚姻的神圣性，指的是这一缔结所具有的易分解但神圣的特性。在这样一种诠释中，只有“繁衍后代”可以作为获取感官愉悦的理由。因为在两性交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性快感，它是生殖过程中必要的一部分。除了生儿育女之外，为其他任何目所进行的性行为都是有罪的。如果结婚是为防止自己纵欲或通奸，这种罪行则相对比较轻微；但如果结婚只是为享受感官愉悦，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于婚姻，教会奉行着一套复杂的评判尺度。例如，为了避免犯下更大的罪行，犯下一些微小的过失是可以被原谅的。如果丈夫知道妻子无法生育，或者妻子正处在月经期时，要求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会被认为是过失；但如果丈夫是为抵制妓女的性诱惑而如此要求，那么他完全有理由可以和妻子行房。 [139]

总而言之，性行为越令人愉悦，所犯下的罪行就会越严重，并非因为性愉悦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性行为者会过度亢奋而丧失应有的理智。通过教会布道的形式，这种观点至少延续了五个世纪。与妻子进行违反自然的性行为——为贪图感官愉悦或出于非生殖目的而进行的性行为——是罪恶深重的罪行。对教会的各种法度文献曾经进行认真研究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圣伯尔纳（Bernardino of Siena）曾这样断言：在各种违背宗教道德的罪行中，与妓女发生性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与修女、自己的母亲或别人的妻子发生性行为更加不可饶恕；但最不可饶恕的，是和自己的妻子进行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即出于非生殖目的、为获取感官享受而进行的性行为）。沃尔姆斯大主教伯彻德（Berchard of Worms）也曾经发表议论：在婚姻内想要获取感官愉悦的行为要比单身男性嫖妓获取感官愉悦的罪行罪恶四倍。女性通奸则是最令人憎恶，也是最应得到严惩的恶行。

尽管这些言论看上去有些偏激，但在它们背后，隐藏着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观念：公元7世纪时的罗马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曾经认为，婚姻内的性愉悦是一种罪恶。在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关于手淫的阐述，但它出现的目的只是为引出更重要的话题——对配偶的欲望激情，以及为满足这一欲望而采取的行为。例如，对西班牙法学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作品的注解就曾经引用思想家哈奇奥（Huggucio）的观点。他把男性用手或温酒挑起自身情欲以便“更频繁地与妻子交合”的行为，批判为不可饶恕的罪行。 [140] 由此可见，自体性行为在当时罪大恶极，因为它会导致在我们现在看来极为正常的性愉悦行为。对于手淫，当时的文化大都保持沉默；即便这种沉

默有时被打破，通常也只是将对手淫的讨论作为抨击更大恶行的前奏曲。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欧洲教会对手淫保持中立的态度。事实上，教会认为，手淫是独立于其他性行为的，它不是纵欲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不会对个人或社会造成严重威胁（有关女性手淫的讨论在当时几乎完全空白）。因此，对其他性行为的讨论似乎总是和对手淫的讨论有所距离。

这种距离在12世纪之前尤其明显。在当时，手淫几乎完全被忽视。我们仅有的寥寥几个发现大部分来自当时天主教的《苦行赎罪书》。现代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教会在推行基督教文化时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西方基督教所提倡的性学伦理道德。书中还提供了评价各种罪行的方法。[141]

有一点毋庸置疑。公元6世纪至公元12世纪之间，文化界完全不存在对手淫的评论，也没有任何术语去称呼它。正如同我们先前对犹太手淫文化的讨论一样，很难说这种词汇的缺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基督教性伦理道德的创立者对性行为种类的界定似乎比我们想的更为宽泛，因此，他们大都使用概括性的词汇，如“私通”，或“违背教义”。这些概括性词汇往往包含了一整类的行为，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指明。[142] 但不论如何，教会其实有现成的关于手淫的拉丁术语可以使用，而且还有许多已被广泛认同的委婉说法，但他们就是不予采纳。某些文献中的某些内容在我们看来是对手淫的讨论，但是在别人眼中，同样的内容就可能显得指代不清。但总的看来，手淫在当时似乎并不是一类值得用精确术语进行描述并讨论的性恶行。

在教会看来，严重的恶行是那些会对上帝对欲念所设定的种种限制形成威胁的行为。上帝规定，对普通人来说，婚姻是正确的途径；而对少数致力于宗教事业的人来说，则应该保持禁欲的生活。俗世中的凡人若是侵犯了邻居的妻子，就要罚做一年的苦行。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就禁止和妻子发生性行为。在宗教节日期间，至少应有120天禁止性生活。对于教士或在教会任职的人来说，对禁欲规定的违背可谓罪恶深重的行为。例如，僧侣若“弄脏”了自己的嘴（指口交），就要苦行赎罪四年；若乱伦，则苦行三年；若鸡奸，苦行七年。有私通行为的主教，将被罚苦行12年，而且还要接受降级处分。简言之，僧侣或教士在教会中的职位越高，他的罪行就越可能变成丑闻；神职人员的丑闻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越大，对他的惩罚也就越严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手淫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话题。同样，在教会以婚姻形式对抗淫欲贪念的斗争中，或在令僧侣们恪守禁欲誓言的种种努力中，手淫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将所有亵渎灵魂的罪行都归为一类，那么手淫也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分支。[143] 它只是亵渎行为的一种，只会被判罚短时间的苦行。比起那些会导致贞节名誉受损，或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性行为，手淫这一类的亵渎行为所受到的惩罚要小得多。

虽然手淫并不是一种完全无辜的行为，但对教会而言，也并非意义重

大。僧侣、修女、教士一直努力保持自己清心寡欲的独身生活，超脱于世俗之外。而在普通凡人中间，教会也一直致力于反对乱伦、私通等行为的发生，以保证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教会还对肉体欢愉行为进行猛烈抨击。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在致力于在教义所传播到的地方推行崭新、和谐的新秩序，世俗贪念无法涉及的领域也不应受到败坏行为的侵扰。人们应该增进与家人的感情，保持家庭的完整与和睦，并破除旧的不良习俗。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手淫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色。

11世纪中期，随着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整个教会，手淫终于被赋予崭新而具体的含义。虽然它仍旧没有，或甚少涉及女性及青少年手淫问题，但对于教会人员、之后又对于所有男性而言，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真正令万人憎恶的恶行。手淫不再是先前那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它一跃成为所有恶行中最令人鄙视的一种。

手淫的地位发生猛然巨变与另一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该行为对于宗教改革者而言，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要远远大于手淫。而且，手淫之所以被认为是违反自然的恶行，正是因为与这种“邪恶的犯罪行为”被划为一类。这种恶行就是——鸡奸。

这种分类早在11世纪初期就已初现端倪。鸡奸就是肛门性交行为。沃尔姆斯大主教怀彻德在1007年左右就曾专门质疑过这种行为。他曾经写道，将阴茎放置于“人臀部内最深之处”，“就像鸡奸者一样进行私通行为”。在谈到相互手淫问题时，他写道，“是臀部与大腿间的私通”。而对于传统的手淫，“你是否曾将生殖器握于手中，翻去包皮，用手来回摩擦以获取射精的快乐？”然而，虽然在行为上，他将鸡奸和手淫归为一类，但却并未给予二者相同的道德批判。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鸡奸者将被罚10—15年的苦行，股间交性行为（阴茎在大腿间摩擦的性行为——译者注）也会受罚90天，被罚只允许以面包为食、喝淡水的苦行。相比之下，手淫者则只需服上述苦行10天。由此可见，手淫问题在当时依然不被重视。[144]

大约30年之后，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这位曾经的修道士、教士、主教，后来成为红衣大主教的基督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宗教改革家——最终将手淫单独定义为鸡奸的一种，是一种“不正常的”的性行为。他写道：

为让世人清楚地了解鸡奸行为，我们可以把此种邪恶的行为划分成四种表现形式：

一种罪行是由自己一人独自完成；一种是互相手淫（即彼此用手来进行）；一种是股间性恶行（即两腿之间的恶行），还有一种则是完全不正常的性行为。[145]

常的性行为，而不是一种淫秽行为。达米安没有引经据典，相反，他抱怨道，自公元4世纪的安西拉大公会议以来，对于鸡奸，教会一直没有

进行应有的彻底批判。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教会对此一直采取可怕的容忍态度，对那些“独自一人犯下的罪行”只字不提，对并非以生殖为目的的手淫也保持沉默。但是，达米安对于这些犯下罪行的人从他们行为中可能获取的扭曲的快乐感并未发表过多评论。性愉悦是与此完全没有关系的另一个话题。达米安所说的“正常”取的是它的本义，即“自然界”。他质问道：“难道一头公羊会因为情欲大盛而骑到另一头公羊身上吗？”显然不会。同一马厩里的两匹公马并列站立，彼此之间丝毫不会产生吸引。但当一匹母马靠近时，“情欲便立刻爆发出来”。因此，男性对另一男性的欲望完全是一种变态行为，和异性之间互相渴望的正常心态完全不同。在达米安看来，这种行为只能用“疯癫”来解释：“男性被另一男性所吸引而发生不洁行为，并不是出于肉欲的自然本能反应，而是被魔性所煽动。”不仅仅只是行为，引发此行为的欲望也是疯癫的。达米安解释说，这也正是安西拉大公会议坚持不让鸡奸者与天主教基督徒一起祈祷，而令他们与恶魔一起祷告的原因。

无论我们对这些观点如何理解，它们似乎与手淫都无甚关联，因为达米安所描述的欲望既不是对于某一物品的幻想，也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人物。它只是幻想的对象不正确。“公羊对另一公羊的欲望”是一种理性的扭曲，似乎并不合乎手淫这个话题。也许达米安是想证明，只有差异才会激发理性的欲望，而在手淫中，并没有差异的存在。如果这是达米安的言外之意，那么他并未对此加以证明，而且这一观点从表面看也令人难以置信。古典医学和道德伦理认为，手淫是异性性交的一种，但不是主流行为。据我所知，基督教学者也大都赞成这个观点。达米安文章中惟一提到自渎行为的例子是一个一直深居在沙漠的隐士的故事：隐士苦行修炼了一生，结果却在临死的那一刻被恶魔诱惑，对自己做了不洁之举，从而一生的修行付之东流。 [146]

事实上，达米安所著的《娥摩拉之书》（Sodom［所多玛城］和Gomorrah［娥摩拉城］均为《圣经·创世记》中的城市，娥摩拉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被神毁灭，现在可能位于死海下面。所多玛因为它的邪恶和堕落和娥摩拉城一起被毁掉，现在可能位于死海以南。两座城市也是圣经中著名的同性恋之城——译者注）或多或少地都认为手淫与其他令人憎恶的“违反自然的恶行”性质相近。达米安曾说，神职人员犯下淫秽罪行并非难事，因为鸡奸者——“所多玛城的居民”——并非“只用这惟一的行为”令自己堕落。我们应该相信，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独自犯下罪行，也会与他人一起以不同的方式犯罪。同样，在讨论到惩罚措施时，达米安又再一次提到那个修道士。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恶行”，以为“这种行为（指手淫）是出于自然本能的合法行为”。达米安还通过比喻暗示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鸡奸淫行的毒葡萄枝上，有四个分叉，但全都来自同一根茎。不管教士们摘下的是哪一分叉上的毒葡萄，都会“毫无区别地受到毒液的侵害”。或者，如果用动物来打比方的话，达米安所抨击的淫行就好似一条四头毒蛇，“被任何一个头中的毒牙咬中，都必定会沾染上毒蛇体内所有的毒液”。 [147]

这两处比喻和我所引用的话都来源于达米安长达55页的著作中关于手淫

的部分。他的著作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抨击教会早先的疏忽，批评教会没有重视这种同性渴望给教会，尤其是神职人员带来的根本性罪恶。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以安西拉大公会议中的原话作为开头。在达米安看来，只有安西拉大公会议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在语言上极力渲染鸡奸行为的罪恶，他哀叹道：“这一罪恶未曾被倾听！令人义愤难平，应用全部的眼泪来哀悼。”达米安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出于“非理性”原因的罪恶。它的可怕并不仅仅在于它违反了自然常规——尽管这是它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与社会应有的秩序和概念完全格格不入。鸡奸会令家族蒙羞，会让其他同去忏悔的人感到羞耻。如果认为牧师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罪行，那么与男性发生性行为就更加如此。鸡奸是对自己为所欲为的嫖妓行为，它好比对处女进行强暴，但比那更为败坏。它是应该受到最严厉惩处的乱伦行为。勾引同性教士的人是最龌龊的人。达米安的著作以及后来很多对鸡奸行为进行猛烈抨击的教会文献，实际上都是在抨击修道院里的情欲暗涌。11世纪末期以及后来的若干年里，达米安的著作在教会中掀起了一场以扫除所有过失、保卫禁欲生活纯净性为目的的广泛运动。

如果以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达米安抨击的对象并不是手淫，而是性骚扰、恋童癖、对婚姻忠贞的背叛，是对修道院这种全男性世界中暗藏的、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性行为的担忧和不安。达米安著作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对乱伦的恐惧：父子、父女之间乱伦，牧师与教子、教女之间乱伦。但是，无论怎样将鸡奸——在教会眼中是最违反自然的行为——和手淫拴在一起，教会学者对手淫的提及都只是一笔带过，并无深入探讨。单独就手淫而论，它没有像鸡奸那么大的破坏力，它只是更严重恶行的一个先兆。就好像抽大麻烟卷只是吸嗜海洛因的最初阶段一样，难道它会引起重视吗？[148]

但是，达米安的这部著作引起的反响一波三折。起初，它并未得到重视及其他教会学者的认同，至少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

手淫也是这样。在当时，它只是关于罪恶尤其是骄淫奢侈行为复杂理论系统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到13世纪末期，达米安所开创的这种分类法（将手淫、鸡奸等行为归为一类）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不管是否与达米安处于同一原因，当时的著名神学家终于开始将手淫这一被看做是鸡奸序曲的行为定义为“违反自然的恶行”。

在神学史上被誉为“天使博士”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著作《神学大全》中写道，所有淫秽恶行中最罪恶深重的是“与自然背离”的恶行。所有的罪行尤其是各种形式的淫秽恶行，都违背了正常的理性。不仅如此，它们还违反了自然规律，尤其是关于性行为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这些淫行不是以生育繁衍为目的，不可能令子嗣世代相承。[149]

阿奎那将这些淫行分为四类：第一类就包括手淫。虽然阿奎那的语言晦涩难懂，但提到手淫时，语言却相当直白、清晰。他写道：“在正常的两性交合之外，由于情欲亢进而导致精液外泄，这一行为属于不洁恶行，

一些人也称之为不贞淫行。”其他三种被阿奎那定义为违反自然的恶行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更清晰的描述，也更容易被译成我们今天的语言。一种是与其他物种的交合，我们称之为“人兽交”；一种是与同性交合，男性之间或女性之间，我们称之为“同性交”；还有一种是以非自然方式进行交合，即使用不恰当的器官，或“以动物或野兽才会用的方式进行交合”。

阿奎那所定义的“不贞淫行”范围广阔，不仅仅只指手淫一种行为。但手淫，如果不算是鸡奸的一种，那一定可以算作“背离自然”的罪行。尽管手淫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在之后的中世纪教会文献和文艺复兴的宣言中，或从广义而言，在力图创建神圣的性行为秩序道德的各种努力中，被阿奎那定义为不洁恶行的手淫依然隐藏在角落里，未能广为人知。或许是因为手淫行为实在过于普遍，教会担心公开提到它只会令此行为更为普遍？我们再一次被这种态度所迷惑，不清楚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与过去相同的是，教会愿意就其他性罪过进行公开谈论，也许是因为教会觉得，世俗大众在听到这些罪恶时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是因为教会认为，这些罪恶的性质更为严重。我个人以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后者。

如前文所言，鸡奸问题得到极大的关注，被教会大肆抨击。在12世纪时，偶尔还可见到鸡奸者受到残酷的惩罚——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教会的态度都是默默容忍。当一直受到质疑的夫妻间的性愉悦其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之后，婚姻内性愉悦也就超出了其应有的限度。口交，或任何违反了男性在上的体位姿势的性交行为成为阿奎那所定义的非自然性行为的第四种，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非理性的淫欲贪念。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或嫖客与妓女之间——的鸡奸行为尤其令人憎恶。

教会一直想要尽力维护的是社会道德秩序，而非个人欲望的满足。对于上帝为能使凡人满足合理性要求而缔造的形式来说——对普通人指的是婚姻形式，对教会人员指的是终身禁欲，违背自然的淫荡恶行无疑是一把最直接的利剑。在婚姻生活中，夫妻每天都面临着床笫间的诱惑，都有可能被引诱而陷入万劫不复的道德深渊。因此，教会在抨击违反自然常规的性行为时——使用了错误“通道”的性行为，都是针对已婚人群。中世纪神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曾经规定，夫妻性交姿势中，只有一种是正确且合乎自然的，即女性平躺，男性在上。其他四种姿势对婚姻有害无利，也就是说，对节欲和生育繁衍毫无益处。鸡奸（肛交）曾经是一种被广泛使用并十分有效的节育方式，但它恰恰背离了惟一可以为婚姻之爱找到的理由和借口。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任何“非正常”的性交姿势都会大大降低受孕的机会。因此，15世纪著名神学家、作家、教育家、曾经担任巴黎大学校长的让·格尔森（Jean de Gerson）说道，“生殖器的每一次情欲亢进”都只不过是为生育繁衍的自然规律起陪衬作用，这种情欲亢进其实是一种“通奸”，或者比通奸性质更加严重。[150]

曾经有人认为，《圣经》十诫的第七条不仅禁止婚姻之外男女间任何的

纠葛和肉体联系，也不允许夫妻恣意享受不受约束的床笫之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内的通奸行为——指纯粹享受肉体之欢的罪行——要比婚姻外的通奸行为性质更加恶劣，因为它违背了婚姻形式的最根本目的。对于教会对这种在教区居民中十分普遍的床笫行为所持有的全面批判态度，我们并不清楚不同教区的牧师们是如何诠释的。但阿奎那所划分的违反自然性行为中的第四种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而且对这一行为的边界如何界定成为讨论的焦点。相比之下，阿奎那所划分的第一种“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即不洁恶行——受到的争议则要小得多。[151]

一份对14世纪至17世纪所有忏悔书的详尽调查显示，教士们偶尔也会就教民的手淫问题进行开解——如果那种隐晦的语言指的就是手淫的话——但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也没有形成规模。一个因手淫而误入歧途的忏悔者，他所犯下的罪恶要比其他三种违反自然的淫行轻得多。性质恶劣的罪行往往会被送往教会高层人员那里进行判定和处罚，而关于手淫的处罚决定则由教区牧师自己裁定即可（只有一起手淫事件例外）。而且，对手淫的处罚要远远小于对私通罪的处罚（“私通”在当时意义广泛，既包括婚姻外性行为，也包括婚姻内追求纯粹肉体欢愉的性行为）。因此，虽然阿奎那将“不洁恶行”定义为所有淫秽恶行的基础，是“对上帝的大不敬”，违背了“人类理性发展的规律”，但俗世中的男女，甚至包括牧师，也大都只认为，强奸、乱伦、诱奸、通奸应当比手淫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样看来，“违反自然的性行为”——道德罪行中含义最广阔的一类——实际上只是指同性恋行为，无论它看上去与其他恶行多么纠缠不清。[152]

与达米安所定义的万恶之源——鸡奸——相比，手淫就显得更加渺小了。自宗教改革开始，即12世纪时，无论教会还是世俗政权，都公开对男性之间以及男女之间这种性质恶劣的非自然行为进行批判。而手淫则再次隐藏在它的身后，默默无名。

在阿奎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从教会的忏悔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手淫仍然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教会所重视的是更严重的行为——鸡奸。为手淫行为作忏悔的通常是正在苦行的年轻僧侣，而倾听忏悔的牧师对此采取不予公开讨论的态度。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会令年轻人更加误入歧途的担心；或者，依我所见，是因为手淫在所有道德罪恶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只不过是色情春梦和夜遗行为。（据忏悔书中记载，牧师问道：“你在睡眠中是否曾有过不洁行为？”或者，“对女性的春梦会令你兴奋不已吗？”）在牧师看来，如果是因淫思邪念而引起习惯性的夜遗，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罪恶。牧师随后又问道：“那么清醒时会产生情欲幻想，并因此而引发射精吗？”“完全是因你自己，而且无人在身边吗？”接着牧师又问，会手淫吗？会“自己动手”而令自己射精吗？最后，牧师问到相互手淫、大腿摩擦等问题，并根据忏悔者的回答最终判定他是否已经步入鸡奸恶行的深渊。和达米安一样，牧师们似乎一致认定，虽然手淫忏悔者的幻想是以异性为前提，但手淫这种在所有违背自然的罪行中被认定为最轻的一种行为却并不是与异性性交的前奏，而是与一个和手

淫者类似的人。和宗教改革之后那些反对神职人员终生禁欲的清教徒一样，教会的告解牧师们勾勒出一整类发生在修道院的罪行，从手淫开始，一个比一个更恶劣。

《手淫》出版前夕的手淫文化

在17世纪清教文化统治下的英国，几乎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一场崭新的、对手淫问题的道德和医学关注即将在1712年前后展开。这一点就连最机敏的观察家们也没有预料到。对手淫问题的这次讨论从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以前英国穷苦文人集居的街道，即现在的弥尔顿街——译者注）开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被更高层次的文人学者所关注，并迅速成为西方文化中对性和自我意识探索的研究核心。但在17世纪，至少在文字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一场革命即将到来。

自公元1世纪马提雅尔之后的1500年里，再也没有手淫及其同源词汇的出现。据说，16世纪著名作家蒙田曾经首次使用了一个法语词汇来指手淫，但我并未找到确凿的相关资料。英语中第一个表示手淫的词汇出现于1612年，其来源也许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著名学者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其著作《忧郁症的剖析》中发明了一个类似于“手淫”的词汇，以帮助读者理解当时流行于贵族女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忧郁”。这种忧郁似乎是古罗马医学家盖仑所描述的那种需要不断刺激生殖器才能治好的女性疾病的一种。伯顿作品中的女性患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们手淫过度，而是因为她们的性生活实在太少。她们——男性也不例外——正是1000年来天主教宗教改革者所猛烈抨击的禁欲文化的牺牲品。伯顿1612年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现实生活中教士终生禁欲的事实并不感兴趣。他的抨击目标是禁欲这一观念，他的愤怒来源于对“这种令人憎恶的龌龊行为”、令男男女女终生维持不正常的童贞生活的“轻率而愚蠢”的天主教誓言的憎恨。不仅如此，伯顿在其作品中还自创了另外一个词汇——“伪政客”，指的是那些干涉他人私生活的伪君子和好事之人。伯顿写道，正是“伪政客”的强横霸道才导致“社会上歪风不灭，疫病乱行，自由受到限制”，并使各种堕落腐败的性行为得以滋生。他还写道，在教会及其自夸的禁欲理念的表象之下，其实是各种淫荡恶行当行其道，混乱一团。这些淫荡恶行中就包括他从拉丁文中衍生过来的词汇“mastuprations（手淫）”（在其之后还提到鸡奸）：

在女修道院里频频发生堕胎、杀戮婴儿等事件……还有偷情、召男妓、同性恋（原文是“互相摩擦而引发快感”）、舞娘……强奸、乱伦、通奸、手淫、鸡奸、僧侣和修士之间的丑恶勾搭行径。 [154]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英语中对“手淫”的首次提及并不是对这一行为本身的抨击，而是对更深层次的根源——罗马教会——的猛烈批判。因为正是教会所坚持的这种不道德且违反圣经的禁欲理念，使得各种性恶行滋生蔓延。教士和僧侣为现实世界带来了众多令人无法预料的邪恶行为，手淫正是其中一种。它之所以受到批判，并不是因为手淫行为本身的性质，而是因为它是所有淫化腐败行为中的一个印记。伯顿的道德义愤针对的是教会所宣扬的禁欲理念。这一理念不仅误导了大众，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黑暗和邪恶。对于伯顿所谓的“忧郁病症”，最好的疗法就是婚姻，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健康性生活。但在当时，没有人预料得到，“手

淫”将在不久的未来引起巨大轰动。

在对“亵渎行为”和“不洁行为”的讨论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预示，这两种说法不久将会与18世纪出现的手淫文化联系起来。无论是犹太文化还是教会传统都普遍认为（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浪费精液——尽管有时也符合自然规律——是亵渎和不洁的道德罪恶。但在《手淫》引起轰动的前夕，并无迹象表明手淫在当时被认为是亵渎和不洁行为的一种特殊且危险的形式。例如，在17世纪初发表的所有关于道德罪恶的论文中，几乎完全没有出现手淫的字样。例如，约翰·马尔顿的《手淫》中就写道，被誉为“博学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奥斯特瓦尔德（J.E.Ostervald，瑞士纳沙特尔州的清教传教士）在其论文“论不洁行为及其所有分支”中，对这种“令人厌恶的不贞行为”只是一笔带过。他仅仅轻描淡写地将手淫划归为违反贞节的道德罪行中，但并没有“揭露手淫的罪恶性”。事实的确如此！奥斯特瓦尔德所提到的“自渎行为，或者可以被称为是不洁恶行违反自然并危害无穷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似乎指的就是手淫，但这样的字样只在1708年英译本的前言中出现过一回（这部1708年的译本也是由开创了药品兜售王国，并在手淫市场中大赚了一笔的亨利·帕克尔出版）。 [155] 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看见手淫新文化的曙光了。

当然，奥斯特瓦尔德的作品中所提到的内容只是手淫在这位博学的牧师的脑海里仅有的一点点想法。他写道，贞节观念“支配着人的双手和身体；人不可以随意触摸自己或他人的身体，或任由自己的身体不受任何约束、不合乎礼仪地被任意触摸摆布”。在这里被排除在外的是“在睡眠或梦境中的奇异行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夜遗。尽管性幻想在夜遗的形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只要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这种夜遗就可以不被看做不洁行为。因此，一个人的某些射精行为并不会使他不再贞洁，它只不过是“肉体没有被完全控制”的一个迹象。这种将遗精看成无伤大雅、只是春梦的一个记号的观点无疑仍是一种传统观念，和现代手淫文化没有任何联系。 [156]

然而，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奥斯特瓦尔德对手淫的沉默态度，还在于他对手淫的沉默暗合了当时社会学者对性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焦虑。和早期的基督教会传统相仿，奥斯特瓦尔德及其同时代人普遍认为，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反映了社会行为的变异，他们并未把这些反常性行为理解为人对自我意识的探求和认知。奥斯特瓦尔德的作品中有11页是对通奸行为进行抨击。对奥斯特瓦尔德来说，触碰他人身体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青年男女未婚私通是非常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但触碰自己的身体就不是那么重要的道德问题了。

17世纪流传下来的罪行忏悔实录中有很多含义直白但却有时又令人生厌的故事，其中一则讲的就是被称为“大师特罗西（Reverend George Trosse）”的忏悔故事。特罗西曾忏悔道，他对上帝犯下了大不敬的罪行，“违反了《十诫》的第七条”。这指的是他曾经和老师的大女儿“眉目传情，有过爱慕的言词和行为”。在特罗西搭船启程赴任之时，两人曾经

私下约定让女方上船，二人在船上偷偷地发生了愚蠢且不检点的行为。特罗西还忏悔道，他曾经在另外的时间里侵犯过一个女仆，因为她经常喝醉，而且衣衫不整。他痛悔自己不断地触犯淫诫。总而言之，他认为自己曾经有过很多爱抚行为，违反了上帝对通奸行为的禁令。

然而，在特罗西的自我反省中，他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酗酒。当他能够适可而止的时候，只是发发酒疯而已；而如果失去控制，就会发生各种不洁行为。一次，当他已经喝醉，却觉得身体还可以应付的时候，他又冒险喝了许多，并与女性发生了各种行为，只是没有越过最后的界限。“一个长相可人、行为放荡的女子”挑起他心中的欲火，令他做出“将直接导致私通”的举动，但只是没有真正地与那女子产生“那种完全肮脏的行为”。还有一次醉酒之后，他和朋友们又继续买酒痛饮，并借酒劲侵犯了一位年老的护士，他们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凌辱”。特罗西在对自己一系列违背了《十诫》第七条淫诫的罪行——与早先对和老师的女儿调情的忏悔有所区别——进行忏悔时，他解释道，虽然自己恣意妄为，有过许多不检点的行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通奸”——上帝挽救了他，“没有令他与任何女人有过任何形式的私通”。在特罗西忏悔的所有性罪恶中，手淫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只有在1712年之后我们追溯起来时，才觉得这种行为是错误的。特罗西当时写道，“一个粗鄙的仆人引导我犯下这一罪恶，这种行为已经令许多年轻人心生愧疚，但觉得无伤大碍”。 [157] 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手淫这一“不洁行为”的所附带的道德含义。虽然此意义后来被《手淫》作者所借用，但在17世纪末时，这种道德附加含义并未被人们所认识，即使是像特罗西这样“恶行累累”的人也不觉得十分有愧。他对自己自责，是因为他犯下了社会罪行，而并非个人意义上的罪行。

17世纪及18世纪初期，“不洁”意味着因违反社会性道德伦理——即通奸、私通、乱伦、不恰当的爱抚——而受到良心谴责。“不洁的通奸者”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惯用语，而且必然伴随着“对基督教众不洁行为”的批判。这一惯用语通常指不合法度的性交行为。例如，在忏悔录中记载道，“一个男子勾引他人的妻子产生不洁行为”，女子的丈夫于是首先杀死奸夫，然后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又如，伦敦的两个市民在“主日”（Lord's Day，基督教对于星期日的别称——译者注）当天通奸，结果在纵欲时刻“被上帝之火惩罚，猛然暴毙”。在这本长达700多页的忏悔录中，记载了上千个关于善行和恶行的故事，但却对手淫只字未提。基督教的畅销作家杰洛米·泰勒（Jeremy Taylor）在谈到健康生活时，坚决将“不洁行为”排除在外，认为它是“所有恶行中最令人羞耻的一种”。但是，大多数的“不洁行为需要两人共同进行”，他写道，并且也对通奸和私通进行强烈的谴责。这种从异性性交角度看来是“不洁”的行为具有手淫的某些特征：它令人“行为鬼祟，举止愚蠢，而且缺乏勇气”。这一形容在《圣经》故事中大卫王与拔示巴（King David and Bathsheba，据《圣经》记载，David爱上拔示巴的美貌，杀害了她的丈夫以得到她——译者注）的私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手淫——如果他脑中所想的那种不洁行为真的是手淫——却在泰勒长达20页对贞洁的讨论中只出现了一回。他将手淫描述为“男女两性都可发生的自发的猥亵

行为”。[158]

对于17世纪的读者而言，“不洁罪行”也可以指代嫖妓行为。自由贸易的第一个倡导者、荷兰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曾经撰写过关于贞节女性如何开创了卖淫市场的文章。他写道，他并不是“不洁行为”的倡导者，但是他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嫖妓的确与后来意义上的手淫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容易上瘾——“比大多数性恶行都更加难以摆脱”；二是极具诱惑性——对于不设防的人来说，是一个隐藏在其他罪恶性行为中的陷阱；最后就是这两种行为都是亵渎行为。但是，当人们提到“亵渎某人”时，往往暗指与妓女发生性行为，而不是自己一人的性行为。维吉尼亚时代的一位年轻贵族威廉·博德二世（William Byrd II）在1719年的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曾为英国的皇家花园。——译者注）中的一次越轨行为，“我给了那个妓女两个金币，与她犯下了不洁罪行”。他写道，有一次他“亲吻了一位少女，直至对自己实行猥亵”；另外还有一次，他也亲吻了少女“直到我的种子从体内播撒出来”。但无论他做了什么，不管是“弄脏了自己”，还是“犯下不洁罪行”，似乎都不是后来被称为“自渎行为”的手淫。[159]

“不洁”是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恶行。在一群伦敦绅士们编订的公共恶行大全中，“不洁”（这里被理解为“嫖娼”）被排在“醉酒”之后，但被列在“对主日的诅咒、谩骂和侮辱”之前。一次基督教的布道曾经这样说道，“不洁行为”始于通奸，始于淫念，始于“男女间不当的调情”。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禁欲、要苦行，布道者继续说道，“肉体的欲望本身是无过的”，道德的关键在于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对象。[160] 由此可见，这里讨论的依然是两性性行为及其各种变体。

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道德捍卫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纠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为己任。令他们恼火的是，由于“道德法庭”（bawdy court，教会法庭，因为教会法庭往往也要处理通奸、私通此类的道德罪行，所以也称“道德法庭”。——译者注）的瓦解，再没有人能够出面对公共社会不良行为进行监管。这些道德捍卫者并不是想建立一个道德自主的公民国度，他们只是想成立一支新的道德监管组织，以代替那个已经失去了效力的“道德法庭”。在他们看来，所有不正常的“公共”罪行——例如，毫不遮掩的风月场所、在街头巷尾公开进行性交行为、大声咒骂、对安息日规定的违反，简言之，就是所有无序、不文明的行为——日益猖獗，并且无人压制。新的道德监督组织成立之后，就曾经操纵高等法院，对约翰·马尔顿在《手淫》出版之前所写的医学色情书籍进行过审查。约翰·马尔顿案件也因此成为这一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涉及道德观念的案件。总而言之，“不洁”总是意味着对公众体面行为的违背。在过去的1000年里，这一类罪行一般都会在副主教法庭中进行裁决。[161]

在《手淫》面世前的30年左右，一位博学的教士撰写了一本非常详尽的历史书籍，分上、下两卷。他在其中详细地分析了《圣经》中他认为是“关于不洁行为最典型的例子”。他提到了俄南，但并不认为他是历史上的“手淫第一人”。他的著作认真地记载和分析了嫖娼、通奸、私通，

以及所有令人羞耻的“不洁行为”。书中还列举了许多从《圣经》中发现的例证。如：《创世记》第4章中娶了两个妻子的拉麦（Lamech），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亚伯拉罕（Abraham）和雅各布（Jacob），无法克制自己贪念的以扫（Esau），雅各布的妾悉帕（Zilpah）和比亚（Bihah）之间的罪行（有迹象表明她们之间存在同性恋行为）。等到这位作者开始讲述《创世记》第38章中珥、俄南和他们的父亲犹大的故事时，我们已经从书中见证了太多的罪恶。但是，罪行依然在继续。作者认为，珥很有可能也犯下了鸡奸之罪；他的父亲犹大则因为在其两个儿子身故之后与自己的儿媳同床，而犯下乱伦之罪。与这些恶行相比，俄南就显得无辜多了。他被上帝处死，是因为他的行为“令自然规律被背离”，也就是，性交中断。这部历史著作的上卷截止于公元3世纪著名神学家奥利金（Origen），他为表明自己苦行的决心，阉割了自己的下体。[162]

1701年，在当时对通奸和未婚私通大肆批判的背景之下，一位不知名的神学者曾经著书对“男子女性化（即同性恋。——译者注）”进行批判。[163] 但这只是表明，在《手淫》问世之前，那些著书对性伦理道德发表意见的学者普遍认为，“不洁恶行”只是一个公共道德问题，或者只是指不正当的性关系。

那时对“猥亵行为”的态度也助长了后来人们对手淫的道德反感。但在18世纪之前，“自我猥亵”却极少作为“手淫”的同义词出现。那时，一个人受到“猥亵”，可能是指偶像崇拜，可能是指笃信错误的教义，或者亵渎了安息日。在正常性生活之外发生夜遗或遗精行为虽时常发生，但极少会和手淫联系在一起。而且即便有所联系，也是在讨论那些难以根除的世俗欲念时，或是在讨论避孕时提到。从广义而言，猥亵是原罪的必然结果。人类后堕落时代本身就违背了上帝为使这个世界变得纯净而做出的种种约束和规定。个人的努力也许会“减轻”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猥亵，但就总体而言，这并非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1712年之前，“自我猥亵”一词极少出现，而且与它后来被赋予的意义很难联系到一起。[164]

同样，“滥用（abuse）”一词的早期各种用法使得这一词汇在1712年前后也成为“手淫”的代名词之一。但在1712年之前，“abuse”并不具备手淫的含义。它可以指不正当的性行为，但却不是不正当的个人性行为。英国都铎王朝时的伦敦布莱德维尔法院曾经审理过一起控告居住在史密斯菲德的一个寡妇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共同滥用了自己的身体”的案子。另外一个女子也曾经承认自己两次允许别的男子接触她的身体，那名男子经常要求“滥用她的身体”，但被她拒绝。此外还有一起案子中，一个仆人控告主人“企图滥用她的身体并且强行亲吻她”。[165] 当时人们对这个词还有其他的用法，如：滥用熏香烟草、卷发的滥用——这令我想起圣经中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Absalom），他因为头发被树枝缠绕，吊了起来，而被敌人杀死（《圣经》中写道，押沙龙因头发缠在树枝上不能动，而被大卫王的将军约押杀死。——译者注）。除此之外，还有对占星术的滥用、特权的滥用、药品的滥用、对“丘比特权利的滥用”、对《圣经》的滥用等等。就我观察，“自我滥用”——至少是它的同

义词——这个词汇只有一次与性行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性行为却不是手淫，而是“同性恋”，或更准确地说，他们是“用人来滥用人”。加尔文（John Calvin）在对《新约》上卷第六章第九节 [166] 的评论中写道，这些同性恋者、这些继承了“古希腊淫乱恶行”人将永远不会升入天堂。由此可见，“自我滥用”一词虽然由来已久，但在1712年之前却甚少和手淫联系在一起。

显然，虽然“不洁行为”、“猥亵”和“滥用”这类词汇并未和手淫联系在一起，它们所承载的道德谴责却在18世纪初完全被转嫁到被称为“令道德受伤的苦难和痛苦”的手淫上。手淫与同性恋不同，“同性恋”这一词汇是在具体事物产生并成为讨论焦点时才出现和使用的——最初是由医生将这种人或状态定义为具备某种特定欲望的人或状态。它与鸡奸也有所区别。“鸡奸”一词涵盖了许多种性行为。而“自我猥亵”、“自辱”、“手淫”或“俄南之罪”都是在1712年之后才开始指代这种从远古时期就被广泛认知的行为——尽管在不同时期，这种行为被给予不同的称呼或叫法。对于这种行为，在“自渎”、“自辱”或“体外排精”这类术语出现之前，有人直接称之为手淫，有人用各种隐晦、委婉的说法来指代它。但不管怎样称呼，17世纪英国撰写教育性质和普通性质作品的作家都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对此话题感到无话可说。在18世纪之前，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手淫的讨论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超过3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里，关于这一罪恶，关于如何培养、教育子女的书籍如雪片般纷纷出现。 [167] 而且，在18世纪之前，即使有人对手淫发表议论，也只是在评论与成年男性有关的罪恶和过失时才会提到。对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性问题研究则连只言片语都没有。

例如，清教学者理查德·卡贝尔（Richard Capel）就将他对“自渎”——虽然这个术语在其作品中出现得很少，但其含义的确包括了手淫——的批判置于广泛的道德神学研究中。与教会对此问题的传统态度一样，他也将所有世俗贪念和淫念的罪恶作为抨击的目标。首先，卡贝尔在其著作中宣扬道，“罪恶本身即是罪恶”。它表现为，任何罪恶都是隐藏在暗处的，一旦被公开揭露，恶行就会得到缓解。“罪恶和对罪恶的狡赖行为总是结伴出现”。换言之，所有的罪恶——不仅仅只是手淫，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隐秘而不可告人的。只有通过将罪恶曝光和公开监管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对罪恶进行遏制。其次，卡贝尔对淫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淫念不仅仅通过诱惑的方式使世人获罪——就像钓鱼时用鱼饵引诱鱼儿上钩一样，淫念也会引诱人的灵魂，还会通过“原罪”，也就是世俗贪念的方式令人犯下罪行。因为世俗贪念就像许许多多的易燃火种，一旦引发，势不可挡。“只要有贪念，就会被欲火焚烧”。问题的根本在于缺乏心灵的纯净，并且与上帝的召唤产生了疏远。此外，卡贝尔还在其著作中用近10页的篇幅来论述“我们所有的欲念，如果任由它们恣意妄为，将最终会导致违背自然的行为”这一观点。罪恶表面上看起来越合乎自然，“我们对它的欲念就越鲁莽”。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可以被指认为“手淫”的部分，但它却提到了所多玛城的罪恶（即同性恋）和罗得（Lot）的女儿们所犯下的乱伦之罪。（罗得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在《创世记》19章中，罗得遵守天使的召唤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行

将毁灭的家园，他的妻子因为好奇心回头望了一眼罪恶之城所多玛，遭到上帝的惩罚，被变成了一根盐柱。后来罗得和两个女儿住进一个山洞，两个女儿为父亲存留后裔，故意把父亲灌醉后与之同寝，从而生下了孩子。——译者注）在这一部分，作者虽然也提到了违背自然的猥亵行为，但却没有对其进行具体阐述。他的观点似乎是在说，淫念是没有边界的。不洁恶行——婚姻之外的所有性行为——对于道德的伤害尤其严重。因为它纯粹是肉欲行为，并且野蛮粗鲁，会令人完全丧失理智。很多不洁恶行都需要另一人协同完成，这一特点使不洁恶行的性质变得更加恶劣，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通奸会导致私生子问题，会导致“鹊巢鸠占”。“这一恶行本身就罪恶深重，它的后果则更加严重”。在卡贝尔长达687页的专论中的第210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专门论述“违反自然的不洁恶行”的章节。这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叫做“论自我猥亵”。这里终于提到手淫，但却十分简短。卡贝尔写道，一人独自犯下的“违背自然的不洁恶行”要比与其他人共同犯罪更为严重，因为当罪恶最大程度地侵犯了爱的规律时，罪恶就更加严重。爱的规律始于自爱，一个人若不能爱惜自己的贞洁，便不能爱慕邻居的贞节。因此，一个人犯下的最大过失就是对自己的过失，一个人独自犯下的不洁远远要比与他人一起不洁更加严重。卡贝尔的这一观点与以艾利斯（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理念截然不同。现代手淫文化的观念早在18世纪就已初现端倪。它认为，手淫的道德问题在于它是自恋情结恣意生长的结果，是由于过度自恋，而不是因为对自己爱得太少。显然，卡贝尔对这种观念不屑一顾。

其实，在对“不洁行为”进行逐层次剖析之后，卡贝尔又谈到了俄南的罪恶。这种“撒播种子”的自渎行为其实就是性交中断。卡贝尔认为，这种行为罪大恶极，就算“它并非出于行为人的意愿”，其严重性也几乎相当于谋杀。“这样做的人将不得善终”，他这样告诫当时的读者。人应该结婚，哪怕是最不如意的婚姻也要强于“实施这种不正当的、黑暗的、令人憎恶的行为”。但是，这一部分其实与手淫并没有什么联系。卡贝尔所警告的是男人和女人一同犯下的罪恶。

无论“自渎”是多么恶劣的一种罪恶，在所有“违背自然的不洁行为”中，它仍然是一个小角色。卡贝尔关于“自渎”的讨论只有区区两页，即便是“人兽交”行为的讨论篇幅都要比“自渎”多，对“鸡奸”的讨论则将近20页。所有的罪行几乎都得到了公开的批判，对鸡奸的抨击“震耳欲聋，令人发匮”。腐化堕落家庭中恶仆的胡作非为、教会男女神职人员——僧侣和修女——之间的淫乱行为，都被作为第三种也是最严重的违背自然的不洁行为，被卡贝尔一一揭露，并进行猛烈抨击。尽管如此，所有“违背自然的不洁行为”加起来所得到的关注也远远小于对“不法恶行”——即通奸和私通——的整体讨论。而且，如果我们寄希望于在卡贝尔对“来自我们心灵深处的诱惑”的讨论中找到更多有关手淫的评论，恐怕也要再次失望，因为这一章节对手淫只字未提。总而言之，作为手淫代名词的“自渎”的确在17世纪时已经出现，但在众多其他恶行的掩衬下，它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突出了。于是，手淫只好就这样默默地在另外一个道德空间中继续存在，直到18世纪的到来。 [168]

当然，我反复使用的这一时间标记——“1712年前后”——本身并无任何魔力。那时，令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因素早已成熟，令手淫文化得以扩张的社会环境也从1680年或1690年起就已经开始存在。1705年，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回答关于他所创办的政治性期刊《评论》的一个问题时，曾经承认，自渎是一种道德罪恶。但是，这一行为就像“实施时不可告人一样”，也不该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他似乎并未打算像后来的约翰·马尔顿一样，利用这一市场大赚一笔。但在当时，也曾出现过一些蠢蠢欲动的举动，这些举动也完全有可能如后来约翰·马尔顿著书《手淫》一样引起大范围的文化轰动。

在这之前，我曾偶尔用“1712年”作为手淫新文化的起始年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是“18世纪初”或“1712年前后”，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年代。据说，《手淫》在1710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印刷版，这在大英图书馆的目录中曾有相关记载，但原书现在已经遗失。就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可靠目录而言，《手淫》出现于1716年。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早在1708年就已经面世。[169] 面对种种分歧，我于是决定使用“1712年前后”这一概念来抹煞这些差别。

姑且不论《手淫》究竟在何年面世，约翰·马尔顿声称这是第一部引起世人关注的手淫文化讨论的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当然，它的背后隐藏着长长的历史。例如，医学传统一向认为，对任何事物或行为的过度放纵都是有害的；古典文化对手淫采取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愚蠢可笑；基督教和犹太文化中因为手淫和避孕联系密切而对它十分反感；犹太和基督教会的许多作品还将手淫和鸡奸归为一类；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地对肉体欲望和肉体愉悦进行质疑和批判；清教徒和自由天主教徒还因此创建了现代形式的手淫，以表明自己的独树一帜等等。但是，手淫拥有自己的历史，尽管情况并不能完全如它所愿。它公然抛开了教会两百多年来赋予这种自体性行为的道德包袱，它确立了自己作为新的道德伦理讨论中心的地位，它还发明了一种无论是古典医学还是后来的医学都对此一无所知的“疾病”。通过这些方式，手淫文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我们并不知道，当《手淫》令整个世界对这种自辱行为产生憎恶的时候，它所声称的“一种新的罪恶正在诞生”的说法究竟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想像：在18世纪初之前，一个行将成年的男孩——当然也可能是女孩——会认为手淫无伤大碍，因为在17世纪的英国，能对他发出手淫危害警告的训诫书只有一本，而且就我所知，别的国家也没有类似的书籍。也许在天主教时期欧洲的某个地方，在忏悔牧师与他的年轻教民一年一次的见面中，有可能会格外小心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说，在手淫的问题上，当时的欧洲一片沉寂。正是在这种沉寂之下，《手淫》和后来的那些作品才会如此轰动，影响了后来的几个世纪。

关于社会人群的手淫历史，我们知之甚少。是否手淫现象会随着各种禁令的发布与废除时而猖獗、时而萧条？是否我们可以从少数人对手淫的忏悔中——或者从大多数人在忏悔中没有提到手淫这一事实中——推测

出手淫是一种大众行为？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基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依据，可以肯定的是，在手淫成为性道德的众矢之的之前，它似乎是相当无辜的一种行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人在手淫问题上的道德挣扎，尤其可以对比1712年之前和1712年以后的情形。英国首位日记作家、被称为“海军部长之父”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有手淫的癖好，在公共场所和私下里都经常手淫。他总是令自己的大脑变成幻想的舞台，不断地对自己欲望的对象浮想联翩，即便她一丝不挂地躺在面前也是如此。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种种情欲画面，身体也会随即作出反应。有时他也用手，有时就全凭幻想。在佩皮斯第一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当他对自己不断出入风月场所感到良心不安时，他似乎对自己的手淫行为也心生愧疚。例如，他写道：1663年6月29日——“我发誓，再也不对我所向往的女性进行淫秽的幻想”，就如同他曾屡次发誓不再踏足风月场所一样。可是仅仅两周之内，他又忍不住再次手淫，一次、两次……但却不再对自己自责。之后，佩皮斯又对自己耽于看戏和贪杯的恶习感到愧疚，并发誓以后每次下马车时，都要投钱到救济穷人的慈善箱中，以此作为对自己风流快活的惩罚。但是，佩皮斯却从未因手淫而这样惩罚自己。[170]

多年以来，佩皮斯只有在不恰当的场所手淫时，才会感觉良心不安，而且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太多。1666年11月11日恰逢星期天，佩皮斯在教堂里再一次手淫，当时他脑海里浮现的是朋友那还未成年的漂亮女儿。在同一年圣诞夜举办的大弥撒时，因为被女王和其他美丽的贵妇们所倾倒，佩皮斯又一次手淫。只是这一次，他的眼睛没有再闭上，“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举动，请上帝原谅我的过失吧，这可是在教堂啊！”（我们并不清楚他所谓的过失是指在教堂手淫——他曾经这样做过，虽然并不是在天主教堂，还是指手淫时双眼睁开——这在他之前的日记中并未有过记载）。也许对像佩皮斯这样的激进的反天主教分子来说，仅仅是出席那样一种场合，以及为那种壮观景象所兴奋就足以令他犯下罪行。然而第二年，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他再次在教堂手淫，这一次双眼紧闭，脑海中浮现的是坐在露台上的一个商人的女儿。他并未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愧疚，相反，当他躺在泰晤士河的一条游船上，完全凭借性幻想——这次没有用手——令自己进入高潮时，佩皮斯甚至为自己感到骄傲。他通过了对“自己幻想力的测试”，并且“完全只借助了我今天在威斯特敏斯特大礼堂中见到的那个女孩的幻象的力量。我很高兴，于是回到办公室，写下这段文字”。事实上，佩皮斯似乎非常自得于在夜晚用手淫的方式，来释放他在日间与宫廷女子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情欲。他也从未因此感到丝毫愧疚或自责：“我躺在床上，在入睡之前，脑海里浮现着我与斯图亚特夫人一起云雨的美妙幻想。”“在床上，我幻想着与女王在一起……”而且，佩皮斯也似乎曾经与在他家借宿的客人一起手淫，但对此他并不感到羞愧，反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在伦敦大瘟疫肆虐时期，佩皮斯外出避难。有一晚，在一场春梦之后，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妙的美梦”，他梦见自己与国王的情妇——美丽的卡瑟梅夫人（Lady　Castlemaine）——共度美妙一夜情。在梦里，柔美的卡瑟梅夫

人任他摆布，完全成为他的奴隶。佩皮斯在日记中还写道，如果在坟墓里也能拥有这样的美梦，那么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人们就不会那么惧怕死亡了。[171]

佩皮斯曾经被人发现在床上藏有一本著名的法国情色小说《女子学堂》，这一事件一度被闹得沸沸扬扬。但真正令他恼怒的是，这本书与他藏书的风格完全格格不入，于是，他将此书付之一炬。但他从未提到过他对手淫的看法。总的来说，虽然这些情色幻想在医生、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眼中是手淫的恶源，但佩皮斯对自己这种沉浸于幻想的性行为似乎感到十分享受。他完全被这种没有尽头、也没有任何限制的性享受所吸引，这种无节制的性享受正是手淫的危险之处。但是，除了对自己沉迷于风月场所和在教堂手淫有所内疚之外，佩皮斯并不认为，“滥用”对“其他女子的幻想”会对良心造成巨大的负担。也许有人会认为，佩皮斯手淫所惹上的麻烦远远小于他因醉酒而闯下的祸端。而且，如果他向往的是恋爱的感觉，或者想找人爱抚他的私处，或者想发展一段短暂的一夜情，他都有可能会被拒绝，从而尝受到失败的滋味，或者会激起佩皮斯夫人的怒火。但是，如果他只是与自己发生性行为（即手淫），那么这些情况就都不会出现（佩皮斯似乎从未担心会被人逮到手淫）。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宗教禁欲主张或对违背自然恶行的担忧，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世俗世界对手淫所赋予的道德罪恶——它直到下个世纪才开始出现。

让我们再来研究发生在18世纪之前的另一起个案。约翰·加侬（John Cannon）是一位学校校长，也是一位负责修行的官员。在他未被出版、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自己在11岁，也就是1696年时，如何学会手淫的故事。他请求读者不要以18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这正是他写书的时间）的标准去评判他当年的行为，而应该也回忆自己那“年轻而荒唐的岁月”。加侬在回忆录中写道，“天南海北地胡扯了一通之后”，游泳队里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开始向其他孩子展示，如果面前有一个女孩的话，他将采取怎样的举动。于是他将自己的私处握在手中，来回摩擦，直至它挺立起来，体液随即流了出来”。加侬和其他孩子还从他那里得知，这是防止“淫思邪念”的一个好办法。[172]

即便是在撰写回忆录的成年时期，加侬仍然不能确定这段年轻时的经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正在发表意见的这种行为听起来似乎像是自渎、或是所谓的‘体外排精’”。但当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作为进行反思时，他对自己说——以及他的读者，姑且不论他所想要的读者群体究竟是什么人，“智慧的人和智慧的国度”或许会为此感到惊异，并“为这种愚蠢的行径”感到内疚。但只有习惯性的愚行才应受到谴责。

这个案所体现的，是年老的人试图为自己年轻时的鲁莽行为和对道德感的麻木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人在年轻时当然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形成正确的判断。也许，我们只应责备他在初次实施这种“愚行时过于疏忽大意”。因此，应当由《手淫》或后来的那些道德评论来告诉年轻人，这种疏忽是不应该的。对于手淫行为的道德内疚应该尽早，而且尽可能根深

蒂固地灌输于人们的观念中。可以预见，一种新的罪恶马上即将席卷整个欧洲。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讨论的问题是：手淫究竟是什么？手淫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焦点话题？我们在这一章里主要论证的是，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文化里，都有与那个时代或文化相对应的罪恶。专门研究道德罪恶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德吕默（Jean Delumeau）曾经说过："罪恶、焦虑和创造力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罪恶和道德恐惧的体制下，虽然衍生出许多罪恶，但内省和自我审查也得到加强。德吕默认为，道德败坏的某种具体形式是随着肖像画、奏鸣曲、散文这些被我们认为是现代世界特征的出现而发展的。[173] 弗洛伊德也曾认为，对过失行为的良心不安最能令人审视自己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现代世界对道德罪恶的认知历史其实只是人类对自我、对创造力、人的局限性，以及无节制行为的认知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淫也只是因个人与社会关系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衍生的一种道德罪行。

第四章　手淫问题之所在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两个问题：在18世纪之前的几千年中，手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从18世纪开始，手淫这一问题才在西方社会蜂起，得到广泛关注。下面我们应该讨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在那之前，还是先来看看是什么使手淫突然变得让人谈之色变吧：当时就有，而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些有关手淫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尽管人们对手淫的理解不断深入，但那理解大多是负面的，只是最近才有越来越多的正面理解。因此，在探讨细节之前，我们要把这个笼统的问题解释清楚。也就是说，我认为大约从1700年开始至今，一提到手淫就会让人联想到很多特点。当时这些联想让人忧心忡忡，几乎整个医学界都认为手淫会造成脊椎结核、癫痫、丘疹、神经错乱及其他神经疾患、身体虚弱和几百种其他疾病。这种忧心忡忡的心理一直困扰着那些说不准手淫是否会导致疾病的人，也困扰着那些1880年以后认为手淫虽不致病但也绝非正大光明的人。手淫的问题还引起了另一些人的关注。这些人并不那么在乎手淫是否会致病，但他们认为人若与自己进行性交则标志着这个人、这个社会乃至整个文化都出了大问题。最后，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些人开始认为手淫有益于健康，而且不乏其他好处：它可以使人实现个人人身自由，达到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并摆脱让人压抑的异性相交模式。这些人讨论的中心话题不再是“手淫的问题出在哪儿？”，而是从这个问题繁衍出的“手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理清这些头绪以后，我要先用普通语言然后用专业术语请教那些医生和江湖庸医，他们到底觉得手淫的危险在哪里。我从医学界开始讨论，并不是因为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手淫本身具有其他含义，如焦虑、恐慌及机会心理、性吸引以及自由等，它们比医学原因更有文章可作。但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医学方面的原因仍是问题的关键。一、从18世纪到20世纪各个等级阶层的医学人士越来越继承神学人士的衣钵，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成为道德及良好秩序的仲裁者。由于宗教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自然的力量便愈发强大，医学人士因此成为自然的代言人。手淫从本来不过是一种遭神谴责的不洁行为或一种不是为生育而进行的性行为，变成了本质上的道德问题，单凭经验就可以辨别其道德是非；二、在1712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全新观点：手淫本身可以置人于死地。该观点涉及了手淫最可怕的负面影响。它首次将手淫的最邪恶本质直指其对身体的伤害。任何对肉体造成如此伤害的事定然十恶不赦。如此，一种世俗道德就通过医学语言被编造、夸大并且合法化。

在弄清了医生所认为的手淫的问题之后，我们要追根溯源，探求他们的病理生理理论的道德支柱——我们要弄清，本来并不太引人注意的手淫这样一种性活动，如何会被钉上了内疚、羞愧和危险的标签。于是，医学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18世纪以来，西欧文化中到底是什么使手淫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更具体一些：在启蒙运动之后，是什么使手淫成为一种典型的让人害怕而后又大受欢迎的东西？人们在认识

自我和性行为过程中，为何会对手淫有如此变化多端的认识？只有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探讨“手淫缘何成为问题”。我们将粗略地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把手淫问题之所在说个一清二楚。

理清基本概念

更多的手淫行为？

手淫成为热门话题，原因之一也许就是——说的简单些——这种现象出现的多了。这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以前，因为手淫并不普及，所以它也就没成为很重要的道德或医学问题。反之，正是因为手淫行为的增加使之成为问题，医生才开始探讨它；这就像瘟疫和霍乱，只有在达到流行规模的时候才会引起医学界和公众的关注。

我们不妨把这个观点阐述的更巧妙一些：新的条件使手淫更具有吸引力，于是手淫就更普及，也就更引人注意。新的条件之一就是摆脱了原有的束缚。19世纪研究精液流失的医学权威拉勒曼（C.F.Lallemand）和研究工业革命给大众带来的所谓民主特征的现代历史学家爱德华·绍特尔（Edward Shorter）都认为，古代和近代医学工作者对手淫问题相对沉默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不太进行手淫活动。是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活动空间。[174] 人们由于获得更多的私密空间和更多的刺激，才产生了更多的手淫行为，而医学界不过是对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已。

另一种说法是，手淫行为增加，是因为其他的性行为减少。经济学家们也许会称其为性行为替代效应：整个性活动就像一个液压系统，来自一方的压力会转化成对另一方的动力。比如，当代一位最博学的研究性学和家庭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手淫……好像是因为其他性行为的缩减而增加的”。[175] 人类欲望往往会由于无法实现其原始目标而转向另一个方向。教堂几个世纪来一直宣扬婚前独身生活理念——这一理念在特伦托会议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高度。此外，经济压力的不断增长使独身者越来越多，人们结婚的年龄也越来越大。这些都迫使人们的性能量从两性生活转移到手淫。（看似成功的对大规模鸡奸行为的压制也有类似的效果。）换句话说，手淫行为是在没有更好的其他性行为的条件下而产生兴起的；它方便易行又不花钱，在时世艰难时也可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现代文明的发展也许的确会使手淫的发生频率更高，与异性性交或与同性性交机会的减少也会促使人们更关注其他性欲释放的方法。其实，那种认为手淫是一种廉价的性释放方式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甚至更早。德国19世纪晚期的性学家们曾经对“必要的手淫”进行过热烈的探讨。[176]

然而，这一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手淫在18世纪成为那样让人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首先，即便是当时手淫确实更普及了，当时的人们也无从确定手淫的发生率是否是呈上升的趋势。15世纪20年代，让·格尔森（Jean de Gerson）认为，每个人——至少是每个男人——都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如果有男人否认他曾在阴茎勃起时抚摸自己的私处，那是无稽之谈。更关键的是，在18世纪，没有人声称问题出在人们有了更多的手淫行为；每位评注者都只是说手淫比比皆是，普及性极强。他们认

为手淫行为到处都是，而且做起来很容易，也不易被察觉，所以就越发危险。因此，问题的新焦点并不是手淫行为本身，而是突然兴起的对手淫的关注。

最后，即便确实有人认为手淫行为在增加——即便是它确实是有所增加，这些设想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手淫问题一下子变得如此迫切、需要解决。在讨论为什么瘟疫、霍乱和疟疾需要人们的关注时，我们几乎不用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因为这些疾病要人的命。可是，手淫不会要人的命，而且18世纪以前没有人认为手淫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我们所寻找的问题的答案肯定不仅仅只是区区几个数字那么简单。答案隐藏在这些数字的背后。

手淫的增加并非由于替代效应（并非由于其他性行为的减少），而是由于其是一种自体性行为。支持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英国和其美洲殖民地。英国是新反手淫文学的发源地，而美洲当时的情况是，异性性交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唾手可得。性压抑（如果还有人想用这个词的话）在当时的美洲已经很少见。人们的结婚年龄降低，这意味着年轻夫妻更早地进入了正常的性生活；未婚先孕率和私生率的提高也表明在婚前人们有了更多的性生活。如果女孩未婚怀孕，就很难找到结婚对象；终身未婚的人数减少，这意味着参与手淫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少。简而言之，此时异性性交的社会阻碍在历史上相对很低。也许当时在法国还有很多手淫现象，因为那里的结婚年龄要大一些，而且天主教会成功地在乡下推行了严格的规定，限制婚前性行为。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的农民因此就成为学者们所阐述的手淫问题的主角。学者笔下的典型手淫者是学校男女学生、中级学徒，而不是那些得不到性爱的农民。对于学者来说，性欲、极度膨胀的性欲，在欧洲的城市中蔓延，也在瑞士工业革命初期的村庄里蔓延。[177]

性愉悦

对手淫的责难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性愉悦也进行攻击。性愉悦是天主教道德神学允许的有限范围之外的好事。对手淫的责难也与日后的新禁欲主义关系不大。[178] 启蒙时期的医学人士和研究该问题的教育家和伦理学者都并不认同长期以来教堂对肉体快感深深的质疑。实际上，1712年以后有关手淫的讨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人们对道德方面并不太在意——有时候有些敌意。在基督教兴起以后，手淫在道德领域是可以被接受的。新教徒之所以对手淫进行现代医学攻击，主要是反对把独身主义当做理想生活。他们并不认为婚姻是次佳选择，也不把性交看做对健康或上帝拯救人类的威胁。实际上，英国的卡尔文教思想相当新颖，认为夫妻间忠贞的性爱恰恰反映出圣人对上帝的忠贞信奉。启蒙时期兴起的对教会的抨击也主要是针对教会对那些发誓要终身禁欲的教士、僧侣和修女的性压迫和剥削上。伏尔泰认为，手淫之所以那么恶俗，正是因为它是修道院和唱诗班堕落败坏的结果，是教堂愚蠢地压抑人们的欲望，使其产生变态反应的结果。[179]

对性愉悦的重新评价是医学和神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一方支持性爱，认为它是美好的享受；另一方反对性爱，认为就是该反对。医生与小说家和道德家结成联盟，大力宣扬性爱的益处：美丽、纯洁、有趣、健康。就是在医学和道德上抨击手淫的人也歌颂了婚姻内的性爱。其实，婚外性爱看起来也不算太坏：没有束缚，也没有世界公认的必须遵从的真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著名的《布干维尔岛游记》中描绘了南太平洋文化中的性自由。这吸引了备受压抑的欧洲人，为他们开拓了思路。

手淫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获得性快感的一种手段，而是在于，它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手段。手淫的快感充其量只是假快感，是对真正快感的曲解。总的来说，崇尚自然的医学界和崇尚思辨的人类学界都支持极乐异性性爱，因为其顺理成章而且没有违反道德。[180] 即便是婚外性行为，在一定的医学范围内也不算太坏，有些医生甚至推荐用嫖娼的办法来治疗手淫的毛病。当然，放荡的人会享受各式各样的性快感，但即使是他们也和医生一样都对手淫表示厌恶。（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在各种文献中被频频提到、公然声称自己放荡理念的俱乐部——“乞讨者的乐园”于1732年在苏格兰的法夫建立，随后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又建立了分部。该俱乐部的宗旨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打破原有的性爱模式。为表现其惊世骇俗、打破常规的特质，会员入会时要在其他成员面前进行手淫。）[181]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旧的流行医学理念都认为手淫大逆不道，因为它会破坏性快感。他们认为，在本应该“充满崇高、狂喜和难以言喻的愉悦的”性爱婚床上，手淫的男人面对的是禁欲、忧虑和被压抑的愤怒。而沉迷于手淫的女人则避开了性交的“合法的欢愉”，选择了痛苦、惩罚和自虐。[182]

18世纪的医生对基督教的性罪恶分类毫不感兴趣。他们当然了解手淫“不正常”。但这个“不正常”，仅仅是意味着在非正常的环境下进行的生理过程会带来更多负面后果：“在正常的性交过程中失掉太多的精液会对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是在非正常的性交过程中失掉太多精液，就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不正常”在这里并非指的是非生殖行为，而是指人为行径，就好比大坝拦截了河流的走向，因此也许会造成负面影响一样。17世纪生理机制方面的专家桑托里奥斯（Sanctorious）的话骇人听闻：“正常性刺激引起的性交是好的。”如果进行的小心，频繁的性交也无伤大碍。但是“主观意志引起的性交就会对人有伤害”。[183]

我们要从这段话里拣选出重要信息来解释：为什么医生和其他那么多人认为一种性交方式比另一种性交方式更危险，毕竟，它们都是达到性高潮的手段。但是，眼下，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两种性交的区别并非在于一种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而另一种以其他为目的。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曾这样划分性行为：可允许的性行为（以传宗接代为指向的婚内性行为）；违反理性的性行为（乱伦、私通、通奸）；违反自然常规的性行为（非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性行为，如口交、兽奸、手淫，以及为防止怀孕而选择的不同性交体位及做法）。在这里，阿奎那的理论不起作用。现在人们关心的焦点不在阿奎那的苦行和道德神学范围内。人们更关注女性手淫和幼童手淫——那些三四五岁还懵懂无知，从阿姨那里学会手淫的小孩子。随着性快感从遭人怀疑到让人崇拜，有关性快感作用的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84]

医学和手淫道德观

我们不妨从医学入手，探讨手淫如何突然坏了名声。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运动时期的医生好像也举起了牧师的大棒，认为邪恶的东西具有杀伤力，其后果不仅对来世，而且对现世也极其不利。不过，那时候的医生们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换了说法；他们彻底地重新解读手淫，使其成为了新鲜事物。他们普遍认为，是自然，而非上帝恩准包容了它的邪恶。因手淫而得的疾病并非神意。有人认为上帝是为了惩罚手淫这样一种罪恶而使手淫的人得病。提索则不辞辛苦地与那些人划清界限。他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身体的机械规律和把身体与灵魂统一起来的世间规律”来解释。 [185] 他接受了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看法，或者更宽泛一些说，他在寻求自然事物的因果关系时遵从了唯物主义医学的传统。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提索和其他的18世纪医学权威人士曾经认为手淫的坏处主要在于它不能导致生育或在形式上污秽。手淫当然不能传宗接代，遗出的精液当然污秽不洁，但这些都不足以破坏手淫的名声。于是，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问题就是探求从唯物的新方法角度来看，手淫究竟在哪些方面“不正常”。

当今的医学资料、新的发现和假说都不能解释当时到底是什么让人觉得手淫如此危险，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手淫会置人于死地。实际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有关性交和性高潮的讨论反而使手淫著作突然大量涌现的原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比如，古典医学理念认为，癫痫症发作与手淫有关。性高潮时会产生战栗，即整个身体颤抖，这让人看起来有些像或者会真的导致痉挛。提索对此理念深信不疑，他引用同时期其他医生研究的典型病例，认为性高潮会导致可怕的疾病发作。他说，他的一个同行“认识一位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个商人。这位商人每次享受完性爱都会立即癫痫症发作”；还有一位同行认识的一个妇女在“性交后通常会痉挛”；第三个同行讲述的是最惊人的病例，说有一个男人，他“在做爱过程中突然抽搐，从此12年都没有停止过”。 [186] 最后，提索还引用古希腊医师盖仑的说法，给这些病例以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以上提到的病例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它们看似滑稽，但是事实；二、虽然如此，这些病例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手淫性高潮虽然原来的名声也不算太好，但突然在18世纪变得如此危险吓人。剧烈的性高潮对某些人来说有可能像是癫痫或其他疾病的发作，而且现代医学发现，性高潮时会产生一些“大脑活动现象”，这也为以前的医学发现提高了可信度。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正常的手淫时不会产生阵发的疾患，但对个别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一位颇受尊敬的20世纪晚期的神经科医生报道了这样的病例：一位被诊断有癫痫病但没有性问题的41岁的男人，在癫痫病发病时伴有不可控制的手淫和眼球快速运动。还有病例称，在某教学医院有些小孩子来就诊，因为他们曾出现类似癫痫或其他阵发的疾患。主治的小儿科医师认为，在进行更昂贵的检查之前，应先考虑鉴别诊断的其他可能性，即，他们剧烈的甚至有时候疼痛的战栗是

由良性手淫性高潮引起的。有些人在手淫时会伴有背部剧痛或其他形式的高潮。[187]

如果说“性高潮—癫痫或战栗抽搐”这样一个说法已经过时、而且不太让人信服，那么“手淫—性高潮—癫痫或战栗抽搐”这样一个说法就比较新颖。18世纪以前，没有人把这种抽搐明确地称做神经病症状（我们现在倒是常用这个说法）。当时就连提索也没有提供手淫会引起抽搐的病例。这个论点是通过推理间接得到的：如果说无节制的两性生活是有害的，有可能导致癫痫或抽搐，那么无节制的手淫这种自体性行为就更加有害，会导致更严重的癫痫或抽搐。20世纪初期，对手淫的抨击主要来自道德方面，已经大大地脱离了医学范畴。手淫会导致癫痫或抽搐的说法也不攻自破。1901年一本主流英美参考资料上记载，手淫现象在“道德水准低的癫痫或抽搐患者中”当然更普遍，但这并不能说明手淫就是导致癫痫或抽搐的原因。（当然，欧洲的其他资料并非如出一辙。）[188]所以，问题仍然是“手淫性高潮”（即手淫产生的激动颤抖）的“毛病”出在哪里，才使它被认为是危险的，而且是需要仔细监督研究的。

从精液的道德生理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让我们更接近答案，但是必须得对这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体液进行重新认识。如果，像一位18世纪观察家及现代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手淫如此骇人，其“毛病”出在流失珍贵的体液，那么我们的后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精液流失有其比喻象征意义，它与其他方式的流失相类似。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大体了解现代时期的手淫问题。这个论点大体如下：精液、金钱和精力都是短缺的，但还是被人们挥霍，因此人们要承担风险。这就好比在经济贸易中，人们必须有条不紊地计划使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一样。在精液释放过程中，男人也需要节俭地使用他们珍贵的体液。如果身体内部的体液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外泄，人们因缺乏时间、金钱和安全感而产生的恐慌感就会缓和；如果体液无度的消耗、外泄，人们的恐慌感就会加剧。[189]

在18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人们一直认为精液携带着“生命的火种”，赋予胎儿以生气和活力。用一位专治性病的江湖庸医詹姆斯·格兰汉姆（James Graham）的话说，精液就是“生命的火炬承传者”、“宜人的活力香精”、“光辉的本源”。他的疗床能为男性点燃“火种”。有关神奇精液的证据比比皆是，源远流长：17世纪塞维利亚的百科全书编纂人伊西多尔（Isidore）说，精液就是血液的泡沫，有了它“人才被赋予生命，才能生存”；血液循环的发现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认为，精液就是普罗米修斯那“精灵般跳跃的”火种，点燃新的生命。显然精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190]

在古希腊盖仑医学时期和在18世纪，尽管受到生物机制、化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精液仍然被看做是人体中最矜贵、最具能量的体液，是整个消化过程中产生的提纯精华。身体花费很大力气从食物中吸收提炼最重要的物质；男性精液的提取过程要比女性阴精提取过程更加费力，精液的提取过程要比母乳费力，母乳要比血液费力。提索从他收集到的证

据中得出结论，说，“简而言之，精液是最重要的体液，可以把它称为动物体液中的精油，经过提馏的精灵”；“浓缩的生命力量”；“生命的源泉和支撑”。《百科全书》把精液解释为最珍贵的体液，其形成过程要比其他体液的形成过程更需要能量和关照。德国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n）写道：精液“就如同血液和决定神经系统的体液一样”，如果流失会导致严重的身体虚弱，因此应该认真节制；无节制的排泄精液会“伤害身体”。[191]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索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说法：一份精液相当于40份血液。该“名言”虽是完全虚假量说法，具有欺骗性，但却风靡了很长时间，被不断引用。在150年之后，甚至还有人把这个观点当做最新的科学成果大谈特谈：一位在莱比锡学习过的医学博士在20世纪早期一本权威的生理书中这样写道：毋庸置疑，“手淫性高潮时所流失的精液比同等量的血液流失的损害要大得多”。[192] 在提索借鉴前人总结手淫的坏处以前，这种说法已经至少有700年了。17世纪早期，托马斯·高根在写给学生的健康手册中说：“如果我们通过非自然的方式把精种排泄掉，那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流掉40倍的血液还大。”至少，高根还援引了出处：出自于11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医学王子艾维塞纳（Avicenna）。提索要是知道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来自于被自己的老师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批判为“组织空洞浅薄”的作品，他一定会觉得窘迫不堪。当然，人们每天的日常活动也似乎给这样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使其看起来有几分道理：哺乳的妇女可以喂一品托的奶，但却毫无疲乏之感，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射出一点精液，他就会觉得疲劳。男人在性高潮后会觉得比做其他任何同等时间的运动都要疲劳。如果没有了睾丸，男人就会变成毫无男子气概、身体变了形的太监；正常身体里的精液意味着青春和活力。[193]

很明显，如果入不敷出地挥霍这宝贵的液体，就会给身体经济状况带来严重的影响。相反，如果一切都有条不紊，那么精液和血液一样，就会循环并首先滋养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与其密切相关的神经和脊髓内液体。因此，提索写道：失去精液会对大脑产生最有害的影响，大脑会因为缺乏生殖活力而萎缩。他解释道，睾丸与整个身体是保持一致的。比如，有人曾听到过一个性生活过度的男人大脑里“头骨膜咯咯作响”；再就是遗精——即精液无意识地流出。从病理生理学方面来看，遗精既是手淫疾病的结果，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人们认为遗精非常危险，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医学领域。19世纪早期的法国医生拉勒曼被同辈认为是这方面的王者权威；186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拉勒曼医生追随者曾经这样说道：能回到拉勒曼的水平就是进步。[194]

但这个解释仍然不能清楚地说明手淫的问题如何在18世纪成为焦点问题，成为一种旧疾病的新变体。在1712年的时候，那种认为精液流失是过度性生活在病理生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过程的说法已经不再是什么新观点。事实上，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提索，在相当长时间里的临床医学传统都给提索提供了大量的病例，用以证明失去精液会对身体损伤很大。但引人注意的是，提索所引用的所有18世纪以前的和大部分当时的

导致重疾甚至死亡的病例都并非手淫的结果，而是老问题——过度异性性交的结果。

可以说，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有关精液的新发现对手淫以及精液损失的讨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哲学医学家”的学者曾经假定，精液是由基本的、产生生命火花的电流组成的。（哲学医学对解释自然主义的世俗伦理道德至关重要。）这个观点很新颖，但是它与射出来的精液没有太大的关联，与体液的传统生理机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提索从他那些显赫的同行那里收集的恐怖病例充满了这种生理机能。这些病例中提到的病人没有一位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霍夫曼的一些病人因为享受“危险的情爱”而受了伤，还有一些病人出现了发烧的症状，但他们都没有手淫；德国西顿的法布里丘斯（Fabricius）医生的一位病人在患胸膜炎的第10天与一位女子有染，发起高烧，身体剧烈震颤，在第13天撒手人寰，但他也没有手淫；丹麦解剖学家巴多林（Bartholin）的病人是一位年轻的新郎，因新婚性交过度发起高烧，但他没有手淫；谢斯诺（Chesneau）医生的病人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结婚后第一周就发热，双颊涨红，几天后死去，但他们都没有手淫；提索的病人是两个“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位于1761年新婚的早晨发病，另一个于1762年其婚后的第二天发病，但他们都没有手淫。事实上，提索也曾经提到一位得了天花的病人，他认为是手淫导致“致命的身体机能紊乱”。所有这些人都是死于其他疾病，而各种各样的性交导致的身体精疲力竭只不过是使病情恶化而已。[195]

从把死亡和疾病都归罪于“性欲过盛”，到认为手淫是独一无二、特别危险的习惯做法，这一观点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大飞跃，尤其是在当时对“过度”的标准界定看来更是这样。尼古拉斯·维奈特（Nicolas Venette）是当时提索很崇敬的一位专家，他也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到广大欧洲大众的推崇。维奈特认为，生活在巴贝里（Barbary）平原上25岁的年轻人可以在夏天一夜做爱5次而毫发不损，而瑞典深冬中40岁的中年人可以一夜做一两次。想必，多数男性可以通过这些典型的例子估计出他们做爱次数的上限。维奈特认为，女人无论多么频繁地性交都“真的不会觉得累”。如果这些例子中提到的做爱频率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那就很难理解每天一次的手淫如何能对健康的年轻男性产生威胁；年轻的女性一个人可以沉湎于性爱而不受损。或者，相反地，就像早先攻击《手淫》的玩笑里讲的那样，如果真的如其书中所述，一个男人可以1小时7次手淫，这种事如果传到好色荡妇的耳朵里，她们就会要求自己的丈夫也表现出同样的水准。任何男人如果不是受疾病困扰的话，都应该让他的女人满意，而《手淫》兜售的药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人们当时认为，大量性能量的消耗直接体现在身体的健康状况上。[196]

当然，关键是要把手淫性高潮与其他种类的性高潮区分开来。但是，这样一来就掩盖了精液损失本身的问题。而实际上，能否找到一个貌似有理、能让人信服的二者间的界限是一个一直困扰那些敌视手淫的人的医学问题；这正是严肃的文化工作之所在。1904年，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教授写道：“在研究手淫影响的时候，突出的、首

要的问题是要确定，手淫是否比过度的自然性交更有害，并且，在哪些方面有害。”他接下来说，有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认为二者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即20世纪初期，“有影响的权威都承认，手淫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度的性交有害得多。”[197]

提索如果在世，也许会同意他的观点。他曾指出，手淫“比与女人进行性交更加有害。”提索的追随者也随声附和——一位19世纪早期的美国医生写道：淫欲过度是导致严重疾病的可怕而又普遍的原因，但是手淫的“破坏性是其十倍”。一位地位显赫的英国法医专家也曾经写道：“手淫之所以比两性交合更邪恶，是因为手淫更加极端和强烈”。[198] 因此，在没有相对较新的有关精液的理论提出之前，有关手淫性高潮的问题突然成了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都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

不管这个关于手淫性高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它都与新体液学——即研究体液平衡的生理学——特别是精液经济学关系甚微。它既没有显示出对身体内精液自给自足的理想的渴望，也没有显示出在物资短缺的社会里精液损失的危险。手淫的问题出现在一个充裕代替匮乏、人们不再鼓吹自给自足的时候，它是作为医学和道德问题出现的。说得更准确一些，精液的流失对于那些把手淫提到日程上来讨论的人来说题目范围太小，不足以完全解释他们的困惑。

首先，是幼童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过渡时期。古典医学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个年龄段人们的性生活：他们不会纵欲过度；他们的身体不产生精子；没错，所以他们还没有到青春期。后来被弗洛伊德称为婴儿手淫或潜伏期手淫的问题是首先在18世纪被提出的。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它表明精液流失充其量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提索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手淫对儿童来说，其危险性不言自明。因为儿童没有精液可以流失，因此会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一位德国重要的教育改革家记载道，在20名受过良好教育的6至10岁的儿童中，最多只有2名儿童没有陷入过手淫的深渊，因此没有受到手淫可怕后果的影响。更糟的是，手淫的传播呈自发燎原的特点。只有一半的儿童能自己意识到手淫的坏处。所以，家长和老师有责任在孩子8岁之前告诫他们，这样做会对身体和精神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这些儿童完全是在众所周知的精液经济论范围以外的受害者。拉鲁斯（Larousse）在他1875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中，回顾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人类残杀，并对他的那些刚入门的读者们写道：“我们在医学记录中发现的大量病例说明，有很多5、6、8岁的儿童因手淫而致死。”是沉迷——即能量的全身消散，或说得更复杂一些，是道德的崩溃——而不是宝贵体液的流失摧残了这些孩童还没有成熟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当然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199]

最后，并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女性手淫。随着手淫现代方式的出现，手淫这个古老的问题一下子关系到所有人；手淫打破了性别界限。古代时期几乎没有人提到女性自体性行为，偶尔提到的是在没有真正的性伴侣时替代用的阳具的小笑话。据我们了解，关于男人手淫的话题在古代时期提到的也不多，大部分是粗俗的笑话或下流的暗示。在新基督教伦理

概念里，鸡奸行为和人兽交虽然也有可能发生在女人身上，但普遍被认为是男人犯的过错；所有与流出精液相联系的复杂后果都只对男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因色情梦境或非色情梦境快感引起的夜间梦遗、不自觉的触摸阴茎、出人意料的白天勃起、出于纯洁的原因而触摸阴茎等。遗精的每个细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问题，是修道士和独身牧师进行忏悔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手淫是男女同等的；1712年以后，女人的手、外生殖器，甚至更重要的，女人的想像和意志变得与男人一样可能引起非议。《手淫》（1730）的第十五版也许鉴于前些版本缺乏说服力，于是在女孩身上诉诸更多的笔墨，以证明她们也手淫，而且也因其而受到伤害。《手淫补遗本》广告的主打亮点就是进行性自我探索或与朋友进行性试验而堕落的女孩的故事。当时最受到崇敬、并在皇家过问下而出版的《医学百科全书》清晰无误地对自愿自体性行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当他们不适当地纵情于这些肉体之欢时，男人或女人都同样痛苦。"提索的作品也大量援引《手淫》一书中那些"读起来让人充满恐怖和同情的"女性手淫者的自白，并得出结论——"这种不适之举好像对女人的祸害比对男人更嚣张"。在另外一处医学文献里——提索在他的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确证的病例，提索说道，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成为这种恶习的受害者"，"因手淫而引起的机能紊乱"似乎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提索的好友齐莫尔曼（Zimmerman）与其观点类似。25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尽管对于男孩子来说手淫是危险的，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19世纪早期的很多法国医生引用了他们的同辈及一些德国专家的说法，更加确凿地证实女孩子也手淫，而且这种做法在道德上和身体上对她们的伤害比对男人更加严重。[200]

启蒙运动时期这种对性行为的认识传统一直延续到弗洛伊德时期以后。和提索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总体上说，女人不像男人那样能够"忍受"手淫：她们对手淫的态度要更敌对一些；她们不如男人那么容易找到进行手淫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手淫在女性中更不自然。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手淫更符合男人的本性……对阴蒂部分进行手淫是更男性化的行为，而要想发展女性气质，先行条件就是要消除对阴蒂的手淫"。换句话说，女性的性事要背负更多的文化内容，以使其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女性要有更多的负罪感，因此，即使不在身体上，至少在心理上，女人要比男人背负更重的伤痛。弗洛伊德或提索以及其同行的观点究竟正确与否，这其实无关紧要。尽管大家已经承认女人不分泌精液，因此她们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但大家仍然认为，手淫的危害是真实存在的。[201]

很明显，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即使在人们认为女人也有阴精之后很久，那个因素仍然在起作用，从心理和身体上对人造成伤害或折磨。福勒是享有盛誉的骨相学大师（骨相学即19世纪版本的唯物主义心理学），他曾引用一些绝对医学权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尽管女孩子们也许不像男孩子那样受手淫影响那么深，但是仍有数以千计的女孩子因手淫导致的肺痨而死亡。另一位19世纪中期的美国作家曾引述"最高

的医学权威”（他是指考普兰［Copland］的《实用医学词典》），大意说，手淫现象，作为“对于色情的个人沉迷”“在男女中同样常见——也许在女孩子中比在男孩子中更为常见”。至于那些手淫的人是否更易患有疾病则很难确定。女性好像与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更易患有虚损性疾病；而被诊断为手淫性疯癫的男性数量则较之女性多。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早期德国的一家精神病院里，自我性刺激一直是男性住院者中最常见的发病方式，而在女性住院者中却根本不曾出现。19世纪晚期，德国性心理学家克拉夫特-艾宾曾诊断出12例男性手淫疯癫症，而只有3例女性病例。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一位资深美国健康问题专家认为手淫导致疯癫，且其威力仅次于酗酒。她认为“有足够证据表明，在因手淫原因导致精神错乱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当中，女性的比例几乎与男性相差无几”。[202] 不管具体的比例到底是多少，从一开始人们对手淫带来的危害忧心忡忡到最后手淫作为一种医学问题受到人们关注，尽管女性一直以来可以不因精液的问题受到手淫的困扰，但是始终不能脱离手淫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干系。

对于女性来说，手淫之恶是神秘中的神秘。齐莫尔曼认为自己很难理解人们只是因为对女性的手淫不太了解就对其采取如此“难以置信的冷漠”态度。因此，他警告说，这样的态度对女性有害，尤其是对年轻女性有害。因为人们大多认为手淫与她们最不相干。国际知名教育家克里斯汀·沙尔斯曼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认为落入手淫“魔爪”的女孩的数量“甚至多于男孩”。实际上，他和参与这一话题的所有其他评论家一样，声称当他自己发现手淫比比皆是时，甚是吃惊。但他拒绝对有关女孩手淫的问题发表更多的评论，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很明显，女孩是不会像男孩子那样给他写信自我剖露、自我忏悔的。从事青春期女生教育的女性教育工作者们好像也不会写文章向大众表白她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感受。而且，在校女生的数量比男生数量少得多。简言之，对女孩如何进行手淫，又是如何学会手淫，我们无从得知。但大家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都会手淫。《百科全书》中提到，两性都竞相“用手作为罪恶的工具”——其结果都同样令人忧虑。[203] 这一点在过去几百年的经验中已经被证实。

19、20世纪之交时期的俄国小说家、臭名昭著的女性解放运动倡导者，安娜斯塔莎·维布斯卡娅（Anastasia Verbitskaia）曾在文中提到她自己在寄宿学校的亲身经历。她的回忆证明了青春期女孩对性爱渴望的痛苦，这种痛苦只能用手淫来承受和缓解。对性爱的渴望折磨着她和她的同窗们；老师让她们在睡觉时把手放在被子外面，有些无法抑制自己欲望的女孩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直至精疲力竭。至于是因为手淫而疲劳，还是因过度压抑自己不去手淫而疲劳，我们则无从得知。[204]

实际上，正是因为手淫的女性在她们的性幻想中产生欲望，而且是只产生欲望，她们才成为手淫问题的最典型佐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耗失身体的什么部分无关紧要。是无形的东西，而不是物质的东西构成了手淫的危险和乐趣。18世纪的色情文学大爆炸，既给人们提供了性刺激以引起手淫，又把手淫当做主要文学主题。女性手淫是一种特别的性刺激

形象：一项有关色情小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书中75%有对手淫的描述，73%的手淫者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一些流行文化区，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一家网站在其一份有学术价值的有关电影中手淫镜头的报告中说，有172部电影有男性手淫的镜头，而只有96部有女性手淫的镜头。）[205] 在18世纪，估计有很多手淫的女性，她们完全脱离于精液问题。这庞大的女性手淫群体告诉我们，手淫的危害并非在于其缺乏性——使人们少了某些东西，而是在于它给人们带来了过量的欲望。手淫立于性欲系统的中心，因其能量超强，往往有旋转失控之嫌。在这样的一个性欲系统中，正常世界和大自然的约束显得苍白无力。

18世纪派生出手淫概念的医学界当然就精液问题谈论了许多，然而医学界终究没有成为道德的传声筒，去忠于那些关于精贵的体液及其对精力影响的老说法。医学更是声势浩大，宣扬正常的人类活动总会有自然极限这样的专业观点。再珍贵的体液也与道德关系不大。提索与其他同样杰出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起——他们大部分是新教徒——阐述了一种建立在自然和理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神或超脱尘俗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基础上的新道德标准。手淫与被称为“人性之母”的情感同宗。情感把身体与精神、自然与灵魂通过不同的人类活动联系起来。[206] 在这样的世界观中，神经或神经液要比血液或精液重要得多。不管灵魂是否由神经或神经液精制而成，产生神经的理智提供了外部世界进入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途径。兴奋、快乐、悲伤、欲望、恐惧——所有的人类感情，无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或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安抚，或使我们的身体经受折磨。人这种生物，总是要受到无穷无尽的刺激，无论这些刺激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在18世纪，人们会直接把别人受的痛苦和折磨转换成同情。由文字产生的同情和共鸣会对读者的身体立即产生影响。例如，有读者写信给卢梭的出版商，说在读了《新爱洛伊丝》之后，泪水涟涟、心悸震颤，甚至心脏病发作，伴有痉挛的剧痛。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阅读。在一本关于文人疾患的书中，提索写道：“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让我们疲劳，而最让我们疲劳的就是快乐。”据说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在读笛卡儿的作品时出现了情况很糟的心悸；巴黎的一位修辞学教授——据说此人如今仍健在——在“追寻荷马崇高的篇章”时，晕厥了过去。[207]

在18世纪，经验主义心理学和联想主义心理学大行其道。外界事务会彻底影响人的思维。刚出生的人，思维好似一张白纸，慢慢地白纸被不同的感觉画满。即使是思维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比如想像力和记忆力——也会因环境扭曲而改变。医生和道德家一样，如果不求助于神学或天意，就很容易把一系列由错误或不恰当的方式生成的刺激理解为疯癫、耗损和死亡。

最后，在18世纪，奢华和物质过剩更加普及，于是也就更具潜在的腐蚀作用。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会切身感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业革命”。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震动和刺激，但也给人们带来危险。更重要的

是，现代文明引发了早熟的、非自然的欲望——自我性刺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篇章里再详谈。

提索的心理生理学观点认为手淫性疾病确实存在。这一观点来自他的瑞士同胞哈勒。哈勒是个新教徒，是18世纪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医生和道德家。提索年轻时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学长哈勒的作品印刷出来。他还为从拉丁原文翻译过来的哈勒的多部著作写序，语句之间充满热忱。提索写道，哈勒有关应激性的发现是“了解自然的关键”。他认为培根是伟大的试验和理性哲学的倡议者，是人类在该发展阶段苍穹中的巨星。这一发展阶段还见证了血液循环、空气的性质及其他很多重要发现。而哈勒就是培根这样伟大人物的继承者。总而言之，提索对哈勒推崇备至。 [208]

哈勒认为，神经是身体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与另一位卡尔文主义者、临床医师和理论家赫曼·柏罕夫（Herman Boerhaave）以及我们以后要提到的其他著名医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但哈勒对荷兰人赫曼顽固不化的唯物主义持审慎态度。哈勒把纯粹肌肉的特性和神经以致大脑的特性区分开来，称前者（如肠的蠕动和青蛙的腓肠肌的收缩）为“应激性”，称后者为“易感性”。灵魂则位于心灵之梯的顶端。生物体所具有的两种特性——纯粹的生理性和最终产生意识、道德和其他人性等更高级特性的生理性——是紧密相连的。对前者有影响的势必也会对后者产生影响，从而或减缓、或加剧后者对刺激的反应。这一点对我们所探讨的话题有些启示：身体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兴奋会直接进入灵魂——或者叫做“内在的自我”——会破坏身体内的管道、组织和神经。简而言之，哈勒提出了道德生理学的框架，而他的学生提索则使之丰满充实。例如，在介绍哈勒时，提索指出，人们任何一点点的特别感受，如小小的惊恐或震惊，都有其异常的症状——忧虑、歇斯底里及各种神经不适。“身体各部分的应激性”，即肌肉的紧张收缩，与“易感性一起”，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机体紊乱甚至会使机体因负载过重而死亡。 [209]

简单地说，手淫邪恶的根本与神经有密切联系。在性兴奋和性高潮爆发时，高级的心理思维与低级的外生殖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在身体运转过程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性高潮时，身体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兴奋；身体在想像与情感的充分作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调节。性高潮的表象与生理特征都无可争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在性高潮时都会表现得斗志昂扬。这样的状态对发送这种狂热信号的身体各部分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抽搐”会破坏身体本来结实部分的力气和灵活性，从而使体质渐渐垮掉。因为在交媾过程中——说得更远一些，在手淫过程中——机体的纤维被“剧烈地拉长”；一位研究激情方面的专家写道，“劳累过度引起的中风会压迫大脑”，这是“心理思维各方面能力都依靠神经系统”的主要例证。一位18世纪的医生声称，“身体”是由“柔韧的管道和流动的液体”组成的。但这位医生对神经到底是用来传输“流动液态”纤维还是用来传输机械震动的故态物质这一细节持不可知态度。 [210]

这种说法好像机械味道太重了，没有给探讨心理因素留下余地。有人认为手淫的危险在于它有太多、太猛烈的摩擦。这就是约翰·马尔顿在他的《手淫》一书中最简练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很早就提出，过度的摩擦也许是有害的。不过即便是用最宽泛的唯物主义生理学观点来看，手淫也仅仅只是对神经的刺激和对某些身体部位的刺激。例如，桑克托里斯（Sanctorius）的《静态医学》一书中尽管极为清晰地阐述了人的机械运动方面的特质，但也用了大量笔墨描述心理状态，特别是人的性心理状态。书中认为，由“自然刺激”激起的性交要比人刺激自己而引起的自体性交健康得多。在桑克托里斯看来，“非自然的性交”的问题并非出在它违背了繁衍的终极目的，而是出在人们对它的作用力始料不及：人们是受到了“心理刺激”才产生性交的欲望。这种理念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提出的观点一样，都是从男性心理的角度出发的。但在18世纪，女性已经得到关注。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些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引起了兴奋，那它会比那些有形的且一直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加危险。

“心理状态”好像并非被理解为心灵的状态和精神本质，而是被理解为身体承受性痛苦能力的标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超出所需范畴的时候，自然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就如同化学物质拒绝参与反应以达到平衡一样。也就是说，在性高潮的代数学里，手淫会使方程式不平衡。

“与自己心仪的人交媾”既是健康的标志，也限制了不适当的肉欲，是以防其造成伤害的保证，因为性爱的愉悦“令心动加速，让人充满活力”，而且“交媾中失去的体液很快会得到补充”。尽管提索总体上对这种过于机械物质的观点不太赞同，但他也借用了该观点的一些语言。他引用了书中的一些例证。例如，有很多医生建议羸弱的病人与他们的护士睡觉，这样这些年轻女性身体散发出的健康活力就会“传”给这些病人。在另外一个病例中，医生禁止一位年轻男子继续与其护士睡觉，因为很明显，这位男子每当获得新的能量时，就立即想再次进行性交；在处女怀抱中获得重生的大卫王也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在交媾过程中，人们的分泌要比其他时候更多，因此也就会感觉身体虚弱。但是，交媾过程中，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反之亦然：“一方呼出，另一方吸入。”可是手淫过程中，人们“什么也得不到”。[211]

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热力学理论解释手淫性疾病，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与妓女性交要比自己手淫一次要健康10倍，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与护士通奸要比独自手淫更加健康。不过这种说法并非人人赞同。例如，1805年在法国举行的医学奇事展览上，除了展出其他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外，还全方位地展示了手淫者的面容和他们的驼背，把传统方式交媾的相对危险性和手淫这种“邪恶举动”的危险性相比较。在自然性交中，体液和精力虽然会流失，但由于性交对象具体真实地就在眼前而引起的性狂热可以缓解这种流失，那种从爱人毛孔中大量散发出来的“看不见的红晕”也会补偿这种流失。可是对于那些独自享受性高潮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流失就是“纯流失”，“因其在完全脱离现实的想像中进行，所以就越发淫奢”。[212] 在这里，我们有些讲过了头。

到目前为止，关于医生们认为手淫的不当之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楚了。首先，医生们认为，手淫不当是因为精液流失，可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把这种性高潮与两性性高潮区分开来，也不得不把妇女和儿童引入手淫这个范畴中来。神经和生理机能这个新的切入点使手淫与体液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手淫对体液的消耗上，不如说是出在手淫对神经系统的消耗上。性满足总是危险的，而手淫这种一个人就能达到的性满足的做法更是打破了平衡，因此也就越发危险。其次，是桑克托里斯以及其弟子们提出的机械物质理论。他们认为只有在原生态状态下的性爱才是健康的，性交过程中一方失去的能量会由另一方获得，反之亦然。不过，在18世纪初期，手淫之所以变得骇人听闻，其主要原因肯定不是众人已经详细阐述的体液的流失，也不是未获补偿的气息流泻，也不是对神经的刺激，尽管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以上这些新颖的说法都是在阐述更深层的原因：心理、灵魂、人类感觉与自然的关系。

没有一种医学哲学能对手淫的不当之处作出具体的解释。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坚持认为应该把手淫性疾病按照引起手淫的神经类型严格区分的人也就到底如何分类而争论不休。[213] 医生们与道德家们只好折中地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不过，所有的人，即使是在易感性生理解释已经过时之后，仍然同意这样的观点：手淫夹带着一种反常的欲望。

为什么说手淫不正常？

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医生认为，手淫远要比天花“可怕得多”。他应该知道，曾对二者进行过比较的提索在这两方面都颇有建树。自体性交是那么的不正常，到了让人恐惧的地步，以至于在18世纪医学已经崩溃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在其他方面充满理性的人们仍然认为手淫是“所有危险中最无法逃避，最致命的一种”。（弗雷德里克·亚瑟·希伯利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威克利夫从事迫使学生承认手淫的工作多年。一次他抚摸一位长相俊俏的男孩的阴茎，声称要让这孩子射精，以避免其手淫。后来这个男孩控告了他，希伯利因此丢掉了工作。）[214]

手淫之所以不正常原因有三。首先，它是由幻影而非真实的欲望对象而促成；它对心理思维中最变化无常，最具创造潜力的能力——想像力产生威胁，危及其存在，甚至要踢它出局。其次，其他性事的性交是男女共同进行的，而手淫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即便手淫不是独自进行时，那也是因为在一起的人出了问题，比如：邪恶的仆人们教孩子；学坏了的大男孩儿教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儿；学校中的男孩女孩在没有成人在场的情况下互相“切磋”。三、与其他欲望不同，人们对手淫的欲望既不会厌烦也不会节制。手淫是一种只由想像力驱动的违规行为，隐秘、原始、不可救药，诱人、上瘾、方便易行。男女老少好像一下子都能得到只有当年罗马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权，体验到无限的满足感。

于是，在一个防御各种欲望的堡垒已经坍塌下去的世界里，手淫成了个性泛滥的恶果；它指向唯我主义、社会反常以及自由的深渊。这种自由

对社会毫无意义，而且掩盖了道德自治的理念。手淫产生于一个重视欲望、快感和隐私的时代。它是现代版的自我性行为。

自然，技巧及想像的危险

启蒙运动之子弗洛伊德说，“手淫使幻想代替了现实”。[215] 那是18世纪中叶，人们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自己为何对手淫感到恐慌。不过《手淫》一书阐述了部分原因。该书虽没有集中讨论手淫问题，但总结了以往人们对手淫的各种忧虑，正如我们在第三章阐述的那样。也许读者们还记得，犹太教的领袖们曾认为触摸自己阴茎的男人很危险，并对这种作法表示忧虑。他们特别对“把自己的阴茎交到淫猥幻想（或激烈的想像）手里的男人感到危险”，因为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男人的罪过在于他们“刺激出自己的邪恶意向”。手淫本身并非这些领袖关心的话题，而手淫所具有的类似偶像崇拜的潜质效应才真正牵动了他们的心。

在《手淫》一书以及该书的后续著作中，“淫猥想像”成了手淫危险之所在的重点。约翰·马尔顿针对西方世界的道德讨论坚定地指出，精神和社会的堕落就是邪恶。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们以前曾提到过，手淫的邪恶就是指任何一种性别的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污损自己身体的一种反常做法。借助污秽的想像，他们努力去模仿并为自己获得那种两性性交的美妙感受。马尔顿在其他场合，如在《手淫补遗本》中，也回应了评论家的观点：手淫最邪恶之处在于它所承载的“淫猥想像”，没有任何人能在“完全没有淫猥想像”的状态下进行手淫。纯粹的医学医疗手淫是不可能的。

这种观念在通俗作品和学术著作中持续了近40年。《手淫》一书的非法翻印版本叫《议手淫》，而《议手淫》又有很多异本，其中一种异本写道：手淫是淫猥中最常见的罪过。手淫对人的诱惑比其他任何诱惑都“更强大”，因为这种诱惑就隐藏在人们自己身上，人们用“自己的身体模仿出来”的是肉欲快感。[216] 1728年出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通过比较所施方法的不同，把“自我玷污”与更广义的玷污区别开来，认为“自我玷污”是“由虚幻刺激引起的，以猥亵的摩擦和搔痒方式来污损自己身体的做法”。换个角度说，“夜间玷污”行为是由身边人产生的美好刺激引起的，是身体的自然反应；而手淫的刺激和手段都是人造的。

提索和《百科全书》的作者们在探讨这一话题的时候，都未把手淫的邪恶本质归因于肉欲，而是归因于相对肉欲因素较温和一些的心理因素。他们没有因手淫违反性交的终极目标或手淫中色欲取得最终胜利而对手淫进行神学谴责。提索声称，罪恶并不是他研究的主攻范围。为《百科全书》撰文的曼纽特·钱巴德（Menuret de Chambaud）则更直截了当。他清楚地表示，如果撇开神学不谈，那么手淫也算不上太坏：“手淫如果并不频繁，又不是由火辣性感的想像形象刺激而来，即如果手淫因个人需要而成”，那它根本就无害。《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很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手淫，很明显，他是站在正常的两性关系的立场上的。不过，《阿尔波特的梦》的作者伯度（Bordeu）医生却在文中说服大家接受手淫优于其他选择余地的观点。狄德罗说，严厉的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 the Elder）如果活到今

天，也许不会像当年那样，给去逛妓院发泄自己性欲的年轻人以这样的忠告："要有胆量。"如果老加图在今天发现年轻人手淫，他也许会对这位年轻人说："这样总比与别人老婆睡觉，或冒着健康和名誉的危险去找妓女强。"对于那种花大力气做锻炼就会消除过剩的性欲的说法，狄德罗的回答是："干吗把自己的那点儿愉悦也剥夺掉？"[217]

换句话说，如果手淫是自然产生的——即是真正性需求的结果——那就正常。很明显，曼纽特·钱巴德对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手淫"不正常"的这一观点不以为然，对更宽泛一点的、让神学家大伤脑筋的关于性快感和肉欲的观点也不以为然。在《百科全书》他的一篇文章中，钱巴德指出，在没有其他手段发泄性欲的时候，很难仅用适度的手淫来满足正常的与他人性交的欲望。手淫的本质就是不适度，因为想像是很难约束的。这正是手淫的"邪恶要因"。因此，心智以及与其联系的一切，作为想像的依托，要受到最严厉的指责。这与《手淫》中的说法完全一致。在《手淫》一书中，一位手淫者在信中坦白道："我认为想像与手淫相伴同行，而且又助长手淫，应对手淫之罪恶本质负主要责任。"[218] 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的权威著作认为，性手淫的中心问题总体说来是由内在的"火辣性感的想像"促成的，这种想像与那些正常生理变化过程中更能促成真实的激情关系不大。

提索对这一观点阐述的更为清楚。他说，手淫是非自然的，这并非因为从传统基督教思想上看，手淫与性生活的目的相违背，而是因为手淫欲望绝非出于自然。手淫是失常的头脑想像出来的事，矫揉造作、胡编乱造、荒诞不经。手淫者自己创造出强烈的欲望，又变态地满足了这种欲望："男人们听命于他们虚假的欲望，于是就有很多人沉迷于手淫。是想像力和习惯使他们不能自拔，并非自然使之。"

如此说来，手淫就如同梦遗，是男女老少都会有的经历。睡梦中，"有关性爱的种种幻法……被蒙上梦幻色彩的性对象"都会影响睡梦中的性高潮，也会影响白天的性高潮。那么说来，如果性高潮出现在想像中，那它也会出现在现实中。也就是说，梦到性高潮就会引起真正身体上的性高潮。反过来，梦到性高潮会使一些器官衰弱，进而会削弱想像。所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传统的梦遗就会有更多性高潮的梦境，也就会有更多的性高潮。但手淫过程会失控，因为手淫者甘心情愿地把充满诱惑的梦幻变成现实。快感随叫随到，各种动作又加强了梦幻效果。从18世纪至今，几乎提索说的每句话都有人响应。"人们支配他们自己"；他们有"虚幻的欲望"；他们"沉迷"于"征服他们的想像和习惯"。无论是对手淫持有敌意的人，还是在过去40年里对手淫持肯定态度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219]

手淫是在大脑清醒时进行的，因此也就有其道德和医学方面的邪恶特点。人们虽对夜间遗精有一种认可心理，但却唾弃导致手淫的性欲念。这种主动的欲念是事情的本质。肉欲，是一种心灵疏离上帝的强烈愿望，但它并没有驱动手淫者；诱惑，也许是促成了手淫，但也不应该受到责难。手淫的邪恶来自这样的事实：手淫者咎由自取；他们在孤独的

个人真空里把性快感演绎成一系列的情感、心理和历史的价值。康德就把焦点对准了这一点：手淫之所以比自杀更邪恶，是因为它承载着道德疯狂，手淫者“自己一手创造了欲望的目标。这样一来，手淫想像带给人们的期望就与自然性交的目的完全相反”。虚构与幻觉是心智编造、想像的产物，它们任意驰骋，是造成手淫的罪魁祸首。

这种观点在有识之士中被广为接受。例如，在魏玛时期，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和赫尔德（Herder）的内科医生克里斯托·威廉·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痛切地指出虚幻的危险之处，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非得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手淫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胡费兰是他所在的时代的革新巨人之一。他不仅是当时那些文化精英的私人医生，还走在现代医学的前沿：他是欧洲大陆天花疫苗的推动者；是“伪科学”——在他看来，骨相学，催眠术之流即属“伪科学”——的宿敌，并在一家行销几十年的主要医学杂志长任编辑。他所著的有关养生之道的书在1836年他去世后仍不断地被译成英语等多国文字。在手淫问题上，他也是旗帜鲜明。

总体上说，胡费兰认为，现代的年轻人过早地开始了性生活。他注意到武士们总是在日耳曼森林里用尽全部气力，因为他们要等到25岁才能与女人交往。在所有的性活动中，手淫是最恶劣的，因为它是一种被迫行为，因而也就“不自然”；手淫回应的是来自内在的需求，而不是真实的需求：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它都比任何自然的性行为更具有无尽的破坏性”。而“道德手淫”经常伴随着性手淫：“伴随着各种不雅低俗的画面，虚幻不断膨胀，点燃激情。”确实，正是因为这种激情成癖，“虚幻才有机会被武装起来并统领了全局”。年轻人越来越被虚幻刺激，仿佛站在致命危险行径的边缘。[220]

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和道德家也向广大读者表明了相同的观点。宾尼威斯基（D.T.de Bienville）称：“想像一手造成了手淫致命的激情。”在当时他虽是无名小卒，但他的书《女色情狂》充满了各种他对手淫的观点，而该书的标题后来也成为一种疾病的名称，被人们接受。[221] 1771年的一部法国主流医学参考书称，“想像一刻也未停止过掩饰那些会愈发刺激生殖器官的事”，因此就必须对其实行管制。在100多年以后，19世纪最大的医学百科全书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自然的性释放是好的；由想像引起的性释放就很糟糕。20世纪前夕，就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出版前一年，蜚声国际的女童性教育专家在著书论述手淫时告诫女孩子，由想像唤起的激情其道德本质是错误的，而且比做爱本身对身体的伤害更大。[222]

问题并非在于手淫在生殖繁衍范围之外创造出性快感，也不在于与不适当的性伴侣或与适当的性伴侣进行不恰当的性爱方式这样的违规行为；问题出在手淫除了想像的对象之外，没有任何性伴侣。“自我排精”中的“排精”部分在与其近亲“夜间排精”区分开来以后，已经失掉了原有的隐含意义。手淫之所以令人蒙羞、违反常理，并非由于那喷出的黏性精液，而是在于其赤裸裸呈现出的非自然产生的虚幻欲望。

英国医生布臣（A.P.Buchan），是大众医学传统的传承者，是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专家。他捕捉到卢梭所说的手淫问题的危险本质："性交中适当对象的缺失。"这种缺失被想像和欲望弥补。凡事实不能满足的，就由幻想来填补。幻想通过"意志的力量"努力"在想像中"留住"一些自己喜欢的形象（也许是女性）"，以这种幻影来代替缺席的真实对象。这正是问题所在。"这种恶习的结果"就是"不恰当地干扰"正常的对"性欲的沉迷"和"以完全本能的行动干扰意志。"[223]

诗人、生理学家汤姆斯·洛维尔·贝道斯（Thomas Lowell Beddoes）的父亲汤姆斯·贝道斯（Thomas　Beddoes）是一位激进的内科医生。他也认为手淫与想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和那些最热衷于改革的人士，尤其是在那些投身于自我实现的浪漫人士一样，他对手淫也是敌视的。首先，他也许认同卢梭的观点，认为手淫的邪恶之处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羞耻和胆怯，能让人浮想联翩"。但他就这一问题在病理生理角度的阐释比卢梭更加具体。手淫也许由一些偶发的刺激引起："任何偶然的刺激都会使女孩子产生情欲。"可是，那些有一定理性的人们的"情欲会占据想像力"，使她们"在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寻求性快感"。即进行他不愿说出口的"那令人不快的"的活动。换句话说，外界刺激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无法说出口的行为的危险性。这里需要引入变化无常的思维因素。[224]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有悖于对手淫的道德评判，它有悖于对手淫的卫生评判。犬儒主义大师第欧根尼几乎是手淫者典范，经常在古典作品中被引用。当时人们认为，抚摸自己以达到性满足的做法并不需要十分投入，比与不知名的妓女性交这种最无须全情投入的性交方式还要轻松，因此手淫也就不那么消耗体力和精力。对他们来说，手淫虽然称不上是最有尊严的办法，但却是发泄性欲最有效的办法。18世纪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极力推崇这一观点，并试图使其复活，结果却遭到广泛的批评。不过，这位医生的不幸遭遇却再次证明，想像的错乱置放正是我们最近讨论的性手淫的症结所在。

约翰·亨特（John　Hunter）是18世纪医学界的泰斗，也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医学著作编撰者，是一位公众人物。如果我们去问当时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谁是最著名的医学公众人物，对方很可能会说出他的名字。总体说来，亨特对那些所谓手淫有害的证据不屑一顾。是的，很多患者都太过急于相信他们在书中看到的内容。在亨特的患者中，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是手淫导致了他们阳痿。但在亨特看来，在如此普及的手淫患者中，出现阳痿问题的寥寥无几。他认为下列解释更能让人接受：如果"想像确能发挥作用……使人们相信他们确实因为手淫而虚弱"，那他们实际上是因他们从书中看到的，而不是因他们的实际行为而虚弱。如果说这种"自私的享乐"有什么负面作用的话，那就是这种行为可能"重复得太频繁"。对这种看似完全合情合理的临床判断，亨特在他专题著作的第一版里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具体解释了为什么它认为手淫无害的原因。他是少数几个医学界中能站出来反对当时盛行的"手淫致命"观点的人。他的观点是犬儒主义医学性伦理在18世纪惟一

被付梓印刷的观点。第欧根尼可算是后继有人。[225]

亨特认为，手淫比“自然性交”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要小”。与妓女或与自己不在乎的女人性交要比与“对其充满感情”的女人性交的伤害要小。因为，在前两种情况下，心智与感情投入得少。当然，以上观点他只提到过一次，因为他的编辑们都打压这种颠覆性的观点。亨特认为，手淫在这三种形式的性活动中是最纯粹的“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这与《手淫》出版后众人的观点大相径庭。手淫的形式“最简单”，而且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其次是与妓女做爱——心智与感情融入得要多一些。对身体最具伤害力的就是与自己身心完全投入的对象做爱。心智“被呼唤起来，变得充满热情，从而提升了身体的敏感性……做爱过程中伴随有一定的猛烈动作，而这些猛烈动作会对身体造成伤害。”[226]

亨特这种把性行为排序的做法，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认同亨特关于哪种性交需要投入更多心智的说法。但大家都同意隐藏于其后的观点，即心智投入越多，对身体伤害越大。除了亨特的解释之外，从18世纪早期至今，手淫一直被理解为一种心智的、特别是幻想的性爱。人们通过手淫，想像出身边不存在的对象，这恰恰是手淫的快感所在，也是其危险所在。

弗洛伊德的同事、匈牙利心理分析学家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提出了与亨特完全不同的排列顺序。他认为，手淫时，感觉器官是沉寂的，而意识幻想与生殖器官一起创造了兴奋。是这些手淫过程中纯粹的脑力活动导致了短期内的疲劳和衰弱。扩而言之，经常与其妻交媾的男性只能通过把妻子想像成其他人来调整自己“减弱的兴趣。”当然，这种做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手淫，与纯粹性手淫的生理心理结果相同。然而，如果这些男子的性交对象偶尔可以给他们完全的性满足，即性交时他们不必再担起任何想像的重负，那他们会“因享受了性快感而充满活力。”[227]

也许是因为在1712年后的大气候里，亨特的观点与其同辈人不合拍，也许是因为他的观点刚一发表就被打压下去，所以对其展开批判攻势显得有些小题大做。只有一个小册子直接对亨特“赞成俄南之举或手淫”的观点进行了抨击。这个小册子基本上是长篇累牍地抄袭提索，零星加上些早已过世的权威的佐证。该作者说他可以引用上千的证据表明，手淫比其他形式的性交更危害人身，但他只选择几个最有说服力的引文进行反驳。例如，在17世纪末尼古拉斯·维奈特写出了长期受到读者推崇的高水准性学手册。他证实了众所周知的现象：与丑女在一起纵欲比与美女在一起纵欲会更令人疲劳。因为后者有魅力，能“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热情加倍”。情人之间不必幻想就可以得到快感，因为事实已能满足他的所有需要。而亨特的观点被认为是反直觉的。如果说，性伴侣越丑，性交就越健康，因为想像投入得少，那么我们干脆去找又丑又老的人做爱好了，而且那样还可以省了生育之苦。作者总结道，我们应该纵情去做放荡者，而不是手淫者；前者的罪过不过是沉迷于“大自然赋予我们内心的意向”，而后者则偷偷摸摸地沉迷于自己创造的感情。康德也许会同意

这种观点。[228]

不过，该小册子的作者邓肯·戈登（Duncan Gordon）也不必那么心急气躁。亨特对于性幻想分析的存活时间并不长，在第二版中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他对手淫是阳痿的起因的临床猜测。不久，亨特的女婿——也是位著名医生和科学家——出版了第三版。在第三版中没有涉及任何手淫与阳痿的关系，只有编者对读者的致歉：手淫比作者想像的危害大，另外还说，与女人交媾时，由于热情欲望高涨，身体机制会对这种高涨予以补偿，所以不会对身体有耗损。[229]

手淫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的危害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解释：手淫需要把想像与无尽的欲望挂钩，那种虚幻的欲望，充其量与真正的男女性行为只有肤浅的联系。但是，从想像和社会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手淫会和想像联系到一起，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阐述。目前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手淫之所以如此可怕，并不是因为手淫得到的快感与两性交媾中得到的快感有所区别，也不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手淫使身体振颤得更猛烈。手淫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是真正性快感（或者叫现实性高潮）的幻影，或者说是一种虚拟现实的性高潮。手淫具有规避、欺骗、伪装等邪恶的特点，这些都与自然性交的特点背道而驰。

卢梭认为学生们一旦屈服于这种隐秘邪恶的魔爪，那么教师的整个教育计划将会全部落空。他对此十分担心，并在他的《爱弥儿》一书中用了“欺骗性”和“伪装性”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手淫。这样的观点与另一篇在《百科全书》中讨论该话题的观点雷同：“手淫”意味着更多的“夜间梦幻曲”。文中介绍说，手淫射精是对“假爱神”的“供奉”，是“强烈肉欲想像”的结果，而并非源自真实世界。这个形象是典型的异教徒形象，使人想起普林尼（Pliny）脍炙人口的典故：有个人对雅典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的裸体美女雕像痴迷万分，就在夜里潜入其身边，拥抱这个雕像（或者说是幻影）。然而大理石雕像上的污迹暴露了他的所作所为。（这尊雕像后来被穿上了衣服，被希腊科斯岛的居民以与裸体雕像同样的价格买了去，并且也没对发生在这一雕像上的丑闻在意。）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典故被改编成故事：这尊卧着的维纳斯雕像“美丽之极，令男人（这里指的是雕像首次展出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男人）产生了渎圣的欲望，便对着雕像手淫”。在19世纪权威的医学教科书中，已经使用了“欺骗”这样的字眼，用以描述手淫激情的本质——对幻想对象的肉欲。[230] 当然更普通的说法是：雕像会激起性欲本能，而这种性欲本能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手淫就歪曲了心智中最变化无常、最令人仰慕的特性——想像力。手淫者鼓起想像的风帆，但并非去创造艺术、诗歌或感情共鸣；实际上手淫者根本什么也没有创造；或者说得更严重些，他们除了以社会利益为代价进行无限的自我沉迷之外，什么也没有创造。如果说因理智沉睡而生成手淫妖魔，那么幻想的胜利则使手淫妖魔大行其道。

人们不必阅读哲学家的著作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一首18世纪销售假万能药的商业打油诗，为牟取私利，把手淫者描述成疯狂的艺术家：

还有什么比幻想力

更刺激，更低级，更危害身体

如此猥亵地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

本来该完成崇高事业的性器

被激起，冲进幻影的怀里

还伴有自我快意 [231]

这首诗并不合辙押韵，但表达的意思却是再清楚不过。“幻想的力量”就是1712年以后人们公认的手淫危险之所在。两个世纪以后，弗洛伊德和他的同僚们开会争论不休的仍然是同样的话题：心智所创造的意象，是对世界的真实写照，还是加上想像后对世界的重新疏理？不过他们在一点上是观点一致的，即幻想与手淫相伴而行。后来的心理学家发现幻想处在中心地位。不过这个时候科学正经证明了白日梦般的手淫也许是件好事。现代的研究技术和性格测试使我们了解到，人们的幻想详尽具体，如同起伏跌宕的故事，而幻想会促成白日梦。白日梦又会促成丰富的性爱生活，从而总体上使人们对生活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232]

自我性行为和隐秘性行为

单从手淫的各种别称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手淫的态度：自我性行为、自我排精、隐秘性行为。这几个词的修饰部分清晰的说明了当时人们所认识的手淫本质。没有任何一种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甚至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违背社会公德的性行为能像手淫那样得到医生和道德家的关注，并引起全民的反感。这种行为具有"自我"和"隐秘"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不仅仅是在没有异性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而且还应该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手淫超出了所有的道德底限。手淫代表着最深层次的隐秘：这种隐秘不同于密谋者之间或共济会成员之间的隐秘；不同于非法恋人因为一方背叛了另一方，或者孩子就要降生而设法欺瞒众人的隐秘；也不同于在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后对上帝或神父进行忏悔的隐秘。[233]

手淫的隐秘并不等同于人们在谈论罪恶、特别是性罪恶时三缄其口。几百年来，道德文献和忏悔实录一直都在回避这个话题：作者们都惟恐社会舆论会谴责他们在纯洁心灵中播下邪恶的种子，因此都对此避而不谈。手淫的隐秘性甚至超越了性用语的隐秘性。例如，人们在谈论性器官时，往往采用下列用语，如：私处、不能公开的器官。德语中称性器官为Scham（与"羞愧"一词同源）。还有"性器"（pudend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udendus"，意为"应该觉得羞愧的地方"。这种用词的隐秘性还被用于性病用语中——指由性欲而引起的隐秘疾病。当然，这些说法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手淫具有现代意义，并在后来一直对手淫问题极为关注的人来说，手淫的隐秘性有其自身的特点。手淫的隐秘程度超过任何其他行为的隐秘程度。《手淫》一书认为，其他所有的罪恶都会有目击者，但手淫却没有。其他所有的罪恶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法律或习惯的约束，而手淫则不会。而且，手淫具有欺瞒性，不易被外界发现；手淫中不会遇到不般配的婚姻问题，不会有失贞问题，不会被拒绝，不会被认为太过鲁莽，也没必要忏悔，因为犯手淫过错的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她犯了错，更不知道谁会对他/她提出警告。那些"宁可去死也不向任何男人泄漏自己弱点的女人"会落入手淫的神秘漩涡中。而这种"神秘"也使一些本应清醒的男孩沉醉，他们"独自玩弄自己"，颠覆了自然赋予的秩序。[234] 就如同森林里孤独凋落的叶子，没人看见一样，手淫的邪恶因没有目击者而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羞耻和应对其采取的管束。

提索著名作品的副标题中用"隐秘"一词修饰"性欲"；"隐秘"这一特性把手淫与其他所有的性欲区分开来；正是其"隐秘性"使手淫比天花更可怕、更可恶，因为"手淫在神秘的黑暗处进行，它渐渐地蚕蚀着手淫者的健康，而手淫者对手淫的邪恶却一无所知"。"它悄无声息地伤害着人"，"偷偷地进行"，不受外界监督和警告的作用。理论上说，在手淫的时候，手淫者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犯下罪过。手淫不是自我恶行的一种，而是惟一的自我恶行；[235] 手淫也不是隐秘恶行的一种，而是惟一的隐秘恶行。

手淫的致命吸引力在于其隐秘性，而单独性是构成隐秘性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单独性的问题，就像一个人独自弹奏乐器或独自学习时那样。事实上，老师担心的是孩子们会聚在一起手淫。而手淫这种独自私下进行的性行为是自给自足的。手淫者不受任何人的监视，也没有任何性伴侣的牵绊。更重要的是，手淫者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东西。整个欲望过程——想像、操作、满足——是不受外部条件左右的，是过时的重商主义者的美梦，是道德伦理学家的梦魇。《手淫》一书阐述道："没有什么能像手淫那样诱人。它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许可或知情……任何时间，在床上或不在床上都可以进行，并获得性满足。"手淫所需要的惟一条件就是独自一人，而且"无须等到天黑。"[236] 这种自我恶行完全不受性别年龄及任何社会秩序的束缚。

即便是19世纪最具激情的性激进分子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也不得不在手淫问题上败下阵来。他设想描绘出一种乌托邦式的性爱美景：大家愉快相处，"在爱河中做爱"，没有怀孕的危险，没有宗教约束下的变态、无爱的婚姻，也没有养不起孩子的烦恼。而在他与之抗争的旧环境里，"自我刺激和非自然满足"，特别是"手淫、鸡奸以及其他做法"盛行，损害了"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他提倡用社交和互利的做法取代那些可耻的、产生疾病的而且令人痛苦的"人为的、不自然"的性关系，从而克制爱的激情。卡莱尔与其他18世纪评论家一样，把社会问题归因于幻想恶魔——手淫。他声称："我们提倡建立真实的性关系，反对自我欺骗的性关系。"在他看来，避孕意味着人们再不用采取错误的性行为，再不必担心怀孕或生产，并可尽情地享受健康的男女性生活。[237]

"单独"和"隐秘"这两个词在修饰手淫恶习时，看似简单，但却背负了很多文化包袱。并不是我们独自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单独"和"私密"的，也并不是我们不与他人分享的事就都是隐秘的。显然两个词本身都没有否定内涵。"单独"和"隐秘"也许与"公共"、"大众"、"社会"等词意思相反。"隐秘"或"隐秘的事"跟"私密"或"私密的事"的意思涵盖范围很广，既可以指被禁止做的事情，也可以指危险、尴尬、不正当、不适当或不易公开的事。它可以是一种信任的象征、一种爱的象征，也可以是一种宗教信仰，如单独祈祷等。换句话说，"私密"和"隐秘"既可以修饰内心，又可以修饰外部世界，既可以修饰别人能触及的事，又可以修饰别人不能触及的事。这两个词可以把内心与外界区分开来，它们与自我塑造紧密相连，与之共同发展。[238]

有关这一点，在世俗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能追溯出一段历史。特伦托会议设立的隐秘忏悔制度——隐秘忏悔与公开忏悔正好相反——要求每个忏悔者仔细深挖自己的灵魂，不光要寻找自己的罪行，还要反省自己邪恶的闪念或欲望。英国新教的传统做法是设立一个祈祷者小屋，人们可以在小屋里独自祈祷。那是可以进行最深层自省的地方。如果把这个独自祈祷小屋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舞台，那么这个舞台是面向上帝的。"对所有人来说，他都是私密的"。祈祷者小屋就是"一个封闭的、或隐秘的小房间，祈祷者可以不被别人看到或听到"。[239] 《手淫》出版前的一个半

世纪里，在宗教领域出现了大量可供人们自我忏悔的私密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是身体的静养所，也是精神专心修炼的好地方，对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

同样，在世俗世界里，私密场所也不再用来替代其他场所。私密场所与公共活动场所是相对而言的，是每个个体寻找自己优势的地方。而公共活动场所是为大众服务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两种场所的功能渐渐融合。据说，一些私人恶习会转换成公共利益——这正是对市场经济最早、最伟大的辩护。有时，私密阅读将会是自我认识的途径，也是了解其他知识的途径。曾经只有圣人才能拥有的领域被大众化、民主化了。这个时期，卢梭撰写了著名的《忏悔录》，它可以被看做是圣奥古斯丁宗教版《忏悔录》的纪念。在这一时期，现代体自传开始萌芽。私有制成为文明社会的基础。在文明社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互相关联，通过协商达到平衡。换言之，隐私与隐秘作为真实自我的反应和基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正是因为以上观点，手淫才受到如此的重视。手淫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惟我的、错误的隐私和隐秘。祈祷者小屋是富人的特权，现代很多隐私地点都是富人的特权；这些特权属于那些不应该滥用这些特权的成年人。但是一些青少年由于没有成年人在身边，也许会被一些粗野、低俗、在性方面很有经验的大孩子教坏。再加上没有仆人在身边，于是这些青少年就远离了文明的视线，成了隐秘邪恶的现成受害者。在漫长的、为确保资产阶级隐私的正确方法和公正手段而进行的斗争中，对手淫的战役是其中重要一环。

不管这种恶行多么隐秘，不管这种作法多么远离人群，那些撰文谈论这个话题的人都认为，手淫起源于社交环境。有些时候人们是在一起手淫，只不过年轻人通常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是“隐秘的事”，也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对某些形式的隐私和社会弃绝而感到羞耻。（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表明青少年男孩子之所以成群地手淫，是因为他们想叛逆，想故意惹大人生气。）有几位19世纪的医生认为，婴儿和儿童也许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现手淫的，比如，他们会自己搔挠生殖器以解痒，于是发现了快感。但在弗洛伊德之前，没有人提出变态性的概念，而各种各样的变态性活动正是人类性高潮的基本手段，也是文明的产物，它们把性高潮引向其恰当渠道。（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在子宫里只有31个星期大的胎儿，在没有任何机会学到手淫的前提下，会抚摸自己的阴部，而且表现出有快感的迹象。[240]）也就是说，手淫是学习得来的，而且还要有人教。技巧需要有技师来完成，即使是变态的性技巧也要有老师来教。齐莫尔曼在回顾25年多的行医经验时写道：“在我看来，只有很少一部分年轻人是自己发现这种恶行的。”[241]手淫本身具有无目击者的特点，于是社会舆论也就没有机会对手淫者反复灌输“手淫不好”的心理暗示。

相比之下，做爱不需要什么“技巧”，因为当时候来临，“自然”会教给我们一切。于是，随着一代代的年轻人被腐化，手淫就成了世俗版“堕

落”的重现。在这里，《圣经》中的毒蛇化身为恶毒的仆人（如玩弄孩子的性器，或因为变态原因或自己乐趣而教给年轻主人手淫的下人），或化身为恶毒的朋友（如学校好友或邻居）。不管怎么说，手淫这种邪恶来自外界，它是后天学会的。

尽管有证据表明异性吸引和性爱也并非完全自然形成，但是手淫与其反差却一直十分明显。著名的“阿韦龙（Aveyron）野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野孩没有在人类社会中长大，因此被认为是绝对的“自然人”。医生伊塔（Jean-Marc-Gaspard Itard）在其研究中认为，这个孩子的感情世界很让人吃惊，因为他“在随明显的青春期而来的巨大变化中”对女人态度冷淡。这种态度“无法解释”。尽管他也体验到了不自觉的暴躁和青春期情绪波动，“忽而悲伤忽而焦虑”，流泪，心跳加速，脸部抽搐，然而这孩子没有意识到导致他这种状态的本质原因，以及女人也许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伊塔又不愿意教给野孩子这些，因为他怕野孩子会像满足其他欲望时一样，在公共场合当场就做起来。那样的话，在伊塔看来，是无法忍受的。而且，冷水浴也并不解决问题。伊塔总结道，由于野孩从来没有像其他青少年那样，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了解男女的区别，因此他想像不出来与异性一起能干些什么。伊塔并没有提及手淫，但是他的发现与“人生来就会同异性性交但后天学会手淫恶习”的说法互相矛盾。他的研究对象——那个野孩子——好像两种性快乐都没有自己发现。 [242]

那种认为是“隐秘”一词把手淫与其他性罪恶区分开来的主张在令人瞠目结舌的证据面前也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一向喜欢收集琐闻的提索引用了一本享有声望的周刊上的文章，讲述了有关一群学生的轶事。这些学生“因为厌烦老教授令人昏昏欲睡的、学究气太强的讲课方式”而进行手淫。手淫可以使他们保持清醒。但是，他也承认，“这个事例并不能证明我要讲的观点，反而会令年轻人误入歧途”。提索认为，手淫是互相传染的，就如同天花或发烧一样，可能从邪恶的仆人传到无助的、被照管的孩子，从一些学生传到另一些学生。不过这个故事颇具警示作用：无聊的课堂可能导致手淫流行。对老师及家长最常见的忠告就是不要把一群没有人看管的孩子留在一起，以防手淫从一个受感染的人传到别人身上，并形成流行态势。教育家沙尔斯曼建议：“只要可能，就不要让孩子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玩耍。”因为如果那样，就会有人教给他们自渎的办法，从而毁掉他们的生活。提索也建议：“为人父的应该知道房屋最暗处的一切活动情况，要像小鹿般机警，努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手淫的病源学表明，年轻人是在不知道手淫隐秘、孤独或错误的情况下，养成手淫恶习的。这个观点应该使年轻人获得警醒。手淫是邪恶的隐秘；它是在错误、隐秘的地点进行的；手淫应该产生羞耻和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手淫自身就携带这种羞耻和罪恶感，那也就不必花如此大的力气把这种隐秘邪恶公诸于众。 [243]

因此，这一理论认为，“手淫是错误的”这一观点不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得有人教给他们。不仅仅要告知这一行为本身，孩子们也应该被告知，以前他们以为“无邪”的那种快感实际上叫做“自渎”，是非常丢脸的

事情。这一理论也正是很多著作的切入点。齐莫尔曼证实，很多信件表明，提索的作品是最早告诫读者手淫是错误的。半个世纪以后，剧作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写道，他是在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游泳中学会手淫。当时有个大孩子教给他们这些小孩子这样做；他说，谁也没把它当隐秘的事。当时他们在一艘汽船甲板上光天化日下手淫，也没有人觉得该为此觉得羞愧。但当他“读了一本有关性恐怖的书后，就立即戒掉了这个习惯”。（那本书很可能就是德国主教卡普夫［Sixt Karl Kapff］撰写的那本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盛行很久的书。书的标题既含沙射影又具有一定的震慑力，有高度概括的作用：“一位朋友撰写的关于青年人的危险敌人对青年人危害的忠告，或，有关隐秘邪恶的指导、其结果、解决方案及预防。”）也就是说，年轻的斯特林堡了解到，他在公众面前的行为是隐秘的罪恶，于是就开始了他自己所说的与本能抗争的日子。虽然本能是他无论如何也抗争不过的，但这种抗争还是持续到18岁，之后他开始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他为戒除这种隐秘邪恶而不懈的努力成了他自我克制、检验自我意志以及自我竞赛的展示。最近为斯特林堡撰写了最全面传记的作家声称，当时斯特林堡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瑞典孩子们都以为他们自己是惟一手淫的人，但当他们了解到教育部颁发文件表明有很多孩子都在手淫的时候，他们才如释重负。大多数的男孩或女孩都手淫。报纸上有报道，人们又广泛谈论，这至少使斯特林堡确信，手淫是“正常人经历的必要部分”。我们无法证实在19世纪究竟有多少人经历了内心的斗争，或者，公众谈论这个话题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减轻了负罪感。但通过弗洛伊德的视线，我们确信这种负罪感是很普遍的，即便互相倾诉也无济于事。而且，我们也无法证明是否斯特林堡的手淫经历与他日后剧作中表现出来的著名的厌女情绪和对性关系的无望有关系。从他的自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过度负罪感和欲望导致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他清醒时，尽管觉得自己不算太孤独的隐私邪恶很正常，但受压抑的形象还是萦绕着他，多年不散。［244］

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有很多作品面向手淫者父母，而不是手淫者本身。手淫者的父母有责任让其子女了解，世上没有无害的手淫。到19世纪晚期，家长，特别是母亲已经被推到教育前沿，她们有责任给孩子们灌输一种正确的隐秘感、羞耻感和罪恶感。同时，如果她们不能正确地监护自己的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内疚感。“完美的女人”就是指这样的母亲：当她看到自己的小儿子玩弄自己的性器时，不会坐视不理，认为“他自己慢慢就不那么做了”。当然，她倒也不至于会意识到“这个恶习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梅兰迪（Mary Ries Melendy）医生警告说：“我对那些爱自己孩子的家长说，要看护好他们。”他的意思基本上与18世纪时专家告诫家长要留心自己的孩子在隐秘地点的隐秘行为做法相同。［245］

简单地说，手淫很隐秘，它比其他行为甚至是其他性行为，更隐秘、更险恶。在公共场合，人们是不会做出这些行为的，而且人们会对这些行为感到羞耻或尴尬。尽管孩子是在各种社交环境下从别的孩子或者仆人那里学会了手淫，但手淫仍然被看做是独自完成的事。手淫和其他那些也不能见人的邪恶是有区别的。手淫发生在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称其为私人空间，因为在手淫刚得到人们关注的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它

是人们最内在的感情和情感的发生地点。真正的自我就安居在这私密的地方，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中对自我的思考更自我，是真相的所在。犯罪就等于亵渎，而亵渎反过来正好定义了犯罪。

对于那些投身于文明进程的人来说，手淫把不可能办到的事变成了可能，这着实让人心烦：只有手淫者知道这种身体的私密语言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行为，在社交中是实现不了的。手淫的世界是不可能被社会规范化的，因为其本质是不被社会大众看到。教育家、医生、家长和神职人员鉴于这种邪恶已经流行，而且情况无法掌握控制，于是变得草木皆兵。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裸体是可耻的，应该穿上衣服，如果不穿就严惩他们；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例子证明通奸有罪，要触动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的羞耻心，才能使他们表现得贞洁和适当。但是如果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更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指责，那我们怎么去批评他们呢？羞耻，从理论上说，是建立在公共秩序基础上的。某人之所以感到羞耻，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丢人。手淫却完全不在这个范畴。

《手淫》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捕捉到了原始隐私（手淫）的这种可怕特点，而且对此一直关注：人们继续手淫，认为手淫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汗颜的感觉，毫无约束。《手淫》书中所说的“童年时候的恶作剧”，“影响长大后不洁习惯的最早的小罪恶”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成了“性感应区性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说：“如果不能把婴儿手淫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那么就会使文明人在发展过程中背离正常的轨道。”在多年的研究中，手淫，或更具体些，手淫的理想化和其导致的罪恶感都成为弗洛伊德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在1915年新出版的《性学三论》中，他说道，人们神经质般的罪恶感往往与青春期时期的手淫经历有关，而这一点很有研究价值，尽管我们很难那么仔细地观察手淫。1920年，他又补充道：手淫就是婴儿性交的全部内容，因此就承载着与其相关的全部罪恶感。有趣的现象是，手淫代表着由隐秘快感带来的罪恶感，这种快感没有补偿性的社会作用，而同时手淫又代表着文化研究的结果。[246]

从《手淫》开始的两个多世纪的作品，一直弥漫着一种道德消极感，认为手淫根深蒂固，而且这种隐私的范围是文明进程无法触及的。人们可以通过禁止使用刀枪或禁止殴斗的办法减少暴力和侵略；人们可以通过讲授餐桌礼仪、鼓励人们不在公共场所大小便，或禁止吐痰和放屁来表现身体文明；人们可以在学校或军队执行纪律。所有这些都旨在塑造一些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合都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手淫由于不在公众视线之内，所以就逃脱了这个范畴。手淫之所以成为特别令人恐惧的违规行为，并非因为它孤独隐秘，而是因为在其负面否定的语境中它成为隐秘孤独的典范。它呈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那是独立和自主的态势，但都是负面的。换句话说，随着隐私、孤独和自主等优点，手淫的邪恶也随之而来。弗洛伊德曾说，犯罪容易，但除去犯罪的痕迹很难；《手淫》以及后续的作品立志要做的正是找到内在违规迹象。[247]

然而，现代人好像意识到，这些迹象并非手淫的自然结果。手淫是，或应该是，隐秘的，因为很显然手淫可耻。而人们要意识到手淫可耻，就必须通过教育。手淫的坏处不言自明，但只有当文化起作用时，这些坏处才能被人们了解。的确，手淫的坏处来自隐秘特性对人的折磨，而这种隐秘特性显然并非是手淫这种行为所固有的。一路畅通的“手淫没有遇到阻碍”；提索引用卢梭的观点，认为家长要认真看管孩子，要介入孩子的行为，要告诉孩子，他或她看似无邪的娱乐实际上是致命的，是非常令人泄气的。提索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手淫具有非自然和内部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有害的隐秘性的特点。提索提出，那些“受自然的性爱诱惑的人应该被原谅”，他们不过是屈服于“大自然刻在我们胸膛”的极度喜悦而已。但是手淫者的欲望生成于非自然渠道，“因手淫隐秘进行而受到折磨，他们害怕一旦被人发现，在众人面前一定显得面目狰狞”。提索引述了一位病人的来信。这位病人觉得人们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个手淫者，这使他觉得“跟谁在一起都不能忍受”，于是就越发孤独、忧郁，最终导致了各种并发症。[248]

在19世纪早期，有很多医生批评提索，因为提索给病人造成很大的心理焦虑，从而导致压力。病人以为自己的很多症状是由手淫引起的，而实际上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如坏血病。提索认为，自己也许有些过分，不过他应接不暇地收到很多忧郁病人的来信，他们声称自己从孩童时起就手淫。不久他就不再回复信件，并声称他已经就此话题阐述了观点，以后不再赘述，要转而研究其他。[249]

到目前，尽管不再有人相信手淫会导致可怕的疾病，也没有人相信它比鸡奸、通奸和婚前性行为更恶劣，但它一直承受着病态、隐秘和违规的骂名。手淫是最普遍的性行为，但却是人们最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公开讨论的话题。在最近一次大规模、绝对专业的研究中，采访者口头询问被采访者有关肛交及同性性交的问题时，毫无羞色。然而他们在询问被采访者是否手淫的时候却犹豫畏怯。以前只有个人收入问题才会使这些采访者面露难色。这也从侧面表现出社会上人们对私事回避的态度。后来这次研究只好改用调查问卷了事。当然，并不是只有采访者才表现出这样善感。一些政府官员也坚持认为，应该把有关手淫的问题从调查中除去。一些被认为对调查“反应迟钝”的人和一些不得不被问五次以上以保持调查统计可靠性的人也都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们的手淫经历。[250]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手淫是最敏感的话题，它最善于从社会科学探索的视野范围逃脱。手淫到现在一直是一种很隐秘的性行为，人们对手淫的理解是对《手淫》最初构想的继承，是经历将近三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私密的自我夹带着它所有的欲望、幻想和无尽的渴望。一个重要的现代道德问题是私密的自我如何能与外界世界联系。更重要的是，私密的自我如何能发展服务于社会利益。如果社会要存在，就不能允许自主、隐秘的自我不与他人来往。在与手淫的斗争中，教化这种私密的自我和使怀有无尽欲望的自我适应社会生活成了斗争的主要内容。

无节制威胁

卢梭总是很乐意表达其敏锐的意见，总是摆出一副要把私人的焦虑之事化为一般真理的姿态，最后终于在他的《忏悔录》中谈及手淫时如愿以偿。他说，手淫是“危险的补充”：性爱中人们总是要的更多，不想受到控制，总会觉得什么地方得不到满足。这位最伟大、最具原创精神的哲人说，当他手淫时，他会编出一个能激起性欲的形象或故事，使自己变得兴奋起来，然后再满足自己的欲望。所有这些都不必求助于任何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不再手淫。他与自己想像的人，在他喜欢的时间“做爱”，从不觉得腻烦。正是因为如此，才构成了手淫的致命吸引力，也埋下了毁灭的祸根。手淫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设想一个美女，完全不必征得这个美女的同意就可以与她寻欢作乐。由于其魅力难挡，我开始渐渐地损耗了自然赋予给我的健壮身体”。手淫是对异性性交的补充，在异性性交中，总是有外部因素限制：他可能被拒绝；他可能会对身边的女人失去兴趣。 [251]

然而手淫不仅不受上述提到的外部因素的限制，它几乎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限制。由于手淫做起来太容易，拥有那么诱人的自由，而且又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因此不可能被禁止。这些特点在《手淫》中已有所提及：一些男人因吝啬或贫穷而无法逛妓院；一些人避免通奸因为怕得病；有些女人害怕怀孕；而淫荡的寡妇害怕如果与男人有染，就会失去财产、自由及声誉。而手淫完全脱离于风俗、经济及法律束缚。有禁止鸡奸的法令，但没有任何法令禁止手淫。手淫完全不受任何惩罚。 [252]

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法律改革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把手淫这种逃脱法律惩罚的特性作为例证，来反对对其他性行为的法律制裁。手淫是“在所有非常规的性取向中”，“最不可辩驳地有害”，“比任何类似的法律禁止的性行为（如兽奸、鸡奸或同性恋）都更令人萎靡不振”。它对社会健康最有害，而且不受国家警力的约束。如果手淫能不受处罚，那鸡奸也不应该受到处罚。 [253] 边沁认为，人们对鸡奸的敌视很不理智，来自一种对快感的厌恶和对快感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夸大。而快感正是他的功利主义计算法的基石。即使是18世纪高举快感大旗的理论家也不能在其哲学系统内把手淫合理化。

其他的罪恶可以通过小心应对和绕开麻烦的方法避免。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这样祈祷：“别带领我们走进诱惑。”但人们很难绕开手淫的诱惑。《议手淫》的系列小册子称，手淫太有吸引力了，因为“从事这个活动是如此简单”。它又是如此普及，一旦做过，就不可能罢手，因为“对它的向往就隐藏在我们身上”。“手淫的动力和诱惑总是伴随着我们”，而这种罪过不像其他的罪过可以适度约束或禁止，因为它不为人知。“一旦开始，就几乎不可能停止”；一旦手淫者的“欲望之火”被点燃，什么也不可能熄灭它。 [254]

30年后，提索又更详尽地说明了如此这般的原因，但总结起来还是一

点：手淫无度。手淫者从不觉得满足，做了一次还想再来一次；对手淫的冲动往往超过任何其他自然冲动；手淫是对两性生活的补充，但总是失控。从社会学角度看，道理与《手淫》书中阐释的一样，而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也会保持不变："孤独的淫荡没有限制，也没有障碍"。从生理学角度看，提索用其他的生理功能来解释手淫的无度。他说，想着手淫的那部分大脑就如同被拉长的、或长时间使用的肌肉。大脑深深地领会了手淫，使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或者，大脑被"长久的疲劳"搞得精疲力竭，不能恢复。他还进行了类比：手淫者就好比以"坏习惯"排便的人，乱服泻药，对肠和膀胱的正常工作进行干扰。他指出，一般来说，要在有"某种情况的时候"才能人工排便或尿，而且是有必要那么做才行。可是，有时的做法很违反常理，排便的量不取决于"需要排出的量"。他在总结这个类比时说："我们使自己变成了这样：我们想要去做我们并不需要做的事。手淫者正是这样。"手淫者受想像而不是自然的激发，不顾社会和正常的生理需求，而达到所谓自给自足：从本质上说，手淫是无度和滥用的。19世纪法国标准医学词典这样解释："因为手淫可能使人纵情于它，因此就越发危险。" [255]

在18世纪，手淫越来越显现出成瘾的特点；它同酗酒、吸毒和其他难以压制的欲望一样让人欲罢不能。从道理上来说，它的根源不在于老生常谈的"欲念"，而在于柏拉图著名的"空罐子"的比喻——"欲望存在于愚者的灵魂"。就像手淫者的欲望一样，他们的灵魂也很难满足；他们越是沉溺，就越想沉溺。《手淫》刊登了很多患者的来信，说他们要戒掉这个习惯，但是发现，想"不让自己去想那个罪恶的、无益的、愚蠢的事"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患者声称，自己一小时内手淫八次，不但没有熄灭欲望之火，反而"使其燎原"。一例尸体解剖报告声称，死者是一位女孩，从尸体阴部的状况可以断定她死于"无法克制的"欲望和兴奋。文章说，"没有比手淫更具诱惑的了。" [256]

只要稍作修改，提索对手淫的描述就可以成为现代"戒瘾十二步骤计划"的内容："应采取很多必要的措施来制伏随时都会唤醒的想像力……看到异性就会使我产生欲望……我污秽的灵魂总是绕着性欲的梦想对象打转……我（与之）抗争——但抗争使我筋疲力尽……如果我能找到分散思绪的办法……我想，办法是在我的手上。"提索回忆起一位日内瓦的同窗，他做"这种令人厌恶的事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不可能戒掉"。一位修表工报告说，他的灵魂成了手淫的奴隶。他说，尽管每次手淫后都越发感到虚弱，但"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而手淫却愈发频繁。"一位可怜的六七岁的男孩，从仆人那里学会了手淫，"他太冲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也未能抑制住"。在他快死的时候，人们告诉他手淫会加速他的死亡，而他却坦然面对，认为这样可以让他更快地见到天堂里的父亲。18、19世纪的观察家在谈论手淫的时候与我们现在谈论吸毒的态度相仿：既在道德上对此嫌恶，又有几丝不情愿的同情。他们的观点是，手淫是没有自然的限度。与对食物，饮料甚至是异性性交的欲望不同，手淫不能产生满足感，只能产生更多的欲望。 [257]

很快，上瘾这样的词就与手淫联系起来。提索曾谈到这样一位年轻人，

他15岁时“开始手淫”，到他23岁时已经“有些中毒”。汤姆斯·特罗特（Thomas Trotter）用经典的酗酒来类比阐述他的观点。手淫会导致“突然死亡、中风、麻痹、水肿、疯狂和一系列的精神忧虑和神经问题”。它与酗酒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当前的社会现状是人类不在自然的掌控中……潮流统领一切”。简言之，酒鬼与手淫者一样，“抛弃了从前的朋友，并似乎总是在躲避那些正直的友人。”[258]

但是对手淫的痴迷似乎要比酒精上瘾更有害、又更诱人，因为兴奋总是存在于充满肉欲的头脑中。通过批准许可、时间的控制和经济成本等因素约束鸦片和酒精的供应是无济于事的。每一回的上瘾都会促使下一次的欲望，每一次的刺激都会加剧下一轮的兴奋。因此同样道理，这种对生殖器的周而复始的性刺激反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手淫者上瘾。大百科全书中对手淫行为的解释是：“一个人无休止地沉醉于感观肉欲的想法中，致使他的精神活力要依赖于对性生殖器的刺激，通过对生殖器的反复摩擦而使情绪变得不稳定（或稳定），并且更容易受幻想的支配而沉溺于性快乐中。”在一个阶段的放纵中，手淫行为会造成更多时候的阴茎勃起、性高潮、痉挛和抽搐。60年以后，一份不太高雅的性研究资料对手淫行为这样描述：性生殖器“变得如此熟悉性幻想的指令，通过这种病态和有害的影响，生殖器更容易兴奋起来而使手淫者实施手淫”。19世纪初的一本自助指南警告说：手淫这种恶习产生了“某种随之愈演愈烈的性冲动或欲念”。另一个宣传册也认为，“如果你有手淫的嗜好”，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生理学家们所普遍认同的事实：手淫要比性交更能产生刺激、兴奋的效果。“反复手淫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觉最终会加快对整个身体的损害。”[259]

到19世纪，手淫这个术语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而反映了那些敏感人的行为。我先提一下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经历。在大学时代，头脑过于兴奋的别林斯基突然间受到席勒和拜伦作品的影响而开始了手淫……这个故事我还没讲完。其实这个故事开始于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向别林斯基的真诚坦白。在两个年轻人刚刚建立起友谊时，巴库宁告诉别林斯基，他最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战胜了自我，并准备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以一种亲密而坦率的方式声明，他曾一直有自淫的癖好，而今已经矫正治愈。倒不是为了在相互的坦白中更胜一筹，别林斯基也宣称他也一直有手淫的习惯，而他开始的时候正是巴库宁摆脱这种恶习的时候。在别林斯基19岁还是个大学生时，是文学诗歌引领他走向了手淫之路。这是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道德堕落的行为。别林斯基告诉他的这位新朋友，他的性幻想曾一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的整个身体因过度兴奋和发热而颤抖。文学中的某些描写让他产生了“令人作呕的色情幻想”，惟一的办法就是从文学中解脱出来。而回到现实中，他的自淫行为更让他感到厌恶。最终他逐渐有系统地戒掉了这个恶习。就像一个瘾君子在自助小组中做的那样：首先他为自己限定一周两次手淫，然后是一个月一次，再然后便是一年一次。别林斯基迷恋手淫的理由直接从《手淫》一书中可窥见一斑。他说他之所以有了手淫的癖好是因为自己太过害羞，很难和女孩子们交往，而且之所以这种嗜好一直持续下来，是因为一旦它开始了，就再也停不下来。通过

这样的真情袒露，这两个男人成了“永远的朋友”，因为面对如此令人窘迫而难以启齿的隐私，他们彼此之间是那么坦诚地向对方吐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然，他们的友谊弥漫着浓厚的同性恋的气息，但是从这个鲜明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的友谊是建立在彼此之间袒露心扉的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的交流中，没有任何像喜剧《宋飞传》情节中的那些讽刺、搞笑的味道：比比看谁戒掉手淫的时间更长——在《宋飞传》中，男主角们打赌，看谁戒掉手淫的时间最长。19世纪令人恐惧厌恶之事在20世纪末已经变成了笑料。 [260]

在18、19世纪，嗜酒成性与迷恋手淫的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伦敦威尔康图书馆所收藏的大卫·提索的著作与另外一本关于手淫的著作装订在一起。它们曾经为成瘾研究协会——教会禁酒协会的前身——所拥有。1826年的一部法语医学字典对“abus（滥用）”的定义是：对某物的不正确的使用，例如，“abus des liqueurs alcooliques（滥用酒精饮品）”或者“de son meme”——意为：自我滥用。事实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手淫的概念本身就有着表示过度的、强迫的、无法停止的含义。在弗洛伊德还是巴黎的一名医科学生时，另一部出版的法语字典曾对手淫评论道，“在相同比率的成瘾症状中，手淫更具危害性”。 [261]

关于手淫最初的含义，我认为年轻的弗洛伊德可能吸收了几乎是长达两个世纪的传统解释，因为在他写给他最好的朋友怀赫姆·弗立斯的一封信中他表示，起初masturbation（手淫）的含义是addiction表示“成瘾”，以后addiction便成为烟瘾、酒瘾、吗啡瘾或者俄国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有过的赌博成瘾的代名词。就像大麻的使用者可能会走上吸食海洛因的道路一样，手淫者也会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在20世纪，有一位积极从事社会主义和其他各项事业的法国医生写道：“可以适度手淫的观点就和可以适度地吸食鸦片或可卡因的观点一样，完全是一种错误。”在1926年，这个医生，一位在性生活方面的自觉进步主义者认为：酗酒者和手淫成癖者一样会走向毁灭之路。 [262]

20世纪初的手淫者们在遭受嗜瘾成癖的折磨之后，致信给玛丽·斯托普斯（Mary Stopes）——一位倡导享受婚内性快乐的著名学者，诉说他们最隐秘的痛苦，向她咨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一个人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尽我的最大努力振作起来”，但是在一个糟糕的月份中，他大约每六天就得手淫。他恳求道：“除了做到不懈地努力进行自我控制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另一个人来信问道：“让我戒掉这个恶习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否割包皮能有所帮助？”还有人告诉她：“我手淫的习惯差不多已经得到了控制，实际上到最后是成功地戒掉了它。”但在此以前，手淫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有的时候斯特普斯会听到一些可喜的消息，例如一个曾经的酗酒者在戒酒者聚会上宣布，他已经戒了很长时间的酒；一个改过自新的手淫者在1929年以胜利者的口吻写道：“从1915年末到现在，我一次也没有手淫过。”还有人感谢她写的那些书，书中的观点“经常帮助他去战胜一种迷恋手淫的欲望”。 [263]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对滥用药物者和手淫者难以戒掉其坏习惯的原因

进行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在1923年，一部重要的英语参考书所提供的解释也和大百科全书的阐述没有太大的区别。首先，先是性幻想燃起了身体中的欲望。对于男性来说，手淫和与异性发生性关系起初有着相同的效果，但是频繁的手淫行为会造成前列腺充血，并将该信号传送给大脑，而后又被大脑传送回来，最终形成“性感过敏的恶性循环”。对于女性而言，造成手淫上瘾的原因似乎与男性是一样的，但是目前还尚不清楚在没有前列腺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在传送信号。关于“意淫”——我们这里又回到了18世纪的老路——我们大脑的更高级部分将信号发送给“性中枢系统”，然后性中枢系统再将信号发送给性生殖器，这和正常的性交过程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该行为频繁发生，导致更高级的中枢系统会变得过于兴奋。因此，意淫“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心理意象去刺激性器官的兴奋活动”。 [264] 从18世纪到20世纪，适度的手淫就像适度的吸食可卡因一样，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手淫就是频繁而无节制的，是挣扎在不可遏制的欲望中的痛苦。

这种观点体现了手淫行为的固有特性，它在性幻想的驱动下，无视社会道德的制约，处于一种现代隐私生活的初期阶段。经验性的观察似乎验证了这个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的一种说法是把真正的强迫性手淫病症解释为普通的手淫行为，这在以前和现在都有很好的证据。现在我们认为这些极端恶劣而鲜明的病例是由于心理行为的抑制作用彻底失败造成的，是一种强迫性行为。而18、19世纪普遍解释成手淫是自身行为的结果。提索记录了一个将死的6岁男孩无法停止手淫，以及他的一个同学有强迫手淫的行为。一个19世纪的医科学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手淫的论文，在他讲述的所有他经历的恐惧事情中，提到了一个最让他感到惊骇的例子：一个牧羊女备受性幻想的困扰折磨，以至于仅仅是看男人一眼都会产生性快感的抽搐。她甚至会在这个医科学生给她诊脉时进行手淫！现代的读者可能认为，几乎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她表示对医生和医院的愤怒和敌对情绪。当今的患者似乎也在步她的后尘。或者现代的临床医生会猜测，这个牧羊女的神经化学物质失衡，与妄想强迫症（亦称：强迫性神经症）有关联。但是这个19世纪的医科学生认为，她的行为是普通的手淫行为要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前兆，也就是说，她的性幻想已经达到了有些精神错乱的地步。 [265]

万幸的是，像这样不光彩、而又可怜可悲的病例在19世纪只是极少数的，而那些患有强迫手淫症的年轻女性要遭受阴蒂切除术，或者阴蒂烧灼法来治疗。这也似乎证实了一种观点：手淫的极端行为就是一种近乎于精神错乱的病症。当性幻想点燃了这些年轻女子们的欲火时，她们便将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羞耻感抛诸脑后，不顾一切疯狂地去获得肉体快感。当然，这只是些很极端有限的病例。而19世纪的医生们却把它们作为手淫的典型病例来处理，现代的评论家们也对此类病例评论得过多。提索和他的继承者们通常对此持有更温和的态度。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即使是普通的手淫行为中也会潜藏着精神错乱的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孤独的恶习永远都隐含着它极端性的特点。 [266]

医生们不是在编造轰动一时的极端病例。在远离文明的时代，人们是否

有过在公开场所强迫手淫的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就像我们还不知道患有抽动—秽语综合症的人周期性地在喊叫些什么，而在今天看来，他们叫喊出的猥秽语言也不像以前那样被看做是违法行为。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的时代存在着强迫性公开场合手淫症。以色列的一家医院利用血清素类药物成功地治疗了一名36岁的男性患者。该男子曾要求医生将他的睾丸摘除。他告诉医生，他被那种想在公共场合下自淫的念头折磨得心劳神疲。虽然他对自己的性幻想行为感到自责和焦虑，却不能戒掉手淫的恶习。他曾在医生办公室的外面褪下裤子自淫起来。还有一名略有残疾的女患者在开始服用碳酸锂后停止了公开场合强迫手淫的行为。有的时候儿童会出现脸红、脸色苍白、短时期虚弱的症状，虽然对各个器官进行了全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病因。其实，那是由于他们手淫造成的。[267]

换句话说，提索和他的同仁们很可能亲眼见过这些报道的病例，但是他们把这些引起他们关注的特殊的病例解释为普通手淫中的代表性病例。在他们的眼中，隐秘而超出人类本性和文化制约的手淫行为具有的特点就是无节制性、不可控制性和成瘾性：它是一种令身心衰竭的恶习。事实上，这些具有强迫性而不可遏制的特殊的手淫行为，悍然不顾文明道德的约束，也恰恰印证了上述的规律特点。

在过去，手淫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罪孽。在我书中有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现代手淫病症深感烦恼不安的每部分探讨中，都贯穿着手淫的三种矛盾特性。第一，手淫不是自我恶行的一种，而是惟一的自我恶行。行为之所以普遍流行是因为它可以不断地传播开来，而且自由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有这种恶习，而是后天学来的，而且对它的传播我们无法抗拒，也没有免疫力，因为它做起来实在太容易了：仅凭想像和一只手就可以做到。第二，手淫也不是隐秘恶行的一种，而是惟一的隐秘恶行。直到手淫者了解到这是一种可耻的行径，并遭到自然的最严厉的报复和惩罚后，这种罪行才开始变得隐蔽起来。和其他的罪孽不一样，它似乎是社会中一桩无害的小事儿，而只有当社会权威明确地指出它的危害时，人们才认识它的严重性。最后，它被认为是违反社会常理、与社会性不相容的，因为它妨碍了正常健康的两性之间的性愉悦。然而它又太具有社会性，因为它纵容放荡堕落的性生活，并在无法监督控制的环境中滋生泛滥。

心理的、社会的和道德上的美德创造了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和思想，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却产生了手淫的各种问题。它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罪恶。现在的问题是：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会产生这样一种特殊而古怪的罪孽？

第五章　手淫缘何成为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探讨在18世纪早期手淫缘何突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我还是请读者稍安毋躁。因为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会发现拨开一层云雾后会有更透彻、更激起求真欲的答案，如此一层层拨开，很难有一锤定音的解释。虽说我们能够说明在文化领域中思想和行为的罪恶感如何被创造邪恶的人传播的，但我们还是不能从心理角度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罪恶感（或为什么不再有罪恶感），也许就像弗洛伊德所说：这种罪恶感是人们儿时受压抑的性欲望的后果。然而，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理论都有广义的文化阐释。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对性行为和身体如此关注？"[268] 要解释清楚这一点，就要进行没完没了的递推。因此我将先解释我的观点，解释我得出此观点的依据。总之，我要在本章把这些问题一一解释清楚。

首先，来说说在1712年后手淫缘何变得令人烦忧。在本章中，我把我的问题重新组织如下：手淫本来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非自然性行为，是性欲的一种体现，是释放体内过剩精液的手段，是对贞节的相对微小的侵害，是对性礼节各种束缚和限制的终结，是非生育的性行为，也是令人尴尬的笑话。然而手淫是如何脱离了人们原本对它多样的理解阐释，变成了具有充满幻想和想像、隐私和孤独、沉迷与过度等特点的呢？在下面的部分，我将解释这个问题。当然，原来的那些阐释也不算过时，但我在这里不想举例子说明它们是怎么又浮出水面的。原因有三：我在第三章已经说过，这是"现代手淫"；我已经解释过自我性行为在其他早期性领域成为重要问题的原因；过去对手淫的一些解释在现代仍然有意义。对不幸人物进行的有关手淫的冷嘲热讽在很多在现代电影中也都有，同样，在当年阿里斯多芬、尤维纳利（Juvenal）和马提雅尔的作品里也有。

因此，我对手淫的解释将侧重它的三个特征：即它所谓的想像和幻想、隐私和单独及它对身体的过度沉迷。在18世纪，人们认为这三个特征是险恶的，因此，此后它们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这三个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稍有改变，演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救赎式手淫。如此，一些作家或团体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手淫的问题大谈特谈：由于精液耗损和非生育等特点使手淫在19世纪的美国和法国成为时髦话题；医学界在对手淫产生的应激性和敏感性有了了解之后，人们对自体性行为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担忧。这些我将不复赘述。我认为如果把手淫和同性恋等其他反传统的性爱方式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种新恶习几乎可以代表各种违规的性快感和性欲望的形式。所有关于手淫邪恶的观点都源于基本的道德问题。

第二，我要重新给启蒙运动之前的手淫下一个定义，在那个时期身体道德方面的其他问题需要更多笔墨进行解释。当时无论是犹太传统观念，古罗马时期的思想，还是基督教的教义，它们都教育人们把性看做是一

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关系方面超越传统秩序的行为。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是和什么人发生性行为、如何发生性行为以及什么时间发生性行为。但在1712年前后，由于个人利益与新形成的社会秩序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手淫便突出起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手淫是现代自我所体现的道德问题，它反映了现代生活中极深的矛盾。反过来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是象征着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了手淫。

手淫中的想像和幻想，隐私和孤独，过度和痴迷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背景和最终解释这种文化背景和手淫的关系方面功不可没。接下来我要讨论这一点。在本书的开头我说过，《手淫》的出版时间与笛福的第一批小说的出版时间和第一次股市低落时代相吻合，这绝非巧合。《手淫》的出版，正好是在1694年英国银行建立以后的20年里，也正值咖啡屋和报纸大规模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孟德维尔和休谟在人们狂热追求郁金香的浪潮中捍卫奢侈理念的时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解释手淫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身体在新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最紧张状态。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手淫是一个不协调的音符，就如同是在基督教保守的秩序中大谈性欲那样，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要再加上一句的话，那我会说：“手淫胁迫了一些文明社会中重要的美德，它把这些美德变成了邪恶；它是一种新型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弱点，而这种弱点似乎又反过来威胁着这种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核心。”

理清大事小情的头绪

一开始，我说我们无法解释，然后我又简单地谈了其他人的一些错误解释，最后我又讲了一些手淫所处的中心地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放到一个更笼统的框架下来谈。（如果读者想要越过讲述别人观点的这部分，去阅读我的观点的话，请直接翻到后面“我的解释”部分。）

首先，历史上人们对手淫有各种解释。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局部的偏执，是对性爱代替物的无休止的需要，是被压抑的意愿杀回马枪后的再次爆发。它是一种扭曲而且稍有些神秘色彩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手淫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看似不理性，与手淫直接危害不相称。但这不是我们要谈论的内容。换句话说，现代手淫的出现不像农民因收成不好或者一项新的税收政策不合理而引发的反抗。实际上，农民反抗也并不是都没有理性或是缺乏深层原因。即使没有《手淫》这本书的话，人们还会依然存在对手淫的恐惧。当然，尽管这本书出版了，但是书中的观点是受到社会机制影响的。这种社会机制提供了人们信仰的生存空间。每一位医生都会提出很多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位相信医生的病人也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协助医生证明他们的观点。然后，没有更多的解释，整个过程就神秘的颠倒过来。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复杂的说法。这一说法认为对手淫问题关注的增长和下降是一种时尚。它“有可能是随着一股世俗的观点来了又走。对手淫的关注是在18世纪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手淫》这本书的出版而产生的，又在20世纪初莫名其妙地消失了。”[269] 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时尚。[270] 但是除了新奇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重要事物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风尚取代了另一个风尚而成为时尚”。

比如，在18世纪早期，性病高发。人们为了避免性病，而转向采取手淫的办法，故而手淫频率有所增长。我们已经说过手淫的较高发生率并没有太多困扰当时的人们。但是尽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还是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手淫的发生频率确实提高了。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所谓的增长是因为对性病的担心而导致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在1700年，比起一个世纪前，性病的毒性要小了许多。即便是当时人们用手淫避免两性性行为所带来的麻烦，因此有了更高的手淫发生率，但是这样的增长幅度也无法说明个人的性满足已经上升为主要的道德问题。尽管我们知道人们不再把巫术当成是导致疯癫的原因，而把身体原因看得更重，但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医学为什么对手淫重新关注起来。从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以后，西医经常寻找导致各种疾病，其中也包括精神疾病的自然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手淫代替了巫术或者魔法成为危害身体的重要因素。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手淫假设学说”破产了。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手淫太普遍了，因此不会致病。然而，即便是这个原因也仍然不能解释手淫发生率的增长。恰恰相反，手淫的普遍性是整个现象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等待有人来揭开神秘面纱，并掌控它。人们认为手淫是在1712成为普遍的现象的，在

1900年，甚至是在3个世纪后的2002年，它仍然是个普遍现象。[271]

同样，正是因为缺少其他解释，有一种观点把手淫看成是某种所谓的致病病因。不久，这种观点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与它相比，其他的解释似乎更合理。当然，因为缺少对乏力、肺结核、热病、痤疮、心律不齐、疯癫和其他疾病病源的更好解释，一种新型的手淫病源学发展起来。但是这些病症在手淫出现之前已经存在1000年了，因此也不是什么新疾病。在理性时代，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突然成为问题。而在现代时期，一些疾病有了新的解释——比如，细菌是导致肺病的原因——于是，手淫不再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但是，有许多神秘的大众疾病人们无法作出具体的解释，甚至是现在也有大量的疾病人们无法作出具体的病源解释，比如，慢性疲劳综合症、头痛和肌肉痛、抑郁症和强迫症等病症。在恰当的文化条件下，不明的病菌、焦虑，或者是因为高压紧张所产生的反应也许能发生在手淫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在A型性格的人身上。在医药的发展史中，我们无法解释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从把手淫当做某些无法解释的疾病的主要原因上转移开。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把精神分裂症之类明显器官性疾病归于不健康的家庭行为模式或者不恰当的抚育方式。原则上，现在的人们有很大空间和余地去研究手淫所产生的疯癫病症。[272]

的确，医学使手淫成了似乎探讨不尽的话题。一旦相关的行为和态度被认定为邪恶的、有威胁的、反社会的；一旦这样的异常有了可识别的标志和症状，比如烦躁易怒、强迫症、不孕症、精液流失和嗜睡多梦，那么人们就很容易把这种可疑行为和道德沦丧与各种疾病联系起来。过去，病理生理学和政治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界线也很模糊：拼命逃跑的奴隶被认为得了“迟钝症”。这种“迟钝症”会导致“无赖”行径；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被认为有酗酒、吸毒和犯罪的倾向，因为他们身上具有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出来的所谓“堕落”特征。19世纪后期在美国变化无常的原始资本积累中，社会的瓦解或者破产给人们带来很多焦虑。这种焦虑被认为是危险的，它对身体构成了威胁。精液经济与商店和市场类似；精液经济中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与商店和市场中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浪费精液与浪费金钱似乎非常相似，在任何领域的损失都可能是一种灾难。[273] 总之，把道德因素加到身体上无疑会产生一系列没完没了的互相关联的复杂解释。

每次成功揭示和解释这些疾病都会证实道德因素是诊断的基础。综合症使体征和症状相吻合。每一例患嗜睡多梦、抑郁、营养不良、肺痨病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手淫，就更能明显体现出手淫这种孤独邪恶的危险之处。德国的教养院对因手淫而导致的疯癫的诊断与加拿大和菲律宾的各种机构所作出的诊断是一样的。这些诊断似乎合理。无论在哪里，嵌闭的精神错乱患者都有手淫史；年轻人向医生和家长承认他们手淫过；疲惫的男女们承认他们也曾手淫过。手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直到20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手淫能够产生疾病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因此，反对这一看法的声音得不到大家重视的现象才得以改观。[274]

但是无论是心理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理论或是诊断学都无法解释医学为什么一开始会研究这一荒谬的性满足形式。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会对手淫予以那么多哲学上甚至是文化上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旦有关手淫的理论被人们接受，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么多为什么了。医生和普通人继续认为这种秘密恶习即使不能让人丧命，也会使人虚弱。真正难解释的是手淫如何成为人们忧虑的源泉。而正是这种忧虑使人们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对这个手淫这一话题持有很强的兴趣。

还有其他的历史解释。这些历史解释并不能解释上述问题，但它们却使我们远离了医学解释以及它的弱点，比如：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它所引起的像清教主义和福音主义之类的运动，当然还有其他运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运动使人们对手淫越发忧虑，对性有更深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在包括手淫在内的性行为中能够得以体现。此观点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指出了一个事实：对手淫的忧虑几乎完全是新教徒创造出来的：约翰·马尔顿和他的《手淫》，日内瓦人提索、卢梭、康德、坎普和一些德国改派革教育家，他们无一不是新教徒。同时，对手淫的忧虑也被认为是新教徒反抗恐怖的反应：或者它是攻击天主教及其所提倡的禁欲和贞节的一个手段。手淫和其他更坏的性行为是禁止健康性行为的宗教环境下的产物。这是伏尔泰的看法。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那样，手淫与新教主义的联系与性罪恶和福音主义观点没有什么关系。对手淫性快感的抵制与人们广泛接受的世俗两性性快感成为一种鲜明的对比。人们认为两性性快感不仅是对过分肉欲的一种抵御方式，而且是对家庭和谐和良好情感的一剂良药。不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它们当中的进步思想都支持改革派的性道德理念，而不是加强传统的性道德理念。无论如何，福音主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太晚了，因而不能解释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对手淫的特别关注不是性罪恶感和忧虑的结果，而是性罪恶感和忧虑瓦解掉的结果。新教主义也许由于它那根深蒂固的并且有争议的个人主义和解放欲望的思想而同手淫问题联系到一起。但是这也使我们了解现代性的另一方面。新教主义不能解释人们对手淫的忧虑的起起落落。[275]

18世纪早期有一段比较精确的人们对同性恋的描述："不能建立起正常的异性性关系。"这一描述可以借用到对手淫的描述上。在当时北欧新教国家中男性同性恋存在暴力虐待，甚至有时女性中偶尔也有这种现象。这些地区也是手淫出现的地方。比如在18世纪的荷兰，在1730—1732年，1764年，1776—1777年和1795—1798年间，因"性欲倒错（同性恋）"的起诉数量是前几个世纪的四倍。在这方面，英国虽然没有比较数字，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控告鸡奸的案子得到了胜诉，并且使人们更加确信：以"蓄意侵害"的名义起诉的鸡奸案件数量是以"暴力犯罪"名义起诉的鸡奸案件数量的两倍。把鸡奸作为暴力犯罪是很难证实的。[276]（不必太多地了解这点；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以不受法律保护的"非自然的性行为"的名义起诉的案件的数量。比如在瑞典，在1630到1734年间，法庭只审判了20起同性恋案件。在同时期，法庭却审判了1500多起性暴力案件。在1630—1750年，一共判了470例死刑。在荷兰和英国，

有些对同性恋的起诉与性暴力起诉有关，有的无关。瑞典在1734年从刑法中悄悄地拿掉了同性恋这一项，原因是许多人认为把同性恋包括在内反而会给人们很多遐想。沉默是最明智的策略。）总之，在一些地方，对鸡奸审判案数量上升的同时，人们对手淫的兴趣也在上升，这也可能是一种巧合。

把这两点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异性恋可以帮助避免鸡奸行为，同时也有助于避免手淫”。当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鲍斯维尔因手淫而感到一阵阵罪恶感的时候，他发誓不再手淫，而且决定除非跟女人，否则永远也不会去寻找那样的性快感。在其他同时代的资料里，手淫被认为是人类的变态行为；它使男人和女人远离婚床这一正统的快乐伊甸园，或者至少远离异性性交的场所。对男人来说，当男性特征最活跃的时候，这种单人的性恶习，即手淫，就会出现。老式男人间的友谊往往表现为色情又亲密的身体接触，有时甚至是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友谊遭到怀疑甚至更糟糕，遭到批判。随着这一私密恶习而来的是人们对手淫的焦虑，它与因正确的两性性行为的瓦解而产生的焦虑一脉相承。更确切地说，手淫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它使人们开始关注两性性行为中出现的雄性新标准。手淫是这场普遍革命的一个特殊战役。在这场革命中，人们要界定对男人来说什么样的性行为是正确恰当的，这种界定可能也会延伸到女性。[277] 对新型的两性性行为的了解会帮助我们解释手淫存在的原因。

大量的证据把各个时期的手淫联系在一起，构成一部手淫史。首先，在18世纪，手淫和男性之间的性爱一样，都是不可公开的秘密。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悲剧《神秘的母亲》中一个和尚对另一个和尚说：“这个秘密是什么，这是个不可告人的故事吗？”这两句话指的是谋杀和性反常。但同时，扩大语境的话，也指作者心中秘密的爱恋。男人间的色情关系和手淫都具有性隐私的特点。这种性隐私成为现代意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世纪晚期手淫和同性恋终于走出密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278]

还有许多有关手淫的例子。18世纪时，对鸡奸行为的嘲笑和对手淫的讽刺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为男人歌唱和犯罪》拉开了对倒霉的伏特（Foote）先生讽刺的序幕。伏特先生因鸡奸他的仆人而被判刑。无论如何解释，手淫都背离了正常的两性性关系。在18世纪关于手淫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变得非常明确。人们认为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方法，手淫是肮脏的、罪恶的。1745年，罗伯特·詹姆斯声称手淫是一种“令人憎恶，非人性行为”的恶习，在他的医学词典中他将手淫定义为“无法用得体的语言来描述”，[279] 这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对同性恋的评价相似。在《议手淫》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认为这是“厌女产生的罪孽”。书的目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厌女者组成的那些邪恶俱乐部和社团”，“人类的自我亵渎者”。但是作者在内容部分并没有深谈这个主题。《手淫之罪》解释道：“molls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在英文中它的意思是“娘娘腔的男人”。同时，这个词既有自我糟蹋的意思，又是一个嘲讽的方式。《手淫》这本小册子曾引用了一位手淫者的来信，他说当他最

终把一个女孩带到他的房间后，他恐慌了，无法与女孩进行正常的性交。他什么也不能做，最终又回头去自渎，也就是手淫。一位父亲写道，他儿子沉浸在“自渎”（即手淫）中无法自拔，“结果最近他拒绝与一位有1.7万英镑嫁妆的女人结婚”。（这个疯狂的决定在许多方面来看真是怪异。不过，虽然这个男孩也有嫖娼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例子中，雄性特点丧失的主题显而易见。）

到19世纪为止，这些联系已经引起权威人士的注意。拉鲁斯的《大百科辞典》里对“手淫”一词作了如下解释：（1）为性爱而性爱，导致鸡奸、手淫或者卖淫；（2）手淫必然产生兽性。其实，这两点都来自于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普鲁东是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创造了“财产就是盗窃”这句话。他对现代法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厌女者。[280] 当然，这些例子不仅仅涉及了同性恋问题，甚至也涉及两性恋中的不正常方面；普鲁东对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正常行为描述的很少。但是他却标出了大致范围。如果我们把手淫这种秘密恶习看成是因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两性恋失败而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更进一步来解释手淫的现代含义。

女人不如男人那样容易卷入鸡奸的纷争。但是她们好像通过自我取乐也脱离了正统的通过与异性性交得到满足的道路。《手淫》这本书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位在11岁就开始手淫的女人说：自己手淫要比跟丈夫在一起性交好多了；一个女孩谈到她和她的仆人时说“我们羞愧地互相取乐”。提索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女人来说要比男人更严重：“这一症状在两性当中都很普遍……在女性当中更为常见：性冷淡。这种可耻的行为使人们远离婚姻之门的合法快乐。”那也就是说男人学会手淫，结果男人开始不喜欢结婚。提索认为手淫导致的虚弱使男孩和女孩们失去了相互吸引的力量。他们眼睛凝滞，身体虚弱，失去青春娇态，身体肥胖，即使是美人在怀，他们也觉得不过是“冷艳”，激不起性欲。

这些人后来成了20世纪90年代Uriah Heeps摇滚乐队的创始人。他们都是些灰黄肤色虚弱的人，他们在正常的两性生活中是无用的家伙。“对这些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可怜家伙们来说，女人是没有魅力的”；是自渎的想像力破坏了一切。[281] 相反，比起合法的令人销魂的两性性交，女人们开始喜欢上这种令人讨厌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不会带给人痛苦、懊悔、惩罚和危险。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女人的这种时髦恶习所带来的结果要比异性性交带来怀孕和生孩子的结果更危险、更痛苦。对女性独身者，手淫导致的焦虑是很严重的。[282] 我们转了许多弯，终于转到了20世纪前夕。克拉夫特-埃宾把手淫看做是导致同性恋的复杂情感的原因。[283] 其他著名的医师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同性恋病例，用他们的术语来称呼便是男同性恋。同性恋与手淫有关联。一个玩弄自己生殖器的年轻人满是悔恨地向他的一位学长告白。这位学长能够启迪他，能使他安心，并且跟他有了关系，形成了相互手淫。另一位“天生的同性恋”说他从来对女孩子不感兴趣。他13岁时开始手淫，发现这种做法太恶心。最后当一个和尚首次引导他进行同性恋行为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性自我。虽然手淫与同性恋的关联不太清楚，但是所有对同性恋的描述都包括手淫

这一细节，就好像手淫是完善的同性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284]

在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公立学校里，由于学校对手淫的监控过严，可能导致了那里上层阶级形成了奇怪的同性恋文化。性发育成熟的敏感男孩肯定会把手淫和同性恋联系起来。约翰·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写了一本关于希腊同性恋情况的书，后来他成为历史学家。他对19世纪40年代的哈罗公学的状况很震惊："每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都是别人的性对象，或者众人的性对象……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看见手淫、相互手淫等坏孩子干的勾当。"[285]对同性恋文化的普遍担忧反映在教育和医学有关手淫的著作中。当时学生们在游泳池边、在寝室、在共同的卧室、在其他年轻男孩们经常聚集的任何地方进行手淫。一份资料称，要想对手淫产生的疾病进行治疗就必须逆转手淫的趋势：采取一种"英勇的措施"，即所谓潜在的婚姻。因为手淫者太虚弱了，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妓女来重燃他们的欲望。妓女"目的明确"，又身体健康。"与女人睡觉就可以恢复自然欲望"，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会恢复活力"。"真正的性"虽然在道德上做不到完美无瑕，但总比手淫强，因为它对男人的健康有利。这个观点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人们的认可。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关于神经官能症病源的著作草稿送给他的朋友怀赫姆·弗立斯。在草稿里，他谈到，他观察到手淫可以引起男人神经衰弱；手淫越多，神经衰弱就越严重，相反，"早年受到女人勾引的男人就不会神经衰弱"。弗洛伊德警告弗立斯不要让他那年轻的妻子看见这份草稿，这是男孩之间的话。[286]

对女孩子就很少有这样建议和警告。在寄宿学校，女孩子群体寻乐的机会很少，单独出去的机会更少。即使是这样，手淫还是存在的。玛丽·伍斯托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抱怨学校里同学们那肮脏的习惯——当然她不是第一个抱怨的人。一个世纪之后，一位美国医生、女性成长指导作家玛丽·伍德艾伦（Mary Wood-Allen），对手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反对手淫，也反对女孩间建立过度亲密的情感关系，她的观点与伍斯托拉夫的观点类似。

由于以下原因，我们有理由把两性性交和手淫的危险性联系起来：鸡奸与手淫之间传统的宗教联系，两性性爱的新标准，对隐私或者各种各样错误社交方式的顾虑。甚至想像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波德莱尔（Baudelaire）为女同性恋唱颂歌，就是因为她们反抗了自然，"蔑视了现实"。她们之间的性爱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是由想像力支配的行为。手淫附带出更广泛的历史问题：同性恋是如何开始被认为是新的威胁呢？[287]

有很多问题都像这个问题一样与历史有关。首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鸡奸和手淫是有联系的。在对鸡奸问题猛烈攻击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手淫的关注，只有在像吸了大麻一样模模糊糊的时候才对手淫问题稍有提及。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反鸡奸的斗争中，也并没有提到手淫。[288]因此我们还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场新一轮对鸡奸的攻击带来了对另一个秘密恶习——手淫的史无前例的兴趣。

其次，还有性别的问题。鸡奸被一些学者称为同性恋。人们往往认为鸡奸和异性恋的新标准几乎完全是男人的事。公众对男性特点的认识和对男同性恋的焦虑与对女性特点的认识和女同性恋的焦虑并不平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另一方面，手淫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对两性来说都是尖锐的。因此，女孩和女人的手淫问题也亟待解释。

最后，还有具体性的问题。的确，手淫是伴随着在同性恋出现的，但是它常常体现为性欲过度的异性恋的结果。对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来说，手淫根本是无性的。它只是一种性懒散，它是各种性过度和性欲减弱的源头。手淫在人们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原来和尚们看似单纯的鸡奸生活转变为一切邪恶之源。到19世纪为止，人们对手淫的这种认识使女性手淫者的形象遭到更加过分的扭曲。人们认为手淫的男人经常是因为过度疲惫而失去了性欲，或更糟糕的情况，他们因为是同性恋才进行手淫的。而屈服于自渎的女人，往往被认为是性欲极强的，因为人们在考虑女人的性欲时往往尺度过严，即使是超出一般正常性欲一点点也是性欲过度。总体来说，对于两性，手淫似乎既可以导致，又标志着对异性的过度欲望。

约翰·马尔顿在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中，提到年轻人的“爱的快乐是稍纵即逝的和过度的”。但是对于经常有男人陪伴的生活比较好的青春期女孩来说，手淫不但是有益的而且对于健康也是必要的。他不主张早婚，因为要“缓解性欲用其他办法是更好的”。早些时候，读者们读到了一些关于阴蒂受刺激后的细节描述。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性饥渴的女孩在手淫时，暂时生活在自我满足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建立在幻觉上的。无论怎么说，以上观点都是从坚定的异性恋者的角度出发的。 [289]

《手淫》这本书里充满着关于手淫的描述，也充满了对异性的好奇和对异性性爱所带来危险的描述。有一个人说到他对手淫有一种罪恶感。他还询问有没有药物治疗他的女伴的慢性淋病性尿道炎。他们在她月经期间性交，因而导致此病。还有一个人说他的岳父让他等了两年才允许他与他那13岁的新娘同房。他心里在想“自然的女仆”是否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他也要求为他的一个朋友帮忙，他的这个朋友的妻子最近跟人私奔了。（甚至作者也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这并不能影响问题的实质）。书中大部分都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青年人直白的表述。一个男孩与女人们性交，几个小时之后，他说道：“很难不感到一种罪恶感，至少是一种无结果的愚蠢幻想。”《审视手淫》一书中没完没了强调的就是手淫不过是通奸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医学上，它不应该单立门户。《手淫》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手淫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手淫》辩解得很清楚。它说在所有邪恶中，自渎是滑向另一个陡峭斜坡的第一步：成千上万的人犯了通奸罪，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调情激起欲望，如果他们不曾通过自渎形成了不洁的习惯，那他们就不会屈服于战胜他们的诱惑。没有什么能像手淫一样，比鸡奸或者是“同性恋”更能诱惑人们犯下糟糕的罪行。

提索引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手淫与异性性欲过度有关：有个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喜欢站着与妓女性交，尽管这样做会更费力。这个男人死于他的这种癖好。那么这个男人的例子证明是某种因素而不是射精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危害。提索认为与异性纵欲和手淫是一个统一体。手淫比与异性纵欲更折磨人，因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手淫的本性就是过度。一位读者曾写信给提索，感谢提索给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使他懂得父母和年轻人应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到使他们走向过度边缘的自身欲望的影响”。（当然不是通过手淫来避免，而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在新鲜的空气下做大量的运动。）提索草稿中遗留下来的信件都是些病人的自白书。这些病人认为与女人过度的性交会加重手淫的破坏后果。其他人则认为手淫是他们生活迈向放荡的第一步。 [290]

关于女同性恋，说法有些不太一样。因为手淫对女人来说尤其危险，所以这里记载了女人们怎么拒绝婚床而独自或成群地取乐的片断。但是，简洁地说，人们更加普遍地认为手淫会导致性过度。当然，从文化角度，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多看似无法控制的过渡性欲望。因此，医生把它作为一种病理进行研究，并把它冠名为“慕男狂”。在边维尔（Bienville）于1768年创造出这个词之前，提索已经把他所称为“手淫或者手动污染”与“可能称为阴蒂的东西”区分开来。提索认为慕男狂指“当代著名的搞同性恋的女子。老天爷给了这些人半似于男人生殖器的东西，然而她们却滥用这一特权。她们利用这个类似于男人性特征的东西，认为这是自然赐予的礼物，她们就此可以消除自己与男人与生俱来的差异”。在这部分结束的时候，提索声称爱女人的女人跟爱男人的女人一样有感情、有妒忌心。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令人震惊的细节包括在内。难怪卢梭觉得提索对女性手淫的警告非常骇人听闻。 [291]

提索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来自尤维纳利的《讽刺6》。这本书叙述了酒神女祭司如何利用阴茎进行纵欲的事。 [292] 更确切地说，这些女人在男人到来之前，互相狂欢作乐。尽管在女同性恋王国，手淫只是序幕，但是在根本上只有一部分人手淫。也许这样的景象构成了一部系列史，一个对现在仍有意义的系列史。比如，最近的一次研究显示，在描述文艺复兴时期性异常和社会处于边缘的女人尤其是女巫和妓女形象时，这些资料中的描述都美化地把阴蒂刺激放在中心地位。这些女人并没有进行“独自性行为”，但是她们却在自己身上或别的女人身上得到了快乐。她们所代表的威胁不是女同性恋主义，而是对社会标准的摒弃。这种摒弃是通过卖淫或者通过其他异常行为实现的。 [293]

边维尔曾著书《女色情狂》。他自称本书的目的是把提索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更普通的女性性生活。这本书高举著名的异性性爱大旗。它声称，女色情狂的狂野是一种“身体机体紊乱运动”而产生的疾病，是手淫的近亲。这种说法对那些总是想要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人们展开了攻击。例如，渴望得到情人的爱而又受挫的女人们；曾过着性感放荡的生活但现在却失去快感的堕落女孩们；失去了已磨合得很好的性伴侣的寡妇们，“读消遣小说”的女人们。总之，任何在自然欲望上受挫的女人，或者不能抑制自己狂热的感情而任其发展到狂野地步的女人都会转向手

淫。那么，手淫既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也是神经衰弱的一个致病原因。手淫是没有满足机体真正的需要而使机体紊乱的主要原因。确切地说，19世纪的医生认为一些女色情狂正在走上同性恋的道路。比如，有些女人同其他女人摩擦外阴，这就是同性恋的征兆。但是当时大部分这样的女性都被认为是顽固的手淫者。她们无法满足自己对男人的欲望。一位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在妓院里待上两周就能治愈一名这里不幸的病人”。 [294]

对男人来说也是一样。尽管手淫并不是迈向男色情狂的第一步，但它却既体现了对异性的过渡性欲望，同时，又是过渡性欲望的致病原因。不过，手淫者并不见得就是同性恋，也不一定都沉默寡言，手淫也不是同性恋或沉默寡言的诱因。20世纪早期的性学专家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说：手淫者不是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苍白可怕的动物”，他们是“想要成为厚颜无耻的唐璜的一群淫秽之人”。这种假说给约翰·马尔顿提供了依据，使他得出结论，认为手淫是迈向通奸的第一步。也正是在这种假说的基础上，19世纪后期掀起了贞节运动。只有男人们发誓尊敬所有的女人，并保持自身的贞洁，社会的纯净才能得以保证。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他们得弃绝一种恶习——自渎。

凯瑟林·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在她的先锋著作中说道：不洁的思想和幻想能产生不洁的行为。淫秽的伙伴，不恰当的或者是令人兴奋的书籍都会引起那种淫秽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早年生活中通过秘密的恶习”（即手淫）解决，后来又“通过违法的手段获得满足”。这位作家在书中写道：世界上之所以有很多人卖淫，还有很多人有无法抑制的性欲，主要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手淫“首次堕落”，从此他们的欲望更加膨胀。另一位作者也是位与公立学校有威望的人物有来往的人士。他认为手淫是“学校里最主要的不道德行为”。这里不道德行为指的是同性恋行为。同时手淫还滋生了成年人体内无法控制的各种形式的欲望。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是美国第一位女医生和“基督教生理学家”。她认为所有非自然的恶习均来自于“手淫”和“通奸”这两个“根本恶习”，并且两者相辅相成。 [295]

如果说在18世纪还没有完全形成，那么到19世纪，手淫已经与所有性异常有关联。玛丽·卡夫（Mary　Cove）认为手淫既可以导致性欲冷淡或者不正当的暴力，也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早逝。克拉夫特-埃宾认为手淫能够导致同性恋。但是他也认为手淫需要一定的想像力，而两性性交则不需要，这是两者的重要差别。想像能导其他疾病。对克拉夫特—埃宾来说，“心理上的手淫”与任何条件下的性幻想是相同的。因为性幻想进一步延伸了手淫的空间。过度手淫、性早熟和性放荡同遗传、疯癫、堕落和妄想症有关。其中妄想症多发生在女人身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病症。当人们在19世纪早期讨论女同性恋、女色情狂和手淫时，人们轻易地就把它们互相融合在一起。女性胀大的阴蒂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女人因不能得到性满足就会成为妓女吗？那是先天行为还是手淫或同性恋导致的呢？当异性性交不再能满足女性或者她们得不到异性性交的时候，同性恋和手淫就在女人中相继发生了吗？抑或卖淫与这

些都无关，而是贫穷导致的呢？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手淫却是问题的关键。每一种对性和社会的担忧都是相融的：在俄国革命之前，一位著名的俄国医生认为“文明人”的性行为堕落导致了所有可怕的疾病。这种“文明人”的性行为堕落的表现是手淫、卖淫，和婚姻性交中使用避孕措施。因为它们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所有的性都是为了快感。争论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手淫的后果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手淫可能导致同性恋，但是同性伴侣间强制禁欲也可以使同性恋行为转变成手淫。克拉夫特-埃宾认为这样的转化是不健康的，不是为病人解决问题的良方。一些人认为如果他们是同性恋，那他们就可以远离手淫这一危险行径。另一些人认为手淫和过度的同性恋欲望一起共同导致神经衰弱。（有位病人如此确信这点，以致他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阉割，当埃宾反对阉割的时候，他就在别的地方进行了阉割手术。）一位评论家认为在女人上床睡觉后，要特别当心。倒不是因为有人可能会看她们的身体，而是因为她们好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最智慧的人才能发现恶习的最微小暗示。他警告说“她刚一上床就睡熟了”，但不要被她愚弄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看上去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对一个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这总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它可以瞒过父母，让父母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她“明显夸张地”假装进入了睡眠。可以通过“叫醒”她而戳穿她的伪装。她会出汗，而被子并不热，不至于会出汗。她伪装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掩盖她手淫的真相。 [296] 在18世纪，各种异常的性行为都很含蓄地跟手淫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后期，这种联系才变得直白起来。

事实上，在医生和大众眼里，所有的异常和堕落似乎都集中在手淫上。我们可以画出两条曲线，一条是个人曲线，另一条是社会曲线。18世纪后期的一位德国医生写道，手淫者最终会失去了他的道德，然后降到“兽性的程度”，成为“只拥有影子”的人。彼得·弗兰克是“卫生警察”之父，是早期公共健康的官员。他认为手淫不仅对自身有危害，对社会也有危害，因此国家应该找出一个方法来监控这种行为。简·康内勒·戴伯雷纳（Pierre Jean Corneille Debreyne）是一位神学和医学方面的国际权威。在19世纪早期，他编写的书记载了手淫最可怕的道德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丧失所有道德、智慧、记忆力、活力，健康，社交能力，丧失使我们成为人的一切东西。对于这一观点，他已经说得很透彻，所以，就连19世纪后期伟大的研究堕落问题的理论学家也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当瓦格纳给尼采的医生写信，分析他的这位老朋友身体垮掉的原因时，为了防止医生漏掉这些线索，他建议在对这位疯了的哲学家进行治疗时，要考虑到他的手淫病史。瓦格纳对艾泽医生说他认识的一位有天赋的年轻诗人因手淫而瞎了眼；另一位则除了患有严重的眼疾，还有神经崩溃症。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的。他还需要再多说吗？像尼采一样，那两个年轻人与瓦格纳的关系破裂了。一个骑车时出了车祸，另一个成了同性恋。 [297]

最初的说法认为对手淫的关注是由对同性恋的关注引起的：既然异性恋有了新的界定范围，那么，任何非与异性在一起而得到的性快感都是不

正常的，应受谴责的，因为那样的性快感超越了异性恋新的脆弱界限。于是，手淫顺理成章，成了问题。我们已经沿着这个理论讲了很多。结果，在医生，教育者，道德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头脑里，手淫不但同鸡奸有关，而且跟其他各种性异常和道德异常有关。这也就是说同性恋的历史跟手淫的历史有关。两者都是存在于隐私，过度和想像的阴影中。在原有的对性活动的限制消失瓦解以后，两者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当国家和教堂失去对性行为进行规定限制的权力，当性成为个人隐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规定其他道德行为的方式。因此，政治历史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潜在的、富有成果的空间去解释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先从自治开始。在18世纪早期，自治对人们理解手淫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治是思想和道德统治的对立面。换句话来说，随着自然束缚和由上帝和上天创造的看似自然的政治等级秩序衰退，个人的理性、约束、情感、想像力和教育兴盛起来。在18和19世纪哲学和政治理论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如何成为新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很难说哪个答案是最终答案，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早晚要回答。康德说："启迪是指人从不成熟中走出来。"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勇敢地去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手淫就是对这句话的否定：手淫是惟我地摒弃公共生活，摒弃控制。在公共生活中自由的运用理性和达成道德上自治都不是容易的事。康德知道，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把自我兴趣产生的行为与绝对命令产生的行为区别开来是很难的。但是不仅对康德，对其他任何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孤独的性快乐代表了最糟糕的情况。 [298]

然而，人们对手淫问题忧虑的爆发只是教育中关系重大的一个方面。教育的目的是塑造道德上能够自治的人。这样的人能够住在民主社会的新型公共环境中。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手淫代表了整个政治框架的危险。手淫问题成为一个情绪上炽热的、令人忧虑的缩影，它映射着由于后专制主义出现而产生的焦虑。在德国，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自渎"展现的是一张清单。在这张清单上列着一些启蒙时期社会原则的优缺点，并把这些优缺点与专制主义社会原则的优缺点作了对比。手淫是民主社会的弱点，是它的原罪。手淫兴盛的条件，比如想像、对奢侈的欲望、隐私等，都是新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这些条件也可能造成道德的沦丧。因此通过教育和医疗上的恐吓对手淫展开的战争也就成了捍卫自由和欲望的战争。而新的秩序在道德上的基本限定范围内，在这种自由和欲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当个人的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的时候，这样的战争就会打个没完没了。上述18世纪德国的情况与19世纪美国的情况很类似。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于美国民主社会能如此遏制过度潜在自由表示震惊。

这是个道德平衡的问题。比如坎普（Joachim Heinrich Campe），他一个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然而他却对的创造感到恐惧。坎普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但他害怕动荡。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推翻专制主义。他喜欢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旧秩序。他说比起生活在法国那样

骚动的共和国，生活在秩序良好的君主制国家的人们会过得更幸福、更安全。这个君主制国家应该是由一个公正英明的君主依循法律而不是独裁统治的国家。他很高兴自己生活在由这样的君主所统治的地区——德国布朗斯维克。但是坎普可能比18世纪其他任何一位作者，做得最多的人。他燃起了年轻一代的幻想，由此创造出一批沉浸在小说中的孤独读者。这些读者处在自渎的道德危险中。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道德家认为小说为手淫做好了铺垫。坎普所译的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文学出版涉及的每个角落，使几百万人走上邪路。本书有几百个用其他所有欧洲语言和许多亚洲语言翻译过来的版本。这本广泛流传的小说产生的影响之一是用幻想替代孤独。年轻读者从小说中得到的启示是非常复杂而且意义含糊的。鲁宾逊·克鲁索被认为是现代经济人的原型。他独立奋斗，远离社会和其他任何外部的道德限制。这个角色所处世界的危险道德环境就是手淫者的危险道德环境。坎普深入探究了这个他曾帮助一手创造出来的危险道德世界，并发表了多卷文集，这些书大部分是指导怎样抚养孩子的。另外还有6本书，讲的是如何在新社会秩序条件下控制自渎大爆发的产生。道德自治的主要表现是放弃从自身寻找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而这种文化秩序又能产生现代手淫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注意道德上的自治。坎普反对手淫，但他的观点可能有些相对保守。他也表示了对手淫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对那些得到了道德自由而进行手淫的人们的担忧，而不是杞人忧天，对手淫对自由造成影响担忧。 [299]

有种观点认为现代手淫是政治转型的产物。对于这种观点，我有许多话要说。回顾我们已经提到的18世纪的作品，几乎所有的都是由新教教徒或者是反对教权人士写的或者出版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专制主义和国王神圣的权力已经丧失，或者正在受到威胁。公共社会对性的控制也已经丧失。《手淫》与行为重整运动几乎处在同时代。行为重整运动是一次邪恶的运动，它拼命地想要取代教堂的位置，发挥原来教堂的作用，但是没有成功。直到17世纪晚期，教堂一直对一些后来成为私人道德的事拥有管辖权。因此，从内部控制各种性活动是对原有方式的补充，而原有方式则是通过社会、宗教、司法、和政治等手段对性活动进行外部控制。手淫则是性欲望的变体形式，是内部性活动的表现。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发生的变化作了更加概括的评论。这些变化包括权利在西方世界的转变和这种转变在现代主体性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上面所谈到的对手淫增长的政治解释与福柯的评论也有一些关联。福柯的评论是这样的：西方世界目睹了权利的大转移。这次权利转移是从对主体事物至高无上的权力转移到福柯称之为“生命权利”上来。“生命权利”是指人类体内某些专门器官的控制力，这些专门器官帮助人们创造出行使控制力的能力。“生命权利”不只限于性问题，它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更广泛的领域里。比如，葬礼原来只是教堂主管的事务。后来，葬礼可以由医生和其他非宗教权力机构记载和分析。洗礼也走出了教堂，可以由医生和其他非宗教权力机构记载。由非宗教人士主持的葬礼和洗礼成了“重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统计的原始材料，是记录这一新型的细致机制所引起的变化的原始材

料。同性恋就像卖淫一样成为医学问题。[300]

最后，医生们“创造”了手淫和手淫者。通过这场新的道德和医学的纷争，教育家、道德家及各种专家成了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与医生一起把他们的观点逐渐扎根于人们的心里。于是，许可和支持这些专家观点的国家不再焚烧或者鞭打这些性异常者，而是把他们困在“生命权利”的网子里。换个方式来解释，那就是，在道德退步的情况下，手淫成了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它是对个人和社会的威胁。它是个绊脚石，妨碍所有正义想法和良好秩序的卫护者充分地行使权利。

某种程度上，在18和19世纪针对手淫进行的医疗战役最能说明上述观点。证据比比皆是。只要读一读《手淫》，一本在造就手淫者方面比其他任何文章的贡献都要大的书，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目睹见证了一个社会的诞生。正如福柯所说的，这个社会是致力于“谈论性”的社会，是“煽动人们进行多形式性交”的社会，是一个“性生产”的社会，是一个为了把性欲望纳入到有约束的体制下而对它进行细致叙述的社会。正如告白文学和道德指导文学的作家们长期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人问得越多，罪恶对他来说就越真实，越有吸引力。杰洛米·泰勒是17世纪畅销作家。他专门写宗教指导书籍。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来自于天主教告白文学的例子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泰勒的例子更直接的影响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手淫》这本书。）泰勒警告读者说：“如果你是个有贞节精神的人，或者你想要成为一个贞节的人，又或者至少你已经开始考虑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了，那么你可以读下面这部分。否则，请读者止步，不要读下面的部分。”这实际上是在诱惑读者。但是，对于那些实际上不能抵御住诱惑的读者们，如果他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会发现作品比较枯燥乏味。也许，有的读者对罪恶会有新的认识，但是他们得下些工夫仔细研读才会有收获。[301]

《手淫》这本书却不是那样诱惑读者。当读者刚开始阅读的时候，书中就直接说出同样警告的话语，而且在读者阅读中，该书也不断提醒。作者担心这本书有可能“激起那些有不洁又愚蠢的人的幻想……我请求读者停在这里，不要继续读下去，除非他想当贞洁的人，或者至少，他有这方面的倾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约翰·马尔顿却不可能装着不知道这样的事实：除了最早的版本之外，所有版本的内容表里都列出了17世纪的经典色情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罗马的两个尼姑，她们互相手淫，因此阴蒂胀大。人们把她们的阴蒂误认为是真正的男性器官。《手淫》这部书收录了很多或真或杜撰的信件，一版一版不断扩充。书的作者号召男女老少讲述出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他们是如何养成手淫这一恶习的，他们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手淫的。当时的咖啡屋里留下了大量这样的信函。医生尤其欢迎女人们的讲述。因为早期的版本留下了这样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女人不会沉浸在手淫里面，或者对女人来说，手淫对她们的危害要比对男人小。

用福柯的话来说，头100年的反手淫作品是一场广泛的、国际性的谈话运动。秘密恶习从来没有这么公开过。提索对他1766年的版本进行增

添，比原来版本长了三分之一。他解释道："用理性来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举出令人恐惧的例子的震慑力强，效果也就没有后者好。积累再多的例子也不嫌多。"庸医詹姆斯·霍德森曾声称，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一场最大的性问题运动。他接受私人拜访或信函。有些信函需要交费，他才会回信并发表。一位19世纪早期的作家告诉福柯他的做法：他要求与他通信的人"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经历"。[302]

从男女老少身上发现手淫，描述手淫和收集手淫材料，这种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有些情况下，手淫这一罪行揭示了肮脏隐蔽的自我，又提供了这样的自我继续肮脏下去的条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例。乔治·艾略特说，"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生活不过是把我们隐藏在工作和行为的屏幕背后。"真正的自我只能在性本性中纯真地表现出来。因此真正的自我等待着被发现。正如福柯所说，真正的自我等待着被纳入到权利的范围。[303]

"真正的性"所产生的性爱结果和"手淫"所产生的性爱结果之间差别是比较大的。在此，"真正的性"和"手淫"应归类为医学上所称的病理学上的性，更广泛点，可以归类为教育学上的"科学的性"。其中"科学的性"是福柯所使用的术语。19世纪早期一本医药字典强调道："不管手淫行为多么秘密，它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它不会逃过人们的眼睛。因为通过医学术语我们就会把它分辨出来。[304]

政治和文化转型包括专制主义的衰落、民主社会的兴盛、超出法律触及范围的个人空间、道德的非宗教化及其普及。一般地说，人们对手淫的深深忧虑很明显是政治和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忧虑也体现了反对奢侈观念的瓦解。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奢侈是自然本性迷失，道德堕落的表现。神职牧师所管辖的等级秩序和限制个人活动的法治国家制度都不能抵御住现有最大的奢侈风气的侵蚀。可以说性是通向现代社会思维的道路，也可以说现代社会思维是通向性的道路，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共有一条发展轨迹。道德上的自治是更广阔意义上的统治的基础。

从政治角度的解释只能解释部分问题，不能让一切迎刃而解。尽管政治角度的解释可以使我们了解：手淫这三个威胁，即想像、隐私和过度痴迷是道德自治的最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考虑时间顺序的问题。此外，还有两个更深入的原因使我转到别的话题上。福柯在他的《性史》的第一卷明确地论述了这种观点：现代主观被欲望刺激创造出来，然后通过权力的新手段占据掌控地位。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那是因为政治原因只不过是另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原因的一部分而已，那个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就是商业文化和民主社会联手的结果。

我先从时间顺序问题开始说起。是的，在德国，自渎好像是启蒙运动的邪恶产物。在当时的德国，一种新形式的法律统治正在转变政治权力和性欲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瑞士、荷兰、英国、美洲殖民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政治形势完全不同的国度，自渎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在德国，当法治国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以后，人们对手淫的热情并

没有消失。两个世纪以来，手淫扰乱了许多人的心绪，其中包括手淫者自己和那些想要通过政治上的大大小小变化来限制自己放纵行为的人。

是的，所谓身体的真相已经被编造清楚了，我们也能够在权力的策略范畴内给手淫定位。但是，这个领域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对手淫的忧虑跟对性欲个体约束的忧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身体的“歇斯底里症”等、生育行为的社会化、不正当娱乐所导致的“精神病”（同性恋病理学的形成）、卖淫有可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归属于性欲个体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专业人士所认识的知识体系。在18世纪，手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它远比性生活所有其他方面更早（几乎要早两个世纪）成为主要问题。与其他恶习不同，手淫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我们可以说出同性恋、避孕、堕胎和卖淫是何时被定为合法或非法、受到法律约束或不受法律约束，但我们说不清手淫是何时在何种情况下被定为合法、非法，或是否受法律约束。但是，这一秘密罪行比任何一种新型的性恶习更加秘密、更加普遍。它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这样运行了几个世纪。它不仅威胁到社会中某些组织，也威胁到每个人。它威胁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或者性秩序，还威胁到了关乎所有男女老少的整体欲望体系。 [305]

如果说政治变化是我们寻找现代手淫原因的主要领域，如果在权力利益带动下，手淫被认为是巨大转变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在讨论手淫问题时，就应该把时间顺序考虑在内。福柯从手淫与现代自我形成的关系方面入手研究手淫的作用。在这方面，他要比其他任何人都研究得深入。他的研究集中在18世纪末。当时，用他的话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性认识”，其中包括对手淫的负面认识。这一认识反过来又是权力本质大转移的一部分。有人也可能说这一认识是由权力本质大转移所引起的。“死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旧权力，它被身体的管理机能和生活中有计划的管理体制所代替”。因此，按照福柯的理论，性跟新形式的权力有关联。通过分析多方面变化的权力关系来替代“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事情却不是按着这样的方式发展的。在18世纪之前，“性”这个字眼还没有出现，手淫问题在欧洲文化领域中起伏不定地艰难前行。 [306]

另外，政治方面的解释还不能解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也不能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一个真正的自治和自由的世界里，会产生一种真正需要创造出自治的内部机制。这种内部机制能够允许个人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广泛的选择。教育者、医生和道德家们不经意地煽动了人们内心的欲望，然后再用手中的权力压制这些欲望。约翰·马尔顿的对人们是怎样学会手淫的鲜活的描述也有可能会激起人们产生手淫这种恶习的欲望。而要治愈这种恶习是要向他付费的。他是权威人物，但他的权威是为个人利益，而不是为“生命权利”服务的。很明显，教育者通过无休止地谈论性和手淫者应受的惩罚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个更普遍的观点：现代社会是受支配的主官创造的产物。换句话说，专业人士漫不经心地创造了欲望学说，然后他们就成了这方面的权威。

福柯在他所著的性史的后两卷中很少提到手淫。出于善意，这两卷书没有提到19世纪的情况，而只是提到了古代情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在医生或者哲学家考虑如何关心自我并创造道德上自治的人这两个方面，手淫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然而，在现代世界，自我和孤独的性却变得关系紧密起来。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新型的性基本上与知识和权力无关，而是与自我与关。

我的解释

在此，我将解释一下手淫行为成为文明社会与性欲本能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手淫作为一种性行为的特殊方式，它最能体现出道德上自我控制力的成功失败与否。道德的自我约束性，不是通过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或者是与国家紧密相关的道德专家们的作为来体现的，而是通过文明社会的成果在其社会成员身上来体现的。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我得退回一步去探求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手淫行为成为一种欲望的象征。这种宽泛的文化背景是文明社会的背景，是创造了18世纪以及18世纪以后时期的新经济活动的背景。

也就是说，当幻想、独处、无节制行为再次变成了一个重要而令人不安的话题时，手淫便恰好成为了这个话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手淫，这种个人的恶行指的是一个时代中违反道德规范的罪过，并且在这个时代中存在着一种观念，认为社会是国家和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媒介，认为社会的经济依赖于永远的欲望追求。这种强烈的欲望不仅是宣传说教的产物，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产物。由于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燃起了人们更多的欲望，因而道德自主性的主题也就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没有什么比在性欲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了。随着道德自主性新含义的出现，它具有了表示远离社会监督，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威胁世界良好秩序的象征意义。与旧观念相反，20世纪手淫行为的复苏，被认为是政治运动中要求新的性规则、新的道德秩序的一部分。始于20世纪70年代，手淫行为成了是向文明社会的调控机制争取自我，从启蒙运动及其继承者所提倡的专制的性秩序中争取自我的方式。手淫行为变成了自制、自控的象征，而不是监督管理制度失败的表现。因此，手淫行为一旦不再存在于宗教和基本的社会秩序中，手淫的历史便成立在形成个人道德规范的不同阶段中展示幻想的历史，是反映人们的隐居独处与私密的历史，是个人与公众、过度沉湎和自我克制的关系的历史。

在此，我要先解释一下手淫行为与市场的关系，然后再讨论一些学者们对手淫行为的个人观点和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经济学为手淫提供了真正的体系框架，在该框架中人们产生了对手淫行为的焦虑。相反，我认为手淫在文化领域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典型现象。或者，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是，当手淫行为的各种因素得到重视时，手淫问题便成为伦理道德的重点，也被明确地标注为是很危险的行为。纵观历史，人的幻想从未在经济、文学和艺术这样广泛的领域中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约瑟夫·阿狄森（Joseph Addison）所说的“幻想的愉悦享受”吸引着众多欧洲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这些愉悦的感受成为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及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核心和追求原则。[307]

同时，无节制行为从未如此地受到过赞誉和追捧。个人的独处和隐秘，在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对比中，也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成为焦点问题。在过去，人们认为手淫行为是追求色欲幻想，无节制，独处条件下的自我亵渎。而今人们对这些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与过去的观点恰恰相反：即

个人追求私利可能有助于公众利益；隐居独处是远离喧嚣的世界，并在道德和精神上重新获得活力的方式；感观享乐的好处在于，它使幻想得到愉悦和满足，是功利主义的根基（即提倡人们追求快乐，回避痛苦）。总之，上述的思想被灌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换句话说，人们本来对手淫行为有很多极其不公正的态度，现在都有180度转变，手淫变得广受重视、赞誉，并得到了广泛的探讨。但是矫枉过正也是很危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假如不存在手淫这种恶习，那么就会在繁荣的资产阶级文明中产生某种更邪恶的道德堕落。

手淫、现代作风和自由市场经济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快速增长的商品经济并不是造成手淫的新问题的元凶，也未对新的金融体制产生致命影响。但是商品经济及其信贷基础却和手淫一样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和心理问题被展示在历史的公众大舞台上。如果手淫，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是病理学上的一种幻想症，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体验，是一种由无尽的欲望而产生的满足感，那么，手淫不过就是人们心理和道德问题方面的一个特例罢了。而在心理和道德方面存在的更大问题则体现在商业信贷经济上：商业信贷经济预示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它在道德性质方面的表现却令人担忧。这种担忧与人们的社会交往，或者任何形式的公众道德有关：那就是，在商业信贷经济中，公共道德能否在追求个人欲望和财富的疯狂中保留下来，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焦点问题最早在英国得到普遍关注。英国是继荷兰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文明社会，也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社会。当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关注这些问题。

当时的人们在谈及性行为和商业活动时，用了很多相似的词汇。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他通过两个游历欧洲的波斯人的书信来反映启蒙运动初期人们的躁动心态。其中一封信提到："这种病正在蔓延，并危及到最健康的器官"，"贪得无厌的强烈欲望侵蚀着每一个人"；甚至是"最有德行的人都在干这种丢人的事"。当然，他所说的并不是手淫，而是在明显地掩饰着约翰法则中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所谓"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指的是18世纪初期在法国发生的密西西比股票泡沫，人们争相投资股票，梦想着不劳而获就能发财而导致股票一路飙升到荒诞的顶点。这种欲望是对金钱的贪欲，而不是追求性满足的肉欲。在下一封信中则提到人们完全抛弃了道德中对性的约束。例如，小说主人公郁斯贝克的一个妻子泽丽思打破了公开与隐私的屏障。她在去清真寺的途中扔掉面纱，允许大家看到她的面容；郁斯贝克的另一个妻子扎茜无视道德伦理，和她的一个仆人上床。[308] 这些例子都反映了在经济和性生活这两个领域中，人们抛弃道德的约束而在欲望的驱使下贪婪地追逐金钱和肉体享乐。

正如手淫一样，信贷活动产生了"精神上不断地苦恼与恐惧"；正如手淫一样，信贷活动"让人感觉会得到欲望的满足，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给受害者留下的是"骨瘦如柴"，而"欲望"却"丝毫不减"。部长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虚假的股市"诱惑着投资者，就像"幻想的力量"勾引着手淫的受害者们一样。"艺术的魔力"使股票升值，就像技巧使手淫者的快感增加一样。两者都建立在虚假、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中，人们满足了欲望，同时也受到惩罚。"泡沫经济"，像手淫一样，不过是一场脆弱空虚、毫不实际的"骗人的表演秀"罢了。"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迷恋这样的一个泡沫幻想？"[309] 这两个领域中的问题都来自于自发的欲望，两者中的欲望并没有本质的界限。它不是产生于某些必须而基本的需求或者产生于原罪，而是来源于想像和虚构。这种欲望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商业和

信贷活动的驱动力——是促进发展和进步的引擎，又是孤独的罪恶、自我亵渎，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文化和社会范畴，是自由经济市场中新的道德观念的一种冒险。

换句话说，孤独而隐秘的手淫行为毫不克制地激发着欲望，也预示着经济领域的新问题。信贷经济的膨胀质疑着以金钱、交换、价值为坚实基础的信念。就像由于身体的诱惑而产生的性幻想一样，不劳而获的想法是毫无根据、不受约束的空幻梦想，对经济领域是一种威胁。其实，投机者和手淫者玩着相同的游戏，那些认为可以通过手淫得到性满足和那些想通过信贷来消费享乐的做法实际上都是自欺欺人的。一旦缺少了严格的宗教约束，我们就得依靠切实可行的道德秩序，使道德秩序与欲望、个人占有财富和享乐、虚构和幻想这样广泛的文化包容性相调和。

人们对手淫的焦虑是对人们对新政治经济秩序的焦虑在身体上的体现。哲学家们将这种私人占有与公众利益难以调和的问题用一种术语命名为“亚当·斯密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认为，这种问题的发生或多或少是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无意识作用来调节的。然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尤其是喂饱自己以缓解贪欲的重要性）。很明显手淫行为不属于社会范畴，并且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会自己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交易，即，一种交往和物品交换的体系。[310]

手淫行为超出了一种文化所允许的自私、奢侈的限度。那些先锋派人物们点燃欲望之火的同时又拆掉了传统道德的防火装置。提索和其他手淫新论点创造者来都信奉启蒙运动的自然伦理观。个人的欲望通过服从“自然本性”的智慧，受公众利益所制约，并与公众利益相协调。“真正的需求”限定了自然的约束性，它为人们合理的行为提供向导，在人们行为过度时叫停。它保证了在这个神学特权已经失去声势的世界里的和谐性。“真正的需求”将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性交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将自淫和其他形式的性需要区别开来。遵循自然法则是正常性生活的基础；而幻想、妄想这种不真实的需要却在另一方面导致人们行为过度疯狂。违背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自然本性（不是违背人们供认的性生活的最终目的——繁衍生殖后代），人们会犯下“违反自然常理”的罪孽。而“文明社会的疾病”——18世纪的一个共性范畴，就是人们无视道德原则、生活奢侈、过度消费造成的；相反，那些恪守原则的人则生活得健康而有德行。同样道理，在性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基于“自然需要”的性生活要比自淫获得的性满足健康得多。即使如百科全书所解释的“只是由人的需要而刺激产生”的手淫也并非坏事。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手淫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玷污却远远超出了此范围。正如1819年著名的法语百科全书解释的那样，现代（商业的）社会所达到的高度文明导致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这是造成大量手淫疾病的症结所在。同时期的一名医生认为手淫是“不断生长着的邪恶”，是由“奢侈的生活、不完善的知识和文明社会中的道德堕落”造成的。[311]

奢侈享受通常被看做是一种罪恶。在这种意义上，手淫似乎是奢侈生活

中的又一种罪孽。道德评判家们一直抱怨这是法律约束软弱无力造成的。希腊人嘲笑波斯人生活奢侈、道德颓废，最终在希波战争中失败。罗马执政官加图因旧的共和传统道德的逝去而哀伤。从那时起，道德评判家们便对此抱怨不止。但是现在，事情却由于放松了对奢侈享受的谴责而变得更加危险起来，这是因为没有更多禁止奢侈的法律去限制奢侈品的享用。而实际上，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给奢侈享乐恢复道德上的名誉，因为它创造出了利益。奢侈的生活推动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使每个人从中受益。买奢侈品的人越多越好。但是手淫却是一种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奢侈，因为它事实上一无是处，只是虚无的、欺骗性的肉欲快感。[312]

提索抱怨道："我们沉迷于自己的欲望，想要那些本不需要的东西。"这表达了他在传统道德观丧失时，却找不到一个补救措施的痛惜心情。自淫，犹如羽毛枕头，也像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很明显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是不必要的、堕落的生活。人们（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醉心于虚假需要的倾向完全是违反常理的行为。真正性兴奋与幻想出的性愉悦是大相径庭的。[313]

是否有一种不需幻想介入的自然本性的欲望，这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像动物那样，人类的生存超出了本能。即使是激进的唯物主义者在对性欲望作解释时，也注意到了性的渴望对思维的强大作用，这和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及原子论者卢克莱修的观点是一样的，而且他的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得到了重新认识。撇开这个更普遍的问题，所有写过关于手淫问题的人都认为性交的自然刺激来自于身体之间的吸引。这种自然刺激不同于手淫者无根据的自我刺激。

性生活中的这种极大的区别可能不会在新经济模式中得到证实。在经济生活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普遍存在，必不可少而又充满危险。虚假需求的繁荣——也就是对那些事实上并不需要的东西的需求，使经济消费也繁荣起来。在社会的每个层面，随着人们欲望层出不穷，包罗万象，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必需品。提倡以"高薪水"促进消费的理论学家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工作不是因为害怕挨饿，而是想获得那些以前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和其他学者认为，所谓的奢侈享受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获得感观满足的优雅生活，它不仅是繁荣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它所体现出的无害的一面，使我们更加"人性化"和"社会化"。它还会带来一种愉快的结果，那就是在奢华安逸普及的高雅社会中，男女两性以一种轻松的社交方式相识。而另一方面，"应受谴责的"奢侈行为和"不道德的"奢侈行为则不利于社会交往活动。但两者的界限并不明确。"无害的"和"应受谴责的"奢侈之间的区别不可能是"完全固定不变的"。但是奢侈高雅的生活总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仅仅在这点上，手淫就属于一种"不道德"的奢侈行为。休谟（Hume）通过对奢侈行为的重新评价，阐明了欲望激情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只是一部分泛泛的评价。激情欲望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受到长期的争论，但是它集中体现了18世纪的思想，尤其是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世界上的每一样事物都是通过劳动购买而得到"，休谟认

为，“而我们的激情欲望是我们劳动的惟一原因”。[314]

在日益强盛的经济社会中，强烈欲望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物质的渴望已被证实。经济历史学家们更注意现在需求的重要性，此种需求在创造西方国家的转型中被称之为工业革命。这种“产业的革命”，似乎是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去工作和出售所生产的产品，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市场购买国内还未生产出的商品或者那些用不上的东西。[315] 恰好在这个时候手淫成为了一个迫切而普遍的问题。手淫行为的学说和信贷消费学说一样，是关于幻想和欲望的学说，是更广泛的经济市场道德理论中的一部分。

在《手淫》一书出版之前，出生于荷兰的英国医生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大胆宣布那种只提供笼统理论的有关奢侈的陈旧观点早已不复存在。今天，除了一些医学专家之外很少有人了解他，但是他的学说在18世纪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康德认真地研读过他的观点并立即给以回应；伏尔泰继承并普及了他的学说。[316] 没有人比他更清晰地阐述过商品社会中神圣的社会秩序与男女老幼的欲望之间存在的道德鸿沟。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点事实很重要，那就是孟德维尔，这位最具影响力又普遍受争议的经济思想家，将人们追求肉欲与渴望奢华生活，即对市场上华而不实的商品的渴望联系在一起。

孟德维尔最有名的著作是于1714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最初是作为一首诗在1705年发表的，题为《牢骚满腹的蜜蜂：或流氓变诚实》，同一年约翰·马尔顿发表了《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这本书是《手淫》的鼻祖。《蜜蜂的寓言》讲的是群居的蜜蜂像人一样喜欢奢华安逸生活的故事。这则寓言对这些蜜蜂的经典的描述便是，蜂房的“每个部分都充满邪恶，但聚成整体则成天堂”。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欺诈和诡计，但是这并未造成个人的不幸和公众的瓦解，相反，整个群体“满怀邪恶去结交朋友，而从那时起民众中最顽劣的人，也对公益有所贡献。”孟德维尔这种悖论的观点发表在1714年更长、更著名的宣传册上，他以有力的嘲讽文笔对他先前写的诗逐行进行评论解释。他臭名昭著的观点是将人们追逐私利的“个人之恶行”，解释为经济繁荣的补救良方，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第一个发表最著名的观点抨击“这种个人的恶行”。[317]

孟德维尔认为快乐不是哲学家所研究的抽象概念，它所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一个英国人可以把任何令他们高兴的事称之为快乐。”真正的快乐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最好的事情，而似乎是“最令人愉悦、满足的事”。几乎所有的快乐，即使被认为是充满罪恶的快乐，也是满足了想像中的需要，是文明发展和创造的产物。事实上，他认为自然本能的需求太原始，不在探讨的范围之内：今天穷人的生活要比以前富人的生活好得多。不是基本的必需品，而是人们能够尽情享受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的兴旺、刺激了新经济的繁荣。对于奢侈这个概念，孟德维尔定义为“人在生存中任何不直接必需的东西”。也许孟德维尔承认他下的定义过于严格。但是一旦扩展它的范畴，一旦承认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认为是生活之必需

品，那么他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318]

当然，他的观点想表明即使是最贫困的人也不可能将奢侈品与生活必需品区分开来，“更何况那些奢侈品匮乏的赤裸的原始部落了”。大量的啤酒、充足的食物还有柔软的羽毛枕，更不必说体面的葬礼，很多很多曾经对穷人来讲是不可企盼的奢侈生活，现在已成为生活的必需。似乎历史一直在提升着生活的标准界限：在久远的过去，最富有的人“都享受不到的舒适安逸生活，在今天即使是最吝啬卑微的穷光蛋也能享受得到”。孟德维尔似乎想说明一种社会的文明令欲望变得膨胀是一件好事。[319]

孟德维尔并没有否认本能激情的存在；相反，他认为人们受这些欲望的驱使，欲望支配着我们“会去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他为大众妓院、性交易的商业市场，进行了不光彩的辩护。他首先从漫长的历史中找出证据，不厌其烦地证明压抑欲望是多么愚蠢，并证明即使是哲学家们也“抗拒不了爱的力量”：比如苏格拉底曾坦白，在他老年时一个年轻女子触摸他的肩膀都令他心动；亚里士多德也并非圣人，他与他的情妇育有一子；齐诺（Zeno）以适度、节制闻名，因为他极少与年轻男子发生性关系，但他与他的女仆偷情，并为妇女们争取权利……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孟德维尔认为，国家的政策制度应承认如果最有德行和最理性的人都不可能抑制性的欲望，那么要求世间的凡夫俗子去压制性欲望就太荒唐了。[320]

他特别否认陈旧道德的约束、对传统罪恶的批判以及传统的卫道士能够控制人的欲望激情。他认为就连哲学家都难以做到控制情欲，而且他们也不必做到。孟德维尔已经预料到他的观点会受到批评，但没想到遭到的是尼采的激烈反对。孟德维尔说，“我们越探求人的本性”我们就越确信“精神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产物，是立法者为了治理人民，利用人的骄傲心理发明的谎言”。而相反，精神道德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心理因素的作用密切相关——这是规定人们行为的另一方面。孟德维尔解释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羞耻感使我们变成了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情、理性和宗教都不会使我们变得道德高尚。多少年来人们都相信战胜欲望而不放纵对每个人都大有益处，重视公众利益要比追求私利好得多。”但孟德维尔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为自己寻找快乐，不是所谓的为他人做好事，这使我们成为社会性的人并使社会有了凝聚力。追求享乐使蜜蜂富有朝气，而压制对享乐的追求会使蜜蜂沮丧而无生气。我们吹捧、赞美我们的欲望，虽然理智地说这并不值得我们这么做，但这要比传教士、道德学家在道德上的劝导、说教有益得多。同基于公共道德之上的行为相比，建立在我们利己之上的行为很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简而言之，与我们已经信奉了千年的信条相反，事实上，无论在哪里，个人欲望的满足、奢侈挥霍还有自私自利似乎都是好事情。[321] 从1712年以后手淫的各种令人不安的特征——即为了满足自我性欲，在幻想中得到更多的愉悦，无休止地甚至过度地渴望，这些特征的道德标准在自由经济市场的道德伦理观中的体现是很深远的。他著名的结论是：个人的恶行产生了公共美德。他没有说“这种个人恶行”，而是用了复数形式的“这些个人恶行”，这一定是与那10年间用的单数形式的意思是相符的。

孟德维尔认为即使是最卑劣的恶行，比如酗酒、卖淫、偷窃也是社会繁荣的一部分。而奢侈享受，这种一直备受道德学家们不理性抨击的恶习，这种人们对所有事物的想像、梦想和渴望，事实上更是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相反，如果个人的恶行被压制，公众道德就会崩溃瓦解；当所谓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一时得胜，快乐蜜蜂们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商品交换活动停止，经济就会崩溃，人们通过买卖赖以生存的繁荣就会结束。但是那些被谴责为浪费、过度无节制的行为，却被孟德维尔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命脉。他说："挥霍浪费是一种惬意而和善的高贵之罪，它令人们生活温馨，商人们心情愉快。"[322]

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并未特别提到手淫的问题，但是在他的《为公共妓院辩护》中，他将性欲和性快乐完全置于我们渴望和享受其他事物的同一范畴，包括手淫这种自体性行为。他还以第欧根尼为例来证明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不能压制他的性渴望。在《为公共妓院辩护》中，孟德维尔用书中取名为phil-Phoney这个人物为例，（phil-Phoney意思为：娼妓的情人）主张在经济市场中应给娼妓们留有一席之地，而不应设法阻止卖淫活动。（如我们所看到的色情文学，"对娼妓的描写"也是体现欲望变革的产物，这种欲望驱使人们追求新的消费文化、手淫新恶习。）孟德维尔明确的观点是：长期的历史证明，试图阻止那些无法阻止的东西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在《蜜蜂的寓言》和《为公共妓院辩护》中孟德维尔更主要的观点是：个人私利有助于公众利益。比如贪婪与浪费，是"医学上两种毒性相反的毒药"，一种毒性被另一种毒性所抵消，"两者在一起便是一副良药"。对于那些好色之徒，让他们通过手淫来缓解性饥渴，而不是强迫压抑，这对社会是件好事，这要比他们去残害良家妇女或者向缺乏管理的妓女们传播地方流行病好得多。当然，如所有的商业行为一样，更商业化的性行为是件好事，毕竟妓女也要生存消费。[323]

赞成肉体享乐自由的观点适用于所有其他方面的欲望追求。例如为了买一件二手的睡袍，贫穷的妇女会让自己和全家忍饥挨饿；中产阶级的妇女会效仿比她生活更好的人，以此类推整个社会都陷入竞相效仿和不断的追逐之中。"羡慕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因此，确切地说，手淫的危险是幻觉和充满肉欲的想像，它是罪恶之源，是不正常的需求。但手淫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赢得了好名声，因为它既满足了私利又有利于公众利益。[324]

孟德维尔所宣扬的邪恶自动调节的规律——私利而达公益——当然也是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经济市场的强大精神魔力将追求私利的个人贪婪转变成公共利益；买与卖的商业活动使糟粕成精髓，化自私自利为公众美德。

当然，亚当·斯密并不认为单靠经济市场自身就能做到这些。还需要有人们的情操生活和社会交际活动。在他的学说中，道德情操是生理学（感受到疼痛和痛苦的自然特征）、想像（将自己设想为他人的状态）和社区（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被认可的环境）的某种综合形式。在否定个人

私欲追求的商品社会中，同情心要比物品交换更让人们觉得合乎道德。但是问题是对于斯密和《手淫》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比如孟德维尔看来，假如没有充分的社会联系网络，那么市场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它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则是18、19世纪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有些人认为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认为现金交易关系是社区不可使用的替代物。然而，即使经济市场没有使人们免遭孤独和混乱，但它也的确由为人们提供了交易的场所。任何单方的市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是不存在的。 [325]

多人之间的性行为——这里指不分性别的两人或两人以上参与的性行为——无论是多么的私密，也无论他们如何强烈反对将性行为看做是商品交易，终归还是受到调节的，受到供求关系的调节，同时也要权衡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快乐。正如孟德维尔所认为的那样，也许不受束缚的个人欲望最终会产生公众的利益。供求关系不会、也不应该限制人们对奢华享受的追求。即使个人的傲慢自大，这种近似纯粹的利己主义也有它的优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社交规则、法律规定以及生理上的需要。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包括对性快乐的追求，实际上也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如是不是能够追求到快乐、社会成本会不会太高、有没有健康风险等等。“婚姻市场”这个词组是在1846年作为一本书的书名出现的，但是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就已存在。在市场上提供和接受商品及服务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有形式的性行为，或许是所有形式的享乐方式，都要付出代价。而只有手淫不在此范围内。孟德维尔了解到了这一点，因为手淫是不能被阻止的。首先，它无法让人拒绝：“这种享受隐蔽而安全、方便而廉价，这正是手淫者的强烈动机。”（“被公认的安全性”，《手淫》如是说。）第二，自淫不但廉价而且是自由的。年轻的男子们每天都在“强奸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通过手淫“袭击自己”——因为他们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袭击一个女人。长期不断地和习惯性地摩擦会导致阳痿或者更糟的身体状况。孟德维尔认为，公共娼妓会让这些男子们避免将“暴力之手伸向他们自己”。很明显，这大都是半开玩笑、不合逻辑的夸张滑稽之谈。自我强奸是矛盾修辞法：如果男人们真的缺乏性欲或性能力，那么妓女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孟德维尔担心手淫经济中缺乏合理性，这么看来，他还是太墨守成规了。 [326]

反对手淫的学者们著书立作公开谴责任何诸如此类约束力的缺失的行为，认为这是造成这种特殊的个人之罪危险的原因所在。不知羞耻，没有负罪感，不怕被拒绝，没有什么能够约束手淫者，除非他愿意听取医生、老师、哲学家的意见，让他知道这种恶习并非看似简单，是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如果孤独的性享受不能受到供求力量的制约，其最终结果便是死亡；其隐患便是身体和精神的崩溃，如同鱼群冲向致命的暗礁而毁灭一样。

对于异性恋者而言，这恰恰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享受“道德高尚的爱情”更诱人的。他原

本指的是合法婚姻基础上的床地之欢，却也代表了他未说出的不合法的爱情关系。即使是这位最理性、最高尚的学者，在临终前深情款款回忆的不是他曾经怎样安静地研究过学问，而更多的是曾经拥有过的情欲之欢。毫无疑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最温馨的事情是曾经拥有过的情爱。

面对像性行为这样有着巨大诱惑力的事情，只有饥荒、疾病这样的灾难才能把人们带回到严酷的现实规则中：人们不能免费地享受性生活。当然，马尔萨斯相信，过性生活而不考虑节育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设想的惟一可选择的办法便是利用饥荒和疾病进行坚决的抵制，这才能在道德上约束人们。[327]

在马尔萨斯之前，提索和他的追随者们便试图创立马尔萨斯式的灾难理论，其惯用的约束方法便是宣扬手淫行为看似安全，其实会导致死亡。（其中最荒谬的观点之一便是：与手淫相比，怀孕的风险要小得多。）手淫行为的潜在代价已变得很清楚，因此需要遏制人们再度释放的欲望。用限制手淫行为供应或需求一方的机制可以制约无限的欲望，其方法有：其一，通过饥荒、死亡、敏感性以及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调节者的调剂作用；其二，考虑一下令你尊敬和仰慕的人是怎样看待你这种不良的纵欲行为；第三，依靠实用原则或者其他的因果伦理道德观的约束；最后，利用某种重要的理性原则来约束，即康德提倡的绝对道德义务原理（即道德上的无上命令观念），认为自私的纵欲行为是荒唐愚蠢的。

怎样使自私的欲望变得社会化，手淫作为一个有限的而具有代表性的范例，是对所有这些诸如此类观点的根本挑战。相爱的两个人总是受到满怀敌对情绪的父母的干预，受到不利环境的困扰，而结局一定是他们战胜了一切困难而终成眷属。这是小说中灌输的，某种程度上，也在现实中得以强化。要是美德不总能获胜，那么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克服。卢梭最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不过即使在他之前，已经有这样的观点：手淫者的行为可以说，（手淫者）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决与女性的性交，不必得到任何美人的许可，便可幻想着与她们做爱以达到满足他们情欲的目的。[328]“这种对婚姻的危险的弥补方式”，不再受到找不到婚姻伴侣的制约；对于手淫者，需要和供应是无限的，他可以信马由缰地幻想着性愉悦，自我解决性冲动。但是如果手淫者过度沉湎于难以抑制的性幻想中而毫不克制，那么医生就会设法让患者确信手淫对身体有危害。这种教化的观点在于说明过度手淫的最终结局便是死亡。负罪感和恐惧会阻止这种恶习。人们可能认为在缺乏神圣权威的情况下产生了手淫的恶习，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没有任何外在的方式去限制自我享乐。即使是孟德维尔也可能找不到弥补的办法。在手淫的过度经济理论中，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什么都不能将个人之恶行转变为公众之美德。它违背所有经济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公理：也许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

直到20世纪，弗洛伊德的同行威廉·斯特克（Wilhelm Stekel）才最终证

明了孟德维尔的理论。斯特克认为，“如果完全压制手淫的行为，那么性犯罪的数量将会惊人地增长”。[329] 手淫为所有会导致强奸、鸡奸等犯罪行为的欲望提供一个健康的突破口。如果我们相信女权主义者麦金农的理论，上述说法则可能是不对的。事实却恰恰完全相反！然而自此以后，在18、19世纪，没有人能提出一种弥补的良方。

通过对经济市场道德观的辩论，我们可以看出手淫的原理和新经济现实的原理在想像、个人欲望、奢侈和不节制方面惊人地相似。但是其矛盾之处在于，人们对前者加以严重警告，而对后者高度赞扬。贯穿于手淫中关于虚假需求、沉湎于欲望幻想的论点同样贯穿在经济信贷理论中。手淫者的疾病与国家沉溺于票据证券的弊病极其相似。手淫和信贷，都被理解为预示着幻想。两者都威胁着真正的社会秩序；两者都沉湎于幻觉；两者都与认识论中事物的秩序理论背道而驰。是否是像保守的批评家们所宣称的那样，信贷破坏了实际价值？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它依赖于信奉那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说股票投机活动，它的兴奋来自于两种幻想：票据证券可能会变成金钱；人们可以不劳而获。[330]

性行为与金融经济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不可思议。18世纪很多受过教育的英国男女都看过阿狄森和斯梯尔（Addison and Steele）所创办的杂志《旁观者》，它是一把了解现代城市生活的钥匙。比如，《旁观者》中就有关于手淫的长篇论述，认为手淫者和国家都陶醉于虚假的需求中。政府信贷犹如坐在宝座上的贵妇人，只要她周围的钱袋里装满了真的金子，她就丰满而健康。（金子怎样变成钱是另一种幻想的飞跃，另一种文化的炼丹术，但是这在很早以前就发生过，已经不再稀奇了。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似乎很奇特的，但到了18世纪时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331] 但是当她的钱包变得沉甸甸时，政府信贷这位贵妇人红润的肤色消失了。现在她看起来像一具垮掉了的骷髅，像手淫者那样备受“消耗性犬热病”的折磨；“最可怕的幻影”以“最无法接受的方式”直入幻觉。对证券票据的空洞夸张的幻想时刻诱惑着她。当这位贵妇人看到几张钉在墙上议会法案的纸张——这些曾轰动一时的公共基金——而今却成了长期借据，“便常常会露出神秘快乐的笑容”。但是随后现实重新证实自己，所有的一切又都好起来了：那些曾“装着空气”而胀鼓鼓的钱袋又重新装上了金子——“这位贵妇人又恢复了健康”。[332]

信贷和手淫被使用在相同的语言学范畴中。18世纪初主要的金融评论家阿奇博尔德·哈奇森（Archibald Hutcheson），写了有关南海股票事件的“虚构的价值”，和“美梦的乐趣”；安东尼·哈蒙德（Anthony Hammond）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编辑，他指出了南海泡沫事件的变化过程：一开始是慢慢浮现出的“痴迷、疯狂或狂乱”，接着1719年经济泡沫破裂，股票“瞬息幻灭”，打破了“可真正兑现”的谎言。股票信贷产生于幻想，也毁灭于幻想，这正如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一些小册子上明确阐述的一样。笛福对编造、虚构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指掌。幻想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在人们不知情的时候摧毁欲望；信贷，如同手淫一样是“看不见的幽灵”。它以异想天开取代理性的判断，“蛊惑人们迷恋它，

然后榨干他们的血肉”。或许国家信贷并不神秘，但是她的确俘获了为她而献身的众多灵魂。[333]

亚当·斯密是提索同一时代的人。他撰写的有关信贷问题的文章与瑞士医生抨击孤独的罪恶的文章有很多相同点。这位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现实”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么未被“滥用”的钞票会自然而然地符合金银本位。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过剩的纸币”意味着“危险的弥补”，困扰者手淫活动和财政领域。其解决办法是在现实中保持节制，远离幻想；信贷和手淫一样，如果符合真正的需求，如果能保持收支平衡，那就不是一件坏事。

当银行贴现给一位商人一个由真实的债权人开具给真实的债务人的真实的汇票，并且当该汇票即将到期，债务人真的付了款时，银行只是支付了该商人账户中价值的那部分，这部分得由他来保存，否则就会被闲置起来。如果银行贴现的这张汇票不超过这个值，那么若在无汇票存在的情况下，这个价值就绝对不能超过国家中必要流通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也绝对不能超过国家流通中肯定能承担和使用的数量。

而错误形式的信贷，如同手淫，也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小说故事，被批评家称为是一种错误认识论：它不尊重现实，更糟的是，它随意歪曲现实。国家信贷让政府发动能承受得起的战争，就是因为债务掩盖了它真正的损失；当代的国民们完全不必承担这种损失，而还未出生的下一代则会为此而付出由战争带来的代价。私人信贷让人们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收获的是什么。如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所说，信贷是“实现任何可想像的东西的护身符，也是能想像出任何东西的法宝。”[334] 换句话说，金钱膜拜和手淫者的欲望是一样的。一方面，钞票、汇票，无拘束的性享受等滋生于自我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它们又充满了着神秘而令人不安的魔力。

真正的商品交换，如同真正的性行为，刺激着生产和人们的社交活动；虚假的商业票据如同手淫一样，对生产和人们的社交活动没有任何益处。但是将手淫和与爱的好坏处挑选出来也并非容易。启蒙时期的苏格兰哲学家们告诉我们，社会交往和富有同情心是将四分五裂的利己主义商业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社会交往似乎限制了那种不好的幻想，相反，孤单独处的行为却让这种幻想活跃起来。但是孤单独处也带来了解脱和安宁，避免了频繁的社会交往的需求。所以与那些提出现代手淫问题的学者一样，他们也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平衡。德国医生、国王的内科医生齐莫尔曼写道：孤独是“思维自发地沉湎于自我思考的状态”。这听起来似乎很危险，而在齐莫尔曼写的关于手淫的另一文章中却开始哀叹这种恶习。但是他所著的关于手淫的全球畅销书是反思手淫行为的开端，阐述了人的思维如何受制于情感，人们是如何以手淫的方式得到解脱，从毫无生气而繁杂的世界中得到慰藉。[335] 人们需要置身于社会和经济交换的世界之外，但人们又不得不以正确的方式置身其中。在这里，手淫又是一个限定的例子。手淫者沉迷于思想上的孤独，

这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独处可以享受和谐平静并恢复社会交往的生气。有一些社交行为是高尚的，而有一些，比如年轻人逃避合理的社会监督，就会产生隐秘的罪恶。

这种事物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作为手淫问题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作为新秩序的基础，体现在现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想像的美好享受与其危险的一面相对立；正确的社交和独处方式也与其危险的一面相对立；作为经济推动力的欲望与自我沉湎放纵的欲望相对立。现代的手淫问题和道德重组的市场社会处于同一时期。同样的思想家们致力于研究性生活的变化与更广泛的文化差异的问题。所不同的表达是，他们回答了在这两个领域中被孟德维尔推翻掉的质疑。比如卢梭担心自然的自给自足经济正在被商业中产生的虚假需求所摧毁，担心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与实际的物质价值无关联的纸币的制约。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很熟悉，18世纪对于奢侈的看法因为《手淫》的出版和流行而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但是自给自足也有危险的一面，虚假的欲望和想像的性满足是能够达成性生活自给自足的。卢梭在他所著的《爱弥儿》中担心这会误导他的学生。奢侈享受在“危险的弥补”情况下可能会破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又是极其危险而难以抗拒的诱惑。自给自足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手淫者对社会麻木不仁，技巧手段和过度幻想最终会导致他们精神崩溃。但是充满想像的文学作品却提高了读者的素养。卢梭在小说中创造出的激情热望和同情之心，使人们变成更高尚、更具有社会性的人。想像作品是美学上的奢侈享受，它对外创造了连接社会的纽带，对内摧毁了唯我主义的个人恶行。

这些主题也反映在更早的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文学作品中。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医生诗人。可惜他现在已被遗忘。在他的年代里，他出版了大量作品。他曾写过一首流行的无韵长诗（18世纪至少再版过34次），题为“Oeconomy of love（1736）”。诗中有很多部分洋溢着对性兴奋无比惊叹的色情描写：美丽的少女“分开的乳房丰满而放荡，充满着诱惑，渴望着被触摸”。但是万一身边没有“美丽的少女”，被激起性欲的读者不应该沉醉于手淫这种替代方式中。阿姆斯特朗在他诗中的抨击“修道士隐居之罪”。他认为与其他的享受方式相比，手淫是满足自我欲望的最低级方式。这种婉转的说法本身在告诉人们：可追溯到至少17世纪初的权威的反天主教思想重点在强调修道士们的隐遁是为了远离经济这一类的生活。其所反映的问题不是修道士手淫行为是不健康的性生活方式，而是他们因为想要逃避社会而选择了隐居的生活。诗中表明，满足快乐并不意味着要选择孤独。

我们应该努力建立在欲望、奢侈、满足等方面一种新型的善恶的道德框架，对于人们来说，他们应该遵循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从《手淫》提出的观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性别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性的经济对男人女人的作用是不同的。正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道：“总是有驱使的欲望和制约的规定”。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制约。性别不同，驱动力也是不同的。女人们作为消费者既是保持奢侈消费文化繁荣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被这些欲望所无情吞噬的牺牲品。在后面的读书与幻

想的章节中我将进一步具体讨论女人和经济市场的问题。其基本观点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消费、读书、自我发现和性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们曾一度认为只有男性色情狂的病症，后来边维尔发现了女性由于性欲强烈而产生的女性色情狂病症。他将该种疾病和手淫归咎于人们的幻想。在他所举的关于想像作用的例子中，他的第一个例子不是性欲望而是对食物和事情的过度渴望：在贪食者中，"想像增强了他对奢侈阔绰生活的热望，导致他不惜一切代价沉迷在想像之中"。手淫、贪吃和消费的冲动体现了另一种情况下市场秩序的崩溃，即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称之为的现实原则的崩溃。[336]

一种主要发生在女人身上的疾病，偷窃狂，则体现得更明显：如同手淫一样，偷窃狂是由不真实的需求冲动而产生的疾病。很多病例体现了想像中的幻象。假如这种找到体内快感的不可遏制的冲动确实是现代（商品）社会更高级的文明产物的话，那么，这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拥有的欲望，也是高级文明的产物。当然，还有其他有关手淫和偷窃癖之间联系的解释。例如弗洛伊德的同仁费尼沙尔（Otto Fenichel）认为，偷窃代表"偷偷摸摸地做一件严禁去做的事情"。他提供了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女人每每偷窃时都有性兴奋，在行窃的那一刻达到性高潮，然而在正常的性交时却表现为性冷淡。[337] 但我的观点是，从18世纪起，手淫这种自体性行为便一直与商业社会的危险因素相关联，尤其与女人的消费相联系。当商业扩大到包括消费与生产的范围时，它便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自我探索，自我展示的世界，而手淫行为也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最后，我还要说，在近代世界史中，手淫这一问题还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与现代性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说这种联系松散是因为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就不严谨。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联系终究还是存在的。欧洲人对手淫充满了怀疑，19世纪晚期，克拉夫特-埃宾等人更是宣称，手淫与同性恋一样，是一种颠倒错乱的性行为。明治时代，即日本的工业化时代，此类观念通过西医著作被引入日本。也只是在此之后，手淫才成为一种须受监管的行为。而在这之前，手淫曾被用来替代其他形式的性行为，并且是更大范围的色情世界的一部分。被用来刺激手淫的色情图画在都市中心的同性恋或异性恋场所非常普遍，且不是什么伦理问题。医生及教育专家逐渐把性教育与卫生保健看做是进步的主要方面，至20世纪前10年，很多非专业人士对此也产生了共识。（反对者称，日本人与西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生理习惯也与西方人有明显差异。例如，日本人肉类、酒类的摄入量都较低，这意为着性欲望也较低，因而不那么需要发泄的渠道。）而相反，支持者则称，年轻人当中已有了相当的性欲望，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其首要目的就在于避免"手淫的可怕后果"。日本人此时已踏上了西医之船，相信国力取决于有关身体的科学，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同时也登上了独自性行为问题之船。[338]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表明独自性行为问题演变成为了与西化相联系的问题。那些离家而居且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印度女孩，手淫的比率较大，且她们常称因手淫而感到很糟。作为社会科学，这类研究成果及观点无

法得以评判，但我们的确知道，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带来文化挑战的时代，独自性行为相应地被视为问题、麻烦。

书籍、阅读与手淫

我在上一部分开头处所提的观点在这里可适用于新的条件：证券市场崩盘、新信贷手段以及关于豪华奢侈的新看法都不会导致现代手淫的出现。同样，新的阅读行为（包括私下里的、不出声响的，以及富有吸引力的）、新的阅读对象（小说，尤其是黄色小说）、或是印刷经济的急速膨胀（包括印刷文字及图片的生产、购买、销售），也不会导致现代手淫的产生。但是，某些种类的读物与书籍，其文化能量即为独自性行为的文化能量。这种书籍是市场本身的产物，对欲望的产生极为关键，对伦理管理亦十分关键。这种书籍取决于孤寂、幻想、想像力的自由腾飞、以及保持自我的能力。与商业世界相比，小说更具威胁性，因而是手淫更为纯粹的衬托。在商业世界中，无论市场有多么芜杂、多么充满投机，终究有它的底线，不管这个底线隐藏得有多深。泡沫破裂，信用就崩溃了。而在小说世界中，可不存在这种令人心安的约束法则。

印刷文化是文明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交际网络，是传授存在与感悟的最基本方式的老师，印刷文化依赖于那些使手淫貌似危险的因素，同时又鼓励着这类因素的发展。在文字与图像相交织的时代，独自性行为代表着新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中危险、黑暗的一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文学不是文明的文学，就会指引人们通往独自恶行，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且文学又有其内容。文学作品是写出来的，写作目的则在于独自阅读，因此称之为实践。色情作品则是内容无控制的标志，也是过分的自我沉迷、想像、孤寂而导致的手淫的标志。换句话说，手淫成为了问题，因为印刷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成为了问题。这一切的发生，正是由于那些被大肆吹捧的想像与幻想、贪得无厌的能力以及新近发展起来的隐私领域，均有其危险、黑暗的一面，这些阴暗面代表着唯我论、自私以及道德的全面崩溃。简言之，文明也依赖于文明所惧怕的那些东西。

手淫或许代表着媒体中更加广泛的文化发展，这一点对我们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并不新鲜。就在我写下这几句话的那天，来自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的一封信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该教授因自己沉溺于上网而备感哀叹，其情感十分强烈。他说，在自己意志不坚强的时候，他甚至连屏蔽装置都用过了，他还痛苦地抱怨到，学生在课堂上查发电子邮件、凝神于各类电子追求。这位教授的苦衷使我想起了提索的叙述：讨论课上，一些感到无聊的学生竟然在课堂上手淫。类似的沉迷于自我的故事，当代还有不少。

一面是文学的实践与内容，另一面是手淫。从表面上来看，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我们与现代学者的共同观点，即独自性行为至少可以部分得到平反。其中有位学者的观点颇具启示性：“在研究生院学习时，我读了卢梭的《朱丽》，每次我哭的时候，都会在页边做些笔记。”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与那些担心自己哭得不够多的18世纪女读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但与她们不同的是，这位学者打算写一篇论文来说明她什么时候

哭、为什么哭。接着她说，这是个以幻想为对象的科研课题，与研究萨德（Sade）的文献很接近，会是“一篇促使我手淫的文章”。卢梭与“那危险的伴随效应”又一次不谋而合。这位评论家与许多18世纪的读者一样，被阅读中的纯生理快感所吸引，被这种快感对身体产生的效应所折服。为了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她将研究重心放在“两种体液（即泪水和性兴奋时产生的体液）产生过程之间的联系”上。这两者的关系又相应地映射出“情感（女性的标志）与色情（男性的标志）”之间的联系。 [339]

哪一性别更应当与色情出版物相关联？18世纪的评论界恐怕没有现代的研究者那样确定，但是从一开始，手淫与现代文学事业的联系就已经存在了。（一位著名的权威人士曾说，当今淫秽出版业的存在，即是为了生产性幻想，“从而激发或伴随男性的手淫”。而且倘若女性当中也存在类似的需求的话，就会有各个更多的淫秽作品为了她们而作。 [340] ）不过，把阅读当做耗费体力的行为，当做需要想像力的行为，当做需要某种快感的、秘密的、可能会上瘾的自我陶醉的行为（最后这一点被当代人视为独自罪恶的核心），也的确存在于女性当中。正如我在前面所说，隐私读物的兴起、小说的兴起，均不会致使独自性行为急剧升温。但独自性行为作为例证，却表明道德遭遇到了挑战。

这种事情可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我没有臆造，那位边读萨德边手淫、边看《朱丽》边哭泣的密尔沃基大学杰出教授简·加洛普（Jane Gallop）也没有臆造。18世纪时，约翰逊博士遵循的也是这条路子。他当年就曾注意到，那些最为遁世的人，并不一定是最为勤学的人，也并不一定是最能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良好的道德秩序的人。许多人“放弃了自我，并且投身于幻想的奢华之中”。他们在头脑中摆弄着过去与未来，就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将自己置于不同情形的幸福之中”。约翰逊称这种幻想为“头脑中看不见的暴动”，这些暴动“是存在中的秘密挥霍，安于察觉，恐于责备”。这种徘徊、飘摇、无拘无束的意识，可以自由地想像着任何它愿意想像的东西，可以自由地创造着它自己的世界，似乎于隐秘的性爱生活十分接近、与充满欲望的身体十分接近。约翰逊的这一“存在中的秘密挥霍”的论断，成了对独自性行为的威胁。 [341]

我并不想宣称这一发现是我的原创，提索比我抢先了两个多世纪。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作出上述论断后不到20年，提索就写道：“那位玷污了自我的人最终选择了放荡，他开始了肮脏猥亵的沉思。从这层意思上来说，他是有修养的人的典型，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接着，他补充道，“这类过度如果不产生致命后果，那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这类“发生在有文化的人、久坐的人身上的疾病”，或许就是手淫疾病的最纯粹的原型。而文化人高强度、自我高度集中的工作，则是独自罪恶的原始形式。提索之所以说“勤学的人”，是因为其情绪液从神经的不断运动中迸发出，并且永不停息地耗散，这一过程并不需要将手放在生殖器上。提索与他的同代人都将精液视为神经的能量、生命的动力，他认为精液是“最重要的液体，是精华之油”，精液流失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射精，而是思考力度过大。不是停不下手，而是停不下脑；不是手无法行动，而是脑无法行动，无论对文化人来说，还是对手

淫者来说，皆是如此。无论从生理上看，还是从道德上看，独自罪恶都是独自脑力劳动（尤其是文学上的投入）的特例。提索对此问题的理解，恐怕永远也达不到我即将在本章中所阐释的那种广度，但那些创造了现代手淫的人十分明白，他们将面对的问题，比自我沉醉的兴奋要广泛得多。他们所理解的人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有何异同？手淫问题直指这一问题的核心。 [342]

文学行为与手淫之间的联系既深邃又广泛。手淫的罪恶即在于它那可疑的孤寂性。这种罪恶取决于其热烈而无拘束的想像、其似乎不可避免的上瘾与无度。在宁静而又意义深远的意识革命中，手淫的罪恶找到了相匹敌之物。私下里的阅读反映了这一意识革命，也协助了这一革命的产生。然而，私下里的阅读与私下里的罪行之间也存在区别。据我们所知，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手淫，然而却并未一直在阅读一种其乐趣在于虚构与吸引力、且能将新乐趣刻入灵魂的文学作品。私下里的罪行在道德方面变得十分急迫。从广义上说，这种罪行成为了更加广泛的现代隐私问题的一部分。从狭义上说，这种罪行与私下里的阅读等同。

这两个问题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私下里的阅读，其历史长于手淫，且更具连续性。它并没有1712年那样明确的分水岭，并且早在《手淫》问世之前，就已十分盛行。独自性行为的正名，一直等到了20世纪晚期。而私下里的阅读却很快就摆脱了恶名。18世纪中期起，远离公众视线的种种行为已不再被视作野蛮行为了。尤其是私下里的阅读，尽管一向遭到怀疑，为某些人所不齿，却逐渐取得了人们的承认，哪怕算不上是什么值得称颂的行为。甚至连小说这一最具威胁性的文学形式、最需要在私下里进行阅读的文学形式，也于18世纪末得到了驯化，惟一的例外仅仅是一些最持怀疑态度的圈子（例如，美国的纯洁改革者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就从未与任何小说实现和解。他通常的台词就是：大多数人读的那种垃圾绝不会指引他们去读点更好的东西，就是类似薄伽丘那样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也不比那些5分钱的小说强到哪去）。 [343] 然而，手淫却继续代表着隐私读物与想像小说所代表的罪恶。就算已不再明显具有威胁性了，其所带来的恐惧依然流传了下来：即自私欲望中的危险、长期的“初爱之罪”。

在这个故事中，关于阅读的那部分可一直追溯到古典时代。那时，手淫之类的问题并不会激起人们的兴趣。而那时的阅读通常是公开的、出声的。即使是个人的阅读，阅读者也要小声读出来。如果不把单词读出声来就能进行阅读，则被视为天才、奇迹。有个著名的例子：安布洛斯（Ambrose）会一种当今的小学生都会的本领——默读。而奥古斯丁（Augustine）对此表示惊讶。这位博学的大主教自己尝试时，一定感到了磕磕绊绊。实际上，在中世纪盛期的文献中，词与词之间并无空格，这使得默读极难达到我们现在的速度。这不过是因为，不把词读出声来就看懂那些连续不断的文字，在生理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与之相反，现代书写形式的兴起、词与词的分写规范以及拉丁语的新句法形式，使得默读变为了可能、变为了常规。截至13世纪，这一常规出现在了识字的人群之中，尤其是教士之中。接着便传入了世俗的贵族社会中。 [344] 与

昔日相比，阅读变得私密得多了，变成了与自我进行思想、情感、幻想等交流的方式，也使思想、情感、幻想等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默读当然不一定是私下里的阅读。14世纪的历史学家、诗人让·弗卢瓦萨尔（Jean Froissart）曾将其诗集的手抄卷献给国王理查二世，国王通读了一番才将其拿进自己的房间，此后还在群臣面前朗读了其中的几个部分。并且即使是在他的私人房间里，也很可能有侍从与亲密智囊的陪同。默读成了一种奢侈，它首先需要政治上的可能性，其次需要一种逃遁。在寂静的卧室里默读甚至是躺在床上默读，最初仅对极个别的人来说才会成为可能。然而到了15世纪，默读在世俗世界的富人中、在教士的圈子里，都盛行了起来。私密的独自阅读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可能、真正的乐趣。

从一开始，这场革命的在道德方面的潜台词就已经很清楚了。一方面，这场革命使人与神之间建立更直接、更私人的关系变为可能，这种亲密关系以对宗教文本的深思为途径。书可以在封闭的房间里读，这样有利于灵魂的升华。新教即得益于与神圣文献、虔诚文献私下沟通，而阅读则总是与改革相联系。（事实上，扫灭文盲的历程与新教发展的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但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在这里展开。）另一方面，私下里的默读又明显具有危险。默读使人们更容易地就接触到了能够挑起性欲的材料，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也不必担心受到约束。默读支持私下里的幻想，激发私下里的欲望。圣经中一些潜在的黄色场景开始涌入某些手抄卷中，如大卫与拔示巴、苏珊娜与长老们等，而活字排版则更大规模地丰富了人们宗教的或是色情的内心世界。[345]

印刷的书要比手抄卷便宜几百倍，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乌七八糟的东西：异端邪说、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危险思想、浪漫传奇、色情故事。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是对公众需求的反映，而公众需求的，则是从前所难以想像的一种奢侈，这种奢侈对我们今天来说，却习以为常：这就是独自阅读。这一行为对自由思考来说是一种打击，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恐惧、危险、与矛盾。大批量印刷的第一批书约有4000多种，其中既有路德的《圣经》，也有阿尔德斯·马努提厄斯（Aldus Manutius）对淫秽拉丁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评介。[346] 裘里奥·罗玛诺（Giulio Romano）那组16种做爱姿势的图画（即所谓的《方式》）最初仅在收藏家中流传，而此时却付印了，使得越来越多饥渴的读者对淫秽作品的独自沉思变得空前普及。其便宜的版本直至18世纪晚期仍在伦敦的大众阶层中流传。最终，这些淫荡的姿势与皮埃德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淫荡的十四行诗相结合，赞颂交媾、赞颂性器官，成为西方色情传统之第一书、最长命之书。这类书或许为情侣所共同研读，或许为独自沉思之用，但的确是可以独自打发时间的书，在寂静与孤寂的时刻，读书的人和看画的人都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内心深处。色情印刷品给了读者、欣赏者沉思的机会，如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各类性经历都与自己相关”。[347] 《方式》也直接挑战了教皇的权威、审查以及教会政治，同时也表明了个人的性刺激为何被视为对社会的重大威胁。当然，这类沉思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印刷的图像。比如，如果有人订购了提尚

（Titian）或乔尔乔涅（Giorgione）的经典油画（如那幅维纳斯把手放在阴部的画，或许她是在手淫吧），用来装点自己的私人空间，这种人并没威胁到任何东西，然而却仍要卷入艺术与艺术所代表的东西之间复杂的新关系之中。印刷，这一复制作品的机械方式，使得这种关系传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348]

与17世纪后期以及18世纪的“阅读革命”相比，这还仅仅是个史前阶段。到时候，阅读革命将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数量庞大的识字人群的内心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私下里的、不出动静的、秘密的阅读行为本身进行监控，对阅读的内容进行监控，对洁净的东西与淫秽的东西进行区分，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工程。（整个文艺评论界成长起来了，都来对这项任务助一臂之力。）阅读那些使人浮想联翩的作品可以带来乐趣，对于《手淫》出版之后的这代人来说，自淫性乐是这种乐趣邪恶的双胞胎兄弟。这对难以招安的兄弟，是近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文化胜利之一。私下里的阅读，甚至包括私下里阅读浮想联翩的小说，已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得到了平反。然而手淫以及与手淫联系显著的特殊小说——色情文学——则一直鲜有辩护者，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这二者的昭雪有时是共同进行的，有时是分开进行的，这些内容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现在，我要把私下里的阅读作为一个不涉及其内容的过程来考虑，与之类似，我们也会在不特定节目内容、网站内容的前提下，对电视或网络所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当然这种离析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像乔尔乔涅的《睡着的维纳斯》和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这样高雅艺术的伟大作品，是为男士房间而画的。画中模特左手的位置在暗示着什么（左手正抚摸自己的下身）。印刷技术导致了更多色情图画的出现，并使人们更易得到这种画并用作独自沉思。

进行某些种类的阅读，就像看某些电视节目、登陆某些网站一样，似乎完全不会导致问题。一个人无论是读体育教练手册还是铜匠手册、作家手册，无论是私下里默读还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读，在道德上都是中性的。因为从纸上的字到重构起来的图像，都基本上是公开的，与内心世界几乎毫无关系。同样，技术本身也绝不可以一概而论地加以谴责。人们很快就会从默读这项广为传播的革命性技术中得到益处，无论这一技术在政治、社会、道德方面有多么危险，都会倾向于其伦理上的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要控制阅读的内容与社会背景，正如其他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一样。例如我们已经看到，17世纪时，隐秘进行的祷告是具有危险的，而社会阶层限制以及良好的成长环境，可以减轻其危险性。有些种类的阅读材料对部分人有害，对其他人则可能无害。阅读本身就可被招募过来，用以抵抗阅读造成的最坏效应，正如火可以用来灭火一样。正确的阅读具有教诲作用，且确实可以起很关键的作用，可以深深地、直接地触及人的良知。好书把好思想塞入读者的良知，把好的思考方式、感触方式塞入读者的良知。好书不仅起教化作用，而且会激发起同情心，会使人们产生对罪恶的恐惧与反感，会树立新的道德理智。这就反对手淫的文献数量激增的原因。这些文献并非都是在为反手

淫产品做广告，而是在对私下的、隐秘的独自阅读行为动员起来，用来预防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最糟糕的危险：私下的、隐秘的罪行。

如第二章所述，手淫是如何变为首要的现代性行为的？印刷文化对此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书籍及小册子产业使商业中的新恶行得到了传播。但更具体地说来，私下的、隐秘的阅读是十分关键的。其实，很难想像会有其他途径，能够使手淫这种无法称其名号的秘密罪行如此出名。康德“认为这种行为太肮脏了，就是用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也不行。”《手淫》、提索以及所有的教育家、医生、道德家都曾通过书来触及内心世界，这样可以毫无窘迫、不失礼仪。这就像现代的研究者，如果提出有关手淫的问题感觉尴尬，则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来提问。独自性行为是秘密的恶行，要宣传这一观念，私下里的阅读成了最佳途径。这种行为本身也强化了一条信息：任何坏事、窘事、可怕的事，任何不能用嘴大声地说的事，都是带有深深罪责的乐趣。偷偷去读关于秘密的书，定会使秘密显得更加危险，但同时也会使秘密变得更加甜美。这是一个充满秘密故事的时代，是一个无论在政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充满幕后观点的时代。这也是书信体小说的时代，这种小说使读者产生幻觉，似乎自己在偷看别人的信件，从而偷窥了别人的内心世界、别人的性格。那些信件占了已出版的18世纪手淫记录的大部分，有声明，也有询问。这些记录描述了人们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所作所为又只能通过与医生的通信来揭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至于手淫与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我们接下去还会谈很多。现在我们应当明白的道理是：私下里的阅读实际上对造就这种秘密的恶性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读书、警告会使人学会手淫。这是忏悔者们及道德书的作者们长期以来所惧怕的事情。但几乎从没有谁汇报过这样的事例。然而，从20世纪回溯到18世纪，书籍在使手淫变得不为道德所容的过程中，倒是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书籍教导着人们：手淫是错误的、危险的，能否战胜手淫是对真实人品的检验。不手淫则被描绘为意志力的胜利，反之，持续手淫则是意志薄弱的标志、道德遭受挫败的标志。关于手淫的文献，其巨大的市场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教育人们意识到道德危险并不一定要通过劝诫或口头建议，很多罪恶感似乎都是通过印刷品建立起来的。

例子是大量存在的。20世纪20年代，有位俄国农民在回答研究者的提问时说，正因为他读到了手淫的危害，所以他才不这么做了。如果没有书，他很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这种终身的行为竟是终身的罪恶。玛莉·斯多普斯（Marie Stopes）是位节育倡导者，曾著一部十分畅销的指南，教给人们如何使性生活达到彼此满意。许多人写信向她寻求建议，通信使他们得到了与读书相似的帮助。例如，L小姐单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手淫的受害者，直至三年前”，她之所以醒悟了，是因为她读到了爱德华·卡蓬特（Edward Carpenter）的书《爱的如期而至》，并且“第一次有所感悟，在斗争了许久之后终于戒掉了。”（她不再手淫了，转而像对待宠物那样对男朋友进行爱抚，不过这样做她同样觉得有些不妥。斯多普斯建议她把这一行为也戒了，并且应该尽快和男朋友结婚。）另一位读者来信坦言，他年幼无知时学会了手淫，这一行为几乎

毁了他的一生，不过通过阅读斯多普斯的《婚后爱情》一书，他及时地发现了“这一行为的真正本质与危害”。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脸红，却不敢寻求建议，就只好写信，因为他相信斯多普斯一定会对此表示同情。署名C.H.G.的读者在上小学时学会了手淫这一手淫行为，并且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直到有一天，他偶然间读到了一本十分流行的性教育书《年轻男子应当具有的知识》，才认识到了错误。他把这本书买回去读，看看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他还写到他父亲对性只字不谈，大人们都说这样对他有好处。）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早期德国曾出过一本反对手淫的小册子。这本书后来不断重印，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读过这本小册子后，明白了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可怕的罪行，应当感到罪过。基赫特·卡尔·卡普弗主教（Bishop Sixt Karl Kapff）的这本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连几年，奥古斯特都在备受良心的折磨。提索告诉我们，《手淫》的出版引发了潮水般的读者来信。他留下的档案资料证实了这一说法。来信者有的感觉疲倦，有的起了小脓包，有的出汗，有的患上了各类心血管疾病。在作者看来，这些全都是由童年时期养成了“声名狼藉的习惯”而造成的。读者们期待着从书中找到自我诊疗的线索，因为他们所受的苦皆来自手淫。《手淫》一书中重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据他们说，他们最初是在报纸广告上得知手淫是一种罪恶的。接着，他们便决心（有时是三次四次痛下决心）买来这本书，从而了解更多。几个世纪以来，这始终是一种带有书卷气息的罪恶。[349]

不过这一切又有其另外一面。手淫所具有的危险标志，私下里的阅读也有：这种阅读是私人的、秘密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这种阅读还需要专注于想像、自我吸引以及对社会约束的逃避。私下里读书的人即便尚未自给自足，也有相当的自主，至少在私下里读书时是这样。现代作家们对此十分明确。小说家约瑟夫·斯科沃莱奇（Joseph Skvorecky）曾描述过小时候躺在被窝里看书的情景。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孩子们是不允许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他躲在毯子下面，“身子蜷缩成一团……沉醉于读啊读啊读啊的快乐之中……最终在快乐中筋疲力尽，就睡着了”。科莱特（Colette）也曾滔滔不绝地谈起过小时候躺在床上偷偷地看小说时得到的真切快感。但是，私下阅读与私下快乐之间的联系，还可以追诉到更加久远的年代。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那位失眠的淑女就认为，私下里看看书比下棋有意思多了。1703年，天主教教育家、圣徒式人物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Jean-Baptiste de la Salle）曾经告诫人们，不要模仿那些在床上“忙着看书或是看别的什么的人”。[350]

私下里阅读令人浮想联翩的文学作品是危险的，对这种危险进行警告当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或许可以把这种阅读更准确地描述为：在远离光天化日、远离公众监督的地方进行的危险阅读。）但丁的《神曲》第5篇中有这样的诗行：“我们为了消遣，共同阅读朗斯洛怎样被爱所俘虏的故事；只有我们俩在一起，全无一点疑惧。”（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译者注）弗兰奇斯卡用这些话回答了“爱通过什么迹象、什么方式使你们明白了彼此心里朦胧的欲望？”（同上）这一问题。

那次阅读使我们的目光屡屡相遇，

彼此相顾失色，

但是使我们无法抵抗的，

只是书中的一点。

当我们读到那渴望吻到的微笑的嘴

被这样一位情人亲吻时，

这个永远不会和我分离的人就全身颤抖着亲我的嘴。

这本书和写书的人就是我们的加勒奥托。 [351]

（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译者注）

很明显，这两位所读的东西，作用非常重要。两人在私下里一同看书时的亲昵，促成了两人之间进一步的亲昵。换句话说，私下里的阅读是产生亲昵的途径，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如此。在个人与社会这个天平上，它总是偏向一端，字一行为自身就形成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与阅读的内容无关。随着私下里阅读的不断普及，这一威胁也日益紧迫。

这类阅读行为与私下里的罪行之间的联系，展现在了同代人的面前。18世纪中期的一本关于如何治疗手淫病的小册子建议人们："不要让病人单独待着，别让他们阅读，也别留出时间让他们思索，因为把他们拖入麻烦的正是这些行为。"提索在向一位同事征询了权威意见之后，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绝不能让病人完全一个人待着……不允许他们冥想、看书、或是做任何占用思维的事情。"原因如下：首先，阅读可形成导致手淫的环境。"懒散及与懒散相适应的活动，比任何事情都险恶，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人倾向于某种特定的思想"。"手淫是应当忘却的记忆"，而书却"可能通过想像唤起那些念头"，并促使读书人把这些念头付诸应用。再者，阅读使手淫病症状更加糟糕：本已虚弱的视力进一步疲劳，本已虚弱的神经进一步紧张。人们怀疑，私下阅读使人陷入私下罪行的危险之中。这一怀疑由来已久，并在私下阅读变得十分普及、变得广为接受时，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私下里的阅读一直被指责为不受监督的乐趣，或许直至这一恶名被电视这一更加拒绝社交的媒体所取代时，才完全得以平反。而今，电视与网络相比，也显得温顺得多。一个人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中，躺在床上，躲在被子里，贪婪地读着书，不被别人所看到。提索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本有一个篇幅很长的脚注，转述了一个"在幻想中憔悴枯萎"的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没有一天不做那自我玷污的事情。其实他完全明白，要想把病治好，就应该一醒来就下地，不能继续待在床上。他不应该再去运动自己的想像力了，而应当下床来，"使自己的身体机器焕发青春"。

[352] 维多利亚时代一些以“上瘾”为研究对象的严肃作者，都将阅读也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他们还向人们提供建议，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让阅读变得对社会有所裨益。赫伯特·麦克斯维尔（Herbert Maxwell）在“为小说而狂热”一文中写道，阅读是件没用的事。除非是出于严肃的目的，边读边写，从而创作出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否则便是在“浪费人生有限的时间资本”。也就是说，如果私下里的阅读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带有某种功利主义目的，那就不算是“上瘾”。在麦克斯维尔的年代，wanker已经成为广为使用的俚语词，意思是“手淫者”，此外，这个词的外延含义还在扩大，任何花费精力专注于没用事情的人，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阿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则在探讨上瘾问题时指出，“阅读带来的罪恶”是为了阅读而阅读造成的后果。奥斯汀认为，阅读可以锻炼想像力，可以使人头脑清醒，这是好事，因为这可以带来社会变革。但总的问题在于，阅读任何东西都与手淫存在潜在的相似性：漫无目的，仅为乐趣而为之。[353]

也有人称，不是阅读导致了手淫，也不是阅读上瘾等同于手淫（如麦克斯维尔和奥斯汀所述），而是“阅读病”与手淫病或多或少是同一回事，拥有共同的成因。例如，19世纪美国雄辩的精神病医生埃萨克·雷（Isaac Ray）似乎就说过，其实阅读任何虚构作品差不多都会激起指想像，哪怕所读之书并未充斥明显的性题材也依然如此。读者会像手淫者一样中病，想像力对二者都会产生感染。接着，二者联合产生病状，使彼此的情形更加糟糕。雷写道：年轻人的头脑“由于不断充斥着青少年读物而变得衰弱”，因而“意识不到任何成年男子应当具有的想法”。书籍“以幻想勾引男孩的感触”，通过引诱使男孩“在身体上和灵魂上都放荡起来”。“猛烈的思想情绪震颤着传遍全身”，身体与头脑共同作用，很快他就觉得想手淫了，在这种引领下，他事实上是会这么做的。手淫似乎是更坏的文学的侍女，这些更坏的文学作品具有“降低人格的效应”，这种效应“时不时地伴有自我放纵的习惯”。[354]

雷并不是持此观点的惟一人士。一些重要的美国教育专家认为，无所不包的阅读具有使男人女性化的倾向。具体地说，如果阅读这一具有潜在功效的行为得不到细致的规范，就很容易转而导致手淫。20世纪初的优生学运动拾起了这些题目。一位作者在论及如何延续种族的力量时，小心翼翼地指出，有的男孩或女孩“厌恶正常的青少年所需要、所喜爱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他（她）们喜欢待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书或空想，“这种倾向是手淫与心理手淫的标志”。[355] 弗洛伊德在美国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曾经注意到，有些男孩和女孩是在阅读时开始手淫的，而他（她）们所读的书并不一定与色情有关：《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野蛮场面会促使男孩手淫，而女孩在读过一些施虐、受虐的情节后，也明显会诉诸手淫。nerd（蠢货）一词即指那些把自己关在自己意识中生活的人，这些人十分有可能变成手淫者。[356] 阅读革命从未完全摆脱阅读导致的罪恶。这场革命将隐私、秘密、独自行乐摆上了这个时代的道德日程。即使是在阅读得到了驯化之后，它那罪恶的孪生兄弟仍继续着自己那无约束的生活。

想像力是独自罪恶中首当其冲的坏蛋，也是18世纪第一项取得重要地位的能力，想像力不仅在18世纪的哲学、伦理学及艺术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也在除最穷的人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想像力的乐趣”代表着民主。与独自性行为不同，这次革命没有明确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阿狄森那篇极富影响力的“想像力或幻想之乐趣”中寻求出点事实。这篇文章发表于1712年，阿狄森在文中说，乐趣产生于对现实中的可视物体的思索，也可以产生于对代表物体的符号（包括图片、雕像、词语）的回忆过程。（“想像力”与“幻想”这两个术语，阿狄森基本上交替着使用的，这两个词都至少可追溯到奥古斯丁的作品中。奥古斯丁使用“想像力”和“幻想”来表示对同一事物的两种描述。前者指在头脑中重现已不在面前的事物的能力。后者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是指“头脑在自由状态中的轻浮、轻快的打趣式行为”。）[357] 想像力是手淫的罪恶精灵，无论想像对象在与不在，都可为自我所唤。这就使其成为该世纪最受赞颂、最富内涵的能力。

想像力在18世纪的思想中随处可见：从经济与信贷，到理智与道德，再到认识论与美学，在各类讨论中均可见到。很明显，想像力已经成为现代人文的核心，成为与革新、变化与自由密切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绝对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具有吸引力：

我们的想像力喜欢用物体来填充。……人的头脑天生会憎恶那些试图约束它的东西。当视野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时，头脑就极易于在幽禁中展开幻想。……每件新鲜的事物、不同寻常的事物，都会在想像中激发快乐。[358]

阿狄森所考虑的当然不是《手淫》所警告的那种“屈从于肮脏想像的”快乐。尽管他的这篇文章与约翰·马尔顿那本教育性不太强的书几乎同时问世，但阿狄森在这样一篇高雅的文章中，恐怕想也没曾想过那种问题。不过对想像力的这类理解传播得很快，这使独自性行为的问题在道德上变得十分急迫。在这篇文章中，以及在经济学的文献中，这一新生的秘密罪行逐渐被拿来解释个体主义与自由的局限。这种局限极为关键，并且很危险。

想像力曾经是千真万确的二流能力。往好处说，至多可调节感受与理性，尚有一定用处；往坏处说，最糟可使人分不清表象与现实，十分危险。至于18世纪、19世纪想像力是如何由这样的二流能力变为一种荣耀的，其他书中早已大书特书。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这一过程，其结果都是相同的。至浪漫主义时代，旧有的等级地位已完全颠倒过来：1821年，雪莱（Shelley）在《诗辩》中写道：“理性与想像力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影子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此时的大多数人都已把想像力看做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天才之处。50年后，达尔文亦对其备感欣喜：“它是人类的最高特权之一……是创造灿烂而新潮的成果的能力。”[359]

从次要角色到明星地位，这一演变历程起始于诠释良知、友善，以及由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起的认识论革命对美学的反映。此后，洛克的继承者们还将想像力提升到了与同时代的理性与理解力相当的地位，并回答了相应的一系列问题。想像力在休谟的著作中或许本可以占据很长一章的，但休谟对此问题的观点，前后不尽一致。他已摒弃了想像力作用微乎其微的说法，却认定想像力“是最危险的，且会带来最致命的后果。”将幻想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实都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停下来考虑一下，想像力在休谟、斯密及其他有类似主张的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性如何。对这些哲学家来说，一种行为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须以想像力进行设想；通过一套复杂的情形，想像力使道德行为变为可能。想像力与生理学一道，成为同情心的基础，又被卢梭等反对手淫的人看做道德的基础。在康德的著述中，想像力的份额更大，应为康德对此的看法与以往的人们颇为不同，他认为想像力并非与理性对立，而是理性的感官形式。我们的这一提纲略去了很多相关的话题。[360]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得出问题的答案，那就是通过回顾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众多思想家对想像力的阐述，来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想像力是人的连续体中的中心指导原则，使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建立关联；也有人说想像力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桥梁、身体与意识之间的桥梁；想像力还可定义为艺术欲望与经济欲望之基础；也是哲学美学中新分支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联想主义（抑或是任何经验主义心理学）中理解概念间关联方式的钥匙。凡此种种，举不胜举。这一时期，如果说理性尚未从能力层级的巅峰上完全跌落，那么它最起码也碰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361] 想像力也构成了独自性乐的核心危险，尽管我们很难将这方面的各式各样复杂的定义也一一挑出来，但是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中心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想像力被医生和道德学家们视为手淫的最大问题，而与此同时，却也成为有教养人群的一项基本素质。

要解释这奇怪的一对，我们并不需要拘泥于高知识层的历史。想像力带来的乐趣无处不在，与阅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就是一种激发想像力的虚构作品。人们期望男男女女们通过读小说，学会如何驾驭其同病相怜之感、如何满怀同情地去分享他人的痛苦、如何去感受共同的人性，再笼统点说，就是如何在由爱心和商业共同构成的新世界里航行。小说、想像力以及现代的独自性行为，一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时代伟大的文学体裁，其吸引力恰恰就是诱骗人们手淫的那种吸引力：即诡计与欺骗的乐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说的乐趣就是虚构行为自身的乐趣，因为小说“并非任何真人的故事”：读者被明知是虚构的现实所吸引，在虚构的现实中激动得颤栗着。小说那头绪繁杂而又矫揉造作的世界，比普通的手淫幻想要复杂得多、详细得多。但这“并非任何真人的故事”的诱惑力，却并未比“并非与任何真人发生的性行为”高出很多。[362]

我们现在已准备就绪，可以更多地考虑阅读的内容与体裁的问题了，这些内容与体裁的问题加剧了独自阅读时天然的危险。在围绕如何使想像力文明化的广义讨论中，没有哪个题目比小说和独自阅读小说更加重

要，尤其是女人独自阅读小说的问题，显得最为重要。（朗读小说或在图书馆里看小说尽管不能说是完全安全的，但却从未被视为威胁。因为在公共场所，现实尚有一立锥之地可容身。）如果说“虚构”是一种表现自我的方式，是一种自我喘息的方式，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超越限度的方式、创建边界的方式，那么阅读小说这种特定的虚构形式时的危险就很大了：阅读小说可以建立一种新的自我道德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一方面，人们认为小说不仅应该有趣，而且应该有教育意义。小说中应当品德获胜、罪恶得到应有的报应。例如，帕梅拉在抵御诱惑中取胜，因而得到的善报优于她所拒绝的东西。敏感而有德行的女主人公，和现实生活中有类似品行的女人一样，通过阅读正确的书而表现出高尚的人格。进一步说，就是道德小麦要与谷壳区分开来。评论与期刊开始对小说进行分类，将好的与坏的区分开来、将合理思考与怀疑哲学区分开来。这一体裁成为了实用道德的传播途径，成为了传授感情、爱情与同情的学校，因而总是拥有辩护者，其中就包括既是手淫想像力的鞭挞者、又是手淫想像力的受害者的卢梭。简言之，小说对文明社会的形成绝对关键，这一时代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狂热、情感（或上瘾）以及阅读病在当时随处可见，因为没有哪个女人的房间里缺了印刷品，也很少有哪个工作者的住处没有印刷品。于是乎，无论刮起什么样的邪风，小说文学都会帮助人们在邪风中恪守道德。[363]

不过，依然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小说头上。这片乌云也同样笼罩着独自性行为。人们很可能会放弃现实，投身于浪费之中、虚幻之中。提索将这一危险置于手淫的核心。同样，“小说主义”的批评者们也十分关注这一危险。《批判评论》是一份旨在筛选好坏小说的期刊，该刊物称：“农夫的女儿若是坐下来读小说，就是在浪费时间。”她应当干些“现实中的活”才对。（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将手淫描述为“自我时间的最高象征”。）小说和手淫一样，为女人创造了另类的“枕边伴侣”；小说和手淫一样，煽动了年轻人的激情，促使妓女的数量有所增加。18世纪多产的城市文学作家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说：“最能诱骗女人心的，莫过于小说。女人看小说，接着便融化了，变得唉声叹气。”简言之，小说就像流里流气的口哨、脏话满篇的交谈一样，使女人性欲大开、忘掉尊严，教唆她们进行各种各样不正常的性行为。而小说创作，尤其是专门面向女性的小说创作，总是围绕着一个卖淫荡妇而展开：文学中的公共女人，与真正的公共女人是何其的像。[364]

阅读小说与手淫在道德病理生理方面同样十分相似。许多疾病的起因正是由于想像力得到了不正当的锻炼。想像力具有逼真的、直接的、纯粹的吸引力，可将浩劫发泄至神经及其所能触及的各处。18世纪，想像力造就了领域宽广、数量庞大的作品，其中包括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方面，威力巨大。如孔狄亚克（Condillac）所言，想像力“可唤醒知觉本身”，而记忆却只能“使符号重现”。想像力具有创造力，但却与事实相悖，可以“任随乐趣而进行重新组合”。想像力可以搞各式各样的诡计来

布置我们的思维，使之“与事实相抵触”，这条路的终点即为发疯。因此，想像力是思维中的一种可怕的能力，是虚弱的一环。孔狄亚克认为，“渐渐地，我们会把各种妄想都当做现实”，阅读小说的危险即在于此。特别是对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辨不清现实与虚构的女孩子来说，尤其危险。[365]

小说的问题所在以及手淫的问题所在，其实并非是由于那些关注于读虚构故事的人、关注于自我色情刺激的人不懂得（或不能正确认识）幻想的本体论地位。尽管有的人会时不时有所表现，似乎小说中的人物、幻想中的欲望对象确实存在一般，但谁也不会一口咬定这些人物、对象确实存在。孔狄亚克的意思是说，小说中的人物、手淫幻想中的人物，其本质都是虚构的，但却显得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性伴侣更真实、更刺激、更煽情。其他道德学家也有类似的忧虑。总之，想像力使上述问题更易发生、更易失控。危险就在于小说中、虚幻中的表现过度，渐渐排挤了正常思维自身的内在约束结构。

现在，手淫在阅读领域已取得了坚固的地位。亚历山大·克里奇顿（Alexander Crichton）是第一位研究酗酒的理论家。1799年他曾指出，精神错乱的产生是由于“引发想像力的原因”导致“象征能力进行了比例失调的活动”。也就是说，虚构能力活动过于频繁，导致了“强烈的情感”。这种错乱不仅包括宗教狂想，还包括手淫疯狂。提索曾援引摩拉维亚一位精神病患者的例子来说明前者，而后者则是指小说读者中的精神疾病以及由神经刺激过度而引起的其他疾病。

如果阅读会导致肉体上的后果，那么手淫所带来的更明显的精神兴奋就不会被肉体所忽略。1802年，托马斯·贝多斯（Thomas Beddoes）严厉批评了“与宪法精神想悖的书……以及使理智更加病入膏肓的小说”。他是位激进的医生、化学家，是启蒙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浪漫主义诗人贝多斯的父亲。他认为流动图书馆导致了多种病症，因为“某些观念力量巨大，无需解释就可以激起器官的欲望”。戏剧作家理查德·谢立丹（Richard Sheridan）也将流动图书馆视为“魔鬼知识的常青树”。《新爱洛丝》的读者给作者卢梭写信，讲述自己“叹息与折磨”的经历，讲述他们的心“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讲述他们扑到床上几乎发疯，讲述他们由于小说中的痛苦而哭泣、抽搐以至于不得不把书放下。手淫和小说因此有着共同的运作机制。柯尔律治认为阅读小说会“引起思维力量的彻底崩溃”。一位18世纪的评论家则认为，小说以一种“病态的理智”毒害人们的头脑，即小说会使头脑在情绪、情感、与刺激的面前变得敏锐而脆弱。小说与头脑的关系，“就好比少量的酒与身体的关系那样”。小说“对人体器官产生影响”，“使神经状况变得松懈”。小说与音乐一道，“已经给受过教育的女性带来了病弱的面容、神经质的生活习惯”。这已经十分接近手淫疾病了。我们还可以把《卫理会杂志》中的术语“小说主义”加进去。所谓的“小说主义”造就了空虚的面容、不断厌倦的想像力。我们可以再次使用前面曾用过的评价：小说成了另类的“枕边伴侣”，与另外一些事情一道“挑逗着女人的想像力”，使她们难以满足，从而毁掉了其人生。这样看来，小说主义已经与同时代的手淫十分相近

了。小说主义与俄南主义一样，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其主人公并不存在，却似真的存在一般令人兴奋。二者都给人们带来欲望。尽管二者有那么多的相同点，其不同之处在于，小说毕竟有其优点，而手淫则没有任何优点可言。[366]

那些沉溺于手淫的人，“受伤良知在遭受着烦恼与痛苦”，与这一新现象同时诞生的还有促使人们手淫的想像文学、手淫产生的罪孽感以及使人安全幻想的补救措施等。《手淫》开始在道德方面夸夸其谈，但很快就改用了书信体模式。一版又一版的《手淫》因信件而出现，其《补遗本》亦是如此。这些新版本寻觅着充满17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杂志的有关爱情、婚姻、忏悔等问题的来信。例如，“一位出身贫寒年轻的女子”在致《淑女墨丘利》的来信中写到：“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被人勾引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美丽的灵魂，失去了我的荣耀，我把灵魂与荣耀献给了利弗勒这个淫荡、无耻的家伙。我和他一起偷偷地干那邪恶、见不得人的勾当，已经有12个月了。”她还说，这段丑事过去之后，她嫁给了一个“最为热情的男人”。那个男人很值得爱，很可敬，很有钱，也很有德行。但是，她却每天都会上百次地被“悔恨的记忆”所折磨。如若不是这一罪恶的困扰，她会生活得十分幸福的。这不仅仅是个“欺瞒与玷污”的问题，她带上婚姻之床的是更加严重的欺骗行为：“我做了最肮脏卑鄙的事。与他在一起的夜里，本来应当充满纯真的快乐。而我，却在这最可贵的场景里塞满了最虚假的东西。”也就是说，她在冒充处女。怎么办呢？[367] 其实，这篇文字出自自称为妇女事业而献身的男人们之笔，实可算作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学创作：带有窥淫色彩，严肃而又淫秽，却又不失其教化论调，十分逼真却又明显为虚构。里面的论调与《手淫》以及早期小说如出一辙。这类文字的主旨在于教化，至于乐趣，里面仅有一丁点而已。

手淫的雏形文本可上溯到新闻印刷品，小说也是从这类新闻印刷品发展而来的。此雏形文本同样也预示着18世纪小说中勾引及潜在勾引场景的出现，这类小说普遍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即使是约翰·克里兰（John Cleland）的小说《范妮·希尔》中的女主人公范妮这样的人，在故事结局时也找到了真爱，实现了一夫一妻。她在《手淫》中的祖先恐怕并未发展得这么完善。马尔顿把《手淫》中这个女人的邪恶刻画得像小说一般详尽，而这个女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了错误。写信者在一封长信中坦言，11岁时就有人告诉过她“手淫行为的愚蠢”。（准确地讲，她其实应该说是有人教会了她手淫行为。至于其危害，她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与范妮类似，她也曾经与女人同床，那个女人调起了她的性乐。与范妮类似，这种行为不仅仅发生在一两个晚上，而是整整七年！不过与范妮不同的是，她后来并未转向男人的怀抱，而是和她的女仆实践了“我们所能够采用的一切方式，来使这种挑逗达到高潮，使罪孽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受的是古典式的教育。她自称倘若多读些圣经，少读些尤维纳利、奥维德、或是马提雅尔的书，她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而她的女仆则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蛊惑，觉得她们可以用“手指或其他工具”使自己得到“一点小小的交媾快乐”。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写这封信的人所指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亚里士多德这个人，还

包括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书的作者。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这本书一直是或对或错的性信息的主要来源。）多年之后她招认，她的阴蒂已粗如拇指。她问医生："怎么办啊？"马尔顿医生的回答是不用急，去读一读卡尔医生关于两个修女的记述吧。在这份不断重印的记述中，两个修女据说是阴阳人，但其实是由于手淫及同性恋摩擦过多而导致了阴蒂肿大。[368]

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马尔顿的故事中淫秽的一面。这些小说式的片断的目的是教育人们恪守品德，至少表面上如此。后来的作者们秉承了这一精神。一版又一版的《手淫》犹如一部书信体小说，成了最为文学化的产品，通过信的形式揭示着隐秘，充满了对秘密的细致刻画，也不乏无关紧要的华丽辞藻。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为品德的树立而服务。这些信的作者都是些被公认为畸形的人，塑造此类人物的目的则是使人们对这种罪行产生恐惧，而在当时也很有可能达到了这一目的。各类作家也都在讲类似的故事，都在制造恐惧。他们制造的恐怖氛围比起马尔顿要大得多。马尔顿的话题有着悠久的历史，近现代的日记文学、医疗文献，都记载了一种恐惧：是否有过手淫，可以从生殖器上看出。是否有过手淫逃不过医生的感觉，因此，手淫者自以为这种罪行是秘密的，而实际上却可以清楚地在其身体上体现出来。

提索对这一切十分清楚，于是便犹如文学评论家一般对《手淫》进行了评析。这本书充满了"十足的混乱"，他称摘要中略去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最能代表手淫受害者"生动、可怜的痛苦之言与忏悔之言"。但他同时提醒读者，这些言语都是无比真实的，会"给人留下深刻无比的印象"。后人评论提索时也相应地拾起了这些主题。有个叫M.德·里尼亚克（M.de Lignac）的人写了一部十分成功的书，从婚姻的角度谈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别。他赞扬了提索，因为提索使读者"因恐惧而颤栗"，实为描绘了"可怕图景"的"大师"，从而"有效地接近了读者"。提索《论时尚者的错乱》的译者在导言中说，这本书"简直可以称为医学小说。规诫写得十分让人接受，描述进行得既自然又深刻，例子举得十分切题。每个有情感的人都会悟出其中的幻想驰骋"。休谟博士在翻译与该配套的《论手淫》时，本来也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评论。[369]

至于以火攻火——即用最具想像力的医学书籍来消灭想像力的危险——谁的想法也不如德·边维尔（D.T.de Bienville）深入。他是位医生，正是由于他的天才，我们得知什么叫"慕男狂"，如果说他不是位伟大的医生，他却的确是位巧妙的词语锤炼者，又知晓受虐的快乐。他声称他的书对年轻人的想像力充满吸引力，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却是吓唬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他坚持认为，小说无疑是诱发病态想像力并导致手淫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小说同样也是一种治疗手段。他写到，"熟读小说"以及"欣赏淫秽图画、色情歌曲，与勾引少女的男人谈话、接受其抚摸"均可激起年轻姑娘的欲望。但主要问题是，小说的内容以及小说传播的社会环境，激起了小说所要引导的欲望。（边维尔不需要米歇尔·福柯来告诉他，可以创造欲望用以控制欲望。）他所塑造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充满过多刺激的现代社会中，阅读着无回报

的爱情、饱受阻挠的婚姻、踌躇满志的父母，以及邪恶的仆人。读着读着，最终走向堕落。败坏之菌随着阅读而强大起来，阅读引诱着这类女主人公“一有机会就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屈从于欲望的本性。 [370]

这一方子也是一服毒药。小说这种“温柔而色情的”作品“可真是个好方子”！小说“犹如凸透镜，将太阳光收集起来，其目的是把光线聚拢到一点放火”。面对这些剖析细致的论述，我们毫不惊讶女仆伯顿（Berton）竟然教她看护的孩子手淫。（两个世纪以来关于手淫的记录显示，使男孩、女孩学会手淫的人当中，仆人位居第二，仅次于同学。居于第三位的是自我发现。）

这一切看似色情，但我们却得良性地解释这一故事。这其实是个道德故事，我们这位反面女主人公的结局很糟糕。朱丽的情感因色情的想像力而变得更加激动，这种想像力已扭曲变形、失去控制，已不需要他人肉体的作用，已不需要真实爱人的生理存在。她变得空前病弱；请来的医生告诉她父母，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允许朱丽和她的所谓的男友圣阿尔班见面。他们拒绝了。又一位医生被请来了；而朱丽病得更重了；父母吓坏了，因为他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女儿竟然手淫。她在假想中为自己塑造了理想的恋人，固然无法得到爱，因此发了高烧。他们将她驱逐出门。这种被称为慕男狂的奇怪疾病萦绕在18世纪的小说中，十分流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却又死不了。书也好，手也罢，激起的是同一部位的欲望。这部小说首创了手淫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最终导致了纵欲成疾。这部小说也提供了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边维尔的书终究是医学想像之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意识的小说，讲的是警告式的故事，也展示了治疗疾病的方法。

简单地说，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写反对手淫的书，是希望这些书能像小说那样创建起新时代的新道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医学作品，这种题材使规矩变成了小说的形式，而小说的形式最能清楚地展现它所竭力反对的手淫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反对手淫的小册子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小说可以加以驯化，用来为社会所认可的爱而服务。

但是，在更公开的场合，手淫却明显与未经驯化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基本上与艺术、宗教及政治中的幻象问题相联系。在18世纪，这一切又有其独体的历史。手淫文化史与8世纪的历史并肩发展，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核心问题——不受约束的想像力以及非社会化的欲望。我们可以把问题指向有关如何使艺术创作文明化的辩论：例如，如何使艺术创作更接近理性工作，而非充满激情的想像。边维尔的作品中有些慕男狂式的手淫女人，通过想像力可以皮格马利翁似的把她的恋人变成阿多尼斯（确切地说是把武尔坎［Vulcan］式的男人变成阿多尼斯）。作品中这类女人应该少一些才好。男性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建立在与此不同的秩序上，作品应当多一些这样热情才对。 [371] 狂想（Schw?rmerei）代表的是一种错乱，是最令18世纪的德国思想家们担忧的问题。狂想使人们

把“小说”误当做真实的事情，使人们受到自身的迷惑，坠入形形色色的虚假预言中。无论这些虚假预言是世俗的还是渎神的，都已十分接近手淫。（这个德语词的英语同义词应当是“热情”[enthusiasm]，可追溯至17世纪的革命共鸣。）据认为，狂想与手淫一样，由衰弱的神经以及受压抑的性驱动力而引起，与其他一些现象有着共同的文化环境。对狂想持敌对态度的人把阅读小说带来的狂躁使为情绪过剩者的标志。这种情绪过剩的主观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新教的痛疾。人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时代是个世俗的时代，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时代里，这一痛疾仍未消亡。一个领域的内省很轻易地污损了其他的领域。[372]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新出现的。人们将小说视为对现实的挑战、对道德的挑战。到1712年为止，这一观念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几千年来，始终有人在雄辩地反对着戏剧性，也有人因受到艺术的诱惑而痛苦地忏悔着。这种审美惟我论的问题即为在幻想中自我专注的危险，这一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年代。这种迷惑在西方文学中的著名例子一直层出不穷。例如，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哀叹道，他为小说中为爱而自杀的迪多深深地悲痛，却未能为现实世界中自己精神的死亡而哭泣。还有更切题的例子：他谴责自己不该因悲痛、怜悯、和快乐（即有害的快乐、肮脏的乐趣）而激动，谴责自己不该分享台上人物的快乐与忧愁。这是一种自我沉湎的情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目的。“看戏的人并不会被唤醒，以帮助他人”，而是绝望地滚入了自己那漫无目的的情绪之中：“对于舞台上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又有什么怜悯可表示呢？”[373]

1712年前后的新事物是：在广袤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想像力的驰骋已失去了其旧时的约束。（事实上，这种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的实质。）手淫这一不可救药的行为成了对这一变革的道德威胁。有些种类的阅读具有教育意义，有些种类的阅读有更为广泛的益处。既非空虚，也非无度。而摩擦生殖器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招致疾病。私下里的罪恶为了其可敬的邻居，成了替罪的羔羊。想像、无度，以及这二者实现所需的隐秘，全部为手淫所承担。手淫被人们所谴责，被逐往文明之外的沙漠中。

至18世纪后期，这些主题在某些圈子反对变革的言辞中渐渐合流。1795年，瑞士保守派狂热人士约翰·格奥尔格·海因茨曼（Johann Georg Heinzmann）写道，那些“秘密阅读”的小说造成的不幸，与法国大革命在公众中酿成的不幸相同。这些不幸培育出了人生中的各类幻象，不仅在政治上危险，而且使男女读者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变得病弱。小说阅读的受害者那些投身于独自罪行的人一样，“因幻想而疯癫”。他们的神经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们那“不经事的心”在暴风骤雨般的焦虑中被撕碎，他们已不再居住在现实世界之中了。男女读者都在冒险故事中屈从于更加自由的想像、更加不净的文学，这一切将他们本已脆弱的灵魂推向了毁灭的边缘。[374]

海因茨曼是个例外。到19世纪初，小说早已被驯化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是否算作分水岭并不怎么重要，但小说已

得到了成功的监督，并且已融入文明社会，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我们所见到的，人们依然可以发现，有人反对小说，反对独自阅读。但小说也好，独自阅读也罢，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控制。然而，手淫仍然可以表明对小说及性行为的控制不利之处，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手淫在文学方面的孪生兄弟——色情作品。

“反对色情作品也就意味着反对手淫。”某位现代的打诨者这样说道。把这话反过来说就是，色情作品基本上是手淫时用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当然不是色情作品的惟一用途，也并非普遍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性别的人、任何性行为。但只要去一下附近的性用品店，甚至书店，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当今二者间的联系。至于手淫网站，就算没有数十万个也数万个，更能说明二者的联系。（用Google搜索手淫一词，可得到157万个结果。少量是关于手淫的，更多的则提供手淫的素材。）手淫意味着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道德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手淫的这一观念的出现，与西方色情作品蔚为壮观的兴起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及心理学背景：即城市、商业、文学等方面基本上都出现了反传统的趋势，放弃以神学权威为基础的传统，而改用自然（其实就是物质世界）作为基础。故事的叙述比纯粹的描写更加吸引人，因此早在《手淫》的前一代时，商业化的色情作品就已经诞生了。

色情作品和手淫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联系。例如，狄德罗的《阿朗贝尔之梦》中那个做梦的人就曾打断物质主义的演说，转而手淫。这在该书中是种受到推崇的行为，且是当着女主人的面进行的。这个人物似乎是在代表着作者说话，就算我们不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在手淫，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参加讨论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波尔多医生（Dr.Bordeu）。他向雷斯比纳斯小姐表示，他坚决反对“狂热者对贞节、自律等的大肆赞扬”，因为在某些时候，这类赞扬在收场时竟确定无疑地认可了秘密罪恶。他解释道，快乐而有用的行为都是高尚的；而既带不来快乐、又没有用处的行为则是低下的。至于快乐本身到底是好还是坏，则毫无意义。她许诺“无论（谈话内容变得）多糟”，她都不会退却，于是他立即问“谈谈秘密快乐如何？”她不由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呼道：“医生！”他却继续说，秘密乐趣其实很高尚、很有趣，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好处。接着，他又抛出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个论据：“如果老加图今天还活着”，即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去手淫，而不会去和妓女发生性关系使自己得病，同样也不会去糟蹋别人那贞节的妻子或姐妹。既然无法得到一个人来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既然无法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又何苦拒绝一种必要而甜美的快乐方式呢？她断言：“我们的这一教条可千万不能教给孩子们。”医生则答道：“就是对成年人也千万别说。”[375]

这已经相当过分，狄德罗对此也十分清楚。即使是他，也不愿意草草地为手淫弄来一个正面的例子。浪荡子们同样也不愿意这样，他们更倾向于跟实实在在的人或物享受无拘束的性爱。手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极端反社会的行为，甚至比色情作品还要坏。有些人认为坏书也时

常会带来点好处。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反教会思想、极端哲学等，都是通过“风流社会”的印刷文化传播的，使高尚的论争与性冒险的故事与图片组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手淫至多也就是贫乏的替代品，用以取代更加社会化的东西。如果反对启蒙思想家的人援引狄德罗写的这件事（或是其他任何可用作引证的事）作为证据，来证明性堕落是启蒙运动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就连最赞同堕落的人也难以对手淫产生热情。

色情作品并非与西方历史的某一阶段有特定联系，也并非一定要成为与独自性行为相联系的可怕的秘密罪恶。另类的现代造就另类的性伦理。我们知道，有些社会欣赏坏书、坏印刷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手淫。还有的社会欣赏不需字画、不需笼罩在道德之云的行为就可获得的刺激。例如，18世纪日本的商业化、城市化、思想活跃的地区，生产了成千上万的“春画”。这种春画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手淫。人们通常认为，男人比女人更易于放纵。但是从日本的浮士绘画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年轻男子一边读书一边手淫、一边看书卷里的画一边手淫。表现这些事情的画同样也不少，一般均无重要的政治含义。虽然成年男子读黄书手淫会被认为是在现实中缺点什么，但也仅此而已。因此，色情作品与手淫在商业文化中共生。控制这种商业文化的，更多是古代调控手淫的性限制法则，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危险罪行这一说。

西方世界可并非如此。在西方，色情作品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伦敦街头，随处都可以买到肮脏的图片、淫秽的歌曲，更不用说那些较为隐晦的医学读物。但是，即使色情作品的销售不是秘密的，其消化吸收也得是秘密的、私下的，不能为官方或宗教监视所触及。色情作品与手淫一样，是反正统的。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曾长期而坚决地反对邪书、反对邪书所带来的危害。据他讲，他曾下定决心要杜绝“一切题目暗示其有可能提供堕落品位食粮的书籍”。那天晚上，他走进一家书店找一本书，但很快便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浏览。他发现了一本可疑的书，便翻开看了看。一种“模糊的、充满危险的好奇”驱使他更加偏离了航向。在散漫地翻了几页之后，他翻开了罗切斯特（Rochester）的诗集，他的决心已经垮塌了下来。他怀着“污秽的同情”读了两首。起初他还竭力劝说自己，这么做无非是了解男人的本性及做事的方式。但是他却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种“邪恶的迷惑”。为了此事，他是手淫了还是鞭挞了自己（此后他在经历诱惑之后都这么做），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毫无疑问，色情作品的确吸引了他，也吸引了他同一阶层的人们。 [376] 色情作品依然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受到那些威胁良好秩序的可疑社会团体的公开支持。这些团体包括青少年、未受监督的学生、不受尊敬的穷人、浪荡公子、启蒙思想家，还有反对教会的那些素质不太高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还包括一些令人生厌的黑社会类型的人。至19世纪末，革命者也包含了进来。色情作品和手淫都存在于启蒙运动以及更广义的近现代化的阴影之中。二者一起代表着意志的薄弱、隐私的危险、想像力、过度超越文化的边缘或过度超越教会的领域。启蒙思想家们总是习惯将这一切描绘为充满颠倒的爱和私下的乐。（例如，狄德罗曾为连祷文写了一篇色情的滑稽仿作，

讲述一位年轻的修女被带到一位女同性恋母亲面前，向她忏悔自己的独自乐趣。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写得异常优秀。）[377]

危险书籍，或者用卢梭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只用一只手来看的书，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激起性幻想、支持手淫。但我所说的色情作品并不只包括这类危险书籍，还包括数量相当的现代想像式小说：即“病态的书……爱情故事、色情对话，以及其他能够激起性欲与淫荡的东西（原文如此）。”《手淫》以及此后两个世纪里反对手淫的作品，均把这些东西视为导致所谓的独自性行为新流行病的一项主要原因。（色情作品在政治方面同样发挥着作用，这一点与我们此处的话题类似，惟一不同在于，政治作用表明手淫总是与颠覆相联系，如果颠覆的不是与人体相关的政治，那也是与人体相关的社会问题、隐私问题。）色情作品是不是真的导致了更多的手淫，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类作品在小说盛行的时代发展极为迅速，这无疑使独自性行为问题在文化上变得更为迫切。

有些坏书几乎不需要想像力，就可以转化为兴奋与手淫。（我这里说的是那些似乎是写给男人看的书；18世纪有些书显然把男女读者都考虑了进去，但是对于女人是如何使用“坏书”的，我们知之甚少。）《女子学校》是第一部带有色情的教育小说，也是第一个充分表现自我性发现的故事。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曾经带着这本书上床睡觉，不过后来又把它烧了，因为他不想让这种垃圾留在他的书房里。这本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女孩告诉另一个女孩她是如何被激起性欲的，性欲又是如何刺激着她去寻找各种性乐的。佩皮斯躺在船上沿泰晤士河而下，他曾竭力想像过去的快乐梦想来得到刺激。而有了这第一部色情“小说”，就不再需要这么费劲了。人们只要紧紧跟随着淫秽的作者，和他一起飘飘然即可。这种小说的取材并不算上乘，却要把它写得既淫秽又刺激，作者需要的正是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也正是这项新的独自罪行的敌人们所痛斥的。创作色情作品，在于发现、在于利用。

“我买亚里士多德的名篇花了一个先令。”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约翰·坎农（John Cannon）在写他17世纪90年代时的童年生活时告诉我们，“我从中窥探到了自然的秘密，尤其是女性的秘密。”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将精巧做爱作为和谐婚姻的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只是在大谈如何成功繁衍后代，坎农还是有点像20世纪的青少年，到玛丽·斯多普斯的《婚后的爱》（Married Love）或是到西奥多·凡·德·费尔德（Theodoor van de Velde）的《理想婚姻》中寻求刺激。亚里士多德的这本书也和20世纪的许多书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可称得上黄色的东西，倒是谈了很多道德规劝方面的话。——“急切地追求感官上的满足，会损害高尚力量的锻炼。”但所有这些书确实都谈了那些应当私下里探索秘密事情。坎农说，“淫荡的想法”紧随阅读而来。这种阅读驱使他在厕所与毗邻房间之间的墙上钻了个孔，用来偷看女仆“做那事”，可以“平静地看着那些激起我淫欲的部位”。阅读了紧张激动的东西、又偷窥了紧张激动的东西，要满足已唤起的欲望，有时就得“毫无羞愧、不假思索地实践前面提到过的那种蠢事。我的同学们都这么干”。也就是说，坎农手淫了。5年前他11

岁时，从游泳池边一个比他大些的男孩那里学会了如何手淫。[378]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并没有因手淫梦幻而去跟仆人或是跟任何其他女人搞什么“肉体亲密”，但他的确找来了更多坏书。大众读物、健康指南等都是当时爆炸式增长的出版物，自印刷技术出现以来，此类出版物的数量仅次于宗教出版物。这些书似乎提供了无尽的廉价幻想素材。这次，他选择了草药医生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per）的《助产术之书》。（卡尔佩珀是17世纪中期的革命者，是皇家内科医生学院的对头，毕生致力于使更多的人学到知识。）坎农承认，这本书“打开了更深一层的缺口，提供了禁止年轻人知道的自然奥秘”；也就是说，该书成了唤起更多性幻想的材料。但是，他当时有点“过于莽撞”，竟然没有意识到母亲已离他很近。母亲没收了那本书，从此他“再也没能碰上一下”。性欲与好奇在阅读中被放大，在阅读中深深印入脑海；手淫与文本息息相关，其罪恶的地位取决于更加重大的问题：光天化日下的色情作品势如潮水，必须对其加以规范。还有更加重大的问题：有些书和图片有潜在的刺激性，其势犹如海啸一般。

《手淫》、马尔顿的早期作品、提索的《手淫》，以及全体反对手淫的印刷商，全都与过去的忏悔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想压制哪种罪恶，就会把这种罪恶论述得既十分详尽，又十分动人。这类新体裁与忏悔录类似，米歇尔·福柯称之为“对话语的邀请”。这种体裁描述了心理的某一方面，目的是对其进行监控，使其成为新罪恶与新道德的核心。（与忏悔录或忏悔文学不同的是，这些反手淫的东西既非一年一度的应景，也非神父手中的参考指南，而是广泛发行、可随时得到的作品。）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新罪行的紧迫性，并不只是经广义文化现象中的道德紧迫性而出现，而应当说是因广义文化现象中的道德紧迫性而出现：在想像力的新危险中，最无法挽救的部分就是色情作品与独自性行为。

马尔顿在其早期作品《关于所有两性自然、非自然性疾病的综述》中告诉男性读者，他已意识到“女人做那事（指交媾与性乐）的部位十分奇妙”，公众想知道其中的细节。他提供了下列信息：女人知道她们可以通过阴蒂得到快感（阴蒂这个词是他用来“好色地探索隐私话题的词”）；女孩如果找不到男人，则会自我行乐；类似的信息还有很多。因此，这本书遭到了起诉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手淫》则是一本羞羞答答的书，以许多世纪以来的道德建议、忏悔文学的形式出现。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士杰洛米·泰勒（Jeremy Taylor）曾著《神圣的生活》，此前还有过几百部类似的作品。《手淫》似乎是在对这些作品进行肯定的回应。批评家们恐怕会说，手淫“既不该被谈论，也不该被暗示。因为仅提一下它的名字就会对有些人造成危险。如果不提，他们根本连想都想不到手淫”。但是，正因如此，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手淫用不洁的东西装点着蠢人的幻想……我恳求读者就此打住吧，除非他有前列的欲望要做个贞节的人，或者至少要会考虑应不应该手淫。

这段文字究竟是不是在给书中的较为隐晦的性故事做广告呢？这一点我

们不得而知。书中的女校长泪眼汪汪地告诉当地一位绅士的妻子，“她看到学校里有些学者‘用手指’手淫，她感到震惊，并制止过这种行为。”书中那些被罪孽感折磨着的男孩子们写道：他们已无法戒除手淫，只得祈祷，希望得到治愈痤疮和羞怯的药。书中的一位教士还描述了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手淫致死的情景（女青年死于子宫狂，此病系发展中尚未定型的慕男狂）。作者其实承认，有些牵强的有可能是假的。因此他出版了其他那些信。有的信指责他鼓励了他曾强烈谴责的那一罪行。他的敌人在小册子中对他的淫秽进行了直截了当的谴责，而他在书中却对这些小册子进行了大篇幅的引用。这些均说明，马尔顿在《手淫》中已经表态：“《手淫》是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后来提索的那些更严肃的作品也说明了这一点。[379]

提索满怀歉意地用了三四页的篇幅翻来覆去谈论了同一个问题：他的书与所有谈论道德问题的书处境相同，即很容易被人谴责为“展示了危险，却助长了罪行”。他说，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圣经》也有类似的问题。他还承认，他所期望做的事情用现代语言很难说清楚，但是如果用了拉丁语，读者群就太窄了。《手淫》最初就是用拉丁语出版的。他之所以把这本书写得十分小说化，只是想吓唬读者，使他们恪守品德。简言之，整个这项工程就是在例证知识与启蒙所带来的危险。提索及其同事们早已放弃了神的权威，因而必须依赖于“让年轻人惊得瞪圆眼睛”、让他们看清“危险以及罪恶”，从而避免其人性进一步蜕变，否则会使我们回到“祖先的力量”中。提索的《论文化人、从事久坐职业者偶然患上的疾病》中的那位农民，似乎是提索眼中的理想人物：“他避免了危险的谈话、远离具有诱惑性的东西……因而他的欲望就不那么猛烈。猛烈的欲望常常是多余的幻想造成的结果。”[380] 难怪卢梭会在乡下人中找到类似的同感，也难怪创造新罪恶的人会与其敌人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病态的书……爱情故事、色情对话，以及其他能够激起性欲与淫荡的东西（原文如此）”，其作者均如此，此外还有那些从事色情作品生产的人。

这是一种被文学环境缠住的文学作品。边维尔显得很传统，他谴责了小说在性方面（尤其是手淫方面）的危险：女孩有可能因自然激情而痛苦，但无论自然激情有多么强烈，“当她们读了那种奢侈的小说之后”，激情都会无限增加。“小说最初使其心灵为种种细微情感而作好准备，直至最后，使心灵能够获取各种更为恶劣的激情，使心灵因每一次的色情感触而发光。”应当有点东西来平息这种火焰，这一点不足为奇。但边维尔自己的作品也不乏小说式的细节。他承认，任何站在他的立场上的人都必须贯彻“关乎体面的真正界限”，且不可越轨。但又必须做到清晰而生动：“愿我的笔具有足够的表达力，愿我的色彩足以自然地激起所有恐惧，愿这些恐惧能引起人们对可憎罪行的注意。”他承诺，“极具震撼的图片”以及“惊人的、难以置信的痛苦”足以致富女孩子们。这听上去像是打斗式电影的预告片。边维尔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读者群问题。一方面，《慕男狂》似乎是写给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看的，但却不排除该书会流入年轻女孩的手中——有时是由于父母看管不力，有时甚至是由于“浪荡公子的勾引”。“浪荡公子从不对任何阴谋诡计感到困惑，总能从中获取立足之地。”他几乎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作品是色情作品。不过，如果哪个

年轻女孩弄到了一本，最可能发生的事是：这本书中得来的不甚成熟的知识会让她觉察到“自己本性的脆弱”。她还会觉得，如果自己步了书中受害者的后尘，就会“必然受到损害”。没错，边维尔还承认，“这本书（指《慕男狂》）会使年轻男子比另一种性别的人（女人）更加兴奋”，但是他们不应该陷进去。除非他们觉得只有女人才会因手淫而受苦，否则就应当再读读提索先生的书作为解毒剂。提索“吓人的印象……加上强有力的表达”，足以把他们拉回正道上。 [381] 显然，18世纪的反手淫杰作十分接近小说，尤其十分接近色情作品，而他们却将手淫流行病的主要嫌疑归为色情作品。

但是，此处有点麻烦。如果手淫是想像力的罪恶精灵，那么色情作品就是想像式小说的道德深渊，就是整个家族潜在的坏种子。18世纪，色情作品这类小说其实代表了文学力量中最纯粹的方式，它唤醒了想像力，并使这一文学体裁触及了身体。后来，色情作品从小说家族的族谱上无声无息地被人忽略掉了。我们知道，如果说卢梭的小说使人的身体深深地颤抖，那么18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称之为色情作品的书则会产生更加震撼的效果。对于美术作品，我们或许可以下相同的结论。自从古典时期起，人们就已知道艺术表现具有激发情欲的作用，如男人们在冰冷的大理石雕像上手淫。而公开激发情欲本身甚至就可以成为高雅艺术作品的内容，这一点同样十分明确。欣赏明显带有色情的图片仅仅是这类欣赏活动的底线：那就是艺术所需要的激情，不会自动变为审美冷漠。或许这一切都仅在男人视角下才算正确：男人们积极地凝视着女人的画像，使女人成为自己的。许多文学性质的色情蜜饯都以男性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力量为主题。男人欣赏着画中读着浪漫传奇、为性所吸引的女人，在画外为自己创造淫秽的空间。而女人呢，只是被动地与看画者打成一片而已。 [382]

其实，对于18世纪及18世纪以后女人与图画的关系、女人与色情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边维尔暗示，女人们也同样色迷迷地对他那本可能会变成黄书的医学书显现出兴趣。）好奇女孩的形象，在直白的淫秽文学中、在广为谈论的反手淫小册子中，其地位都十分重要。不妨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这种形象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客体方面（即男人的视角），二是认识方面（即女人的视角）。很难确定不同的欣赏者会如何审视一幅图片，很难确定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什么样的欣赏位置，同样很难知道他们从有利条件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性乐。我们确知的是，看图的能力、从图中得出淫秽或非淫秽的含义的能力，均为想像力的行为，均已为18世纪的人们理解。看的力量之中蕴涵着想像的力量。我们还知道，当今的女人声称他们也在创造色情作品、欣赏色情作品，并且这种创造与欣赏是对更广泛的性自治、个人自治的一部分，也是女权主义政治中受争议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会更为详细地探讨。 [383]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男人（以及部分女人）认为女人是典型的专注型读者。这种读者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说中想像力的驰骋中去。并且我们知道，较为极端的情形是：女人读着特别刺激的什么东西，这东

西使她们手淫。女人到底是不是小说的主要读者？我们不太清楚。但基本可以肯定，她们不是。她们手淫像男人一样多还是像男人一样少？这一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她们读小说时的手淫比男人多、比男人少、还是和男人一样。但我们的确知道，女性手淫者就是海报上进行着独自性行为的女孩，除了欲望和里比多式的乐趣之外，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女性读者也和她们一样，是小说中潜藏着的道德污染的黄金标准。她是受了误导的读者，卓越而超群。她又是被深深吸引的读者，是想像力过剩的典型牺牲品。她还代表着“文学市场而非文学大众”，是完美的手淫者。[384] 在女性抚摸自己身体的淫秽色情图片中，这些威胁被合并到了一处。

孟德维尔再次表现出了先见之明。他设想出了一位在生理上投入的读者。与那些看完小说就写信向卢梭倾吐自己的泪水与心跳的人相比，她处于一种不那么纯洁的环境中。小说具有勾引性，在缺乏情人之时，女人会被迫做些她们所能做的事情。在一处对话中，安东尼娅正在阅读剧本和传奇，她任自己的幻想游荡着。吕辛达建议，既然她已经“热烈地”堕落了，就莫不如将双腿相互夹紧，再用尽全部力量将大腿夹紧，反复进行15分钟。这一技巧，孟德维尔似乎是从他的同代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所著的《爱情学校》中学来的。男人在幻想着女人的阅读、自我专注、性欲望以及手淫，而不是在关心自己的那些东西。这一倾向大体可以追溯到《手淫》的那个年代。[385]

17世纪后期以前，美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女人（男人也一样）的阅读，是项安全的活动。有时我们可以在画中看到专注于营生的男人，有时画中的书仅仅是个陪衬，用来表明虔诚或钻研。例如，医生或学者拿着一本书，或是女人在读弥撒书。有时书是寓言的一部分，如圣母与耶稣、《圣经》在一起，旁边还有构成肉体的字、书页上的字等等。如果说阅读还可以被描述成具有吸引力的东西、超乎自然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在描绘精灵的世界：一个专心致志研读《圣经》的形象。我们很少会在这类美术作品中看到阅读世俗书籍的场面，但如果画中人物读的真是世俗是书，那么他们就不会埋头于书页中，而是会向画外凝望着我们。有时，如伦勃朗（Rembrandt）所画的母亲阅读图那样，画中的人物太老。按照常规标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与性相关的角色。她所读的东西同样也很安全：地图、图表之类。这一切都在17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

17世纪的荷兰美术作品中开始向我们提供大量出神凝视着文本的资产阶级女性，这种文本常常是信件。这种艺术品自身就是一种新事物；在早先的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男人在读信。对女人来说，“这些以信为主题的画里，爱弥漫在空气中”。杰拉尔德·泰尔·波尔赫（Gerard Ter Borch）的《读信的淑女》[5] 可作为例子：画中的淑女在读信的过程中，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类似的画中，部分暗示了危险的存在。使人觉得信中除了感伤之外还会有更多的东西流露出来。读信者的眼神柔和而专注，暗示着一种拘谨却又温柔的情感。这类描述忘我的阅读的画中，很少会刻画男人。尽管经常有人指责这类阅读不健康，但我们却可以推

断，男人的确也会专注地读信，只不过读的是些与工作相关的、公开的、外向型的东西罢了。到18世纪为止，女人的形象即完全成了这个样子：懒洋洋地躺在奢侈、肉欲的环境里，沉溺于她们的小书世界之中，但是画中并不把性乐趣明确展示出来。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回忆》 [6] 是个很好的例证，他的《情书》同样也不错。布歇（Boucher）的《沙发上的淑女》、格勒兹（Greuze）的《熟睡的淑女》 [7]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但相对来说向欣赏者展示的淫秽乐趣多了一些。女主人公的胳膊放在书上，大腿上坐着一只小狗，这是18世纪美术作品中表示性乐趣的通用标志。 [386]

这种美术传统演变为了明显的色情作品：女人一边看书，一边狂喜地手淫。（对男人沉溺于自体性行为的刻画，仅见于一些反对教会生活的作品，描述那些缺乏性生活的教士或色鬼。“真正的”男人并不出现在这类美术记载中。）这类作品揭示了女人的挑逗，也解释了女人的危险。其作者为男性，这一点确定无疑。至于其欣赏者，尽管会有点不同意见，但也基本上为男性。画中的女人激情饱满地独自阅读着，在想像力中寻欢作乐。艾萨克·克雷克尚克（Isaac Cruikshank）的《奢华》（Luxury） [8] 对这一主题揭示得绝佳：这间布置讲究的屋子里物品极为丰富，壁炉架上有丘比特的雕像，温暖的炉火烘烤着女主人公那裸露的后背。屋子的一侧是长沙发，桌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另一本书是马修·格里高里·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教士》，这本书讲的是哥特式的悲怆与性虐待的故事。她的左手拇指压着的或许是一段生动的描写，左胳膊顺着那宽大的无袖内衣而垂着，尽可能袒露出她那饱满的胸部。她的右手在衣服下面手淫。一只很刁的宠物小狗四腿朝天地躺着（其实看不出它的性别），似乎试图从她的裙子往上看，它或许并不只是因为受到整个性兴奋场面的影响才这么做的。 [387] 版画《中午之热》、《独自一人的快乐》都取材于皮埃尔—安托万·博杜安（Pierre-Antoine Baudouin）的树胶水彩画，此处要表达的信息同样十分清楚。画中书从女人的手中掉了下来，光线照在手上。《中午之热》中手疲倦无力地垂到了身体一侧，《独自一人的快乐》中的手垂到了两腿之间。她独自入梦，只有一旁的两性青年的古典雕像在凝望着她。这两幅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独自性行为。如果有人对此有疑义，那就一定要看未经删改的版本（《危险的小说》 [9] 中的那个女人超然入梦了，我们不清楚她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充分的乐趣，也不知道她若是看到了床边那个讨厌的男人会不会高兴。男女欣赏者都不会对这个可鄙的家伙感到认同。拉波尔德［Laborde］的《睡着的女人》（The Dormeuse） [10] 中的那位情人更是胆大包天，他走近了他的情妇，欣喜得几乎要昏厥过去。书掉到了她的一边，独自性行为一定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一主题有许多变体，有时还有文字的帮助。例如，克劳德·约瑟夫·多拉（Claude Joseph Dorat）的诗“吻的颂歌”就配有插图 [11] ，极好地解释了法文动词baiser的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吻”，另一重意思是“操”。这幅版画意在为文学中关键的引诱能量注入力量。这种东西对年轻处女有害，会使她们想像得更多，会使她们用手来解决问题。（“安全了，她母亲看不到/唱着歌儿学会什么是吻/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脑子里再现这一切/

快乐而趋近欣喜。”）这些东西对提索来说简直就是最糟糕的噩梦。[388]

至此，如果说缺少艺术矫饰的色情作品尚未准备就绪，那么至少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小步。在《浪荡的进程》[12]中，一位修女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手淫。一方面，这仅仅是一幅攻击教士独身制的画，类似的画自从宗教改革起在新教圈子里就流传着，只是这幅画得过分些而已，并无太大新意。强行搞违背自然的独身制，后果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幅画同时也揭示了手淫所代表的启蒙之危险：阅读的能力不仅可以启智，还可以激起性欲；知识（尤其是关于自我的知识）不仅可以提升人的境界，同样也可以使人被玷污。对手持镜子照生殖器的自由叙述，后来在20世纪后期女权主义关于健康的文献中变得十分强大。这种叙述在浪荡、反教士制以及现代自我创造三者的交叉点上达到了至高。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812年出版的色情漫画《孤独的乐趣》[13]中的主题也与之相同，只是没有反教士制度而已。画中一个女人有所准备地露出了生殖器，为的是独自满足一番；一个假阴茎扔在地上，似乎没什么用处，其实正好相反。她明显是这幅画中欣赏者注意的焦点。欣赏者中包括我们，或许还包括敞开的帘子后面那个好色的男人。

尽管他站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似乎看不见什么，也进不到这一场景之中，但仍然应当把他算进来。此外，还应当把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切的那两尊女性雕像也算进来。这幅色情画无论有多么淫秽，毕竟揭示了一位掌控自己性命运的女人的形象。她玩弄生殖器为的是她自己，这一姿态所获得的政治能量与朱迪·芝加哥的晚宴陈设完全不同。站在对独自性行为发起攻击的那些人的立场上来看，这幅画是个人意志自由的最糟后果。安德雷阿·德·奈尔西亚（Andréa de Nerciat）的《身体内的魔鬼》[14]是18世纪最畅销的色情画之一。这幅画中的裸女凝视着床头柜上一本翻开的书，一只胳膊支撑着头，作出十分快感的姿势，手指头尽管并未放在阴部，但却放在张开的大腿之间。另一只手抚摸着替她手淫的鬈毛狗。

手淫女人身旁翻开的书、掉落的书，象征着文学所带来的乐趣与危险。她读的或许是本充满哲理的色情作品，但也可能只是《项迪传》、《帕梅拉》或者是任何一部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小说。这些小说完全是值得尊敬的，可以激发爱神去传授品德。正如我们所见，在那个纯洁的年代，即使是阅读席勒的作品也有可能激起青春期男孩手淫的欲望。独自性行为与表现独自性行为的图画，均为消费革命、阅读革命以及个人道德自由之广泛文化基础的不可同化的残余，是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巨大储备的表现，也是更大供给的先兆。一旦照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肮脏图片变得十分便宜，这种更大的供给就可实现。（直至今日，反映阅读和手淫的旧图片还有足够的能量，可以使之在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运作。例如，1991年在悉尼大学妇女学系挂着这样一幅海报：一个女人把手放在阴部，眼睛被书所深深吸引，图中的文字框告诉男人们，她即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男人的购买力。）

人们对手淫产生恐惧，其基础已在第四章中被展示了出来，又在本章中得以解释。然而，指代此行为的最为描述式的术语“独自一人所犯下的罪行”却不够清晰。没错，等待手淫者的确实是一种遁世的、秘密的、无助的、悲惨的孤独。然而真正的大问题却是：手淫彻底颠倒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却创建了一套可怕的秩序来取而代之。大群大群自由、不合作、又在某种程度上串通一气的个人出现了，因为他们知道相互之间谁也不需要谁。最可怕的是，手淫者扩展了萨德所难以启齿的“罪恶朋友所构成的群体”，这些人因共同目的而相互支持，而这个共同的目的竟然是漠视他人的感情与需求。

18世纪，孤寂的最有力的两位支持者，又都属于独自性行为的最有力反对者。德国人齐莫尔曼关于此话题的著作在全欧洲乃至新大陆都十分风行，而卢梭的“自然状态说”同样也代表着一种人类堕落前幸福的自由状态。卢梭的观点不如齐默尔曼那么直白，卢梭认为，孤寂中我们向往着已逝去了的纯洁与独立；孤寂中我们意识到那个年代已一去不返，我们前方是社会化的交流、与他人的交换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孤寂中我们还意识到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通过为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最好的东西；最后，孤寂中我们真正懂得了珍惜我们的劳动成果、享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我们实践了我们在孤寂中所学到的东西。但是对于手淫者，情况恰恰相反。手淫者在社会化的世界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是意志自由的人，有自给自足的潜能。孤寂本来应当是纯洁的，他们却将肮脏的秘密带回了孤寂之中，玷污了孤寂。他们的孤寂是个颠倒了的世界。

在同代人看来，小说读者群就是这种颠倒世界的写照：数十万人拿起社会化世界中的垃圾，将其带入内心世界的孤寂密室。 [389] 在启蒙运动前夕，手淫者成了现代自我的挚友、讨厌的坏兄弟、坏姐妹。自此之后一直如此。

但是，随着20世纪初疾病和精神失常的威胁开始减弱，人们对这个总是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有了新的清晰认识。这位不走正道的兄弟演变成了可贵的自立的模范、道德自由的模范、摆脱过分的男权、异性恋的模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讲述的故事。

第六章　20世纪的独自性行为

日本有位妇科专家，曾著有多部性题材的畅销书。1913年，他结束了在德国为期两年的学习回到日本，对德国人手淫问题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他指出，在这一拥有西方动力工厂之美誉的国度，人们并不像日本人那样，“仅仅从道德方面出发”来阻止手淫，而是“进一步使用了科学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而这种科学手段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此领域，德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文献专著”，因此“在德国极少有20岁以上的人仍然手淫。”[390] 然而，我们这位日本观察家却并不知晓，他所目睹的这一切在当时已是日薄西山，此后便不再有人费尽心机地将手淫视为导致身体失调的原因。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认为手淫对公众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观念寿终正寝。大多数医生及患者都已不再相信手淫会致人死亡、伤残或精神失常。诚然，“手淫者的下场”这一俚语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通行，儿童仍然会得到警告：手淫是会付出代价的，如失明、瘫痪、肌体萎缩以及手掌生毛。然而，在医学专家的圈子内，手淫再次被定性为无害。

随着疾病威胁论淡出人们的视线（至少是淡出了公众探讨），文化忧虑论开始盛行起来。人们虽然不再认为自我性行为会威胁健康，但却认为其存在不仅排斥了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本身。过去，人们曾长期认为手淫是对道德秩序的最大挑战，对人类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使文明退化。但现在，对手淫的讨论不再充斥着精神病医院的记录，也不再在各种道德统计数据出现。它最终与各类附加现象实现了分离，也不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手淫代表了文化的崩塌，代表了向最原始欲望的蜕变、向最低级喜悦的蜕变。手淫已不再是脊柱结核、肺结核、盲聋、肌体萎缩的缘由，它现已成为一种崇高的行为。用著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让·拉普朗什（Lean　Laplanche）和J.B.旁达里斯（J.B.Pontailis）的话来说，手淫是一种“为性而性”的行为，没有具体的目标，也不受任何牵绊，完全是纯粹的幻想。弗洛伊德认为，手淫“位于性行为各个层次中的最低端”，不仅仅因为其在历史上出现得最早，更是因为这一行为是最原始蒙昧的、与文明进程的对立是最尖锐的，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手淫“是‘性本能’在自恋阶段的性行为”。即便我们一边手淫，一边想像着自淫活动之外的事情，也无法超越我们自身。[391]

由此可见，从提索和卢梭的时代，到弗洛伊德的自由性学的时代，人们对手淫的看法既有明显的变化，又缺乏明显的变化。那些关于致病的奇谈怪论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套更加繁杂的理论。为什么手淫时的罪恶感是最核心的罪恶感？为什么手淫又是最基本的性行为？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这些繁杂的理论。在这些繁杂理论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代表着文明的著作，使自淫活动中自恋、自动的乐趣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当然，也有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首先指出，手淫行为代表着最高形式的文明；代表着

艺术与创造力的基石。这当然不是弗洛伊德及其同仁们所持的观点。）人们曾对儿童及成人进行恫吓，试图使之停止手淫幻想。这也曾是提索、卢梭及其同仁们公开宣称的目标。这类努力已销声匿迹，但取而代之的是对手淫最初动机的更加详尽的描述：那是一种罪恶，这一罪恶得到了难以想像的成功，“这一罪恶是孩提时代的诡计，是第一种天真幼稚的罪孽”，在此之后，其他各种罪孽会接踵而来。

手淫成了性欲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前线，成了性欲与除了纯快感之外的其他目的之间的冲突前线，成了既充满诗意又极具色情的干细胞，此后的一切淫色均由此发展而来。过去那些低级的恫吓方式，在新世纪已经被更新的方法取代了。例如，良好的养育方式、道德的规劝、对什么是崇高的阐释等，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教育。总之，新世纪的社会舆论导向直指孩子如何健康地长大成人这一话题。罪恶感及其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取代了死亡与精神失常，但是却依然令人恐惧，依然使手淫者认定手淫是一种器质上的变态行为。那种被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称之以“波特诺依的抱怨”的伪病症只能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手淫在性与自我的关系中虽仍然居于关键地位，然而却有了新的使用领域，这一新的使用领域着实令人吃惊。那种认为性及性乐趣的终极目的是生育的旧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遵从。

旧的医学模式死亡，新的心理分析模式兴起，然而故事至此却并未结束。故事还有尾声，展现给人们的是更加激烈的变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手淫就开始存在于先锋派文艺领域。60年代起，手淫成为一种个性解放活动，成为独立自主的宣言，成为对“为了快乐而快乐”的理念的肯定。它不仅成为利用性玩具赚钱的方式，成为新时代文化政治中的策略或反策略，成为绘画及行为艺术的主题，也成为人类在落魄或成功的性爱体验中极为有趣的部分。这些新的理念时而交相辉映，时而相互组合，使手淫这一原本被认定为枯燥乏味的行为身价陡增，无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虚拟世界中都是如此。例如，在我写下这些内容的那一天的晚上5点，同性恋者手淫网站“纽约小子”的访问量已达1073006人次，而与之类似的“小子”网站在全球还有20多个。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不再仅仅信奉手淫所带来的即时快感。遵循着手淫的精神，全国手淫月应运而生[15]。此活动得到了情趣用品制造商“Good Vibration”的资助，将商业获利与社会评论结合于一起。电视上、互联网上、书店中、画廊里，我们的主题随处可见。它不仅出现在女权主义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也出现在男性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出现在同性恋的环境中，也出现在异性恋的环境中；出现在学校的卫生所中，或许也出现在许许多多人的思想中、谈话中。这些人有的热烈拥护这一行为，有的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还有的则对这一行为深恶痛绝。

手淫致病论的持续与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手淫视为导致重大疾病病因的观点逐渐衰落，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解释。首先，具体明确的病原体取代了含糊不清的社会文化因素。19世纪80年代起，细菌理论兴起并取得辉煌成就。截至1900年，人们已十分清楚，结核病等消蚀性疾病是由细菌及器官机能障碍造成的。过去人们曾把这些疾病归咎于手淫行为，这显然是错误的。此外，某些年龄段的人群手淫率较高（或仅仅是被认为手淫率较高），而处于此年龄段的人死亡率却在下降。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幼儿死亡率急剧下降。《拉鲁斯大词典》曾把手淫列为导致幼儿死亡的原因，而在19世纪后期，5—7岁的儿童成千上万地死亡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人的预期寿命也在上升，由此反映出未成年人的夭折率在下降。不仅如此，按人口平均计算，任何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在下降。20世纪初的青少年可以顺利地进入成年、老年。简而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众健康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指数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变化，使夭折问题变得不再像原先那样危急迫切。

对于手淫问题，医学领域的重心也出现了变化，根据这些新变化，手淫导致精神分裂的说法已站不住脚。神经学正在迅速发展，神经学家已经能够对器官机能障碍进行确切的定位，器官病理学也变得更加具体。这时的人们若想找到导致精神分裂的原因，这些新理论显然要比诸如手淫之类的学说更具吸引力。将手淫视为病因的理论，其产生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这一术语直至1868年才出现，其始作俑者是英国心理学家亨利·莫德斯里（Henry Maudsley）。他认为手淫会对大脑造成器官损伤，故使用“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这一术语来指这种损伤。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是莫德斯里所关注的，那就是由手淫导致的精神分裂是如何与精神变质相联系的。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到底是手淫导致了精神变质，还是精神变质导致了手淫？抑或是只对先天脆弱的青年人产生不良影响？这些问题在此理论框架下始终悬而未决。而有关精神变质的讨论，结果大都如此。莫德斯里将这一疾病的本质归结为“犯罪型自我中心主义”。然而，无论莫德斯里的理论有多么新颖，精神病学家并不买他的账。[392]

20世纪早期的精神病学巨匠埃米尔·克莱普林（Emil Kraepelin）断言，只有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器质性病变趋向的人，才存在手淫过度这一说法。如果过度的手淫与精神分裂巧合，那只能说精神疾病与自我刺激二者具有共同的精神变质原因。即使是那些古板一些的精神病医生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完全发病的精神分裂来说，手淫活动也并非其惟一的原因。赫尔曼·诺斯纳吉尔（Hermann Nothnagel）认为，虽然手淫与癫痫症之间存在某种神经学上的联系，然而手淫仅为导致该病的一个次要原因而已。爱得华·希齐格（Eduard Hitzig）是探索大脑电兴奋性的先驱，他的结论是手淫不会引起脑萎缩。而大阿尔伯特·欧伦伯格（Albert Eulenburg）也指出，手淫不会引起肌肉萎缩。手淫导致死亡、加速衰

弱的论断之荒谬已不言自明，以至人们已懒得去证实其错误。总之，截至1900年左右，手淫者（至少是那些阅读了最先进的思想家们著作的手淫者）已不再惧怕手淫会把自己送上轮椅、送入坟墓。

此外，几乎所有具有前瞻精神的性学家及正派的医生都曾指出，对手淫的恐惧被极大地夸张了，并被涂上了一层可怕的色泽。对此大事渲染的是一群毫无道德可言的江湖游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兜售假药、兜售些似是而非的点子。的确，自从《手淫》之后，这些江湖游医们便投身于手淫产业之中，然而到19世纪晚期，世界各地的医学界已积极地与那些见不得人的江湖游医划清界限，即便是在美国、英国等规范秩序产生较晚的国家也不例外。简言之，手淫已落魄。进入19世纪晚期时的医学界，已背弃了一个世纪以来由提索所倡导并捍卫的传统。

但是，将自我性行为与身体虚弱联系起来的观念的消亡过程却很缓慢，其原因有二：第一，对于某一问题，如果人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看法，那么在产生另一种理论来提供完全不同的解释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原有观念的。而在当时，仍然有很多病症轻易无法得到解释，仍然可以被归结为手淫的恶果。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衍生出的各个心理学学派虽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若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若要使人们自孩提以来形成的观念得以转变，尚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手淫存在潜在的伦理问题的观念曾于18世纪初迅速兴起，而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有很强的约束力。几十年来，手淫一直在器质性病变的根源与心理疾病的根源之间盘旋不定，但却始终未被看得无关紧要。原先人们相信，手淫行为可以导致结核病、虚损及精神分裂，而现在虽已无人相信这些谬论，但手淫却又成了罪孽、神经质及个人失败的根源，被解析得更加可怕。20世纪初的一位革新派作家曾专门论述过基督教伦理学，他对病理学几乎毫无兴趣，对托马斯主义中的“自然需求论”同样毫无兴趣。他十分赞同地援引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及其他一些世俗专家的话，对手淫进行了万分雄辩的猛烈抨击。他痛斥手淫为“见不得人的不检点行为”，是“童年与青春最可怕的大敌”。如果父母没能对此加以阻止，则“比远古时代莫洛克的信徒还要不负责任”，不亚于莫洛克的信徒将自己的孩子投入烈焰中焚烧。不检点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扎根并积蓄力量，“人的意志力以及灵魂的高尚成长”将悉数毁灭。 [393]

截至1900年，知情人已经不再会煞有介事地称手淫会导致器质性病变。然而，由于手淫会对精神造成影响，其所代表的道德崩溃似乎仍会对身体造成可怕的后果。因此，尽管手淫致病论已遭否定，但却阴魂不散。就连弗洛伊德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观点：任何类似独自性行为的行为都势必会给人们带来害处，就算没有人们以前想像的那么糟糕，害处终究是有的。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A.A.布里尔（A.A.Brill）写道，手淫“一直是性问题中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没有哪个话题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也没有哪个话题如此“混

乱地被加以或正或误、反复无常的阐释”。这个问题“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几乎每一位文明人的头顶”。尽管当时有很多显赫的性学家对此作出了新的著述，有关手淫的“古老的中世纪观点”不仅仍在外行之中盛传，而且还在大多数医生中盛传。对此，布里尔希望更正人们的观念。[394]

他所要谴责的观点并非“中世纪”的，这一点与我们的想像的不大相同。布里尔曾经引用过某些赫赫有名的专家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持支持态度。然而，那些有关手淫的旧观点之所以会顽固地留存下来，就是由于这些赫赫有名的专家们。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看做是与黑暗作斗争的战士。过去，手淫是堕落，是罪孽，应当受到诅咒。而这些专家们使之进入了令人欣慰的轨道：手淫是医学问题，是自然问题。[395] 他们还对与手淫相联系的疾病加以论述。但这些人（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过来的：他们在青春期时都被告知，手淫是伤及生命的自虐行为。比如，他们都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步入成年。那些年，丹尼尔·戈特里普·施莱伯（Daniel Gottlieb Schreber）医生曾被遵奉为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此人即弗洛伊德那位著名的病人的父亲，他设计了诸多工具及训练法，以阻止儿童进行“隐秘而危险的违规行为”。同样是在那些年，重要的心理学教科书都在信誓旦旦地宣称：26%患有神经疾病的手淫男孩，会以精神彻底分裂而告终。[396] （施莱伯对待他的儿子极为残酷，可谓丧心病狂，然而他却是中产阶级教育学领域的主要人物。）

直到1944年，一位知名的教育学家、畅销书作家在论及种族、性以及生物学等问题时还声称，他在编写教科书时，参照了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人及其性关系》一书，并在该书中发现了一堆年代久远的有关手淫危害健康东西，如干燥脆弱的骨骼、毫无生机的心跳以及不断萎缩的肌体等。[397]

但是，即使暂且不谈此类返祖现象，此话题的激烈争论依然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革新主义者也会时不时地回到一些历史久远的陈词滥调中来。一方面强调手淫是幻想，是个人隐私，只有过度的手淫才有害处，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手淫是个性不完美的表现，是一种错误，缺乏社交能力的表现。或许手淫在他们的眼中不像保守派描述的那样可怕，但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威胁意味。简而言之，几十年来，手淫始终被卡在两种范式之间。弗洛伊德始终无法正视自己作品的引申含义，他仍坚持宣称，手淫的确导致了神经官能症之外的病症。1912年，他与他的维也纳同事们召开了一次颇具争议的会议，专门讨论手淫问题。他在会后的报告中指出，他希望能够回避手淫所导致的伤害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其小组所关注的中心。然而，回避这一问题并不可能。他感到不得不对此问题有所言论，因为“除了手淫问题之外，整个世界似乎并无其他兴趣”。

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弗洛伊德当时一定是想强调其小组内部的分歧，因为他本人就是持相对守旧观点的人之一。1895年，他曾经指出过一种体细胞的存在，这种体细胞因手淫而衰竭，从而导致神经衰弱。他还指

出，这一神经官能症与焦虑型神经官能症不同，因为焦虑型神经官能症是由其他不充分的性行为引起的，如禁欲，或是为防止受精而在射精之前有意中断性交。[398] 他提醒其同事们，有关此话题，早在1908年的那次会议上，大家的分歧就很大。当时他担任会议书记员，由于与会者分歧巨大，连一份粗线条的会议摘要都无法形成。在那次会议上，与会的一位知名的儿科学家希望得到小组对此问题的明确答案："手淫究竟会造成多大的损伤？为什么手淫会对一部分人造成损伤，而对另一部分人不会造成损伤？"或许弗洛伊德会再次回避这一问题。

总之，在1912年的会议上，弗洛伊德显然已决定要从小组的谈话中拯救出点什么。这次会议并未达成一致，从而"否定受手淫影响的体细胞因素的存在"。此处，弗洛伊德的观点显然仅代表他个人：手淫的"致病效应"是由于这一行为的自身特征，而不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相提并论。"器质性损害是由某种未知的机制造成的……只有放弃心理学模式，才能解释损伤的发生。"这一观点显然无法得以证实。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此得出的结论是，此话题不可能得出一般结论，需要对个案进行逐一研究。弗洛伊德不经意间打了个极具讽刺性的比方：对手淫进行个案研究的方式恰似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位苏格兰国王。这位国王称，要想判断出一个女人是否为女巫，仅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这个女人煮了，随后品尝一下其肉汤，并得出结论："没错，这是个女巫。"[399]

专家们不会放过旧的模式。当然，他们会融合各种新理论，然而却远未达到盖棺定论。早在弗洛伊德尚为医学院学生的年代，法国就曾有位医生，在其著作的开篇之处写道：手淫是一种相对良性的行为。他是通过列举数百种女性易患的疾病后而得出这一结论的。[400] 世纪之交，这一争论依然未变。美国的一位妇科学家称："如果手淫适度，就不会致病。"事实上他还指出，手淫行为是普遍的，是无处不在的。西南非的霍屯督人这样做，骑自行车的人这样做，缝纫工这样做，卡菲尔人也这样做，更不必说低等的灵长类动物也都这样做了。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平常的行为，这位妇科学家还是联想到了体质衰弱、心理衰弱："女性手淫者会变得极其假正经，她们鄙视并厌恶异性……手淫经常导致痛经、卵巢神经阻塞、下肢无力、性狂躁等病症。"对于大多数手淫的女人来说，手淫不会导致失明。然而，波兰布雷斯劳的一位著名眼科医生曾记载，过度的手淫的确会对视神经产生影响。当时有位名叫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的性学家，其著作影响力很大。他声称，手淫是良性的，而过度手淫却不是。但不幸的是"二者之间很难界定"。的确，自1712年的探讨之后的200年间，普普通通的手淫一直被恶名缠绕着，一直被公众视为不当行为，这一切使手淫成为文化危机的象征。[401]

这种摇摆不定的观念在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霍尔是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将弗洛伊德请到美国讲学的正是此人，而弗洛伊德也同样将自己在克拉克大学所作的心理分析五讲献给了霍尔。霍尔本人也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初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然而，无论霍尔在我们这一话题上的姿态有多么开明，他依然无法动摇

旧时代成年的男孩心中的罪孽感。他们在那个糟糕的年代走向成年——那时提索依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权威。霍尔在内战前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在自传中承认，那时候他哪怕是有一点点的性兴奋或“夜间行为”，都会吓得发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给他讲过的故事。故事中的青年“不仅手淫，而且还与多个下流的女人做过坏事”，这个青年最终尝到了苦果。他得了一种病，鼻子渐渐变没了，最后只剩下了两个洞。最后，这种病使他完全变成了傻子。（在这里，他将第三期梅毒与手淫混合到了一起。）此事使霍尔生活在恐惧当中，他总是仔细地检查自己的鼻子，已确保鼻子没有变扁。他还找来带子将自己的阴茎扎住，使之始终向下，以避免不经意间的勃起。后来，他进了第三修道会的寄宿学校，在那里目睹了很多真正的淫荡性行为。他像很多同代人一样，在后来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将这些事情与手淫联系在一起，与一系列性行为错乱联系在一起：在那所学校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令人恶心的性行为，跟克拉夫特—埃宾、塔尔诺夫斯基（Tarnovski）、哈夫罗克·埃里斯描写得一模一样。[402]

霍尔关于青春期的两卷本巨著，被奉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其读者对霍尔的这些早期经历却全然不知。（他的自传是在其职业生涯的末期面世的，即教程出版之后的20年——1924年。）起初，霍尔本人对现代观点显得十分坚定：

人们常常相信一些直接而感性的效应，又常常因为迂腐的原因而夸大这些效应。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效应远不及早期文献中或流行说法中那么直接、那么可怕。

接着他又指出，大脑“其实不会干瘪掉；痴呆、智障、麻痹、猝死也不会逼近。”同样，在男孩或女孩的身上也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表明其有过手淫史。

然而读者从上述论断中却难以得到安慰。手淫引起的苦难仍可列成一张单子，而有关“性错乱”的说法最为流行，这一切使人颇感束手无策。首先，从优生学的角度说，手淫是有害的。“投身于纯感官的乐趣会缩短人的生长周期”，削弱一个民族，代表着一种现代社会的悲怆。“颓废的儿子咒骂着父亲，二人之间充满了怨恨，而事实上二者之间本不存在冤仇。这种模式始终困扰着我们的文化，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特征，自从古希腊阿特柔斯时代的诅咒以来，一直如此。”（阿特柔斯的妻子与人通奸；阿特柔斯杀死了奸夫家的孩子，却未曾料想那孩子竟是自己的。他将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并将象征王权的金羊传给了妻子的情人。）与之类似，手淫也萦绕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头上。

其次，手淫对个人也有害处。霍尔极其欣慰地宣称，无论人们过去是怎么认为的，现今已无人依旧相信手淫不过是“过度的自然行为”而已。独自的过度行为，其危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这一行为极具兽性，在种系发展史的梯级上处于底端位置”；由于这一“不自然行为”，幻想也病态地变得紧张、激烈。霍尔实质上是在重复《百科全书》中的悲叹，这种

传统的悲叹认定，幻想使手淫者“过度紧张以达到所渴望的高潮”，危险由此产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幻想不仅包括性错乱，而且包括幻觉症。整套感觉器官会出现严重错误。无论性交会产生多么令人不快的后果，手淫必定产生更糟的后果。常言道，性交使人忧愁悲伤。但手淫会使人更加忧愁悲伤，还会使人更加孱弱。追根溯源，“众多疾病的疼痛及迹象”都可以“直接追溯到人类的这一灾难行为中”。这些疾病包括：“梅毒、心悸、恐光症……神经衰弱症、脑神经衰弱症、脊柱神经衰弱症、心理性阳痿……主观光感、视觉痉挛，或许还包括巴西多氏病（卡尔·阿道夫·巴西多［Carl Adolph Basedow］在1840年的著名论文中描述了突眼性甲状腺肿，因此这种病以他的名字命名）、膝跳反射紧张、皮肤变紫变粗、手部湿粘……贫血肤色、干咳以及多种消化紊乱症。”霍尔还研究出了“手淫者心脏”理论。这是个具有权威性的结论，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一家重要医学学报刊登了六例“有趣的个案分析”。此外，霍尔还研究了许多与“青年人的禁乐”相关的病理学问题。［403］

独自性行为因此站在了道德问题与病理问题之间，期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微妙。更确切地说，器质性疾病的研究基础既然是细菌理论及细胞病理学，想把手淫的恶果插入医学模式中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手淫以它长期以来惯有的姿态再次出现了：这一罪行具有道德上的严肃性，由此可带来相应的症状；从事物的秩序来看，手淫则是一种严重的离经叛道。医生们一边对手淫行为带来的实际疾病越来越表示怀疑，一边又更加明确地表示，手淫是一种罪行，是对文明进程的侵犯，也是对使文明成为可能的各项机制的侵犯。关于手淫的理论日渐混乱，普通人对此倍感折磨。

要想把问题弄清楚颇需花费一番工夫，其过程势必将独自性行为不断推向心理方面。约翰·米格尔（John Meagher）的手淫心理学研究有过多种版本、历经多次修订，该项研究概括了手淫的道德方面、社会方面的影响。此时的世界似乎早已超越了约翰·马尔顿以及提索的年代，然而这些问题其实仍然为人们所关注。过去，手淫在生理方面的危险性被夸大了，这些危险性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智障症和结核病并不是由手淫引起的。与之类似，手淫造成的心理后果也不像人们过去想像的那么严重。但米格尔的观点至多到这一步，浅尝辄止而已。

威廉·施特克尔（Wilhelm Stekel）曾指出，手淫完全无害，甚至还有一定益处。（弗洛伊德曾于1912年竭力批驳这一观点。）米格尔把施特克尔的这一观点视为“走了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手淫的确会带来某些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大多是道德方面的，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生理方面的。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手淫是一种有罪的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儿戏。据称，10%的青少年犯罪是由手淫引起的，因为在这部分人中间，手淫使他们“突破了道德底线”。米格尔的观点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不断发展的世俗观念，也影响了我们这一时代对手淫的昭雪。他的核心观点即：生理行为“与在内心中造成的极大损害相比，相对次要得多”。《手淫》一书也好，提索也罢，还有那些以医学观点为基础的种种传统观念，都已无法立足。而1712年前后首次出现的“严重道德危机说”，却变得日益

明确。米格尔及其同代人对独自性行为的谴责，尽管使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术语，但其理念无疑来源于18世纪。

手淫依旧是性交的极端对立面。手淫“绝对无法满足社会化的成年人的精神责任价值”；手淫会引起病症与不安，而合法的性交则可以带来舒适与轻松。米格尔的观点好似新瓶装旧酒，他认为手淫是有关怪诞幻想的行为：“怪诞幻想取代了现实，这类怪诞幻想是极其幼稚的。”（拉普朗什及庞塔里斯（Pontalis）曾指出，怪诞幻想是“欲望的舞台”，手淫则是欲望的登台表演，代表着一种退化。）尽管米格尔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其同事们还是对此进行了发挥：手淫过度的危险源自其所带来的安逸感，这一观点与《手淫》中的观点如出一辙。20世纪的医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争辩道，手淫并不比性交更可怕：“手淫与性交具有可比性，其危险在于其频率。”正如《百科全书》200多年前所指出，如果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做做，应该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米格尔也和提索一样，认为女人的手淫要比男人恶劣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手淫会对身体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因为该行为是对正常社会责任感的破坏：结过婚的女人如果手淫，则表明她的色欲超过了感情，表明她对丈夫不满。这种女人惧怕生孩子，且不希望在性交时使用避孕器具。她们错误地认为，手淫不会带来避孕时的罪恶感，因此不会造成神经质。这样的女人还认为性“纯粹是男人的特征”，而自己则是性的“受害者”。因此她们养成了这种“不通过性交就可以得到抚慰”的习惯。简而言之，手淫这一行为是个信号，女人手淫表明其对正常的性秩序的拒绝。[404]

罪孽感导致了众多后果，如神经质、疲劳、焦虑、歇斯底里、各种身体不适、无法达到预定的生活目标、道德崩溃、失魂落魄等等。这一切取代了死亡、智障等，成为独自性行为的首要后果。近代早期以来手淫所背负的伦理包袱，此时依旧未见轻松，旧日的重负以新的面孔继续存在着，并且变得十分离奇。

这一缓慢的再思考过程在一个令人想不到的地方可见一斑，那就是20世纪早期某些最进步的女权主义期刊的版面中。在此类期刊中，女权运动者谈到了双重标准的问题、控制卖淫活动的问题、手淫的本质与后果问题。妇女自由团是个好斗的非暴力女权组织，拥有60多个分支机构、4000多名会员。该组织成员E.W.（即依迪斯·沃森［Edith Watson］）认为，完全的性自由既不可能，也绝非众望所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禁欲要么有害，要么根本就做不到。E.W.此处遵循的是依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的观点。布莱克威尔是英国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医生，曾论述道德纯洁问题，并因此而备受关注。沃森认为，禁欲是“痛苦的、易在生理方面造成伤害的”，禁欲“对女人产生了危害，并且极易滋生卖淫行为。”（布莱克威尔在诊疗中发现，许多青年男子嫖娼得到了其长辈的许可。嫖娼一方面可防止精液在体内积存过多造成可怕后果，另一方面则可防止手淫。）[405]

一位“新订户”回应了沃森的观点，也回应了那些写信对沃森表示支持的

人，从而加入了这场论战。后来证实，这位“新订户”就是斯黛拉·布朗（Stella Brown）。布朗是位社会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颇为激进，她还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她后来称，自己“一辈子没碰到过一个正常的女人”。布朗将沃森等人的观点谴责为“性麻醉”，因为沃森一族的结论来源于对男人的恐惧，这种男人粗野、无知且性欲望极强。在婚内性生活中虐待妻子，在婚外的嫖娼及偷情中虐待妓女及情妇。以此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化。因此，布朗认为，女人手淫是纵欲与禁欲之间的中庸路线。布朗并没有宣称男人和女人同样有可能禁欲，而是称男人和女人都有可能沉湎于“自我色情活动”及“手淫”中。由此，布朗已完全颠覆了沃森的双重标准理论。布朗没有对“自我色情活动”和“手淫”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但她的确显示了她的前卫，因为“自我色情活动”这一术语是哈夫洛克·埃利斯所造，其使用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她对埃利斯以及奥古斯特·弗莱尔（Auguste Forel）的观点加以整理，认定手淫仅仅是一种服务于自我的活动，因此她支持了这种中间路线的观点。最后，她对那些鼓吹独身有利于健康的妇女进行了批驳，称她们是虚伪的，因为她们所谴责的，无疑正是她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事情变得越发复杂。有的女性撰文称自己从不手淫，因而在道德上超乎其诱惑。“智慧与理性”统治着其“低层次的本能与欲望”。这一本领使她们得以精神上的升华，超越了包括男人在内的“低等动物”。沃森对布朗观点并未作过多回应，然而却对“男人需要性安慰”这一提法反应强烈。对这一泛泛的结论，沃森置疑道：就算男人当真需要性安慰，也无法推论出国家应当实行卖淫嫖娼业合法化。（这一推论是此行业国家规范的重要依据。男人因其本性而需要性宣泄，而许多男人要么未婚，要么其妻无法满足其性需求，因此，他们必须获得安全的途径来发泄其性欲。故此，国家应当确保妓女不会传播疾病。）沃森建议这类男人通过手淫解决此问题。她对手淫有其独到的看法。首先，手淫与嫖娼不同，手淫不会造成伤害。退一万步说，就算造成伤害也只伤害手淫者自身，而不会伤害他人。而男人手淫时，有关男人性欲的实质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使男人显得有失体面”，同时也使“性需求”的丑恶面暴露无遗。读者显然难以接受沃森的观点，且很可能会反驳，称“无数人曾因手淫而变得精神失常”，或是称“需要找出医学上的依据来证明手淫不会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对此，沃森早已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观点，且这一观点已具有极强的现代色彩：手淫是十分安全的，那些关于其致病的传言不过是“有人竖起的稻草人而已”。这一古老的传言毫无事实依据。但这一看法并未贬低其主要的伦理观点。布朗是在向人们推介手淫，而沃森及其同事们却并未这么做，因为在沃森看来，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类并不需要屈从于性欲望。“男人的最高自由，包括其对自我的控制。”而手淫恰恰与之不符。可见，20世纪早期，即使是在前卫的圈子里，18世纪的遗风尚存，尽管其仅仅限于纯道德领域而已。[406]

与之类似，许多男男女女都写信向玛丽·斯托普斯求助。这些人都是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最初几年里成长起来的一代。那时，手淫依旧被看做是导致体弱多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手淫还逐渐被看做是内心病态的标志。死亡、精神失常已不再萦绕在手淫者的心头，取而代之的是道德的

沦丧。有位40岁的男性，出生于1890年，他在信中写到：过去的两年里，他共计手淫约12次，而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曾嗜手淫成瘾。而今，新婚的前夜，他感到神经衰弱、性欲过剩，并充满了“紧张、愧疚与悔恨”。另一位男子则称，他即将结婚，然而却对自己所感染的“疾病”忧心忡忡。就连小孩子也会从身体和道德两方面来对此表示反对，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生活。他始终在考虑，是不是要去“静心”？还有一个人问到，自己会不会得到不健康的孩子。他曾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手淫，直到最近才停下，这险些毁了他的婚姻。他始终对妻子敬而远之，因为早在度蜜月时他就已经发现自己阳痿，他认为自己的男子汉风范已丧失殆尽，对此他深表羞耻。

但也有一部分人来信认为，应当允许手淫。当然，前提是在担心性生活是否正常这一前提下。有位写信者说，她和丈夫每星期进行一次约一个半小时的性生活。每次她都会得到10—12次的“满足感”，但由于丈夫总是出于避孕目的而中断交媾，她很快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想再次自我满足一下。是否可以动用一下自己的手指呢？斯托普斯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只要感觉好，就可以这样做。斯托普斯还告诉这位读者，必须让丈夫知道中断交媾对身体有害，应当用避孕套才对。还有一位男子在信中说，由于自己早泄，他不得不去“摩擦妻子的阴蒂，而两人都知道这么做不好”。他从不手淫，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407]

如果上述资料是有关此问题的惟一资料来源，那么就不难下结论，对于手淫，男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更容易产生潜在的罪恶感，也更容易相信手淫这一青年时代的恶习会毁掉一切幸福生活。或许斯托普斯的通信中所展现的那些问题有些极端，因为前来咨询的人大多数不是咨询神经衰弱、紧张、歇斯底里、焦虑、抑郁等，而是咨询器质性的病变，如阳痿、早泄、性欲丧失等。而斯托普斯本人则是医生，以研究节育问题为主，同时也研究性机能障碍。在她看来，性机能障碍常常是由对怀孕的恐惧造成的。若要避孕，就不得不选择手淫，这正是女人们所担心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临床案例中，女人似乎更易成为独自性行为的受害者。对女人来说，手淫代表着更加为社会所不齿的异常行为，代表着极端的痛苦与危险。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成年期以及青春后期的手淫行为都是罪孽的，本应当被摒弃，或是根本就不应该养成。这种感觉带有原始的罪孽，正是这种感觉影响了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整整一代性学家、神经学家、精神病医生，使他们竭力寻找解决此问题的理论视角。人们尚未完全使用心理学视角来审视手淫，而在这一新视角逐渐被接受之前，医学视角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开始这一部分之前，有必要暂停一会，来看看新兴的弗洛伊德派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20世纪前期的手淫：理论视角

手淫病曾有过医学模式、器质模式，在探讨这类模式的衰亡时，我们已经对目前这一解释性话题有了不少接触，但我仍然想对这一争论作一总结。而对于这一争论，弗洛伊德曾作过影响深远的新综述。早先，这一话题在各位作者中间大同小异，哈夫洛克在一部著作中对其作了很好的总结，这部作品于1897年出版，此后不断重印。在医生及道德学家看来，自体性行为是性行为的核心，其形式即为手淫。这一性已超出了人类世界，从而显现出其原始、初级的本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埃利斯及其同事已获悉，黄鼠狼、狗、猫、马，都有这一行为，伊万·布洛赫重复道："甚至大象也会。"他兴奋地称，猴子当然也存在这一行为，且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恣意为之"。这些证据中明显带有一种反诘，即手淫具有原始性。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由人类养育的长臂猿使用手来手淫，而不是把身体往别处蹭，这似乎表明长臂猿在模仿其主人的行为。一位研究倭黑猩猩的专家评论道，这些灵长类动物"仿佛读了《卡玛·苏特拉》一样"，它们可变换不同姿势、不同方式进行手淫，可谓颇具创意。 [408]

但埃利斯这一代专家却并不承认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不是动物在模仿人，而是人在模仿动物。截至1900年，已有大量人类学文献显示了原始人的手淫行为以及幼儿的手淫行为。究竟男孩和女孩的手淫是否一样多，尚无定论；但每个人都逐渐接受了一个观点，即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罕能避免这一行为。一些知名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例如，噬菌体的发现者、诺贝尔奖早期得主埃列·麦奇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认为，有一种自然的生理手淫，其存在是正常的自体性行为，是人类发育不平衡的结果。这一不平衡体现为：性感知先于性器官的成熟而出现。但麦奇尼科夫仍然认为，女性的性感知程度低于男性，因此手淫行为自然也相对较少。 [409]

在18世纪，婴幼儿的手淫曾被认为是外在因素介入所致，这些外在因素可能是生理的，也可能是人为的。例如，德国一位学究指出，虫子、紧身衣、有邪念的仆人，都可能成为婴幼儿手淫的诱发因素。（他曾以此为依据，建议给女孩穿连衣裙）。而截至1900年，婴幼儿的手淫已逐渐被认为是自然的了。在生命的特定阶段，自体性行为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堕落，而仅仅是兽的本性或人的兽性而已。 [410]

问题随之而来：这一存在于动物中、幼儿中、原始人中的蒙昧行为，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方可引入资产阶级欧洲的社会秩序？代价几何？从婴幼儿到巴厘岛上、丛林之中的原始人，从前线的士兵到骑自行车、跑缝纫机、蹲着洗衣的女人，直至形形色色的青春期少年，要解答上述问题，其线索极难把握。哈夫洛克·埃利斯十分圆滑地否定了童年后的手淫是良性的这一观点，并引用了大量文献说明了其危害，即手淫或许不是导致神经衰弱的惟一原因，但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与文明是对立的。此处的"这"究竟指什么，无法定论。有时，或

许需要在“手淫”前面加上“过度”这一并未阐明的形容词，而这样一来，又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其论断的理解。

但这一话题对他来说显然意义深邃：“我认为手淫问题对女人来说意义很大，手淫会使其厌恶日后的真正交媾”，因为在青春期时，“情感的要求以及性的真正魅力”均被“用不正常的手段加以锻炼了”。他认为，在高智商女性当中，“早熟而过频的手淫”若不算是导致离婚的“惟一有效原因”，最起码可以算作“主要原因”之一。无论男女，青春期的手淫均会导致病态的自我意识、导致自尊的缺失，因为手淫无法使人得到提升自我的“荣耀感和安乐感”。只有从心爱的异性所给予的亲吻中，才可能找到这样的感觉。

下一步，问题又继续出现。对于聪明的青年男女，青春期过多的自体性行为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心理扭曲”，并培育出“致人神经极为紧张的错误心态”。据埃利斯所依靠的权威资料称，泽伦·克尔凯郭尔（Sφren Kierkegaard）深受此折磨，尼古拉依·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梦幻忧郁”亦是由此产生，尽管不可否认，这种“梦幻忧郁”帮助果戈里成为了成功的小说家。很明显，这两个人都是声名狼藉的手淫者。健康的成年人若无正常性生活，需要多频的手淫才算得上“正常”？埃利斯的结论是，这一问题很难回答，故只可一一进行个案分析。而他所引述的个案并不会给手淫者带来多少希望。一些个案中的人在手淫习惯中挣扎着，恰似酒鬼、烟鬼“被牢牢锁在其放纵的习惯上”。简言之，在埃利斯看来，成年人的手淫若是超过了某种限度（在我们今天看来常常是很平常的），就会成为某种病变，即使不是身体的病变，也会成为社会病变、心理病变的标志与起因。这种病变即便不代表回归压抑，也是在否定人在文明秩序中的位置。[411]

在维也纳的分析家们之中，在研究性问题的学生之中，只有威廉·施特克尔对手淫问题持自信乐观的态度。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直至战后才出版，但他在心理分析的圈子里，长期以来就是个独特的人。欧内斯特·琼斯（Earnest Jones）称其为“异常的施特克尔”。即使是在自体性行为之外的问题上，施特克尔在其同事中也颇具冒险投机的名声。琼斯认为，施特克尔是位“超级娴熟的作家”，其作品比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更有意思，但却“不准确，且具有最差记者的那种坏品位”，甚至还经常“对事实持有不负责任的观点”。就是这位名声扫地的施特克尔认定，在儿童成年之时，将自体性行为引入家庭生活中并不会带来道德上的负担。如果继续手淫，甚至有可能产生积极效应，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如此。对于此问题，弗洛伊德与施特克尔一直争论不休，喧闹一时的“关于《手淫》一书的讨论”显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在漫长的争吵中，施特克尔始终独为一方，其观点与其同事们一直相左。[412]

奥古斯特·弗莱尔是德国极富影响力的催眠专家、精神疾病专家、性学专家。其有关当前这一话题的著作于1906年出版，并广为翻译。其中有关发育中的手淫的观点十分柔和。弗莱尔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补偿性手淫，所谓的补偿性手淫，是由于缺乏正常释放自然欲望的

途径而产生的。这一行为所导致的麻烦并不在于该行为本身，而是在于手淫者“意志反复遭受挫折，多次痛下决心克服感官上的欲望而无果”。女性受此影响的几率较小，但“一旦养成这一习惯，就会反复为之，因为抵制这一淫欲十分困难”。换言之，补偿性手淫所带来的麻烦在于戒除这一行为的尝试。这与吸烟问题类似。尼古丁所带来的麻烦，远不及试图戒烟时所经受的痛苦。与弗莱尔的这一观点相比，此前的观点似乎从未将意志薄弱至于如此重要的地位。

第二类手淫“由榜样与模仿而引起”。弗莱尔认为，这类手淫的危害被夸大了。爱情与正常的性生活可使之淡出。至于第三类手淫的来源，弗莱尔将其认定为“与生俱来的病态色情狂”或“心理早熟”。笔者认为，“心理早熟”与儿童期迷恋手淫相关，也可能与其他某种真正的病理有关，这类病症在当今的医疗文献中人可见到。“仁爱与自信”、成长中的温柔帮助，均有利于此问题的解决。除极个别的几个例子外，此问题并不十分危险。 [413]

青少年的核心性行为意味着什么？超出原始蒙昧状态的性行为意味着什么？在弗洛伊德的圈子里，鲜有对此问题的温和论述。赫尔曼·洛雷德（Hermann Rohleder）的著作曾被其同事们称为手淫问题的综述，他称手淫为“堕落”的标志，即对原始性形式的回归。他还认为性幻想是手淫区别于性交的标志。尽管这一提法于原始主义的概念不甚相符，但却沿袭了我们已追溯过的旧传统，这一传统始终存在，并进入了20世纪。 [414]

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是弗洛伊德前一代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对他来说，手淫的核心问题，并非其会导致男性阳痿，并由此导致性颠倒或性颠倒式的行为。克拉夫特—埃宾认定，同性恋感觉或同性恋“本能”均根植于身心深处，因此手淫及其他外部因素均不会导致这类感觉或“本能”。所谓的手淫过度，也不是性欲过强或先天性精神失常、道德堕落而引起的症状。所以，在克拉夫特—埃宾看来，童年以后的手淫明显是病态行为。这种行为会抑制道德发育及性发育。他写道：“没有什么会（比手淫）更易于玷污一切高贵情感、理想情感之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这一切枯竭。”手淫“会毁掉芬芳美丽、含苞欲放的花蕾”，并使之变得“粗俗猥亵，充满兽欲”。对男男女女来说，手淫使他们不再喜爱“由自然方式得到满足”。接下来，手淫者会力图戒除手淫并恢复到正常的性生活中去。然而戒除手淫的成功纪律却并不高。因为在放荡多年之后，手淫者早已丧失了戒除手淫所需的心理素质。道德、品格、幻想、感触、本能等，都已几近毁灭。因此，克拉夫特—埃宾也像弗莱尔一样，认为戒除手淫的尝试是势必要失败的，这一失败自身即为道德沦丧的产物，这一结论比其同事们的看法要严重得多。 [415]

在这一文献中，手淫已不再致命，也不再被认作一种疾病。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手淫变成了一种非正常行为，变成了可取代正常性行为与性乐趣的非自然行为。这里的非自然行为，不同于过去托马斯·阿奎纳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生殖”意义上的“非自然”。20世纪早期的进步运动者为

手淫制定了新的规则。例如，20世纪早期，节育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指出，先前的许多作者都犯有“严重的错误”，这些人在此类问题上明显持基督教神学的道德传统，因而才会认为“性乐趣仅仅是个副产品”，生殖才是最终目的。而这位学者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接着，他自己也对手淫进行了评论：“这一糟糕的替代行为”对青春期少年比对幼儿害处要大得多，因为这一行为在青春期会形成习惯、形成需要。哪些行为可被允许，其极限由正常性交的极限所决定。独自性行为超越了这一极限，“远非提供正常性交的那种舒适有益的效应”。这种“自我的强行性行为”使人衰弱，其随心所欲的本质造就了“这一习惯的真正危险之处”。由此，我们回到了提索所提出的童年压抑成瘾论中，用巧妙的花样翻新了观点。手淫成了个体心理动力学的战场：由于成年之后要有正规有序的性乐，因而婴幼儿时代的游戏必须遭到摒弃。然而，做到这一点也并非容易。[416]

弗洛伊德，手淫，与自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什么独自性行为中的医学论和器质病变论会丧失其中心地位？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快要得出答案了。但旧的伦理问题却并未随之烟消云散，这又是为什么呢？非但没有烟消云散，反倒穿上了新外衣，获得了新生命。此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建立在与我们的讨论本质不同的观察之上。这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经历了多年的危机之后，心理分析革命使旧观点显示出某种“中世纪性”。他的新理论解释了下述事实：有些孩子得到了精心的防护，没有被心术不正的仆人照顾过，也没有跟坏孩子一起玩，而在这类孩子中，手淫依然非常普遍。他的新理论同样解释了手淫者向医生表述的罪咎、不适，乃至疾病。其二，弗洛伊德把手淫置于了更普遍的历史之中，其中涉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演变为我们今天的样子的？文明是如何使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使我们用崭新的方式谈论这类问题，使这类问题变得比以往更为核心。然而，弗洛伊德却并未对深层次的伦理问题作出彻底改变——即独自的、个体的自我，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预示着手淫的现代概念的来临。换言之，20世纪早期并非1712年那样的分水岭。20世纪早期的性躯体，并未反射出新的社会秩序，新的问题自然也尚未随之而产生。

我不想以当时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去解释弗洛伊德革命的根源。但是，我们却可以对当时的文化环境投以一瞥。1911年，维也纳画家埃根·席勒（Egon Schieler）画了一幅手淫中的自画像《披黑斗篷手淫的自画像》[16]。在此之后一年，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学家召开了第二次“手淫研讨会”。会后，弗洛伊德颇感绝望，因为他无法为此话题得出结论。于是，他仅仅总结道“手淫这一主题是无穷尽的”，便匆匆了事。席勒的画是在镜子前完成的，画中充满焦虑，且萦绕在自我监察之中：他的眼睛很大，似乎很狂热、很富激情，且又偷偷摸摸地看着我们。他的头所摆出的姿势，似乎置于自我陶醉、镜像和我们之间。他的胳膊作着几近特技的动作，尽管手指画得严重变形，却在强有力地抓住生殖器。从这幅自画像中，我们能够看出多少罪恶感呢？席勒在竭力塑造自己的男人特征，这样一幅画对此起了多大作用呢？这幅画又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作者本人手淫的羞耻感与罪恶感呢？这些问题均为研究这位画家个性的更加宽泛的问题。但从未有过哪幅关于手淫的画，在心理逻辑方面如此丰富、如此复杂。这幅画远远超出了创作时的文化环境，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显然，他对自己的手淫充满幸福的幻想，这与他同年创作的另一幅自画像《手放在生殖器上的裸体自画像》[17] 如出一辙：画面上纯洁的少年在自我探索着，四周充满了甜美、柔和的金色光线。[417]

如果说性罪恶感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赫然耸现，那么性力量同样也是如此，尤其是非社会化的性行为的力量更是如此。看看席勒的另一幅画：《岔腿而蹲的女人》[18]。画中女子的短裙拽了上去，长过膝盖的长筒袜仍然穿着。手摆出姿势，食指深深地插入她自己那裸着的生殖器

中。她或许应该感到罪恶，但我们从画中却找不出蛛丝马迹。她不是酒神的众女伴之一，不会杀死并吞噬其观赏者。同样，她也不是个梅杜莎式的形象——暴露生殖器的目的是阉割威胁男人她只是用注视的眼神看着我们，她的目光十分热切，使我们敢于前去挑战其性自主性与性乐趣。无论这幅画有多么复杂，这位女子都拥有着她自己的自体性行为力量。当然，她也是一位模特，其角色就是在画家的目光中展示自己的身体，此处没有镜子反射出她的自我行为。只是席勒捕获了她的这一既抵御又顺从的姿势，而她也只是应对着这一职业要求而已。相比之下，《躺在带图案的床罩上的裸体男孩》 [19] 这幅作品所显现的冲劲要弱得多，但这幅画同样表明，疲倦地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打发时间，不仅安全而且如抒情诗一般吸引人。自我陶醉已失去了其刺痛感。[418]

这些画从两个方面将我们带回了弗洛伊德理论及其世界：一方面是神经官能症、焦虑、罪恶感及其来源，另一方面是性行为的驱动能量（性本能）与文明对其的利用之间的关系。手淫在弗洛伊德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中居于中心位置。如果某个孩子在诸多方面存在颠倒行为，且为了寻欢无所不做，则弗洛伊德的故事所关心的问题是，他该如何长大成人。[419] 一旦弗洛伊德能够解释这一问题了，手淫就不再是罪恶深渊的边缘了，而成了“性行为的原始形式”。后来有位分析家的确是这样解释的。更为特别的是，手淫新理论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过渡，即由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勾引论发展为成熟的性本能论，后者为解释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等病症提供了蹊径。承认性幻想在自体性行为中的作用，使弗洛伊德在其事业中的产生了突破。[420]

19世纪80年代以及此后的弗洛伊德学派对手淫所致的病态效应仍持常规的看法。笔者怀疑，在弗洛伊德的内心深处，他终究未能克服自我。他曾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资产阶级式的青春期，也曾面临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这一问题。他认为手淫对身体有害，即便不是导致堕落的原因，最起码也可看做是走向堕落的一个信号。他同样认为，手淫者经常会感到乏力、疼痛、神经官能症。他还认为，总体说来，手淫是一种非常恶劣、非常卑贱的行为。但现在看来，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就已不再关心器质性的疾病了，他更关心的是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症等。他还开始对另外一些问题产生了兴趣：如外部事件是如何进入心理世界的，之后又如何对肉体产生真实的后果。火车事故以及各类惊吓都会使人体产生反应，这就是著名的歇斯底里，而神经病学在这期间似乎不起作用，疾病与导致疾病的原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媒介。我们已经看到，他把手淫视为衰弱的表现以及神经衰弱症的原因。手淫行为成为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病原学的基础。但此处已有一处纯心理学的障碍，使手淫行为变得具有破坏性：自我性行为所提供的满足感并不充分，因为促成这一行为的生理欲望与心理欲望之间的联系并不充分。[421]

在其勾引论中，弗洛伊德设想，某些真正的损伤是导致日后歇斯底里式错乱的主要原因。例如，女孩受到其父的性攻击或其他的早期性唤醒。弗洛伊德称他已在很多病人身上观测到了这一点。这成为歇斯底里在真

实世界中的境遇型开端。此后，心理能量以某种形式，由损伤出发，经由心理，抵达身体。手淫则很可能是早期性损伤的后果，是导致症状的间接原因。因为孩子的自体性行为一旦被过早唤醒，再对其进行压制，其性能量就会喷涌出来，从而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现出来。这一现象经历两个过程：一是早期性刺激带来的损伤，二是其后对手淫的压制。

手淫并非导致歇斯底里的惟一途径。弗洛伊德1895年称："处于矛盾冲突概念中……的日常经历，具有致病效应。"弗洛伊德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位已婚女子突然意识到爱上了别的男人。另一个例子则与一位对道德极为敏感的手淫男孩有关。 [422] 歇斯底里症状、困扰人情绪的行为、乃至幻觉，均由此类紧张而产生。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女子因手淫而生产了一种罪恶感，称自己是在谋杀。在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父母性虐待与手淫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关系的病原学作用。但后来，弗洛伊德对此有些举棋不定。1899年起，他开始转而强调手淫的心智方面。这即肯定了错乱行为的境遇性原因，又肯定了手淫对心智的危险性。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读了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作品，并接受了其三个观点：第一，手淫与幻想联系紧密。第二，自体性行为产生于内部，因为这一行为带有自恋性质，故不存在（或至少可以说不需要）外部刺激，无论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还是恋物癖者都是如此。最后，歇斯底里发作，是因为自体性行为发生了冲突。弗洛伊德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重新加工：幻想产生得较晚，对童年早期有所反映。童年早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却存在过一种可导致性冲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即为性发展中的自体性行为阶段，后来的幻想即为这一阶段的反映。 [423] 弗洛伊德用一个实例说明了上述含义，我们可从中看到，手淫是如何成为勾引理论与性本能理论中的过渡理论的。

弗洛伊德的这一实例被称为多拉实例，解释如下：吮吸手指是婴儿期性本能的一种形式。这个名叫多拉的女孩改掉了这一习惯，随后处于一种想念状态之中。三年后，她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性幻想。与此同时，她有了生殖器的感觉。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生殖器感觉要么是由于真实的勾引引起的，要么是由手淫引起的。但无论是哪种，都加剧了其俄狄浦斯式的爱。这些幻想对她产生了刺激，促使其手淫。她抑制着自己的手淫幻想，并将性能量转化为歇斯底里症状。多拉并非由于其俄狄浦斯式的爱而痛苦，其损伤不是由勾引引起的，而是由手淫引起的。或者换句话说，损伤可能由于使她产生生殖器性行为的因素而引起，但促使其产生自体性行为梦幻的决定因素，则是幻想。自体性行为梦幻一旦中断，便成为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弗洛伊德看来，其勾引幻想或许是个屏幕，反映着其真实生活中的手淫行为。但此处的主要观点是，发病机理越来越朝着"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心灵与躯体之间" [424] 方向发展。在童年早期（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自体性行为时期），性能量与性刺激均无焦点。此后出现了以俄狄浦斯式欲望为代表的幻想与某种内心渴望。使弗洛伊德在这两个阶段的两种状态间建立联系的，正是手淫。与手淫相关的幻想，在弗洛伊德日后的作品中渐渐显示出其巨大作用：

他认为，虽然手淫是一种独自进行的、单调如一的活动，但却“完成着种类最多的性幻想过程”。[425] 尽管“真实环境中受到的损伤”这一提法尚有一定生存空间，但却已处于两种理论的复杂关系中间，一方面是心灵世界，另一方面是自我刺激生殖器时获得的纯生物乐趣。

人们不必相信弗洛伊德的任何一种分析：多拉（Dora）当然不相信。我们也不必认为他的手淫理论是其两大理论之间的中间站。但这一观念的确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们明白他是如何得出性本能理论的。这一理论影响巨大，但却脱胎于一个不那么新颖的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这一解释，无论其细节正确与否，都使我们看到，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这种罪恶行为，时不时地出现在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的内心世界研究者的心中，从其事业的开端之时便是如此。

渐渐地，他开始讲述着自淫的历险记。他讲述了一个忧郁的故事，讲述我们是如何以一种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另一种自由的（这是对卢梭观点的转述）。他还讲了一个暴力的故事，讲述我们是如何压制自己的本能从而实现对兽性的超越（这是在转述尼采的观点）。随之而来的自我克制，是对文明的绝佳表述。人，尤其是女人，倘若对这种自我克制采取抵制态度，那他（她）就成了法外人（或许也可称为英雄），成了拒绝在创造文明中承担责任的人。性本能的巨大威力本应得到升华，却被这种人“抛入了文明活动的废物堆”。这一变化进程不存在物质衰减，但却不可对其视而不见。其发展方向的变化可能导致痛苦的结果，如焦虑、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等。因此，人们必须迈出首要的一步：升华婴幼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使这种原始行为朝高尚的方向发展。[426]

弗洛伊德的基本故事线索已十分明晰：即从纯粹为乐趣而玩弄，到为了特定的目标而玩弄。自体性行为若不加以限制，就会“使性本能日后变得无法控制、无法给人带来益处”。简言之，文明取决于对手淫的掌控：“从很大程度上说，通过抑制性兴奋中的反常因素，我们可以获取对文明活动有用的力量。”自体性行为即为最初的反常因素之一。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如若不能抑制自体性行为，就会导致其他更为具体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理想中的文明性道德大相径庭。反常的因素驱使年轻人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产生冲突。要想避免冲突，就只好简单地对性行为采取回避态度。弗洛伊德对自体性行为与文明产生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时，还有另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人们一旦否定婚前性行为，就会投入另一种更不道德的怀抱。接着，就会被罪恶感所折磨，或是因戒除某种性发泄的途径而倍感煎熬，还可能会因屡戒屡败而泄气。相比之下，手淫似乎不需付出代价，这暗示着人们可通过手淫达到某一目的，同时毋须产生麻烦。有些期待是不可能的，在文化上亦是危险的，而手淫却可以通过幻想使人得到满足。弗洛伊德在此引述了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讽刺幽默杂志《火炬》中的话：“性交是手淫的替代品，且性交不如手淫令人满足。”当然还可从中引申出更多：手淫对取代现实中的幻想有积极意义，手淫其实可以在心灵中建立起那些幻想中的目标。上述观点放到一起，形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景。[427]

这些话直接来源于启蒙运动作家。但弗洛伊德的关键作用在于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去强调我们是如何被引入歧途的。《性学三论》中展现出的弗洛伊德，与《爱弥尔》中展现出的卢梭有很大不同。即便是那些不相信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人，也会从中明白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弗洛伊德认为，手淫的升华作用十分关键，这一过程使性行为更改方向，使之产生文明以及“开化的”性角色。倘若如此，这一过程对手淫重塑自我的理论同样十分关键。如果手淫不需加以抑制，则不会导致歇斯底里；如果手淫在道德上是健康的，则不会产生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因此，弗洛伊德提供了两种图景。其一，医学界对手淫长达两个世纪的攻击得以转向，转而提出缓慢而坚决地抑制自体性行为中的性能量。这种能量不再是致命的罪恶，而是成为异性恋的培养基础。手淫成了发育中的一个阶段，人必然要经历这一阶段，且要在这一阶段有所发展。其二，这个世界始终无法摆脱手淫所代表的那些因素。这一观点不甚明确，也不甚乐观。对此进行剖析的力度很大，但却很难有所收效。这一阐释表明，性秩序比弗洛伊德想像得还要脆弱、还要有韧性，也正是这一阐释成为一种突破口，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手淫的新用途。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拘束的性本能式能量，模糊了上述两幅图景之间的区别。同时，通过这两幅图景之间的区别，又预示着对文明的规范需求。弗洛伊德的这两种各居一端的观点之间严重冲突。而冲突最为明显的地方，则是对成年女子性行为形成过程的叙述。有可能因肉体而使文明付出代价的不是别人，正是女性。因此，最该戒除手淫的，也正是女性。

首先，我们来谈谈不分性别的性乐。弗洛伊德指出，肛门阶段的手淫是很普遍的。其实，就是在这一阶段，婴幼儿首次发现了与本能性乐相左的环境。这时的身体只是松散地与生殖器性行为联系着，且需要经过诱导才可实现。尽管在这个最初阶段已经显示出性行为的迹象，但性行为却不是自动的。弗洛伊德称，此时对龟头或阴蒂的玩弄，宣告了其“注定要在将来发挥重大作用”，“此后所谓的正常性生活，即以此为开端。”这种早期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生殖器之所以渐渐获取生殖器的含义，在于对生殖器手淫的禁止。生殖器之所以成为生殖器，就是因为这一部位为禁区。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性感区域日后在性行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一主导地位是通过婴幼儿时代的手淫而建立起来的”。无论这一主导地位是否为天然，弗洛伊德的这一看法是明确而不含糊的。 [428]

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婴幼儿时期的手淫如果得以继续进行，就“构成了开化的人所确立的发育进程中的第一个重大离规行为”。性别差异的关键时刻在青春期时到来。此时，女孩会抑制其性行为中曾经有过的男性形式，即放弃阴蒂手淫及阴蒂性行为，并像弗洛伊德在《新心理分析入门讲座》中所说的那样：“将性触觉及其重要性转移到了阴道。”女童的手淫导致其生殖器性行为“完全男性化”，“而随着阴蒂式手淫被摒弃，许多与之相关的行为随之被抛弃。此时，被动性占了上风”。由此，手淫不仅

仅对解释生殖器阶段的发育有重大意义。对女孩来说，手淫对生殖器阶段的重塑意义同样重大。经过重塑，阴茎夹入阴道的交媾变为了更为推崇的性表达。这一进程使女孩变为了女人，如果这一过渡失败，则会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戒除手淫是精神升华的首选，性能量的转向意味着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兴趣所在。因此，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手淫的罪恶感都不仅仅只是习俗而已。这种罪恶感来源于这一行为“与社会原则的冲突”。但此原则对女性的要求要远远超过对男性的要求。[429]

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书写道：“正常情况下，最强烈反应的核心，随着阴蒂向阴道的转变而成熟。”作者此处论述的是女性的情绪问题，显然是在沿袭弗洛伊德的传统。无论是童年的手淫还是成年的手淫，都会阻碍这一转变。不过，这一阻碍也并非不可挽回，因此“对那些尚不发达的地区进行教育，还是有可能的”，阴道还是可以得到挽救的。无论如何，阴蒂在女性阴道性乐中毕竟有一定作用。也就是说，即使手淫已经毁坏了正常的发育，女性生殖器仍可进行重新锻炼。但手淫显然是一种重大错误，对女人来说意味着退化，意味着向早期自体性行为的退化，向童年性感区域的退化。而对于男人来说，阴茎仍然是生殖器性乐的不变源泉。如果哪位女子必须通过手淫来缓解紧张，并因此向医生咨询，那么医生很可能会告诉她，仅仅在“有确定的生理需要时”才可以这么做，不要有幻想，并且“做完之后应立即忘掉这一切”。[430]

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婴幼儿时期的手淫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在道德上是纯洁的，是发育中的特征。这一观点对1920年以后的性教育学影响重大。手淫变成了本体论的一部分，而不再简单地被认为罪恶、危险。我们经历了手淫，在手淫的基础上发展，与此同时，我们成长为有性能力的成年人。只有当手淫存在于这之后的发育阶段时，才表示一种过错。就好像某些原始人赤裸着，在欧洲的资产阶级眼里犹如野人一般。这种过错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内心。罪恶感、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取代了肉体上的玷污，但其产生的根源并非这一行为本身，而是由于这一行为与道德、文明的冲突。（对有些心理分析理论家来说，手淫实际上可用来区别自恋式的羞耻感与客观存在的罪恶感：“与手淫相比，罪恶感与阉割恐惧联系紧密；而羞耻感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主要的、绝对的。[431]”）

这些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成了医学教科书所参照的专业标准，从而用来警告人们提防现代庸医与宗教情节较深的教师。这两类人均在19世纪搭乘上了反手淫的乐队彩车。而一旦上车，便会非常冷酷。他们仍然会告诫人们，手淫会引发可怕的生理及精神损伤。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非常明确：手淫不会带来那些损害，“损害其实来自伴随着手淫行为的罪恶感”。这已经成为该学派对此类问题的标准答复。我们前面曾讨论过的心理分析学家A.A.布里尔对此作出了权威的解答。他劝人们放心，“将恐惧从手淫中强行剥离出去”并不会引发手淫行为泛滥成灾。相反，那些惧怕手淫后果的青少年，是知晓手淫行为事实真相的青少年的两倍。这一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如果戒除手淫行为，就必须考虑罪恶

感问题。而青少年手淫“被认定与童年的自体性行为不同”，因此是必须要戒除的。[432]

心理学的新理论甚至逐渐影响到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尽管这一过程非常缓慢而平稳。20世纪早期，罗马天主教会的学说仍严格遵循着托马斯·阿奎纳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手淫代表着色欲（拉丁文为luxuria），是原罪的一种，且是最严重原罪之一，是违背自然的罪过。一切违反贞操的罪均是不可饶恕的。有些罪行还会造成自我污染，同时人们又积极希望去做，这样的罪尤其应受到惩处。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立场仍然受到拥护。50年后，情况变了。一位天主教作家在回顾1970年的大好形势时注意到，20世纪，教会已经注意到了心理学。“在旧时的说教中，手淫这一行为被包裹在罪孽与庄严中。”这种庄严源于对性的片面理解。旧时的说教仅仅强调性的物化方面及性与生殖之间的联系。而“当代理论”对手淫的表达则更为精妙：并非总那么重要，在多数情况下可轻易克制；并不那么庄严，只有在其“殃及性生活的协调时”，才会成为问题。如果说手淫行为是错误的，“是因为手淫无法使性与爱结合”。（婚内手淫是另一回事，并未获得正式平反。虽然天主教文献远未忽视性问题的心理学方面，但在教会的田园诗式说教中，关于手淫的说教同心理的联系并不大。）另外一种道德神学的教科书采纳了弗洛伊德的另一学说。弗洛伊德曾暗示，手淫之核心为一种瘾，是病态冲动催促出的结果。手淫者恰似走进嗜酒者互诫协会没错，他可以在某些场合戒瘾，但其瘾是难以抵抗的，其根源很深，因此从道德上说，他并非有罪。相反，如果这个人有意识地作出手淫的决定，那么他定是在心理上、生理上得了幼稚症，但仍不能称之为“故意犯下罪过”。此外还有一种权威声音，认为手淫基本上是个“道德教育学”问题，应当建立一套有力的体制，使人们弄懂手淫。换句话说，手淫已不再是违背自然的罪过，不再是医学威胁，而是自我心理的问题。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期，弗洛伊德的论述已传遍世界各地。即使是在那些尚未受到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地区，也有人在积极地引入其思想。当代一位持新教立场的作者在论及我们这一话题时担忧地说，在宽恕手淫这一问题上，新教已经比天主教迟缓了许多。新教教会仍然认为任何与性相关的事情都是十分严重的，如“个性发育的问题……尊重人的生命之源的问题”。[433]

至此，我们已经接近故事的尾声。手淫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多数时候，都是以自我道德界限为标志的，包括欲望的临界、内省、想像、秘密，以及社会性。手淫是一种消极的能力，是对公众与个人正确关系的反叛。接着，弗洛伊德与其后继者们将崇高与文明的开始过程作为其理论的高潮。

新的阶段，即第三个阶段是何时开始的？确切的时间很难得出。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者们已进入全盛时期。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的那群人，尽情地引述着他们大师的话语，试图将他们的性行为与创造力从心理的监狱中解放出来。有的人在调查自己的性行为，显得颇具青春期的冲动，也显得有些绝望而愚蠢。在这个主观意识不断攀升的团体里，充满了惊人的纯真与坦然。还有些观点，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在我

们听来似乎有些刺耳。雷蒙·魁诺（Raymond　　Queneau）提出，手淫与“悲观、补偿”等都毫无关系，而“完全是正常的同性恋行为”。据说，此观点一出，即遭到安德烈·布雷东、皮埃尔·优尼克（Pierre Unik）、本杰明·佩雷（Benjamin Péret）的强烈围攻。三人一致认为：“这些现象之间没有共性可言！”佩雷坚持认为，没有女人的意象，就没有手淫。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超现实主义者是第一个将手淫作为谈话内容的性极端团体。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一话题几乎不感兴趣，19世纪的改革派怒斥这一话题。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对这一话题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他们谈论各自手淫多少次，谈论是否以此替代与女人的性行为，谈论手淫在其性记忆中的存在状况等等。布雷东的性行为是这样被唤醒的：“小学生在其作业夹下偷偷地手淫”，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手淫的。佩雷则是因为看到一个男孩往阴茎上涂满墨水并手淫，而开始了自己的手淫的。他们还谈论自己在手淫时都想像了些什么，以及在手淫时是感觉到羞耻、窘迫，还是满足。（布雷东认为，想像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时，根本就没法手淫。）此外，他们也谈及了对女人手淫的看法。不过这仅仅是一群友人间的谈话而已，至多谈到有那些结果可应用于自己的艺术与写作，而没有上升为手淫的新理论。（倒是超现实主义圈子的外围人物马尔塞勒·杜尚，使用“缓慢的生活——不利的环境——手淫”这一公式来描述受挫的性爱，这一结论算是关于欲望的更为严肃的论断。但是如果揭示其更深层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作品《被单身汉们剥光的新娘》、《甚至》等作品中显现的那种意境，则会将我们引入其他方向。）毫无疑问，超现实主义者的戏谑，以及他们那位更伟大的同伴的艺术创作，都预示着独自性行为将在20世纪后期发挥新的作用。[434]

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先是爆发了妇女运动，后又爆发了同性恋运动。至此，1712年就已经开始的那个故事被全面抛弃了，接着这个故事又有了较为极端的新用途。手淫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拥戴为自由的风尚、自主的象征，手淫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仅代表着乐趣本身，手淫是一种逃遁，逃离社会所规定的正常成年之路。手淫曾经是种离规的性行为，代表着错误的社会秩序；而现在却成为了基础的性行为。代表着理想中的新型群体，成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新契约，哪怕这种契约根本就没有内容。与自由爱情不同，自由手淫带有一种新精神，是“身体与乐趣”的另类荟萃。[435] 当然，这些观点也表明了其另一面：手淫是自私的、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它损毁了人际关系，是商业行为过剩的产物……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故事在继续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动向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弗洛伊德最杰出的后继者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这样的主张：有朝一日，手淫或许会成为通向某种极端变化的钥匙。这种变化有时是乌托邦式的，却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以及性行为。乔伊斯·迈克道尔（Joyce McDougall）认为，正常的手淫对于“为性冲突找到性解决”十分必要。但是，手淫与最初的自体性行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体性行为（如吮吸拇指）可以通过幻想重建婴幼儿的首个性目标——乳房，婴幼儿对此有依赖感。她因此论断，最初的自体性行为是一切独立的性愉悦的基础，是一切非生物的性行为的基础。梅兰尼·克赖因（Melanie Klein）也认为，自体性行为建立在婴幼儿的虚幻创造的基础之上。在这种虚幻中，婴幼儿建立了“能够使其得到满足的内心世界的乳房”，这个内心世界的乳房是外部世界的乳房在其体内的投影。自体性行为是“与内心目标有色情联系的幻想”，因此是极度自我的。海伦·德意志（Helen Deutsch）提出，女孩的双性恋幻想，“在与手淫的抗争中被征服”，由此可得出结论，如果在这种抗争中败下阵来，那么双性恋幻想就会得以释放。这些观点有些漂浮不定，但却使我们看到，现代意义上的解放运动、另类的性行为、通过手淫而建立的另类社团，其来源均非心理分析，而源自女权主义、源自大众文化对20世纪60年代另类文化的解释。[436]

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场合下，弗洛伊德的影响依然可见。弗洛伊德的理论与男权体制的基本观点一致，因此使手淫呈现出政治色彩。而女权主义者迅速摆脱了这一点。玛萨·雪莱（Martha Shelley）曾于1970年对女性同性恋问题与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论述，其作品使弗洛伊德曾经压制过的东西变为了常态。她认为，健康的发育必然要经历一个同性恋阶段，但却不会被这一阶段或其他任何阶段所“拘禁”，接着便会寻求异性性交。在谈论如何治疗另类者时，弗洛伊德学派的人称，“她所需要的只是被好好地操上一顿”。但女权主义方面却清楚弗洛伊德手淫观中的政治含义。《花花公子》的作者们对手淫问题的见解同样颇具权威色彩。莫顿·亨特（Morton Hunt）认为，手淫（他指的是“女性的手淫”）“可用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如生性懦弱、自信心低下、社会经验缺乏等”。整个由阴蒂兴奋高潮引起的骚动，支持并推广了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发生理论的攻击，亨特认为这一骚动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极端者”的成就。早在1922年，弗洛伊德的同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已断定，手淫是逃避“成年性身份”的途径，尤其是那些“憎恨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女人、“对男性的统治地位感到恐惧”的女人，尤为如此，有时还应该包括那些“使用手淫手段使自己与男人保持距离”的女人。最后这种女人其实是问题的关键。亨特认为女性手淫与俏女哲学太不相宜，但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呢？这一领域最咄咄逼人的著作是《激发美感的女人》（1969年）一书。此书仅因其标题，就已经遭到攻击。这本书“热切地号召每个人自由地手淫”，并告诉女人们手淫不仅是训练做爱的好途径，而且是“最令人满意的人类行为之一”。这后一种论断不免有些使人担忧。[437]

事实上，《花花公子》并不需要担忧。尽管《激发美感的女人》对男人的做爱技巧持批评态度，但毕竟是在主张异性恋。这位笔名为J的作者向女人们提出建议："对于性爱行为，你们必须像运动员那样训练。"你之所以要独自练习——"要教会自己觉悟起来（至于此处是否有双关的成分，尚不清楚）"——是因为男人可没有这方面的耐性。（后来由于《时代周刊》的透露，全体美国人——其中也包括J的母亲——才知道，J就是特里·加里提（Terry Garrity）。她是位较为成功的旅游手册编写者、儿童读物作家。她的书出版于1969年圣诞节前，此后仅过了几个月，便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J颠覆了18世纪关于独自性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应当允许幻想（所有的异性恋幻想以及部分变态幻想）来激发你自己。"她所推崇的书，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飘》，到《O的故事》、《芳妮·希尔》及《酋长》，她尤其推荐《飘》中莱特·巴特勒将斯嘉丽弄上楼去的那一幕。她坦言道，她是在利用手淫出卖自己，且她所说的手淫明显是指阴蒂手淫。这一行为是在训练其身体的反应力。她在书中用斜体字强调，读者应该每星期都拿出几个小时来做这件事。关于女性手淫，中产阶级的圈子里从未出现过如此不知羞耻的作品。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激发美感的女人》不仅在美国销量极佳，而且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均如此。后来，这位作者不幸破落了，她得了精神病，破产了，婚姻也破裂了。但她的书却清晰地代表着那一时代。 [438]

毫无疑问，在《激发美感的女人》及许多同时代的书中，解放手淫是为性幸福权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好比餐馆静坐是团体运动的一部分一样。 [439] 就连安妮·科德特（Anne Koedt）在写她的开山之作《阴道高潮的神话》一文时，也或多或少成为了这一学派的一员。她最终得出了更为极端的结论：如果一切性高潮都来源于阴蒂，那么女人就可能不再需要通过男人来得到性满足了。然而，她的这一导论唤起了一场自由运动：如果当前公认为"标准"的性技巧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就应当加以摒弃。这种"标准"纯属误导，是不合时宜的。"必须使用或设计新的技巧，使性生活的这一方面有所转变"。 [440]

在科德特写作的同时，女权主义与手淫的联系更加明显了。1971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出版了。这本书由波士顿妇女健康书籍协会编写，在此前发行的油印小册子《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该书号召手淫自由，并试图将手淫转变为一种对个人创造力的培养、对社团的构建都有益处的行为。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此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截至1995年，已售出400万册，并被翻译成了16种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语、日语、丹麦语、汉语、西班牙语、希腊语、瑞典语、德语、希伯来语、泰卢固语、阿拉伯语、俄语。

有关手淫的表述，是对弗洛伊德罪恶观的批评，对弗洛伊德拒绝阴蒂性高潮的批评。同时，从积极的一面说，也是对自体性行为的肯定。新的观点十分珍重幻想与自我探索，提出"手淫使我们得知我们所处的现实中的某些事情"，提出"要接受我们的感觉，竭力去理解这些感觉"，并以如何手淫的建议结尾，同时还吹响号角，呼唤性成就权。虽然《我们的身

体，我们自己》对女同性恋行为充满同情，但该书所要解释的即使不完全是异性恋的世界，主要也还是社会化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来说，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而手淫是使之丰富的途径。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对手淫的这一看法已变得十分普及。但与之并存的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其中不乏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还会重新出现某些传统的观点。例如，贝蒂·道森（Betty Dodson）的《解放手淫：对自恋的反思》于1974年初版，最新的一次修订是在1996年。该书指出："手淫是第一位的性行为，是性的基础。我们所做的超越手淫的每一件事，都仅仅是我们选择了使性生活社会化。"换句话说，人们也完全可以不使之社会化，而是仍然将其作为自我行为。（这本书目前已停印，但似乎是因为她又出了可替代这本书的新作。此次出版的新作是由大型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主题不变，书名为《单人的性：自恋的喜悦》，蓝登书屋1995年发行。新题目与旧题目一样，暗示着手淫是通向良性自恋之路、通向自给自足乐趣之路。道森对畅销书《性事之快乐》题目中的词进行了重组，从而暗示了手淫与异性恋快乐之间的联系。）道森与其他几位主张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如罗尼·巴尔巴赫（Lonnie Barbach）、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等，都相信内心世界的重要性，都相信自我接受的重要性。巴尔巴赫曾提出，"我爱你"是赠与自我的信息。想像非但不可怕，反而应该加以珍爱。（巴尔巴赫还对异性恋关系中的手淫作出了许多其他论述。例如，不充分射精会引起一些问题。她认为其部分原因手淫过快，而男人必须学会快速手淫，以免被人发现。这导致了对快速达到高潮的期望。在偷偷摸摸的环境中，这或许有重要作用。而在本该是相互满足的性生活中，却显得很糟糕。）[441] 她还把别人曾暗示过的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出来：道德自主是社交的开端，自主的表现方式之一即为对性愉悦的控制。

总的来说，道森对手淫的期待与塞内加对快乐的看法差别不大；实际上，她或许是第一个从新希腊文化角度对手淫进行阐释的人。塞内加曾说："我从不希望你们被剥夺快乐，我希望快乐在你们的房子里产生……只要这快乐在你们心中，就不会使你们失望。"这段话出自这位伟大的斯多噶学派哲学家写给朋友卢西利厄斯（Lucilius）的信中。[442] 他的这一论断中，没有什么比性高潮更会使他专注。但这并未减弱道森的自我爱护观的分量。她认为，以手淫为基础，人们可以安全地进入这个世界。她还认为，手淫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会继续安全存在下去。她的观点以及与之类似的观点，都是对卢梭观点的颠覆。她与卢梭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法。对那位大哲学家来说，手淫代表的是社会对自我的污染，因而我们所拥有的私人世界、内心世界，不再为其社会角色服务，不再代表遁世与自省。而对道森来说，手淫代表的就是真实的自我，如果公共领域可以为我们的独立世界作点补充，那么只管索要好了。

我引用道森的观点，仅仅是因为她的观点丝毫不带任何歧义。其实这种新观点已经有了很多大同小异的变体，与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挑战相呼应着。例如，阴蒂手淫可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可作为通向健康的异性恋

生活之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促成的度假村产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前所述，他们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用途。一些激进的女同性恋者又捡起了她们以前说过的阴道的外三分之一，并认为可用做阳具。也就是说，阴蒂并不是个孤独的性器官。另一些人也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里得到启发，认为只要用截然不同的视角去审视阴蒂，就会发现阴蒂与阴茎一样大、一样重要。这一器官很重要，因此女人不再需要嫉妒男人，也不再是被动角色。再如《女性身体新说》一书，书中提供了详细而专业的解剖图来展示阴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阴蒂的内部结构被描绘了出来，阴蒂不仅仅比阴茎要大，而且布满了比阴茎复杂得多的神经。[443]

处于危险之中的并非只有自由与反弗洛伊德争论。首先，对有的人来说，手淫意味着更好的社会、较少充斥着性别歧视的社会。“愤怒者组织”1971年的行动日健康宣言以这样一句话结尾：“应当鼓励孩子们探索自己的身体、探索相互间的身体，并应当鼓励他们手淫。”这种曾经被19世纪的激进派所鄙视的自我性行为已经成为“创新性女同性恋纲领”的核心舞台。敌人已不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教会、家庭及常规道德，而是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新马尔萨斯论者等等。这个秩序是异性恋的，支持暴力而压抑的男性色彩。如果说过去手淫是正常性交的幽灵，需要加以压制，那么现在手淫却与其注定胜利的敌人实现了共存。[444] 有关女性手淫的很多文献都与社会环境有关。尽管其关联不一定特别偏激。手淫经常会构建出一个群体，成群的女人会形成一些小圈子，一起学习手淫，一起得到快乐，并相互支持着。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社会课题，研究的正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最疯狂的梦里也未曾料想过的东西。这个课题称为《阴蒂事实：指尖上的秘密世界》，作者是女性健康研究者、活动家丽贝卡·乔克（Rebecca Chalker）。该书十分重要，并不仅仅是因这一研究（以及与之类似的研究）所透露的政治信息：声称手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合法权益”，或称“手淫是性发现的基本途径”，或是希望“把精力集中在异性恋上的男人……经历重大转变”。这一研究还支撑着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向读者提供女人从手淫团体中获益的辛酸证明，同时也向读者提供一份很长的名单，上面罗列着支持自我性发现的机构组织。（这类研究成果，在政治方面、自由方面均有所反响：《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称乔克早年创作的《女人的抉择之书》为“独立宣言”。）

并非所有的女性团体都是这样温和。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出现了一种倾向，把除了口交之外所有行为都看得有价值，而把性愉悦本身看得问题百出。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回应，支持黄色影片的运动应运而生。这类黄色影片常常带有性虐待与性受虐的内容。无论如何，这种支持已走向大众（女人在黄色影片中找到乐趣，这一历史很可能是连续的，尽管不为我们所知）。[445] 类似《骑在我们背上》这样的期刊，使女同性恋者对黄色影片的要求变得十分清晰。一位将手放在乳房上、戴着棒球帽的女子，把目光从广告上移开，抬起头看着我们，说：“我喜欢一边握着震动器，一边读《骑在我们背上》。”有个标榜道德纯净的组织，认为有关手淫的新理念是“回归荒谬”，因此被人们讥讽为试图建立“禁手淫区”。科

罗拉多州布尔德市某性用品商店的一项调查显示，女人购买振荡器自娱的频率，与她们为别人提供快感的频率，是不相上下的。黄色电影和电话性服务的广告同样很多，如“露比激情电话热线”，其广告语为“我冲动着呢，就等着你来了”。性商品商店数量也不少，如“为了你自己：性用品商店”等等。最终，手淫在女同性恋者虐恋、受虐的窥淫场合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场合与18世纪男窥淫癖的场合没什么不同。“手淫去吧……这是你自找的。”也就是说，手淫的性政治，在性解放运动的早期不那么拘束，与传统意义上的“好品位”有所差别。[446]

当代的艺术家也通过各种场面、各种图像，使手淫得以展现。这一曾经背负耻辱的个人恶行引起公众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艺术家们不太注重性别问题，只是作为艺术权威，与观众建立关联。有些作品专门讨论通过对手淫的评述而产生的女权主义艺术。还有的作品，则明确地表达了独自性行为及其意义，表达了独自性行为对艺术、艺术创作的作用。

1972年，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推出了名为《温床》[20]的行为艺术作品，光辉、有趣、同时又臭名昭著。这部作品最初看来是作为艺术权威而出现的，至于艺术家打算做点什么，并未透露太多。艺术家所要做的，正是手淫。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快便渐近消失。一连三个星期，阿孔奇都躺在纽约索纳本德美术馆的白色斜坡地板的下面。当参观者走近他藏着的地方时，他便开始手淫，并同时利用美术馆里的扬声器播送他的性幻想。由此，艺术创作与手淫等同了起来。这要我们看到这位艺术家之后，他的权威就可确立了。其实我们没看见他干了什么，或许他只是在地板下面喝茶而已。但每个人在看到别的观察者时，都会觉得相互产生影响。因而相互窥淫也就在预料之中了。阿孔奇在这部作品中成了一位神，他的事业因这部作品而变得不同寻常。（实际上，这种纯真已很难再找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艺术家接连几个星期不断表演这一艺术，最终受了伤。）[447] 简言之，通过幻想、通过想像，艺术创作与手淫共同创造了《温床》这一行为艺术。

但是，如果这一艺术表现了艺术与艺术家，那么同样也表现了手淫。这一点是可能的，阿孔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越是对其艺术作出评论，就越是如此。他说：“你走过房间，越过地板，在地板下面待上一天。我看着你们的身影，尽情地幻想着。我要手淫，因为我和你们在一起，并且为你们而手淫。”从表面上看，艺术家与参观者不那么具有说教性，而是具有相互性。独自性行为是公众行为，是在人际关系的罅隙里构建自我的方式。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阿孔奇说，在他的作品中，人们首先发现的就是“自我”，“仿佛自我是一种珍贵的珠宝”，藏在什么地方。但在对看不见的参观者的三个星期的手淫中，他开始将手淫“看成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是人与人的对应关系”。然而，无论这种行为艺术代表的究竟是自我还是手淫，我们的主题都已确定无疑地进入了当代艺术的领域。这一行为进入艺术时并不具有性别上的差异。倘若当时参观者从上面走过时，声称自己在下面手淫的是位女艺术家，那么这一行为恐怕又要有不同的解释了。因为历史已经赋予女性手淫其固有的反响：一方面

是自由、欣喜、如梦一般、如诗一样；另一方面则卑鄙、无耻、低人一等。如果当时艺术家的性别被掩盖了，同样也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但事实并非这样。这一行为艺术是以纯形式出现的，那就是“雏形的性行为”。 [448]

手淫在女权主义者的美术作品中，涉及了同样的主题，但对女性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女性历史，表达得更为直接更为具体。这可以使我们更快地切入主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作品《晚餐会》就是个开端。这件作品与同名图书并无关联，作品中有39套晚餐餐具，围绕着三角形的餐桌（三角形的底为48英尺，两腰各43英尺）排列着。39套餐具各自代表一位真人，如克里斯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乔治娅·奥奇弗（Georgia O’Keeffe）、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等，其中也有一些是神话中的原始女神。每位客人面前都有一个刺绣精美的餐盘垫子，上面写有客人的名字。垫子上面放者陶瓷的盘子。盘子上绘着或雕刻着女性生殖器的褶皱，风格多样、形象逼真。这件作品引起了巨大的政治争议，在经过激烈的听证之后，禁止在其展出地哥伦比亚特区大学中永久保留。同时，这件作品又被公认为艺术家们可视化的对话的开端标志。一位当代艺术家在谈及她自己以及她这一代与芝加哥的关系时说：“这件作品中除了阴道还是阴道，但这并不是件关于阴道的作品。”的确，她们的作品也涉及其他辅助器官，还涉及很多其他内容。“这几乎就像发明出一种使女性力量容光焕发的新语言。”现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艺术是存在的。如一位评论家所注意到的，安·沃尔什（Anne Walsh）的《今夏我学会了手淫的新方法》[21]“表现了独自居住、独自创作的女艺术家经历挫折之后，所表达出的深思与讽刺”。我们应邀来看猫在页边的抓痕，从而了解到，这里只有艺术家和她的猫。另一方面，画中的枕头并不那么具有讽刺意味，艺术家的心情也未必深邃。而在安妮·斯普林科（Annie Sprinkle）的行为艺术时期（1992—1993），枕头或许就是枕头，而手淫的新方法或许也就是手淫的新方法。

斯普林科原名爱伦·斯坦伯格（Ellen Steinburg），她将自我打造成为“后淫秽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仪式主持者”、“高级女牧师”，甚至干脆可称为“女神”。她是色情的倡导者，特别是手淫是倡导者。在她的个人主页上，她把自己做成了千手湿婆，腿叉开得很宽，周围摆满了性玩具，手里玩弄着阳具。（她目前正在出售一种抛光黑色理石做的“爱柄阳具”，定量发行、有编号、附有她的签名。目前已制成50个，还剩余40个。每个售价200美元，另加6美元邮费及手续费。）她的网站有她个人大量照片可供下载，其中一幅，她叉开双腿，阴唇张开，无名指摆弄着阴蒂[22]。修剪过指甲的食指与中指间精巧地夹着一支烟。她的另一只手抚弄着从张开的皮乳罩中露出来的乳头。她曾经做过妓女、做过黄色影片明星，如今成为了一名行为艺术家，且自称为“性学大师”。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她，她现在确实成为许多大学的客座艺术家——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她的日程中就排列着包括瓦萨大学和俄勒冈大学讲座。手淫与下流永远是不同的概念。 [449]

斯普林科在激进的淫秽电影业有着25年的职业生涯，且一贯倡导女性手淫。与之相比，佐·列奥那德（Zoe Leonard）于1992年在卡斯尔新美术馆展出的作品要更复杂一些。在作品的一端，有一位身着盛装的18世纪妇女，其衣着、财富、物质财产，均有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在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穿着同样讲究的女人，被她的小儿子拥抱着。她的手一本正经地交叉着放在大腿前。两个女人的中间，是一幅古尔贝的《世界起源》的小幅复制品：带有阴毛的女性胯部。古尔贝的那幅画曾经是专门为土耳其驻法大使的闺房而作。但列奥那德与古尔贝那幅并不完全一样，列奥那德似乎加上了一只手。这件作品中的对立或许很好地展现了可视性这一艺术的本质，并展现了我们对其的看法："每件艺术品都潜藏着一些下流的东西，一些令人喘着粗气的东西，一些使自我产生并发展的东西。"对于这件作品，这些评论并不正确，因为画中被加上了一只手，因为这只手挡住了长满毛的那个区域，因为那两只手指并未伸向那很难看清的阴蒂。这幅画已经与那位土耳其老爷从古尔贝手中买走的那幅大不相同，这幅画所要展示的，已不再是叉开双腿的被动女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探索着自己生殖器官的女人正在自娱自乐，全然不顾周围的旁观者。如果说这幅画主题是窥淫行为，那么我们这些旁观者绝不是请来的观众。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幅作品中学到点什么，那就是：自主是通向社会性的第一步。欣赏这样一幅作品，与欣赏古尔贝那幅下流的画并不同。在列奥那德这幅画中，一个女人除拥有自我外，又拥有其他一切；而另外一个女人则什么也没有。那个18世纪女人显然属于后者。（这幅画与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太一样，尽管列奥那德的本意使之更加接近刚才的说法。在卡斯尔展览之时，列奥那德其实并未看过古尔贝的画，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过这幅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并非转引。她注意到，在艺术作品中，女人被描绘为男人异性恋欲望的催化剂，而女人自己的欲望却从未被描述。她请了六位朋友摆好姿势摄影，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试图使形势有所好转。她还要"描述女人的性欲望，而不是女人对他人欲望的满足"。她也在公众中全面引起了对我们这一话题的争论。）（列奥那德对这件作品的兴趣不在于无处不在的男性目光，也不在于其可能表现出也可能未表现出的力量，而在于女人目光的消失。画中的女人总在看着什么，但看的绝不是画家。）[450]

斯普林科的凝视与列奥那德的凝视并不相同。前者总是向公众展示其阴户与宫颈（对此还有专门的网页），而后者则使用了历史比较法，且并非考虑古尔贝模式的第一人。其他许多艺术家也同样在思索着，其中包括马尔塞尔·杜尚、汉斯·贝尔墨（Hans Bellmer）、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要数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这些人也并非最后一些考虑这一问题的人。1997年，两位年轻的塞尔维亚艺术家依据对古尔贝行为的推测，录制了一盘录像带。[451] 毕加索的主要兴趣似乎不在手淫上，而在他的艺术上，其性欲能量十分强大，适用域很广，使我们的话题变得十分灰暗。他的艺术可以使人们大胆地窥淫，从而形成与18世纪截然不同的效果，但我们所能看到的毕加索作品展现了女性的性自主意义。这并非阿里斯托芬式的笑话，而是对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性欲能力的尊

崇。

在1974年11月的《美术论坛》上，林达·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刊登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广告，使约翰·马尔顿第一次公布的变色龙式私人恶行有了新的变异。这一方式使手淫走出了自娱领域、欲望自主领域，径直使之成为力量控制。正如许多人所指出，这一方式使这位女艺术家有了阴茎，并可以对男艺术家们垄断这一领域的图谋进行了嘲笑。确切地说，这一方式对整个关于阴茎的理论都加以了嘲笑。但这位艺术家显然是在进行双重手淫：本格里斯伸出了她那硕大得荒诞的阳具的一端，并抚摸着其主干，仿佛这个阴茎是真的一般。无论如何，她所谈到的力量不仅仅是阴茎的力量，更是因玩弄其所代表的事物而获得的力量。这一手淫方式的双重性同样显而易见：手淫不仅是自主之源、力量之源，而且是自卑之源、感伤之源。其快乐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452]

男人们在为独自性行为正名的过程中，行动十分缓慢。早先，手淫被看做带有同性恋性质，手淫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些执迷不悟。他们故意地投身于自体性行为之中，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这种行为不分性别，男女都有；也不分性向，同性恋异性恋都有。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据说就已经有了集体手淫行为，但我并未找到证据。SF小子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口号是“为喜欢集体手淫的男人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一口号至今仍可在其网站上看到。纽约小子自称为“喜欢一起手淫的男人组织”，成立于1980年。这些组织均成立于HIV病毒发现之前——对艾滋病进行传染病学阐释之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艾滋病使这类俱乐部人气大增，因为这种性行为比公共浴池中淫乱行为要安全得多。

但这类俱乐部之所以会走向世界，并非仅仅因为性安全的缘故。例如，成立于1990年的墨尔本手淫者协会，自称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成为性的先锋派，其网站称：“Wanking属于地道的澳大利亚语汇，其意思就是手淫。Wanker指的是手淫者，这种人或许有点怪，但却相信自己的行为，钟爱自己的行为，就算自己的这种行为不是主流，也仍旧如此。”男同性恋的色情文化，也与绝大多数色情文化一样，为手淫提供便利，并充分提供手淫的场景。除此之外，男同性恋的色情文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让男同性恋者为世人所关注”、“为男同性恋者的记忆留下范例”。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男同性恋的色情文化还是宣扬非生殖性行为的有效途径。《单手历史》一书阐释了上述观点，成为20世纪手淫文化的化身。卢梭的观念再次被颠覆。[453]

无论是同性恋的男子，还是异性恋的男子，都已经放弃对手淫的陈旧偏见，都已把手淫视为“与身体接触”的途径。正如我们在女权主义文献中看到的那样，手淫有时候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去阐释。手淫可以成为通向更好的异性恋关系的途径：学习新的性技巧、加深亲昵程度、使性生活更加丰富。有时候则可以用贝蒂·道森的新希腊传统文化理论来解释：发展“强有力的自我恋爱”，或是在自我之中找到“权威力量”，均为社会生活的序曲；“自我触摸可建立起自我尊重”；经历快感可以促进与他人分享快感。简言之，18世纪的观念被彻底颠覆。手淫建立了某种自我，并

使这种自我合乎伦理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手淫又是一种更加仁慈、更加温柔的男性气概，可以使人与神走得更近。“阴茎形象是个巨大的谜”，“兴奋高潮可以是超自然的经历”。不同形式的手淫可以与不同种类的精神实践建立关联：有的带有密教哲学色彩，有的隐约显示出泛神论的特点，还有的与瑜珈有关等等。琼妮·布兰克（Joanie Blank）于1996年收集整理的95名男女对自我快感的叙述，成为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文献。[454]

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男性艺术家，当然也会把手淫当做自我发现，当做自我创造，当做公共政治的主题。还有的艺术家会把这一行为表现出来。例如，我现在想到了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他以苏珊·罗森伯格（Susan Rothenberg）的异性恋伴侣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1985年的《手淫着的男人》、《性与死亡/双人69》两部作品中，他向人们展示了一批多余的、毫无生机的霓虹灯式人物。对这类人物来说，无论是手淫还是其他性行为，都显得十分机械，毫无乐趣可言。人与人之间的亲昵，在他们身上显得遥不可期。但是，惠特曼的那种带有同性恋倾向的抒情诗歌传统，在沃依纳洛维奇（Wojnarowicz）1978—1979年的作品《亚瑟·兰波在纽约》中得以延续。他的朋友兼同事布莱恩·巴特里克（Brian Butterick）将这一人物形象认定为沃依纳洛维奇所塑造的文化英雄之一。在罗伯特·马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比尔》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两个框架内均有柔嫩白皙的男性骨盆及勃起的暗黑色阴茎。他那戴着镯子的手腕，伸向无际的空间。他用那动作精巧的手抓住自己的生殖器，两个框架中的手方向相反，从而作出抚弄的样子。两幅图景之间是一片静谧而空虚的黑色，使整个手淫场面几近于挽歌。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即为其存在。这些作品融合了18世纪独自性行为的伦理中心，转述了19世纪独自性行为的诗般言语，这一切最终都被融入了20世纪晚期纽约的同性恋世界中。[455]

保守派声称，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道德日渐衰退。面对这种批评，性学新潮流、艺术新潮流成为了避雷针。在这种“文化战争”的背景下，手淫变得具有政治性，这一点显得十分明显、十分复杂。对于手淫，在美国人得知白宫的官方观点之前，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乔瑟莉·埃尔德斯（Jocelyn Elders）就已明确表示，她并不苟同什么白宫观点。比尔·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除她的职务，并称这一行为与政治无关。埃尔德斯将手淫认定为有益于公众健康，而克林顿表示：“这与政府政策相左，也与我个人的看法不符。”当然，这并非他撤掉埃尔德斯的真正原因，且媒体也暗示，埃尔德斯并未说过儿童应当在性教育课上被教会如何手淫。弗兰克·瑞奇（Frank Rich）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了题为《最后的禁忌词》的文章，指出：“克林顿明白，任何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手淫的人，其智商似乎根本就达不到学校教育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埃尔德斯触犯过很多人，尤其是保守人士。她在诸多方面有过十分激进的言论，如艾滋病问题、婚前性行为问题、毒品使用合法化问题等。政府最终认为，让她继续惹是生非实在不值。但很明显，她在各种新闻发布会上，总是在使用那个禁忌的词语，且总是有些

不假思索。[456] 显然，就是这一点使她一落千丈。文化方面的右翼势力其实对其观点颇为赞同，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些事情是无法名正言顺地搬上公共日程的。迄今仍没有哪位主流政客，愿意公开为手淫辩护，公开声称其在道德上无辜、行为上有益。

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这场文化战争还在继续。手淫成为倡导自由个体主义的人与恐惧自由个体主义的人斗争的核心。一方面，宗教右翼势力狂热地反对手淫。例如，基督教问答网站就在为启蒙运动以来的罪恶说进行圣经式的润色。有位年轻人写道："我是基督教徒，我有个尴尬的问题。我想知道在上帝的眼里手淫是不是错。"虚拟教士道森·麦克阿里斯特（Dawson McAllister）承认，《圣经》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他还是回答道："上帝创造了性，其目的是使男人脱离'孤独'。"（此处所援引的《创世记》2：18并没有这么说，此处即为上帝创造各种鸟兽的故事开始之处。这一故事以2：21—2：24中上帝创造夏娃为结束。此处还宣告了二人相互依恋、"融为一体"。）此外，麦克阿里斯特还指出，性幻想总是伴随着手淫：人们可以从图像、电影、照片之中构建自己的性幻想。上帝对此问题的观点十分明确："追求幻想的人缺乏判断力。"麦克阿里斯特最后还说，手淫会取代健康的夫妻关系，变成情绪上的拐棍。就算这位优秀的布道者其实未曾拜读过去三个世纪中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那他心中也一定早已熟识这些看法了。

对于独自性行为的看法，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意外地在当代法国文学与哲学文化的辉煌中发现了与自己十分相似的观点。在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作，情感小说《基本粒子》中把手淫视为六、七十年代性革命带来的最卑下症状，同时也是在肉体上、精神上屈从于诱惑的最卑下症状。在这部探寻后现代爱情的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之一即是一位过度手淫者，他发了疯。另一位是他的弟弟，他始终无法通过手淫达到满足。这使他对自己的肉体产生了厌恶，并驱使他在生物科学的领域探寻解决性满足的非肉体方法：即一种纯洁的肉体满足感，既不需要人际接触的负担，又不会带来身体衰弱。这些均为新时代的旧论调，惟一与过去不同的仅仅是其科幻背景。

另一方面，有线电视、好莱坞电影所打造的以商业为动力的文化，也在展现着道德方面的各种优柔寡断。那种兴奋夹杂着恐惧、尴尬与卑下感，当年正是这样的感觉造就了那部《手淫》。在这类影视作品中，手淫很少代表着解放、审美的冲动，也很少起补救作用。这与我们曾在别处看到的不同。在美国的大众化电影中，时不时会看到成年或未成年的男性手淫时被捉，并因"做了那种事"而遭受侮辱、嘲讽以及精神打击。例如，在电影《美国馅饼》中，杰森·布里格斯将袜子套在勃起的阴茎上，欣赏着有线电视中播放的黄色影片，他的父母突然破门而入。整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冗长而肤浅的笑话，即苹果馅饼可在手淫中用来代替阴道。在《达迪·克拉维茨学徒记》中，主人公达迪醒来时发现室友在"做那事"，便挖苦道："干吗不用另一只手呢？那样会感觉是在跟另一个人做爱。"《美国丽人》中的凯文·斯贝西淋浴时手淫被发现过，躺在床上手淫也被发现过，在床上手淫时弄醒了他的妻子，妻子为此十分恼怒，

并跟他大吵了一场。在《情迷索玛丽》中，本·斯蒂勒“释放一下”的场景颇有些滑稽荒诞：他把精液溅到了洗手池上，竟然被他未来的女友当做洗发液用了。《坏中尉》中由哈维·凯特尔扮演的坏中尉在车门旁手淫，却猛然发现车里坐着两个女孩，他连忙停了手——这可不是什么幸福的时刻。 [457]

20世纪90年代的偶像剧《宋飞传》是一部“表现虚无”的剧，因此是惟我论与自我中心的绝妙例证。这种惟我论与自我中心是18世纪时人们所恐惧的，如若不停止手淫，惟我论与自我中心必将把我们吞噬掉。该剧的第51集名为《竞赛》，于1992年11月18日首播。这一集可谓是臭名昭著，《手淫》中所宣扬的威胁论出现在了这一集当中。剧中的主人公们打了个赌：大家谁也别手淫，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克拉默看到了另一间公寓房中的裸女，于是便最先败下阵来。而埃莱娜在瞥了小约翰·肯尼迪一眼之后也陷入了幻想，变得难以自拔。接着，杰里成了第三个退却的人。乔治赢了。此后，在1993年9月23日播出的第66集《肥大的衬衫》中，乔治找到了一份担任手模的工作。在签协议时，他向老板保证，他那迷人手指绝对不会失去其魅力，因为他曾在不手淫竞赛中获胜过。而这一职位的前任就是因为做了“那事”，导致珍贵的双手枯萎起皱，最终断送了前程。在最后一集中，乔治最终招认他撒谎了，因而杰里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些事情与阿里斯托芬对这一话题的取笑并不相同，因为这些笑话产生于1712年之后，产生于走过了弗洛伊德时代的人们之中。这时的人们异常精通如何对从前的偏见进行讥讽、如何对前人坚持认为是犯罪的事情进行嘲弄。这些人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这类诡辩，但他们这些插科打诨却并未能够完全驱逐18世纪留给人们的罪恶萦绕的魔影。

启蒙运动时期的性伦理学曾经使手淫成为近代的罪恶幽灵。然而有迹象表明，在互联网时代，这一伦理渐渐得到了澄清。互联网摆脱了18世纪印刷文化的诸多约束，因而人们发现国际互联网各种声音激增。网络使人们相互交换故事变为可能，这些故事可以是关于幻想的、可以是关于欲望的，全然不受审查的限制，不受来自医学界、教会、家长或是教育当局的约束。在数字世界中，《手淫》、提索、坎普、沙尔斯曼及类似人物的观点，传播速度大了1万倍，然而其中的道德说教、死亡威胁，以及致病论、致疯论，却无人在乎，被剔除在外了。手淫不仅仅成为个人自我发现的渠道，而且成为新形式的性社交活动的基础，这类社交活动根植于对想像力的赞颂之中、对想像力的无限可能的赞颂之中。（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手淫月”的来临即是在庆祝这一新群体的产生，这种嘉年华式的欢闹，颠覆了《手淫》中所支持的价值观。）

黄色网站迎合了能够想像得出来的各种幻想，这类网站的数量已达数十万个。而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则是手淫者的虚拟社区的激增。这种虚拟社区的建立，形成了社交活动的另类宇宙。手淫行为公开化了，变得不再那么隐私。网站“手淫世界”（Jackin World）在其成立五周年之际做了一次调查，5000多名青年男子参与了调查。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22.8岁。其中有1/3的人称，他们登陆该网站的目的是更多了解同龄人

对此问题的看法。（另有1/3的人，是为了熟悉这项先进的技术；还有1/3的人称，他们仅仅是来寻求刺激。每一类人的需求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该网站还推出了“每周一问”（分设男孩版和女孩版），问题的答案中提供了大量可供分享的经验，极富价值，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提索当年所收集的信息。几乎每位参与者都愉快地讲述了自己从自体性行为中得到的乐趣。至于哪些人读过了这些信息、他们关注于这些信息时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458] 但我们确实知道，网络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流与对话，使色情群体的存在变为了可能。这一群体的欲望是1712年的条件所难以满足的。

一本88页的小册子，一本最为简陋的文献，它带来了“良心受伤所导致的麻烦与痛苦”这一论断。这一论断为贪得无厌的庸医们所认同，亦为黄色电影制作商们所认同。这段历史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许多严肃认真的男男女女，其中不乏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曾将前人之所思看得十分重要。而今，这些观点则会沦落为伦理学中不甚重要的旁枝末梢，对有的人来说甚至显得有些可笑。有件事至今读起来令人感到奇怪和不安：20世纪之初，年轻的维特根斯坦曾在一战的东线战场上经历着道德上的痛苦；卢梭在和平年代的自我伤害行为尚且令人心烦意乱，而他竟然在死亡与屠戮中手淫依旧。独自性行为具有自给自足的潜能，它触及了现代人类的内心生活，其中的运作方式我们至今不得而知。独自性行为依旧在自我发现与自我专注之间保持着平衡，在欲望与放纵之间保持着平衡，在隐私与孤独之间保持着平衡，在无辜与罪过之间保持着平衡。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其他哪种性行为会是这样。

译名对照表

A

Acconci，Vito　维托·阿孔奇

Addison，Joseph　约瑟夫·阿狄森

Adler，Alfred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eschines　埃斯基涅斯

Ainsworth，Henry　亨利·埃恩斯沃斯

Albert the Great　大阿尔伯特

Ammi，Rabbi　拉比阿米

Anti-semitism，and masturbation　反闪米特运动与手淫

Augustine，saint　圣奥古斯丁

Austin，Alfred　阿尔弗雷德·奥斯汀

Avicenna　艾维塞纳

B

Baden-Powell，Lord　贝登堡勋爵

Bakunin，Mikhail　巴枯宁

Barbach，Lonnie　罗尼·巴尔巴赫

Baudelaire　波德莱尔

Baudouin，Pierre-Antoine　皮埃尔-安托万·博杜安

Baynard，Edward　爱德华·贝纳德

Beddoes，Thomas　汤姆斯·贝道斯

Bekker，Balthasar　巴沙萨·贝克尔

Belinsky，Vissarion　别林斯基

Benglis，Lynda　林达·本格里斯

Bentham，Jeremy　边沁

Bernardino of Siena　圣伯尔纳

Besant，Annie　安妮·贝桑

Bienville，D.T.de　德·边维尔

Blackwell，Elizabeth　依丽莎白·布莱克威尔

Bloch，Iwan　伊万·布洛赫

Blumenbach，Johann Friedrich 布鲁门巴赫

Bonaparte，Marie　玛丽·波拿巴特

Boswell，James　詹姆士·鲍斯威尔

Breton，André 安得列·布雷东

Brill，A.A A.A.布里尔

Browne，Stella　斯黛拉·布朗

Buchan，A.P. 布臣

Burchard of Worms　沃尔姆斯大主教伯彻德

Burton，Robert　罗伯特·伯顿

Byrd，William III　威廉·博德三世

C

Calvin，John　约翰·加尔文

Campe，Joachim Heinrich　坎普

Cannon，John　约翰·加侬

Capel，Richard　理查德·卡贝尔

Carlile，Richard　理查德·卡莱尔

Carus，Carl Albert　卡尔·大阿尔伯特·卡鲁斯

Chalker，Rebecca　丽贝卡·乔克

Chambers，Ephraim　埃夫兰·钱伯斯

Chaucer，Geoffrey　乔叟

Chicago，Judy　朱迪·芝加哥

Cicero　西塞罗

Clinton，Bill　比尔·克林顿

Cogan，Thomas　托马斯·高根

Coleridge　柯尔律治

Colette　科莱特

Colman，George　乔治·科尔曼

Comstock，Anthony　安东尼·康斯托克

Condillac　孔狄亚克

Corbin，Alain　阿兰·科尔班

Cove，Mary　玛丽·卡夫

Crich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里奇顿

Crime of Onan，The　俄南的罪恶

Crouch，Thomas　托马斯·科罗奇

Cruikshank，Isaac　艾萨克·克雷克尚克

Culpepper，Nicholas　尼古拉斯·卡尔佩珀

D

Dante　但丁

Debreyne，Pierre Jean Corneille　简·康内勒·戴伯雷纳

Defoe，Daniel　丹尼尔·笛福

Deutsch，Helen　海伦·德意志

Dickens，Helen　查尔斯·狄更斯

Diderot，Denis　狄得罗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勒尔逖斯

Diogenes，the Cynic　第欧根尼，犬儒派

Doc Johnson　约翰逊

Dodson，Betty　贝蒂·道森

Dorat，Claude Joseph　克劳德·约瑟夫·多拉

Douglas，Mary　玛丽·道格拉斯

Dryden，John　约翰·德莱顿

Duchamp，Marcel　杜尚

Dugan，Alan　亚兰·杜根

Dworkin，Andrea　安德丽·德沃金

E

Edgeworth，Maria　玛丽亚·埃奇沃思

Elders，Jocelyn　乔斯琳·埃尔德斯

Eliezer，Rabbi　埃利泽拉比

Ellis，Havelock　哈夫洛克·埃利斯

Ettmüller，Michael　麦克·埃特姆勒

Eulenburg，Albert　阿尔伯特·欧伦伯格

F

Fallopius　法罗皮欧

Fenichel，Otto　费尼沙尔

Ferenczi，Sandor　桑多尔·费伦齐

Fliess，Wilhelm　怀赫姆·弗立斯

Forel，Auguste　奥古斯特·福勒尔

Foucault，Michel　福柯

Fowler，O.S.　福勒

Fragonard，Jean-Honoré　弗拉戈纳尔

Frank，Johann Peter　弗兰克

Freud，Sigmund　弗洛伊德

Friday，Nancy　南希·弗莱迪

G

Galen，Claudius　盖仑

Gallop，Jane　简·加洛普

Garrity，Terry　特里·加里提

Garroway，Mrs.　盖洛威夫人

Gerson，Jean de　让·格尔森

Ghendt，Emmanuel de　埃马纽埃尔·德·冈特

Gide，André 纪德

Giorgione　乔尔乔涅

Gladston，William　格拉斯通

Good Vibration　快乐振荡器

Gordon，Duncan　邓肯·戈登

Graham，Sylvester　希尔维斯特·格兰汉姆

Grégoire，Abbé　阿比·格里高利

Gregory XI，Pope　教皇贵格利十一世

Gregory the Great，Pope　教皇贵格利一世

Greuze　格勒兹

H

Hall，G.Stanley G.　斯坦利·霍尔

Haller，Albrecht von　阿尔布莱克·冯·哈勒

Hammond，Anthony　安冬尼·哈蒙德

Harvey，William　哈维

Heinzmann，Johann Georg　约翰·格奥尔格·海因茨曼

Helman，Isidore Stanislas　依西多尔·斯塔尼斯拉·埃尔曼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siod　赫西奥德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Hitzig，Eduard　爱得华·希齐格

Hodson，James　詹姆斯·霍德森

Hoffman，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霍夫曼

Hufeland，Christoph Wilhelm　克里斯托·威廉·胡费兰

Hughes，George　乔治·休斯

Hume，David　休谟

Hunt，Morton　莫顿·亨特

Hunter，John　约翰·亨特

Hutcheson，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哈奇森

Hutton，Laura　劳拉·赫顿

I

Irigarav，Luce　露丝·伊利格拉芙

Isidore　伊西多尔

Itard，Jean-Marc-Gaspard　伊塔

J

James，Robert　罗伯特·詹姆斯

Jerome，Saint　圣哲杰罗姆

John，Cassin　卡辛·约翰

Johnson，Jill　吉尔·约翰逊

Johnson，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Jones，Earnest　欧内斯特·琼斯

Juvenal　尤维纳利

K

Kabbala　喀巴拉

Kant，Immanuel　康德

Kapff，Sixt Karl　基赫特·卡尔·卡普弗

Kellogg，J.H. 凯洛格

Klein，Melanie　梅兰尼·克赖因

Kleist，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Knox，Vicesimus　维塞斯莫·诺克斯

Koedt，Anne　安妮·科德特

Kraepelin，Emil　埃米尔·克莱普林

Krafft-Ebing，Richard von　克拉夫特-埃宾

Krassner，Paul　保罗·柯拉斯纳

L

Laborde　拉波尔德

Lallemand　拉勒曼

Lambert　兰贝尔

Laplanche，Lean　让·拉普朗什

Lawrence，D.H.　劳伦斯

Leadbeater，C.W.　利德比特

Leolx，Pope　教皇列奥十世

Leonard，Zoe　佐·列奥那德

Luther　路德

M

Mackinnon，Catherine　凯瑟林·麦金农

Mailer，Norman　诺曼·梅勒

Malthus　马尔萨斯

Mandeville，Bernard　伯纳德·曼德维尔

Manutius，Aldus　阿尔德斯·马努提厄斯

Mapplethorpe，Robert　罗伯特·马普索普

Marie-Antoinette　玛丽·安东尼

Marshall，John　约翰·马歇尔

Marten，John　约翰·马尔顿

Masters，William　威廉·马斯特大师

Mather，Cotton　考顿·马瑟

Maudsley，Henry　亨利·莫德斯里

Maxwell，Herbert　赫伯特·麦克斯维尔

McAllister，Dawson　道森·麦克阿里斯特

McDougall，Joyce　乔伊斯·迈克道尔

Meagher，John　约翰·米格尔

Melendy，Mary Ries　梅兰迪

Menuret de，Chambaud　钱巴德·曼纽特

Metchnikoff，Elie　梅契尼科夫

Millett，Kate　凯特·米利特

Montaigne，Miclel de　蒙田

Montesquieu，Baron de　孟德斯鸠

Moravia，Alberto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Musonius Rufus　穆索尼厄斯

N

Nauman，Bruce　布鲁斯·诺曼

Nearkos　尼尔科斯

Nerciat，Andréa de　安德雷阿·德·奈尔西亚

Nietzsche，Friedrich　尼采

Nothnagel，Hermann　赫尔曼·诺斯纳吉尔

Nougaret，P.J.B.　努伽莱

O

Ostervald，J.E.　奥斯特瓦尔德

Our Bodies，Ourselves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d’Outremont Phillippe　杜特蒙

Ovid　奥维德

P

Paget，Sir James　詹姆斯·帕格特

Parker，Henry　亨利·帕克尔

Pepys，Samuel　塞缪尔·佩皮斯

Péret，Benjamin　本杰明·佩雷

Peter Damian　彼得·达米安

Peter Lombard　彼得·伦巴底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的菲洛

Picasso，Pablo　毕加索

Pliny　普林尼

Pontalis　庞塔里斯

Pope，Alexander　教皇亚历山大

Porter，Roy　罗依·波特

Proudhon，Pierre-Joseph　约瑟夫·普鲁东

Q

Queneau，Raymond　雷蒙·魁诺

R

Ray，Isaac　埃萨克·雷

Raymond of Pe?afort　雷蒙德

Reubens，Paul　保罗·雷宾斯

Rohleder，Hermann　赫尔曼·洛雷德

Romano，Giulio　裘里奥·罗玛诺

Roth，Philip　菲利普·罗斯

Rothos，Mathew　马修·罗索斯

Rouseau，Jean-Jaccques　卢梭

Rowlander，Thomas　托马斯·罗兰德

Ruskin，John　约翰·罗斯金

S

Salzmann，C.G.　沙尔斯曼

Sanctorious　桑托里奥斯

Sarganeck，Georg　齐奥格·萨格耐克

Schiele，Egon　埃根·席勒

Schreber，Daniel Gottlieb　丹尼尔·戈特里普·施莱伯

Sedgwick，Eve　伊夫·塞奇威克

Shelley，Martha　玛萨·雪莱

Sheridan，Richard　理查德·谢立丹

Shorter，Edward　爱德华·绍特尔

Sibly　西布里

Skvorecky，Josef　约瑟夫·斯科沃莱奇

Smith，Adan　亚当·斯密

Solomon，Dr.　所罗门医生

Sorbon　索本

Sprinkle，Annie　安妮·斯普林科

Stehelin，Johann Rudolph　约翰·鲁道夫·斯特林

Stekel，Wilhelm　威廉·斯特科

Stone，Lawrence　劳伦斯·斯通

Stopes，Mary　玛丽·斯托普斯

Strindberg，August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Swift，Jonathan　斯威夫特

Symon　西蒙

Symonds，John Addington　约翰·丁顿·西蒙兹

T

Taylor，Charles　查尔斯·泰勒

Taylor，Jeremy　杰洛米·泰勒

Ter Borch，Gerard　杰拉尔德·泰尔·波尔赫

Theodore of Canterbery　坎特伯雷的西奥多

Theodulf of Orléans　奥尔良的西奥多夫

Thomas of Cantimpré　康坦普雷的托马斯

Tissot　提索

Titian　提香

Trewby，Arthur　阿瑟·特鲁比

Trosse，George　特罗西

Trotter，Thomas　汤姆斯·特罗特

U

Unik，Pierre　皮埃尔·于尼克

V

Varenne，Paul　保尔·瓦热内

Venette，Nicolas　尼古拉斯·韦奈特

Verbitskaia，Anastasia　安娜斯塔莎·维布斯卡娅

Vidal，Gore　戈尔·维达尔

Vogel　弗格尔

Voltaire　伏尔泰

W

Wagner，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Walpole，Horace　霍勒斯·沃波尔

Walsh，Anne　安·沃尔什

Watson，Edith　依迪斯·沃森

Wesley，John　约翰·卫斯理

Whitman，Walt　惠特曼

Wojnarowicz　沃依纳洛维奇

Wollstonecraft，Mary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Wood-Allen，Mary　玛丽·伍德艾伦

Y

Yohanan，Rabbi　拉比约翰南

Yosi，Rabbi　拉比尤西

Z

Zedler，Johann Heinrich　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

Zimmermann，Johann Georg　约翰·乔格·齐莫尔曼

[1] 《手淫者肖像》，摘自《性制度及其错乱行为》。左图是手淫者形象，面无血色，四肢无力；右图为戒除手淫恶习的形象，抬头挺胸，气宇昂扬。

[2] 半人半兽神手淫彩绘图。在彩绘中，三尊山羊形状的神用自己的手来获取满足。虽然看上去粗鄙且丑陋，但他们代表了手淫者的祖先。神灵因怜悯他们无法得到性满足而教会他们手淫。据说，人类就是从这些半人半兽神那里学会如何自我满足的。因此，手淫的血统似乎并不那么“高贵”。

[3] 半人半兽神手淫彩绘图。这幅彩绘似乎文雅得多。但是那巨大的阴茎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文明行为。通常来说，希腊精品艺术中对于阴茎的描绘不会这样明显。

[4] 女性手淫图。古希腊文化中女性手淫的画面寥寥无几。图中喷泉旁的女性似乎在用左手抚玩生殖器部位，此时，另外一对男女恰好到来。这些描绘女性使用自慰器具进行手淫的图画其实并非真正关于手淫，它们讨论的是在没有阴茎的情况下，女性应该如何找到慰藉自己的方法。

[5] 《读信的淑女》，杰拉尔德·泰尔·波尔赫的作品，1660。历史学家斯维提亚纳·阿尔珀斯（Svetiana Alpers）评论到：在这幅画以及17世纪后期、18世纪的以信为主题的画中，“爱弥漫在空气中”。

[6] 《回忆》，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作品，1776。画中很明显表现出了这位读信入了迷的年轻女子在回忆爱情。

[7] 《熟睡的淑女》，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作品，1725-1805。画中球和笔表明，这位淑女很可能在忙于更为积极、更为世故的事情，但她疲倦而满足的面容以及趴在她腿上的小狗，经常是色情图画的标志，暗示着文学方面、性方面的自我专注。

[8] 《奢华》，艾萨克·克雷克尚克的作品，1801。此画的主题为：阅读小说、消费更多商品以及手淫。这几点被英国最著名的政治画家加在了一起。

[9] 《危险的小说》，依西多尔·斯塔尼斯拉·埃尔曼（Isidore Stanislas Helman）依据尼古拉·拉夫兰斯（Nicholas Lavreince）的设计而作，1781。

[10] 《睡者的女人》，莫罗（Moreau）的作品，选自让·本杰明·德·拉波尔德《歌曲选》。文字说明为：“今天，她的眼睛闭上了，因为她的心开始恋爱了。”书掉到了一边，而她的姿势似乎说明，她一个人待着挺满足的。

[11] “吻的颂歌”，克劳德·约瑟夫·多拉的首页花饰。

[12] 《自我检查的修女》，选自努伽莱《浪荡的进程》。

[13] 《孤独的乐趣》，托马斯·罗兰森的作品，1812。这幅画选自一本淫秽图画集，作者是英国19世纪早期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无论从这幅画中还能悟出点什么，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在将性成为自己的事情。

[14] 《身体内的魔鬼》，安德雷阿·德·奈尔西亚的作品，这幅印刷的图画选自18世纪最著名的淫秽出版物之一。这幅画把主题从阅读和手淫延展到了我们称之为辅助性具的那些东西。

[15] 手淫似乎仅仅是人类众多行为与兴趣中的一种而已，因此应当有专门的月份献给这一行为与兴趣。这一观念的产生表明手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不再像过去那样视为见不得人的罪行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精明的商业运作。

[16] 《披黑斗篷手淫的自画像》，埃根·席勒的作品，1911。手淫是席勒自我检测的核心，无论作为男人还是作为艺术家均如此。现存于维也纳的阿尔伯提纳美术馆。

[17] 《手放在生殖器上的裸体自画像》，埃根·席勒的作品，1911。一幅总体上更为抒情的画，揭示了自体性行为与内心世界的关系。现存于维也纳的列奥波德博物馆。

[18] 《岔腿而蹲的女人》，埃根·席勒的作品，1918。这是第一幅将女性手淫作为自主性行为来展现的画，不像18世纪的作品那样为窥淫者提供乐趣。现存于维也纳的列奥波德博物馆。

[19] 《躺在带图案的床罩上的裸体男孩》，1909。画中这位可爱的男孩的右手究竟干了什么？或是打算干什么？欣赏者无法准确知晓。这幅表达色情自我专注的画中带有一种宁静而超然于时间的感觉。现存于维也纳的列奥波德博物馆。

[20] 《温床》，维托·阿孔奇的行为艺术作品，纽约索纳本德美术馆，1972年。

[21] 《今夏我学会了手淫的新方法》，安·沃尔什的作品，1992—1993。方格纸上的墨迹和咀嚼过的泡沫橡胶，20×24×1.5英寸。该作品成为当代女性艺术。

[22] 《拿着烟卷、露着阴蒂的安妮·斯普林科》，安妮·斯普林科的作品，2001。

[1] 4th ed.，p.63;17th ed.，pp.70-71.我之所以援引这两个版本，是因为第4版是英美两国所有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版本。

《手淫》（Onania;or，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in both sexes，considered，wi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最早由作者本人印刷，发行商N.Crouch，P.Varenne，J.Isted，　［1718？］）。这一出版日期无从确定。有些图书馆认为第四版出版于1725年，而有些图书馆认为，该书早在1720年就已经发行了第五版。我在本书细述了此书的出版历史和各种版本的发行日期。我个人认为第四版应该发行于1718年。此书的第17版之所以被援引，是因为著名医生提索的图书馆中保存此书。正是因为这位杰出的瑞士学者，“手淫”一词才被收录进《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手淫》第17版在1752年由伦敦的C.Corbett印刷并发行。在本书，我还引用了《手淫》的第8版（London：E.Rumball，1723）和《补遗本》（Supplement，London：Printed for T.Crouch，1723），这两个版本由Garland Press出版社制作发行（New York：Garland，1986）。 根据我们的发行知识来判断，该书在18世纪的版本大概有2000本。但鉴定作者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该书中既阐述了手淫的危害，又同时做起了医疗广告，说明作者可能是一个医生。而且作者也在书中说道，如果患者有时间，只需在书商那里交上一定的费用，便可以和作者当面详谈病情；通过邮寄费用的方式也可以。这也证明了我的观点：《手淫》的作者就是医生兼色情作者约翰·马尔顿。

[2] 在现代手淫问题研究中最早确定医学作用的是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Robert Hurley译，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该书的第一卷讲述了他如何来治疗手淫。Dr.Pouillet的著作Essai mé dico-philosophique sur les formes，les causes，les signes，les conséquences et le traitement de l’onanisme chez la femme（Paris：Adrien Delahaye，1876）虽然主要针对女性手淫，但也涉及了许多男女手淫者的通用问题。

[3] Sir James Paget，Clinical Lectures and Essays，2nd ed.，ed.Howard Marsh（London：Longman，Green，1879），pp.291-292，275-299（几乎随处可见）。该言论最早见于Paget在1879年所做的关于手淫病理学的一个讲座上（Paget因以他名字命名的“帕格特症”［一种骨骼异常的疾病］而闻名）。

[4] 出自J.B.Schneewind的著作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A History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 & 9。Schneewind认为，康德是首先提出“道德自治”概念的人。但我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理论都拥有相同的共性：反对传统、认为道德就是服从，并认为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道德判断力。弄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为什么手淫会和其他道德问题一样成为女性关注的话题的原因。

[5]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05-306.这本著作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虽只引用了2页内容，但该书的内容对我在手淫这个话题上的思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 事实上，在这之前并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手淫药方”。《手淫》作者此举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是第一个将手淫带入公共视野的人。由于治疗手淫的药物一般都只是帮助患者治愈手淫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并不能真正令患者停止手淫，因此该书的作者也许是想说，他从以往的医学资料中找到了一些能够加强体质、恢复活力的药方。

[7] 参见Francis Doherty，“The Anodyne Necklace：A Quack Remedy and Its Promotion，”Medical History 34（1990）.若想获知更多信息，参见Roy Porter，Health for Sale：Quackery in England，1660-1850（Manchester，UK，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

[8] 这本书的出版方式有许多中，很难说清楚《手淫》是以哪一种方式进行的。例如，Elizabeth Rumball为Thomas Crouch出版了第8版，每线装本售价2先令。出版日期至今无法确定的第4版没有显现印刷者，只是说是由N.Crouch，P.Varenne，和J.Isted发行，而且没有规定限价（J.Isted以1先令出售此书）。出版于1722年前后的第6版《手淫》声明是由书商T.Crouch出版并发行。上述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出版商和书商。《手淫补遗本》没有标明出版日期，是由T.Crouch和J.Isted共同印刷，售价为1先令6便士。1752年，“在Crouch和J.Isted先后离世之后”，书商C.Corbett发行了第17版的《手淫》和第8版的《补遗本》，售价为：线装本3先令，合订本3先令6便士。此版本在大英图书馆中可以找到，从书中空白页上的签名来看，它的主人是一个名叫Sarah Turk的女孩。书的内页附有该书第9版的广告，声称此书已经卖出1.5万本。大英图书馆中珍藏的此书的最近一个版本是第20版，由Glasgow的A.MacIntosh印刷出版，这个版本没有出版日期，没有标题页，也没有兜售药品的广告。而且，在之前版本中被注明是写给Crouch先生的信函，在这个版本中被改成了“某某先生”。日期也从先前的1720年左右改成了1740年左右，但该版本仍然保持了“软色情”的本质。大英图书馆中保存的这个版本的《手淫》曾一度属于Pisiasnus Fraxi——19世纪著名的色情文学收藏家。

[9] G.A.Cranfield，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1700-17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pp.222-223.此书引用的广告出自1727年12月1日出版的Brice's Weekly Journal。

[10] 有关邮件以及咖啡馆在报纸流通以及兜售假药中所起的作用，请参见Bryant Lillywhite，London Coffee Houses：A Reference Book of Coffee Houses of the Seventeenth，Eighteenth，and Nineteenth Centurie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63），pp.19&23。书中没有对各地的咖啡馆进行罗列，但是进行了比较概括的介绍。想了解18世纪伦敦物业情况，请参见Aytoun Ellis，The Penny Universities：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6），p.xiv and pp.129-144。

[11] 引自（在此也表示感谢）John Quincy，Dr.Carr's Medicinal Epistles Uppon Several Occasions Done into English，as a supplement to the explanation of Sanctorius's Aphorism（London，1714）。这两个修女的故事是该书41个故事中色情意味最浓的一个，且被置于反传统的、突出性主体的反天主教运动的大框架下来讨论：为什么教皇会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对两性关系一无所知”的主教来完成呢？而且，书中的其他故事与“性”并无太大关联。Quincy在书中写道，他不会“因为要表示谦恭而不对这个故事感到恶心”。Quincy还曾经翻译Albert the Great的著作Mysteries of Human Generation Fully revealed with explanatory notes，该书后来成为医学“软色情”文学市场中的主要商品，由“臭名昭著”的Edward Curll出版。

[12] [Thomas Stretzer]，A New Description of Merryland：Containing a Topographical，Geographical，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at Country，7th ed.（Bath，UK，1741），p.15.

[13] J.Isted出版过至少68部书籍及其各种版本，其中包括《手淫》的四个版本。其出版的作品还包括：畅销书A History of the Remarkable Life of Jack Sheppard（Jack Sheppard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抢劫犯，并屡次成功越狱）；一本名为The Lives of the Most Remarkable Criminals的合集；一部关于偷情的丈夫的戏剧；一系列法律用书。这些书籍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手淫》的发行。在关于各种性病的书籍里，手淫并未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手淫也会导致不举、不育、遗精、和其他生殖性疾病，例如：“不自觉的发冷、疼痛、性交过频以及自渎”（上文引自The Modern Siphylis;or The True Method of Curing Every Stage ad Symptom collected and digested，作者：I.F.Nicholson，New College Oxford和University of Glasgow两所大学的教授，[London，1718]）。 有关广告中涉及手淫的例子，请参见Doherty，“Anodyne Necklace”中第65条注释，其中引用了1732年的一则广告。

[14] John Marten，A Treatise of All the Degrees and Symptoms of the Venereal Disease in Both Sexes，6th ed.enl.（London：S.Crouch，N.Crouch，P.Varenne，C.King，J.Isted，n.d.）.大英图书馆认为该书出版于1708年，书中有一封落款为1703年的信函。“Masturbation（手淫）”这一词首先出现于Edward Baynard的著作The History of Cold Bathing，Both Ancient and Modern（London，1706）。John Marten另著有Gonosologium novum;or A new system of all the secret infirmities and diseases natural，accidental，and venereal in men and women（London：S.Crouch，N.Crouch，P.Varenne，C.King，J.Isted，1709）。有关Marten的争议，请参见David Foxon，Libertine Literature in England，1660-1745（New Hyde Park，NY：University Books，1965），p.13.有争议认为，Gonosologim novum一书是作为《手淫》（第6版）的附录出版的，因为在大英图书馆的藏书中，两本书虽然各有封面和页码，但是被装订在一起。 如果《手淫》最早版本（现已遗失）的出版日期是1708年而非1710年，那么“手淫”一词的出现以及对它的抨击也应该是一起产生的。如果我对《手淫》作者身份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手淫”一词的发明和对它的抨击也应该出自于同一人。

[15] Marten，Gonosologim novum， pp.86-87.

[16] Philo-Castitatis，Onania Examined，and detected;or，The ignorance，error，impertinence，and contradiction of a book called Onania discovered and exposed…2nd ed.（London，1724）.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723年。我们尚不知《手淫》首次对针对自己的抨击作出回应是在何时。我所引用的是该书的第15版，出版于1730年。

[17] [Math.Rothos]，A Whip for the Quack;or，Some remarks on M—n's Supplement to his Onania.With a full answer and confutation of his boasted-of，and long-promised curious piece from Sckmeider，and of all their arguments for the seeds [sic] return into the blood after its secretion（London，1727）.“Rothos”应该只是一个化名。The 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ESTC）认为M——n就是John Marten。

[18] 此书由Joseph Marshall和J.Roberts共同出版。他们出版的其他书籍包括：抢劫犯Jack Sheppard的传记，有关Calvin和Luther阐述“三位一体”（Trinity）的论文专著。Marshall主要出版恶意反对天主教教义类的丛书、以及其他关于宗教神学辩论的书籍。对《手淫》的抨击与将“新反卡尔文教派”攻击为“新反原罪主义的异端学说”的抨击论调如出一辙，Marshall还和《手淫》的另一出版商N.Crouch一起，出版了一部手抄本。在ESTC（The 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中可以找到106条关于Joseph Marshall的内容，另外还有9条关于Marshall和Roberts的内容。

[19] 学者Michael Stolberg曾将Marten的其他作品与《手淫》作一比较，并得出如此论断。在Wellcome Library工作的学者Symons也曾怀疑Marten就是《手淫》的作者，但从未就此发表过任何作品。但是在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Library的馆藏图书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4（London，1995），ed.Symons and H.R.Denham中，Marten被认定为《手淫》作者（网上的目录并非如此）。Stolberg之所以对Marten是否是真正作者的问题存有疑虑，是因为《手淫》一书的说教与Marten其他作品中道德说教的语气有所不同，而且其他的一些证据也不足为信。至今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Mathew Rothos"此人与John Marten的联系。请参阅Michael Stolberg，"Self Poll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9.1-2（Jan.-April 2000），n.79&p.54。

[20] 该书的第15版（出版于1730年）声称，此书"由J.Isted出版并发行（售书区域为：Golden Ball between St.Dunstan's Church and Chancery Lane），发行商Crouch当时已经过世"。《手淫》的另一出版商Varenne逝世于1724年。著名的"止痛药"在售卖时，也免费赠送制作精美的《手淫》手抄本。

[21] 想要了解这一部分的历史，请参阅Doherty，"Anodyne Necklace"，The Crime of Onan没有注明出版日期；Eronania的出版日期标注为1724年。这两部书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连页码都相同。

[22] 《手淫》的出版和发行与当时的"止痛药风潮"（anodyne-necklace）联系紧密。例如，Paul Chamberlen——止痛药的发明者，常被误解为与发明了产钳的助产士一家有所渊源——的著作The Way to get rid of the Labyrinth of Venus就是由《手淫》的出版商J.Isted发行。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隐疾"似乎是因为男性向"普通女性"播种而引起的一种常见性病。这里涉及的引用没有注明页码，因为《手淫》的版本实在太多，难以一一赘述，而且版本中的页码并不一致，无法作为确实的学术依据。

[23] Onania;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London Printed;repr.at Boston，1724，出版发行商：John Phillips）。该书在1747年又发行了一版，书中注明"由S.Kneeland和T.Green共同出版发行"。Cotton Mather，"The Pure Nazarite：Advice to a young man，concerning an impiety and impurity which many young men are to their perpetual sorrow，too easily drawn into.A letter forced into the press，by the discoveries which are made，that sad occasions multiply，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it"（Boston：Printed by T.Fleet for John Phillips，at his shop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Town-House，1723）.如果上述出版信息真实可靠，我们可以发现，《手淫》和Mather的出版商是同一人。学者Thomas James Holmes，Cotton Mather，a Bibliography of His Work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0）认为这一出版信息是真实的。我的同事Robert Middlekauf曾针对Mather发表过许多研究作品，他认为Mather曾经一度沉迷手淫，这一点也许也可以证明上述材料的真实性。

[24] Ephraim Chambers，"Onania，and Le Onanisme，""Pollution，""Emission，""Seed，"收编于Cyclopaedia;or，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s of the terms，and accounts of the things signify'd thereby，in the several arts，both liberal and mechanical，and the several...（London，1728），pp.301，662，848.1751年又出版了6个版本。Chambers在医学问题上持比较传统的态度。他的这部百科全书支持传统医学观点，认为传统的"割脉放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对一些流传下来的"医学奇迹"的故事深信不疑——例如，女孩肚子里吐出了一只蟾蜍、母猫的肚子里怀了一些小猫，然后从嘴里生了出来，等等。Chambers之所以对《手淫》心存疑虑，是因为这本书如"Philo-Castitatis"所言，时常会助长那些"伪善的宗教说教者"的道德说教；也许也是因为《手淫》中所提到的一些医学方法与他自己书中高度赞誉的古代医学传统是对立的。想要了解著名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现之前的18世纪百科全书的编写情况，请参阅Philip Shorr，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Study of Science in Two Encyclopedias of 1725-1750（New York：AMS Press，1967）。

[25] Chambers认为，自渎和夜间自慰的行为有所不同，后者是因为精液过多、过剧烈或者生殖器器质过于虚弱的缘故，是自然的行为而不是故意为之。 这也正是罗马教廷所担心的，他们"会把教徒留在教堂过夜，使他们避免夜间自慰行为"。

[26] Johann Heinrich Zedler，Gross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Lexicon，64 vols.，ed.Hohann Peter von Ludwig and P.D.Longolius;Onania;oder，Die Sünde der Selbst-Befleckung，mit allen ihren entsetzlichen Folgen...（Leiqzig，1736）.这个版本共439页，包括《手淫》及其《补遗本》。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此书在1751年、1758年和1765年分别再版。在某些版本的标题中，"Sünde"一词被"Krankheit（疾病）"取代。我们找到了一本1761年由Philipp Friedrich Sicherer撰写的著作，名叫Kurzer und nötige unterricht von den schädlichen folgen der selbstbefleckung in absicht auf die gesundheit：Als ein höchst nützlicheranhang zu dem englischen buch Onania...（译为"有关手淫对身体健康危害性的综述，对《手淫》一书的附加补充"），这本书宣称自己是之前早期版本的修订版，由——而且"特许"由——莱比锡的Friedrich Gotthold Jacobäern于1761年出版。Sicherer在书中说自己是德国海尔布隆（Heilbronn）地区的一个药剂师，读者可以从他那里购买药方，而且在法兰克福也可以买到。这本书的第6版由莱比锡的同一出版商于1773年出版。这些信息是我在各种目录（包括网上目录）中搜集到的，我的同事也帮我找到了一些零散的信息，WorldCat和Deutsche Gesamtverzeichnis（DV）这两个目录对我尤其有帮助。1736年的那一版在DV中并没有记载，但在www.swbv.uni-konstanz上出现。在这里，我要感谢德国学者James H.Spohrer，他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有关Sarganeck的详细信息，请参阅Karl Braun，Die Krankheit Onania：Körperangst und die Anfänge moderner Sexualitöt im 18.Jahrhundert（Frankfurt：Campus Verlag，1995），p.207.或参阅著作Überzeugende und bewegliche Warnung vor allen Sünden der Unreinigkeit und heimlichen Unzucht...（Züllichau，1740）。

[27] 我在这里指的是上一注释中提到的Sicherer的著作1773年莱比锡版本的译本：Instructions courte...sur les suites facheuses auxquelles on expose la santépar la pollution volontaire de soi même：en forme de supplement...au livre anglois intituléOnania...（Leipzig，1775）。

[28] Antoinette Emch-Dériza，Tissot：Physician of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Peter Lang，1992），p.43.

[29] Robert James，A Medicinal Dictionary（London，1743-1745），vol.2.Dr.Johnson是这部巨著的编撰者之一。作家Samuel Richardson不仅参与编辑，并且帮助这部作品成功付印。有关Richardson在这部作品发行上所起的作用，请参阅T.C.Duncan &Ben D.Kimpel，Samuel Richardson：A 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84（James的这部作品在所有类似书籍中，第一个提到手淫会导致失明。这里涉及"遗精"这一关键词。在Chambers看来，它指的是"在射精或排精行为过程中，物体尤其是液体，被迫从体内由内向外的喷射行为"。这一定义来自于Chambers，Cyclopaedia。假使就像自古以来大家一致认为的那样，长时间的注视会使眼睛发出某种光芒，那么一方肉体上过度的排精行为——即手淫——也会对另一方（即视觉）产生影响。James在书中解释说，手淫是"荒谬而反常"的，是一种倒退行为，19世纪称之为变态行为，这种行为将会导致性器官射精无力，也会导致视觉受损 ）。 这样的说法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例如：Annalist（New York，1847，p.193）中所提到的事例，Journal d'Ophtalmologie（Paris，1872，pp.188-190）中也曾提到。

[30] John Lough，Essays o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482中对此有令人信服的说明。Menuret de Chambaud曾经撰写过关于婚姻的文章。

[31] 这段话援自以下的英文译本，该译本的再版现在广为流传。Onanism;or，A Treatise upon the Disorders Produced by Masturbation;or，The Dangerous Effects of Secret and Excessive Venery，trans.A.Hume（London，1761）。该译本是法语原版的精确译本。

[32] 事实或许就是如此，至少有一个版本获得了特许权。罗马帝国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许权。

[33] Hoffman这里指的应该是医生Friedrich Hoffmann the Younger，提索在自己的书中曾经引用过这位医生关于精液流失会导致身体虚弱的观点。也是在这里一位名叫Bekker的医生被认为是《手淫》的作者，很多历史学家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这位医生除了在提索的书中出现过之外，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或许他就是那位在1695年著书阐述世俗谬误的Balthasar Bekker？但是这位Bekker先生1698年就已经过世了，因此他不太可能是Balthasar Bekker。除此之外，在ESTC上再没有其他叫Bekker的人。提索在书中写道，他的一个瑞士病人曾在法兰克福购买过《手淫》（Onanism，pp.x and 20-24）。提索著作的译者Hume现存的另一部作品是Every Woman Her Own Physician;or，Lady's Medical Assistant（London，1776）。这部书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书的作者就是将提索著作的英文译者。当书中的某些章节有可能涉及到手淫时——例如，女性癔病症，Hume完全采取了希波克拉底式的观点，即婚姻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与盖仑（Gallen）一样，Hume也赞成按摩疗法，但并未像盖仑那样指出具体的按摩部位。

[34] 威尼斯的这部版本应该是第三版。在费城的再版进行了一些改动。大多数该书的译者都使用法语版作为翻译的原版，然后再注解中加入一些当地的素材。费城版本的出版信息为：John Sparhawk，A table of the several chapters and principal contents of the late famous treatise，called Dr.Tissot's...（Philadelphia，1771）。该书作者Dr.Sparhawk专门出售治疗眼疾的药物——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与手淫有所联系，他的名字也出现在Early American Imprints上。

[35] 关于1789年之前的事件，我的依据来自Jo-Ann McEachern，Bibliography of Jean-Jacques Rousseau（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89），vol.2；关于1789年这一时间的确定，我参考了学者Carla Hesse 2000年6月16日在Ecole des Hautes Etudes上所做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有关卢梭作品的历史要比提索清楚得多，现今仍没有任何对提索作品的参考文献目录，因此我的数据来源于Emch-Dériaz，Tissot，pp.324-326。但是，我在各种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提索的作品，而至少有10个版本不在她编定的目录之内，由于因为我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所以也不敢妄下论断。有很多与提索著作雷同的作品，如：Duncan Gordon，A Letter to John Hunter respecting His Treatise on the Venereal Disease...pointing out the absurdity and immorality of His Doctrine in Favour of Onanism or Masturbation（London，1786）。该书虽然在某些部分注明引自提索，但大部分文章完全是抄袭。该书出版的前后，Hunter曾发表言论：手淫并不比性交更加损伤人的健康，其程度甚至更小。有关Hunter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四章。有关提索在俄国的经历，请参阅Laura Engelstein，The Keys to Happiness：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ècle Russ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226。俄语作品中也有抄袭提索言论的作品。

[36] Mary Hyde（ed.），The Thrales of Streatham Park（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60。 我所引用的这一版本为第7版，改编自The Family Physician;or，Advice with Respect to Health...extracted from Dr.Tissot（London，1801），p.3；该书第6版出版于1797年。Moise Marcuze的著作Seyfer Refues大

部分内容参考了该书的德文译本。请参阅John M.Efron，Medicine and the German Jew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77。

［37］ James Boswell，In Search of a Wife，1766-1769，ed.Frank Brady and Frederick A.Pottle，in The Private Papers of James Boswell（New York：McGrawHill，1956），p.214.“Swear with drawn sword never pleasure but with a woman's aid，”Frederick A.Pottle（ed.），Boswell on the Grand Tour：Germany and Switzerland，1764（New York：McGraw-Hill，1953），p.278.Boswell声称，手淫罪恶感的产生几乎和性快感同时发生，但对于性快感，他却没有感到丝毫愧疚。例如，1764年在荷兰旅行时，Boswell写道：“我发现，没有规律的性交行为虽然不值得推荐，但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罪恶。与女性性交，尤其是当我的身体健康需要时，这种行为是不会产生任何危害的。”引自Frederick A.Pottle（ed.），Boswell in Holand，1763-1764（New York：McGraw-Hill，1952），p.258。

［38］ S.A.D.Tissot，The Life of J.G.Zimmerman（London，1797），p.16.在当时有一种说法，Zimmermann并没有放弃撰写小说——据说他会这样做，但是他更愿意撰写“这种作品”，因为这类作品更加反映人性。关于手淫和小说之间的关系，请参阅第五章的内容。J.G.Zimmermann，“Warnung an Eltern，Erzieher under Kinderfreunde wegen der Selbst-befleckung，zumal bein ganz jungen madchen，”Deutsches museum（Leipzig）1（1778），p.460.

［39］“Onan，Onanisme，”in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II），vol.8 of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1765;Paris：Chez Firmin Didot Frères，1862），pp.94-95.在提索的文章发表之前，Dictionnaire从未刊登过此类文章。

［40］ 提索1762年7月8日给卢梭的信函，见Corre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Geneva：Madison，1970），vol.11.Rousseau，Emile，vol.4 of Oeuvres complètes，ed.Bernard Gagnebin and Marcel Raymond（Paris：Gallimard，Pléiade，1969），p.663。

［41］ 这个发行数字是我用版本的数量乘以2000（当时每一版的固定发行量）得出来的。Christa Kersting，Die Genese der Padagogik im 18.Jahrhundert：Campes“Allgemeine Revision”im Kontext der neuzeitlichen Wissenschaft（Weinheim：Deutscher Studien Verlag，1992），p.86.

［42］卢梭1762年7月22日写给提索的信函，见Correpondance，p.12。

［43］《忏悔录》是在卢梭死后（18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这部对人类探寻自我意义重大的著作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一共出版了11版，对1712年之后手淫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4］ 据传言，Ruskin患有不举的隐疾，这也正是他取消与“Effie”Chalmers Gray Ruskin婚姻关系的主要原因。当大家得知他正在追求Rosie小姐的时候，这一传言又卷土重来。陶奇夫人之前曾向女儿暗示过Ruskin的这个问题，而且，Ruskin也写信说，自己对“横亘在我们婚姻之间的障碍”非常担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Ruskin写信给好友Mrs.Cowper，Lady Mount-Temple，说自己是“另外一个卢梭”，并暗暗希望她能将自己的这番话传递给陶奇家族。有关这一部分内容，请参阅Van Akin Burd，John Ruskin and Rose La Touche：Her Unpublished Diaries of 1861 and 1867（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116，以及The Letters of John Ruskin to Lord and Lady Mount-Temple，ed.and intro.John Lewis Bradley（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pp.123-124。这封信的编号为No.85，1868年6月2日，p.167。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Père Goriot）中主要讲述了Eugene Rastignac如何从一个偏远地区的穷学生逐渐变成一个精明世故、丧失了道德标准的没落青年。在小说中，Rastignac或许没有直接提到手淫。但在这本书的某一章节里，当两个年轻人正在讨论某话题时，Rastignac承认道，他曾经读过卢梭的作品时，他指的应该就是手淫这一话题。如同D.A.Miller所评论的那样，Eugene的躯体从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的身体——“一具可以拥有丰富多彩性生活的躯体”——变成了有产阶级常见的体形，变成了一个“拒绝一切行为，只知道追寻无穷经济利益的人”。卢梭作品中的罪行恰恰是这一拒绝行为的对立面。（《高老头》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Rastignac这个人物《人间喜剧》的后面部分也有出现。）与此相关的详细内容，请参阅D.A.Miller，“Body Bildung and Textual Liberation”in Denis Hollier（ed.），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1994），pp.681-687，尤其是p.681，683。Rastignac和朋友的谈话内容请参见Honore de Balzac，Human Comedy of Balzac，（Père Goriot）（Paris：Pléiade，1951），vol.2，p.960。

［45］ Samuel Solomon，A Guide to Good Health.从书中信函的落款来看，该书的第64版大概出版于1814年，第52版大概出版于1800年。对手淫的讨论在此书中占据了最大的一章，其他章节则对健康提出各种忠告。关于这本书的广告，请参阅Irvine Loudon，“The Vile Race of Quacks with Which This Country Is Infested，”in W.F.Bynum and Roy Porter（ed.），Medical Fringe and Medical Orthodoxy，1750-1850（London：Croom Helm，1987）。A Guide to Good Health此书共312页，售价为3先令。书中从189页至242页全部是关于手淫的内容，但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健康生活的忠告——好的伴侣、呼吸新鲜空气以及膳食平衡，该书还大量引用了提索的言论。想要了解Samuel Solomon和他创立的健康王国，请参阅William H.Helfand，“Samuel Solomon and the Cordial Balm of Gilead，”Pharmacy in History 31.4（1989），pp.151-159。这段引用来自于James Hodson，Medical Facts and Advertisements Submit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fflicted（London，1799）。该书的封页内侧和第一页刊登了作者对其他医生观点的抨击，以及对自己作品的溢美之词。我援引的这段话来自于该书的第8页，该页主要是为读者提供邮寄咨询服务。我觉得这类药品的名字很有意思。“波斯大补丸”主要针对“因手淫而导致的虚弱”;“波斯蔬菜汁”主要治疗因手淫而引起的暂时性失明。另外一则广告中的“波斯神水”主要针对沉迷于手淫成年男女。Hodson还向读者大力推荐他另外一部作品School Boy's Monitor and Parents Guardian，这部作品的名字将这本书与当时国内外的教育学作品扯在了一起。由于这些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789年这些作品被编订在一起，并在1794年出版了第13版。1799年，这些作品也遭到了剽窃。James Hodson，Nature's assistant to the restoration of health...To which is added，an address to parents，tutors，and schoolmasters，13th ed.（London，1794）.

［46］ Alex Comfort，The Anxiety Makers：Some Curious Preoccupa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London：Nelson，1967）;Vern L.Bullough，“Technology for the Prevention of'Les Malades produites par la masturbation，'”Technology and Culture 28.4（Oct.1987），p.832.

［47］ O.S.Fowler，Amativeness;or，Evils and remedies of excessive and perverted sexuality：including warning and advice to the married and single：being a supplement to“Love and parentage，”13th ed.（New York：Fowlers and Wells，1848）；这本书的发行数字来源于W.J.Hunter，Manhood Wrecked and Rescued（New York，1894），p.109;J.H.Kellogg，Natural History and Hygiene of Organic Life，new rev.ed.（Burlington，Iowa：I.F. Segner，1895），pp.231& 231-260;Sylvester Graham，Graham's lectures on chastity;specially intended for th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young men and parents（Glasgow：Royalty Buildings，1837）。

［48］ Lt.Gen.R.S.S.（Robert）Baden-Powell的作品Scouting for Boys（London：Horace Cox，1908）是在当时提倡优生学以增强国力的大环境下出版的，书中对手淫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手淫与酗酒、性病、缺乏自制力被并列为使种族质量下降的四大元凶。波尔战争（Boer War）时，英国招募的一大批军人中有一半身体都不合格，该书把这一事件的原因也归咎于手淫。 大英图书馆中没有保存关于手淫的章节，但是可以找到19世纪一些其他的对手淫进行猛烈攻击的丛书，例如：Sylvanus Stall，What a Young Boy Ought to Know（London：C.Arthur Pearson，1922），pp.209-210。该版本为第10版。1946年再版时，保留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49］ Irving David Steinhardt，Ten Sex Talks to Boys（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14），p.120;Irving David Steinhardt，Ten Sex Talks to Girls（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14），p.59;Child care（1918）quoted in Peter lewis Allen，The Wages of S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11.

［50］ Carl Capellmann，“Usus Marimonii，1.Onanism：Peccatum Onan，”in Pastoral Medicine，trans.William Dassel（New York：Pustet，1879）.这是一本德语作品的译本，其原版本译成法语、拉丁语以及西班牙语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德语版的第5版出现于1881年。从1923年的第19版起，关于手淫的部分就没有被修改过，我引用的那一版也在其中。Capellmann也在作品中引用了Jean Pierre Gury（1801-1866），Compendium theologiae moralis的内容。我的这段话译自拉丁文，因为德语版和英语版将一些比较敏感的素材保留了原来的拉丁文。这部书据说是专门为专业人士编写的，他们阅读拉丁文自然不成问题。Capellmann在其他章节曾经提到，在手淫问题上，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51］ 此项目为Jean Baptiste Desire Demeaux的特别主持项目。他是法国Sorbonne大学的医学专家、解剖学会（Anatomical Society）副会长。他曾就疝气的外科治疗出版过至少3部专著，并且发表过多篇文章阐述手淫的危害、以及在公立学校如何防止手淫。有关该学者的观点，请参阅Vernon A.Rosario II，“Phantastical Pollutions，”in Paula Bennett and Vernon A.Rosario II（eds.），Solitary Pleasures：The Historical，Literary，and Artistic Discourses of Autoeroticism（New York：Routledge，1995），p.121。

［52］ 在性行为的生育本能和性快感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文化争论，但从历史上来看，这并不是手淫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害的主要原因。持这一观点的是P.R.Abrahamson and S.D.Pinkerton，With Pleasure：Thoughts on Nature of Human Sexu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3］ Elizabeth Blackwell，Medical Address on the Benevolence of Malthus Contrasted with the Corruptions of Neo-Malthusianism（London，1888），pp.24-26.

［54］ Charles Knowlton，Fruits of Philosophy：An Essay on the Population Question，3rd ed.（London，1878;repr.，Arno Press，1972）.1872年的这一版是自从该书被Lord Campbell's Act（这里指的是1857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尤利西斯》也曾被这部法案禁止发行）禁止出版之后的首次发行。该书的最早版本出现在此版本的40多年前，由当时激进的出版商James Watson印刷出版，当时正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潮流行的时候。Watson曾与著名的共和党人、出版商Richard Carlile共事，此人曾经出版Every Woman's Book，是当时宣传节育措施的首批丛书之一，也对手淫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当时的反手淫思潮几乎遍布政界和宗教界。有关“性饥渴”的内容，请参阅C.V.Drysdale，The Malthusian Doctrine and Its Modern Aspects（London：Malthusian League，1917？），p.21。与传统的此类书的作者不同，Drysdale并没有具体说手淫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对当时提倡节育所引发的“性交前奏行为”进行了总结。

[55] 我在全书中多处引用了这部专业医学作品。The Catalogue of the Surgeon General's Library，也就是Index Medicus和现代MEDLIMNE的前身，提供了一份比较详尽的清单（虽然有些文章在那里也没有找到）。请参阅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medicales（Paris，1881），2nd ser.，vol.15。多伦多精神病院（Toronto Asylum）的医学主管Daniel Clark，M.D.，在Tenth Annual Report，Sept.30，1877，p.6上阐述了他与前人Joseph Workman相同的看法。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阅Annual Reports of the Provincial Lunatic Society of Ontario（Toronto，1865，1866-1867），pp.6-13 & 85-88。

[56] Havelock Ellis曾经对此有过描述，请参阅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3rd ed.（Philadelphia：F.A.Davis，1920），vol.1，pp.177-179。

[57] Washiyama Yayoi，引自Sabine Frühstück，Colonizing Sex：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104-105。我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她允许我在其作品尚未发表之前就可以先睹为快。

[58] G.Stanley Hall，Adolescence：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and Education（1904;New York：D.Appleton，1924），vol.1，pp.452，432.Hall在手淫文化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我认为他是后达尔文主义的典范。W.Grant Hague，The Eugenic Marriage：A Personal Guide to the New Science of Better Living and Better Babies（New York：Review of Reviews Company，1916），vol.2，pp.155-157.Hague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讲学。

[59] Onania，8th ed.，p.200.

[60] Vicesimus Knox，Liberal Education，5th ed.（London，1783），pp.329-330;Samuel Gottlieb Vogel，Unterricht für Eltern（1786）.

[61] Mary Wollstonecraft，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ed.D.L.Macdonald and Kathleen Scherf（Orchard Park，NY：Broadview，1997），pp.306-307.虽然，这里探讨的"恶行"也可能指的是同性恋行为，但鉴于Wollstonecraft谈到了卢梭，以及她在和Mandeville交流时明显的暗示——私密的罪恶、但却是公共的大恶，很明显，这里被谈到的应该是手淫。

[62] 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Über die heimlichen Sünden der Jugend（Frankfurt and Leiqzig，1786）.

[63] 同上，pp.13-14。

[64] 同上。

[65] Jean-Jacques Rousseau，Bekenntnisse（Berlin，1782），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版本。

[66] Salzmann，Heimlichen Sünden，16-18.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婴儿期的自体性行为向成年期的异性性行为转化是每个社会个体必经的历程。（我在这里说得有些过早了，后面将会有详细的论述。）

[67] "Masturbation，"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edicales（Paris，1819）;David Hunt，Parents and Children in History：The Psychology of Life in Early Modern Franc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pp.162 & 159-179.Fallopius的观点在Winfried Schleiner，Medical Ethics in the Renaissance（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5-136中被多次引用。

[68] Immanuel Kant，The Doctrine of Virtue：Part II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trans.with intro.and notes by Mary J.Grego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art.2；我对Gregor的翻译略微作了一些改动。请参阅"Von der Wohlustigen Selbstschandung，"in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vol.6 of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G.Reimer，1907），pp.424-427。

[69] Campe曾是一个名为"Philantropen"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名字意为"人性之友"。和康德一样，Campe也认为，道德应该重新定义。人的道德意识开始得越早越好，因此教育就变得十分重要。有关的德国教育改革的情况，以及这一改革和Berliner Monatsschrift之间的联系，请参阅Kersting，Die Genese der Pädagogik im 18.Jahrhundert，pp.71-113，pp.80-81。第85页上有关于这次征文比赛的详情。Campe编撰的百科全书共16卷，有27位学者参与，其中有三位撰写了关于手淫的文章。在征文比赛中获得第三名的文章因为篇幅太长，被编订到另外三位获奖者的文章里。详情请参见Joachim Heinrich Campe（ed.），Allgemeine Revision des gesammten Schul-und Erziehungswesens（Hamburg，1785-1792），vol.6，p.7。一个德国银币大概相当于5个荷兰盾，或是0.5英镑。因此，60个德国银币大概相当于300荷兰盾，即30英镑，也就是一个雇用劳工一整年的收入。关于这部分信息，感谢我的同事——经济历史学家Jan de Vries。发生在德国的这次手淫大讨论也揭示了19世纪末期关于此话题的讨论规模。关于这一问题的精辟评论，请参见Karl Heinz Bloch，Die Bekämpfung der Jugendmasturbation im 18.Jahrhundert：Ursachen-Verlauf-Nachwirkungen（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8），很遗憾，在我修订本书的手稿时，我才发现此书的存在。Bloch尤其擅长揭示Campe发起的这次对与手淫的讨论的影响。例如，德国百科全书the Grosse Brockhaus'中关于手淫的这篇文章一直延续到1898年，之后只是做了轻微的改动。直到1932年，这篇文章才被另一篇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讨论手淫的文章所代替。详见该书pp.532-579。

[70] P.J.C.Debreyne，Essai sur la théologie morale（Paris，1844）.该书的扉页上刊登了这位作者另一部著作的广告，主要是关于牧师和神学院学生的生理学叙述概论。

[71] 引自Margery Levinson，Keats's Life of Allegory：The Origins of a Styl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p.16-18 & 22。这一意象几乎持续了整个年代。当时有人认为，Keats乐于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将自己的脸贴在糖果店玻璃窗上的少年"，Keats在自己的一首诗里对此进行了反驳。但很多人依然认为，他是一个由于欲望过度而几乎陷于病态的诗人，或许也沾染了那种少年的恶习（即手淫）。关于Whitman的内容，请参阅Robert S.Fredrickson，"Public Onanism：Whitman's Song of Himself，"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46.2（June 1985），以及Harold Bloom，"The Real M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26，1984），p.4。

[72] V.Sazhin，"The Victor's Hand：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Belinsky and M.Bakunin，"Erotica in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Barkov to the Present [Erotika v russkoi literature ot Barkova do nashikh dnei]，a special issue of Literary Review [Literaturnoe obozrenie]，（Moscow，1992），p.39.在此感谢Hilda Hoogenbloom，是他告诉了我这一资料，并将此翻译成英语。有关Belinsky和Bakunin的详细内容，请参见Lydia Ginzburg，On Psychological Prose，trans.and ed.Judson Rosengra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59-60 & 84-85。

[73] Wagner引自Marc A.Weiner，Richard Wagner and the Anti-Semitic Imagin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p.341。将犹太人和妓女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由来已久。他们都不是为了生殖繁衍，而是为了金钱而进行性行为。正是因为这种"不作为"，犹太人才会经常和另一种不作为的行为——手淫——相提并论。198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以男性生殖器为主要角色的英国漫画书中，犹太人就是以手淫的形象出现的，而其他人则多多少少都有女性陪伴。详情请参见Sander Gilman，The Jew's Body（New York：Routledge，1991），p.123。

[74] Gérard Walter（ed.），Actes du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68），p.96.引自Chantal Thomas，The Wicked Queen，trans.Julie Rose（New York：Zone Books，1999），p.146。

[75] J.H.Fussell，"Mr.Annie Besant and the Moral Code：A Protest"（1907）.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以从该书作者写给图书馆长的一封信中略见一斑（这封信现保存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

[76] 刊登在British Weekly（Oct.1877-April 1888）上的文章，后来又刊登于Tempted London：Young Men（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88），pp.246-248。

[77] 这些是William A.Cohen的观点，详见William A.Cohen，Sex Scandal：The Private Parts of Victorian Fiction（Durham and New York：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6-72，尤其见pp.26-38。

[78] Ludger Lutkehaus，"O Wollust，O Holle：Onanie，Phantasie und Literature，"Die Zeit 47-15（Nov.1991），pp.76-77，那里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Heinrich von Kleist，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vol.2，pp.559-562，该书的观点在Sander Gilman，Disease and Representa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p.68中被引用并被翻译成英文。Braun，Krankheit Onania一书中以翔实的证据说明了手淫当时在德国所引起的恐慌。

［79］ Elizabeth Blackwell，The Human Element in Sex：Being a Medical E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of Sexual Physiology to Christian Morality（London，1885），p.29.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最值得一读的是Judith R.Walkowitz，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Women，Class，and the Stat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有关Blackwell写书的背景，请参见Margaret Jackson，The Real Facts of Life：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c.1850-1940（Bristol，PA：Taylor and Francis，1994），pp 71-77。

［80］ 关于手淫的普及性的证据来源广泛。Havelock Ellis在其著作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vol.1，pp.161-182中有着非常完善的总结。关于性玩偶的社会学意义研究，请参考169页。 金赛教授在其著作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资料也进行了研究，详见Alfred C.Kinsey and 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Philadelphia：Saunders，1953），pp.132-190，Alfred C.Kinsey，Wardell B.Pomeroy，and Clyde E.Martin，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Philadelphia，W.B.Saunders Co.，1948），pp.497-516;以及Elie Metchnikoff，The Nature of Man：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ed.P.Chalmers Mitchell（New Youk：G.P.Putnam's Sons，1903），pp.95-99。关于手淫和退化论的观点，请参见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64-82，尤见pp.74-75，79-80。Charles Feré，“Le Surmenage scolaire”，Le Progrès médical（Feb.5-12，1887），pp.111，132更具有参考价值，Feré认为，手淫只有对那些天生对于手淫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无法承受的人来说是危险的。他尤其关注学生手淫的问题，但是他也指出，这一问题十分普遍。Feré比弗洛伊德约年长几岁，是Jean-Martin Charcot的忠实追随者。读者还可以参阅Iwan Bloch，The Sexual Life of Our Times in Its Relations to Modern Civilization，trans.M.Eden Paul（New York：Allied Book Co.，1926），pp.409-411.这本书1908年首次于德国出版，当时似乎畅销一时。第6版出版于1910年，正是这一版被首次译成英语，并宣称已经售出了40万册。 著名的妇科医生J.Matthews Duncan在1803年的讲座中所宣称的“女性手淫是对假快感的一种非自然的过度沉溺”的这一观点现在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详情请见“Sterility in Women，”lecture 2，pt.4，Lancet（March 31，1883），p.529。

［81］ “自体性行为”这一词汇是弗洛伊德1899年12月9日在给Wilhelm Fliess的信件中首次提到的。在信中，他表达了对Ellis的谢意。详情请见Jean Laplanche and J.B.Pontalis，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1967;London：Karnac Books，1988），pp.45-47;Havelock Ellis，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vol.1，pp.161-163，161-283。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00年。

［82］ Lutkehaus，“O Wollust，O Holle”中引自Moravia的观点;Ellis，Havelock Ellis，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vol.1，pp.161-163。

［83］ D.H.Lawrence，“Pornography and Obscenity”，in H.T.Moore（ed.），Sex，Literature，and Censorship（New York：Twayne，1953），pp.79-82.

［84］ Gore Vidal，“Pornography”，in Homage to Daniel Shays：Collected Essays，1952-1972（New York：Random House，1973），pp.219-220。关于Gide，请参见Naomi Segal，André Gide：Pederasty and Pedag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41-47，70-73。

［85］ Richard von Krafft-Ebing，Psychopathia Sexualis，7th ed.，trans.Charles Gilbert Chaddock（Philadelphia：F.A.Davis，1908），pp.188-189.

［86］ 关于这一观点，请参阅George J.Makari，“Between Seduction and Libido：Sigmund Freud's Masturbation Hypotheses and the Realignment of His Etiologic Thinking，1897-1905，”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72.4（1998），及本书第六章。

［87］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trans.and ed.Jeffrey Mass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Dostoevsky and Parricide（1928），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Press，1975;repr.of 1961 ed.），vol.23，p.193.

［88］ 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1905），收编于Complete Works，vol.7，p.187，n.1以及p.188，nn.1& 2。

［89］ Marie Bonaparte，Female Sexuality（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3），p.74.

［90］ Wihelm Stekel，Auto-erotism：A Psychiatric Study of Onanism and Neurosis，trans.James S.Van Teslaar（New York：Grove Press，1950），p.63.

［91］ Joyce McDougall，Theatres of the Mind：Illusion and Truth on the Psychoanalytic Stage（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6），p.250.Luce Irigaray，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trans.Gillian Gill（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p.28-31，60;Luce Irigaray，The Sex Which Is Not One，trans.Catherine Porter with Carolyn Burk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24.

［92］ Max Hodann，Onanie：weder Laster noch Krankeit（Berlin，1929）.

［93］ A.A.Brill，Psychoanalysis：Its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Philadelphia：W.B.Saunders，1922），pp.153，158-159;John F.W.Meagher，A Study of Masturbation and Psychosexual Life，3rd rev.ed.（Baltimore：William Wood，1936），p.105.

［94］ William H.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Human Sexual Respons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66），pp.63-65.该书的法语译本出版于1977年，自1967年起也先后有不同的西班牙语译本出现。Bantam出版了该书的平装本，Masters和Johnson还出版了关于同一主题的一系列丛书。详见Johnson，selections from Lesbian Nation（1973），收录于Barbara A.Crow（ed.），Radical Feminism：A Documentary Read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p.349-350，章节名称“The Myth of 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

［95］ 我的依据来自于图书馆目录以及一个名叫“Other Versions of Our Bodies，Ourselves，Including books‘Inspired by’Our Bodies，Ourselves”的目录。这是我的助手Arianne Chernock在一堆资料中搜寻出来的。也有录像及电子文本。

［96］ 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Our Bodies，Our Selves（Boston：New England Free Press，1971），pp.13-14.这是NEFP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后来由Simon & Schuster接手。

［97］ Laura Hutton，The Single Woman and Her Emotional Problems（London： Baillière，Tindall and Cox，1937），p.83.

［98］ 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Our Bodies，Our Selves，pp.13-14，15-19.

［99］ Anne Koedt，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Boston：New England Free Press，1970），repr.in Crow，Radical Feminism.

［100］ 这一信息来源于http：//www.Hoover.com上该公司的财政报告；有关Rotermund，请参见New York Times obituary，July 22，2001，sec.1，p.34。

［101］ 这些数字来源于多伦多一家情趣商店（Come as You Are）的老板Cory Silverberg，他也为加拿大的Canadian SexTV做过很多关于性的电影。http：//www.divine-interventions.com。

［102］ Lonnie Garfield Barbach，For Yourself：The Fulfillment of Female Sexualit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5）.仅仅从这一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103］ 在我看来，“秘密花园”这一意象来自于20世纪早期的一本儿童文学《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作者Frances Hodgson Burnett）。书中描述了一个10岁的女孩独居在Yorkshire的一座孤宅里，却意外发现那里还居住着一个智障的表兄和一座上了锁的神秘花园。Women on Top：How Real Life Has Changed Women's Sexual Fantasie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1）是作者之后的又一作品。Men in Love：Men's Sexual Fantasies：The Triumph of Love over Rage（New York：

Delacorte Press，1980）强调了这一行为的吸引力，但并没有把手淫真正视为女性的自省之路。My Mother/My Self：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7）则成功地延续了性幻想这一主题。

[104] Catharine MacKinnon，Only Word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节选自Drucilla Cornell（ed.），Feminism and Porn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1.Sunday Times，June 2，1997，被引于David Stevenson，The Beggar's Benison（East Lothian：Tuckwell Press，2001），p.23。

[105] Norman Mailer，The Prisoner of Sex（Boston：Little，Brown，1971），pp.188 and 187-204.有关Millett的情况，请参见Sexual Politic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0），pp.322-324，180-187。

[106] 参见http：//www.nyjacks.com，及该网站上的其他链接。

[107] Joseph Kramer的情趣学校：http：//www.eroticmassage.com/cgi-bin/shop.cgi，评论请见http：//www.salon.com/people/lunch/1999/05/28/Kramer/；关于出版物的简介，请见Joanie Blank（ed.），First Person Sexual（San Francisco：Down There Press，1996）。有关手淫和古怪行为——尤其是关于Jane Austen的精辟分析，请见Eve Kosofsky Sedgwick，"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收录于Bennett and Rosario，Solitary Pleausures，p.137。

[108] "Onanisme，"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medicales（Paris，1881），2nd ser.，vol.15，pp.359-360.这篇文章对很多历史问题的叙述都不尽准确。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位名叫"Bekker"的人撰写了《手淫》这本书（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注释）。此文章的作者声称，在伏尔泰关注手淫话题时，《手淫》已经出版至第18版，但这一观点来源于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推断。但是，如果在《手淫》问世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丛书，该文章的作者是应该能够发现的。

[109] Balthasar Bekker，The world bewitch'd;or，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mon opinions concerning spirits：their nature，power，administration，and operations.As also，the effects men are able to produce by their communication.Divided into IV parts.By Balthazar Bekker，D.D.and Pastor at Amsterdam.Vol 1.Translated from a French copy，approved of and subscribed by the author's own hand.Betoverde weereld.English（[London]：Printed for R.Baldwin in Warwick-Lane，1695）.

[110] Lucinda McCray Beier，Sufferers and Healers：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Routledge），p.92.

[111] 我在这里指的是Karl Braun的著作Die Krankheit Onania（Frankfurt：Campus Verlag，1995），该作品中引用了近期德国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

[112] 《手淫》（Onania），4th ed.，p.17。

[113] Edward Baynard，The History of Cold Bathing，Both Ancient and Modern（London，1706），p.68。Baynard是当时医学院的成员之一，他的其他作品包括：一部给酗酒者提出健康建议的小册子，以及两篇发表在Royal Society上的论文。他的女儿是著名的Ann Baynard——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女士。他在TRS上所能找到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男孩不慎吞下两块铜板的病例。手淫并不在他关注的范围之内。本段中出现的内容出现在Baynard在给他的合作编者Sir John Floyer的附言中——"我几乎差点忘记……"在我看来，《手淫》中出现的这位Ettmüller先生是Michael Ettmüller（1644-1683），一位论著颇丰的医生，他的作品在17世纪末时在英国十分流行，既有拉丁语的版本，也有英译本。《手淫》的作者马尔顿或许曾经读过他的作品Etmullerus abridg'd（London，1699），p.567。

[114] 我这里之所以强调"男性"，是因为女性通常不在严肃的道德讨论范围之内。古典时期对与自我道德伦理的讨论仅限于贵族男性。

[115] 由于严肃道德话题的讨论仅限于男性，医学领域内的研究也多针对于他们。而且，由于男性身体一直被视为人体的范本，因此医学界似乎也并不需要过多地进行女性研究。有关古代复杂的养生法的介绍，以及古代医生就"性"给人体带来的损伤和益处的观点的更多介绍，请参见Rousselle，Porneia，pp.14-77。Rousselle也认为，手淫在古代医学讨论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可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Uses of Pleasure：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2，trans.Robert Hurley（New York：Vintage，1990），pp 1-94。Foucault虽然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医学家Arateus用古希腊文撰写的一篇似乎是在谈论手淫的文章（pp.15-16），但是注脚的注解中却指的是19世纪的法语译文。事实上，Foucault全书中只有两处提到手淫，而且只有一处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对手淫进行抨击。Foucault也可能是观点有了一些转变。例如，在1982年出版的一部可以被看做是History of Sexuality：The Care of the Self（New York：Pantheon，1986）第三卷节选本的前言介绍中，Foucault说道，他和Philippe Ariès都认为，"手淫问题重要性的讨论应该是出现于比18、19世纪更早的时期"，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时期。详情请参阅Philippe Ariès and André Béjin，eds.，Western Sexuality：Practice and Precept in Past and Present Times，trans. Anthony Forst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14。但在第三卷，他说道："我们注意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学领域，以及在其他一切涉及性行为得到的讨论中，手淫占据着非常微不足道的地位。"Peter Brown的著作The Body and Society：Men，Women，and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中的第一章"Body and City"对古典时期的身体道德伦理作出了最好的概括。我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他。

[116] Galen，De locis affectis 8.419-420，in K.G.Kuhn，ed.

[117]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6.69，trans.R.D.Hick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vol.2，pp.70-71.Hicks在翻译时，将cheirougerein一词谨慎地翻译为"不体面的行为"，事实上，这个词的意思是"用手来回不停地动作"。

[118] Thomas Cogan（1545？-1607），The hauen of health，chiefly made for the comfort of students，and consequently for all those that haue a care of their health，amplified vpon fiue wordes of Hippocrates，written Epid.6.Labour，meat，drinke，sleepe，Venus：Hereunto is added a preseruation from the pestilence：with a short...censure of the late sicknesse at Oxford（London，1612）.提索《论手淫》的意大利文译者认为提索在第欧根尼问题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认为那个故事只是个玩笑而已。他还引用了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请参见L'onanismo;ovvero，Dessertazione sopra le malattie cagionate dale polluzioni volontarie de Signor Tissot，3rd ed.（Venice，1785）.Bernard Mandeville，A Modest Defense of Public Stews，Clark Memorial Library Publication 162（1724;Los Angeles：Augustan Reprint Society，1973），pp.vi-vii。

[119] 关于这一说法，请参见Ruth Mazo Karras，"Sex and the Singlewoman，"收录于Judith M.Bennett and Amy Froide（eds.），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1250-180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pp.128-135。

[120] Galen，De locis affectis，6.2.39.我在这里对Rudolph Siegel（New York：S.Karger，1976）的译文作了些许改动。关于Galen对性刺激行为的观点，请参见Ann Ellis Hanson，"The Medical Writer's Woman，"收录于David M.Halperin，John J.Winkler，and Froma Zeitlin（eds.），Before Sexuality：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318-320。在Gallen之后的500年后，Aetius of Amida又重新讲述了这一故事。见Aetius of Amida，The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of the VIth Century A.D.（Philadelphia：Blakiston，1950）。

[121] Albert the Great的原话，引自Jacquart and Thomasset，Sexuality and Medicine in the Middle Ages，p.152，152-155。这段话的全文（包括拉丁文）见Dyan Elliott，Fallen Bodies：Pollution，Sexuality，and Demonology in the Middle Ag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pp.45-46，nn.54-56。Albert认为，这种摩擦其实就是在性交，只要有过摩擦经历，就已经不再是处女。

[122] Carl Capellmann，Pastoral Medicine，trans.William Dassel（New York：Pustet，1879），pp.76-77.该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女性是如何发现这种舒缓压力的方式的。

[123] Francois Lissarrague，"The Sexual Life of Satyrs，"收录于Halperin，Winkler，and Zeitlin，Before Sexuality.另见Andrew Stewart，Art，Desire，and the Body in Ancient Greec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25，fig.115，"Masturbating hunchback，"c.200 B.C.E.

[124] Martial，Epigrams 11.73.3-4，ed.and trans.D.R.Shackleton Bailey，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vol.3，pp.62-63，"Cum frustra iacui longa prurigene tentus，succurit pro te saepe sinistra mihi";Priapea 33，"fiet amica manus."我们是不是正确理解了"左手"的含义，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商议的话题。正如Adams指出的那样，那只手，那只"不洁之手"，被给予了不体面的任务。但是"用手来进行"这一叙述却十分具体，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到底是哪只手或是谁的手。在别处，Martial也没有具体指出当没有变童在身边的时候，他到底用的是哪只手，"在侍酒少年不在的时候，我的手就替代了他的作用"（Epigrams 2.43，vol.1，pp.166-167）。 Catullus在他的诗歌cinaedus中讽刺Vibennius时写道，他的父亲在他将自己的屁眼送过去的时候，用的是右手。Plautus将右手称

为“pullaria”，因为男人一般用右手来取悦同性恋人。　关于Catullus，Vibenni以及Plautus的更多内容，请参见Craig　Williams，Roman　Homosexuality：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6，270，n.61。陶绘上半人半兽手淫图上显示的也是右手。

［125］ Hugh Northcote，Christianity and Sex Problems（1908）;Philadelphia：F.A.Davis，1916），p.422;Aeschines，Contra Ctesiphon， p.174.Demosthene的朋友Ctesiphon提出了让Demosthene担任公职的动议，而Aeschines则强烈反对。

［126］ H.C.[Henry Cockerham]，The English Dictionary;or，An Interpreter of Hard English Words（London，1623;repr.New York：Huntington Press，1930）.“手淫”这一词汇在这部字典的许多版本中都能找到。我找到的是该字典的第11版（London，1658），这一版的解释与早先版本中的解释完全相同。

［127］ 关于半人半神兽和手淫，见Lissarrague，“Sexual Life of Satyrs，”p.57.Jeffrey Henderson，The Maculate Muse：Obscene Language in Attic Comed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200.Dio　Chrysostom，Works，trans.J.W.Coho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vol.1，pp.259-261;Philippe Borgeaud，The Cult of Pan in Ancient Greece，trans.Kathleen Atlass and James Redfie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77。并非所有关于潘恩的故事的版本都这么简单。在某个版本的故事中，潘恩令牧羊人全部变得疯癫，他们将仙女艾寇的躯干撕得粉碎，只有她的声音被保留下来。

［128］ Cicero，Tusculan Disputations，ed.and trans.J.E.King，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5），bk.4，vol.32，para.68，pp.406-407；关于Musonius，参见Cora　E.Lutz，“Musonius　Rufus：The　Roman　Socrates，”Yale　Clasical　Studies　10（1947），pp.4-14.关于Cierro和Musonius，参见Williams，Roman Homosexuality，pp.239-241。

［129］ Martial，Epigrams 14.203;Epigrams 2.43：“At mihi succurrit pro Ganymede manus.”关于Martial和变童的内容，请参见Williams，Roman Homosexuality。

［130］ 在此向Katherine　Zieman表示感谢，是他帮我找到了这一参考文献。这一故事出自Ovid，Fasti　1.423-438，ed.and　trans.James　George　Frazer，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31-33.Geoffrey Chaucer，The parliament of Fowls，1.256，收录于The Riverside Chaucer，ed.Larry D.Bens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p.388。

［131］ Daniel Boyarin，Carnal Israel：Reading Sex in Talmudic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此书主要描述了犹太拉比们对性的看法，但没有讨论《创世记》第38章8—10节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关于手淫的内容。

［132］ 关于女性手淫的评论缺失问题，请参见Julius　Preuss，Biblical　and　Talmudic　Medicine，trans.and　ed.Fred　Rosner（New　York：Sanhedrin　Press，1978），pp.489-490。　关于犹太教传统中手淫问题的论述文献中，没有一本涉及女性手淫问题。在某一本参考文献的叙述中，有着这样的字样，“任何被发现有过自我摩擦行为的女性都会被视为她玛（Tarma）”。见《圣经》中的《巴比伦-塔木塔》（BabylonianTalmud，以下简称为BT），Yabamoth　34b。该文献认为，女性的第一次的性经历是不会导致怀孕的。性知识的获得应该通过自然的方式获得。

［133］ 在犹太传统中，“不洁”是一个重要的话题。Ham Maccoby在其著作Ritual and Morality：The Ritual Purity System and Its Place in Judais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1-66中，总结了此类话题以及现代的一些相关评论。在关于“不洁”的问题是如何成为道德话题这一问题上，我在Jacob Milgrom的作品Leviticus 1-16：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New York：Doubleday，1991），尤其是第15章中找到了令人兴奋的内容。关于《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的内容，我参考的是Carmichael，Laws of Deuteronomy。

［134］　所有内容来自BT，Niddah　13a。英语译文参考自The　Babylonian　Talmud，trans.and　ed.I.Epstein（London：Soncino　Press，1935-1952），以及Satlow，“‘Wasted Seed，’”app.2，pp.172-175。在此向Daniel Boyarin，Jack Levinson，和Naomi Janowitz表示感谢，他们在我理解希伯来语文献上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135］ 关于此话题，见John　Noonan，Contraception：A　History　of　Its　Treatment　by　Catholic　Theologians　and　Canonists，enl.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61。关于更广泛的讨论，见该书pp.10-11，35-36，52-53，96-103，120-121，138-139，160-161，174-175，216-235。Noonan认为，12世纪学者Gratian和Lombard将俄南故事的比喻意义作为对节育的抨击。他还认为，手淫的讨论之所以长期以来默默无闻，是因为这种方法极少被人使用。但他并未对自己的论点提供任何证据。

［136］ Geoffroy La Tour Landry，The book of the knight of La Tour-Landry compil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his daughters，Thomas Wright为此书作序并注解（London：Published for th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by Kegan Paul，Trench，Trübner，1906）。该书最早是于1483年由William Caxton——首部英文《圣经》的出版商——翻译并出版的。

［137］ Michel de Montaigne，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trans.Donald M.Fram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bk.3，essay 5.

［138］ 本段的主要观点来自于Brown，Body and Society; 早期教会的道德戒律中并没有手淫的内容，在谈论性及身体的讨论中有没有涉及，或许惟一有所牵连的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中曾经谈论过如何去除多余的体液的问题。关于手淫讨论的缺失，以及当时的道德伦理讨论重点，请参见Susannah Elm，Virgins of God：The Making of Asceticism in Late Antiqu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或Teresa M.Shaw，The Burden of the Flesh：Fasting and Sexual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8）;St.Jerome，Ad Eustachium，Epis.22（Migne，PL 22），para.2，col.395。

［139］ 关于这部分婚内性行为和性快感的讨论，我主要参考了Jean Delumeau，Sin and Fear：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Guilt Culture，13th-18th Centuries，trans.Eric　Nicholson（New　York：St.Martin's，1990），尤其是pp.214-221，另外也参考了Thomas　Tentler，Sin　and　Confession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140］ 此句话出自于William of Rennes对Raymond of Penafort（1175/80-1275）作品的评注。Raymond是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他所编写的苦刑赎罪书在中世纪时期是最广为流传的赎罪书之一（我们已知的就有超过100个手抄本）。在Delumeau，Sin　and　Fear，p.216页中可以看见对William的引用。其拉丁原文，请参见Raymond of Renafort，Seu summa...de poenitentia et matrimonio cum glossis（Franborough，Hants：Gregg，1967;1603年的再版），vol.4，p.520。该页左边的注解处写道，“Provocat eam minibus，vel cogitatione，vel utendo caldis，& incentiuis，ut pluries posit cum uxore coire”；Delumeau的著作中还引用了Gregory的话：“这种愉悦（婚姻内性生活的快感）并非无懈可击。”（p.215）

［141］ 和我们的主题相关的关于苦刑赎罪书的最好的近期论著是Pierre J.Payer，Sex and the Penitentials：The Development of a Sexual Code，550-115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4）。赎罪书里的故事在我看来，为手淫在当时文化的折射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我还参考了John T.McNeill and Helena M.Gamer，Medieval Handbooks of Pen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8），pp.1-75，以及Ludwig Bieler，The Irish Penitentials，with an app.by D.A.Binchy（Dublin：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1963）。Hermann Joseph Schmitz，Die Bussbücher und die Bussdisciplin der Kirche（Graz：Akademische Druck-U.Verlagsanstalt，1958）的前言部分也有精彩的论述；我还引用了该书的拉丁文版本的部分内容。

［142］ 参见Payer，Sex and the Penitentials，pp.14，46-47。

［143］ Schmitz，Bussbücher，pp.619-620.

［144］ 引自Burchard，被引于Mark D.Jordan，The Invention of Sodomy in Christian The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p.52-53，原文来自Burchard of Worms， Decretum Libri Viginti 19.5（Migne，PL 140），p.968，cols.967D-968A。

［145］ Peter Damian，Book of Gomorrah：An Eleventh Century Treatise Against Clerical Homosexual Practices，由Pierre J.Payer翻译、作序并作注（Waterloo，Canada：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82）。该书是从Per Damian的著作Liber Gomorrhianus（Migne，PL 145）翻译过来，见p.29，n.3。Damian的这四种划分的拉丁原文为“Alii siquidem secum，alli aliorum minibus，allis inter femora，alii denique consummato actu contra natura delinquunt”。

［146］　这一故事旨在警告世人，那些“做了不洁之举”的人同样罪恶深重。那个沙漠中的隐士“收到恶魔的诱惑”，他的行为玷污了自己。但这似乎并不完全是手淫的例证，只能算是因为诱惑而不自觉排精，或夜遗的例证。我从没听说过恶魔会主动勾引男子的故事。见Damian，Book of Gomorrah，p.78。

[147] 同上，p.78。

[148] 同上，第26章开头；p.41。关于中世纪教会在12世纪前后对鸡奸行为的看法，见Warren Johansson and William A.Percy，“Homosexuality”，收录于Bullough and Brundage，Handbook of Medieval Sexuality。

[149] 关于此段和下一段的内容，请参阅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ae 2a2ae and 12，拉丁文和英语译文（New York：McGrawHill，1964-1976），pp.154，244-247。译者将peccatum immunditiae译为“自虐”，这显然有些不合适；他还将mollitiem译成“不贞的情欲涌现”，这个译法也存在一定问题。

[150] Tentler，Sin and Confession，pp.186-189;Jean Gerson：Early Works，trans.and ed.Brian Patrick McGuire（New York：Paulist Press，1998），p.188.

[151] 很明显，对婚姻内通奸行为的讨论并非来自于古典时期的传统，而是来自于教会对避孕主张的憎恶。这种带有明显偏见意味的观点不仅对性交姿势作以规定，还提到了手淫。然而，那些认为性交姿势不必仅限于繁衍目的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则对手淫采取了相对宽容的目的。如果没有合法的性交伴侣，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正当的。旅行者、单身者、穷人，以及那些丈夫不在身边的妻子与其诉诸不合法的手段，不如独自满足自己的欲望。法学专家和医生都普遍认为，过剩的精液对健康有损，因此，自我刺激的方式是可以被允许的，即便是在斋戒期间，以免多余的精液导致严重的疾病。B.F.Musallam，Sex and Society in Islam：Birth Control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32-34。

[152] Jean-Louis Flandrin，Sex in the Western World：The Development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ur，trans.Sue Collins（Chur，Switzerland：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1），pp.103-106，247-250，尤见248页，或注释pp.323-333。Flandrin认为，教会自14世纪之后，就一直致力于消灭手淫，或减轻它的频率（Gerson的论著是他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但证据并不十分充足）。但是，这种行为事实上与鸡奸大为不同（鸡奸行为罪恶如此深重，以至于主教要求必须对此作出忏悔）。请参见Payer，“Confession and the Study of Sex in the Middle Ages，”pp.12-14；另见James Brundage，“Sex and the Canon Law”，收录于Bullough and Brundage，Handbook of Medieval Sexuality，p.41。文章中认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只把手淫视为“小小的过失”。

[153] Peter of Poitiers认为，“不洁恶行”（mollites）一词来源于“舒缓压力、舒缓精神”的含义，这一意义的所指似乎十分具体。

[154] Robert Burton，Anatomy of Melancholy，ed.Thomas C.Faulkner，Nicolas K.Kiessling，and Rhonda L.Blai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1.3.2.4，vol.1（417-418），以及J.B.Bamborough with Martin Dodsworth，Commentar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vol.5，p.58。Burton支持传统的医学理念，他曾经讲述过一个疯癫的女孩因为性交而治好了自己的疯病的故事。他还说，“角斗者、挖沟人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者”等被认为会很快用尽自己的精液的人往往比较克制，而真正交合过频的生物，如麻雀则十分短命。（2.2.2.1.vol.2，p.32）

[155] 这里我使用了Mary Douglas的精辟论述：“灰尘只是物质放错了地方。”源自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Harmondsworth，UK：Penguin，1970）;J.F.Ostervald，The Nature of Uncleanness Consider’d：to which is added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Chastity（London，1708）。Ostervald的著作所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Jean Pistorius 1706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Traité contre l’impureté。Ostervald（1663-1747）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关于《圣经》和道德腐化的著作被广为流传。The Nature of Uncleanness英文版的出版商Parker在出版关于手淫的作品之前，就已经涉足性学的其他领域。他出版的Ostervald关于“不洁行为”的合集在当时行销一时，因为读者可以得到他的“签名”。

[156] Ostervald，Nature of Uncleanness Consider’d，pp.177，180.

[157] The life of the Reverend Mr.Geo.Trosse late minister of the gospel in the city of Exon，who died January 11th，1712/1713...， Written by himself，and publish’d according to his order...（1714）.这部自传撰写于1692-1693年，记载了Trosse在1689年之前的所有事件，并在他过世后，由他的妻子负责出版。尽管Trosse的前半生罪行累累，但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非国教教士。

[158] Samuel Clarke（1599-1682），A mirrour or Looking-Glasse both for Saints and Sinners，held forth in thousands of Examples，3rd.enl.ed.（London，1657），pp.7-11;“Examples of God's Judgments upon Whoremongers，and adulterers，”pp.67-70;“Examples of Chastity and Modesty”.Clarke是一个崇尚节制的清教徒，反对国王独裁，1662年之后，他成为一名非国教教徒，并将余生投入到写作当中。他是典型的拥护婚姻者，在对妻子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她总是催人向上，从不阻拦我去做应该做的事”。Jeremy Taylor，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in which are described the means and instruments of obtaining every virtue，and the remedies against every vice，and considerations serving to the resisting all temptations.Together with prayers，containing the whole duty of a Christian，and the parts of devotion fitted to all occasions，and furnished for all necessities（London，1651），pp.83-84，80-100.虽然此书并不如Taylor的另一部作品Holy Dying那样畅销，但也在1651年至1700年间出版了15个版本。也许，这样一部对“所有罪行”都一一阐述的畅销书籍单单没有提到手淫这一事实，其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159] William Byrd，The London Diary（1717-1721）and Other Writings，ed.Louis B.Wright and Marion Tinl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263，268，272;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ed.Irwin Primer（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2），p.710.

[160] “A Short Dissuasive from the Sin of Uncleanness”（1701），未注明页码。[Edward Fowler，Lord Bishop of Gloucester]，A Vindication of an Undertaking of Certain Gentlemen，in Order to the Suppressing of Debauchery and Profaneness（London，1692）.这两篇文献都记载了“行为举止改革协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的有关活动。第一篇文献认为，“不洁”行为指的就是嫖娼行为；第二篇文献却没有明显说明。 1727年的一篇布道文献中没有提到这种新的“不洁行为”。见Anthony Holbrook，Christian Essays upon the Immorality of Uncleanness and dueling delivered in two sermons preached at St.Paul's（London，1727）。

[161] 关于各种捍卫道德组织的有关情况，请参阅Edward J.Bristow，Vice and Vigilance：Purity Movements in Britain Since 1700（Dublin：Gill and Macmillan，1977），pp.11-33。同样在新英格兰，也掀起了一场公共道德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早期的现代欲望和习俗文化，另一方是由清教徒带来的新的道德行为准则。关于此论战，详见Richard P.Gildrie，The Profane，the Civil，and the Godly：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in Orthodox New England，1679-1749（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

[162] God's Judgments against Whoring，being 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it...being a Collection of the Most Remarkable Instances of Uncleanness（London，1697）;关于俄南的内容，见pp.27-28。我未能找到该书的第二卷。

[163] Josiah Woodward，A Rebuke to the Sin of Uncleanness.By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London，1701）。我使用的是1704年的缩印版本，p19。

[164] John Calvin的著作包括Four Godlye Sermons against the pollution of idolatries（London，1561）。见Edward Reynolds，The Sinfulness of Sinne， 4th ed.（London，1639），pp.321及之后各页。其中涉及了偶像崇拜的内容，夹杂在对不洁行为的讨论中。在别处，这种偶像崇拜被视为罪恶的源头，是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著名的神学家Henry Barrows也就不洁行为发表过评论，“The Pollution of University Learning”（London，1642）。钱伯斯的《百科全书》中说，“夜间不洁行为”是18世纪手淫的代用语。见上书，pp.35-36。我能找到的关于“自渎”（Self-pollution）这一词的使用可见Capel，Tentations：Their Nature，Danger，and Cure。

[165] 见Carol Kazmierczak Manzione，“Sex in Tudor London：Abusing Their Bodies with Each Other，”收录于Murray and Eisenbichler，Desire and Discipline，pp.90-93。

[166] 例如：W.T.，A godly and profitable treatise，intituled Absalom his fall;or，The ruin of Roysters.VVherein euery Christian may as in a mirrour behold，the vile and abominable abuse of curled long haire，so much now vsed in this our London（London，1590）;Cupids tryumph.Though his deity is impeached，by his power he is justified.against the reproaches[sic] of a coy scornful lady.Being an answer to Cupids courtesie.Whoby experience found that all were stupid，which durst abuse the boundless power of Cupid（London，1666 and 1679）;John Brinley，A discourse proving by Scripture & reason and the best authors，ancient and modern，that there are witches：and how far their power extends to the doing of mischief both to man and beast：and likewise the use and abuse of astrology...（London，1686）.准确地说，“用人来滥用人”是Calvin的英文译者自己的话。

[167] 17世纪之前还有一部对手淫的批判作品，题为Letters of Advice from Two Reverend Divines to a Young Gentleman，about a Weighty Case of Conscience，大概出版于1676年。这一文献或许确实曾存在过，但影响不大。关于这部作品既没有在任何现代作品中提到过，也没有在18世纪被提到。它的初版也没有任何遗留的残存，在ESTC上也没有任何记载。如果确实曾经有过这本书，它也只是在1720年前后被增补进Eronania的某个版本中。我怀疑这本书是一本伪作。也许我们还会找到其他的参考文献，但我所说的不超过三页是在对所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之后，谨慎得出的数字。

［168］ Richard Capel（1586-1656），Tentations：Their Nature，Danger，and Cure，5th ed.（London，1655）.（该书在此前曾有过4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633年，1635年，1636年和1637年。）“Epistle to the Reader，n.p.，”pp.2-3，22-24，30-40，205-207，210-211，213及之后各页。该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部分共387页，第四部分的298页单独标注页码，但与前三部分装订在一起。

［169］ 有关这些日期的争议，见Stolberg，“Self-Pollution，Moral Reform，the the Veneral Trade”。如果我关于《手淫》的作者是Marten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日期就应该早一些。The Monthly Catalogue，1714-1717 [这是一个出版于1714年5月的目录，搜集了在此日期之前所有书籍、布道的小册子、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资料]（London，1714-1717;London：Gregg Press，1964），3.6（Oct.1716）中记载道，Paul Varenne曾想用1个先令购买此书。

［170］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ed.Robert Latham and William Matthew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vol.2，p.204;vol.2，p.230;vol.2，p.232。有关他流连于各种风月场所的内容在他最初几年的日记中几乎随处可见。我在此向Joseph Roach表示感谢，他慷慨地将自己的手稿“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Pepys，Shakespeare，and the Performance of Everyday Life”给我拜读，这篇论文是他为2001年北美莎士比亚协会研究会议撰写的论文。文章认为，戏剧和手淫属于同类事物，是幻想的不同方式，二者都需要融入丰富的幻想。Latham and Matthew书中的第10卷的索引中给出了Peys手淫的所有范例。

［171］ Diary of Samuel Pepys，vol.7，p.365;vol.8，p.588;vol.9，p.184;vol.6，p.331 vol.2，pp.230，232;vol.6，p.191.

［172］ John Cannon，“Memoirs of the Birth，Education，Life，and Death of Mr.John Cannon.Some time Officer of the Excise and Writing Master at Mere Glastenbury and West Lyford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1684-1742，”Somerset Record Office，DD/SAS C/1193/4，pp.28-29.在此感谢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的Tim Hitchcock，他将这部并未正式出版的回忆录的资料寄给了我。

［173］ Jean Delumeau，Sin and Fear：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Guilt Culture，13th-18th Centuries， trans.Eric Nichols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00），p.4.

［174］ C.F.Lallemand，Des Pertes seminales involontaires（Paris，1836-1842），vol.3，p.477;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1975）.

［175］ Jean-Louis Flandin，Families in Former Tim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11在pp.189-191及209-211有更概括的阐述。

［176］ 到如今，仍然很难确定手淫及曾经手淫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177］ 有关人们消除“所谓性交”（Henry Abelove语）心理障碍的总结性文章，请参阅Patrick O’Brien和Roland Quinault编辑的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Society：Festschrift for R.M.Jartwell（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一书中Thomas Laqueur所著“Sex，Gender，and Desi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文。

［178］ 在19世纪也许有些例外，因为那时自慰由于种种原因浮出水面。例如，美国健康观念革新领袖J.H.Kellogg就是新禁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各种性活动都是混乱的、有罪的，会使人虚弱：“非法的性活动是罪恶深重的，而自慰……要比它坏一倍。”Sylvester Graham也同样对自慰持否定态度，他秉承了Kellogg的克己的高尚作风——素食、节欲。他认为，婚姻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为了挫伤性欲——熟悉后双方的兴趣就会减少，这是好事，因为一年内多于12次性交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有关Graham的文章，参阅Jayme A.Sokolow所著Eros and Modernization：Sylvester Graham，Health Reform，and Origins of Victorian Sexuality in America（Rutherford，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83）.pp.84-91。Sokolow意味深长地指出，性节制，特别是有关自慰的做法，可以帮助抵御城市生活中的刺激和诱惑，是一种更全面的改革进程。

［179］ 见第二章，注释35。

［180］ Roy Porter和Lesley Hall所著The Facts of live：The Creation of Sexual Knowledge in Britain，1650-1950（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的第3章中，对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快感的认识有精彩的论述。

［181］ 见Théodore Tarczylo，Sexe et liberté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Paris：Presses de la Renaissance，1983），第2章。见David Stevenson，The Beggar's Benison：Sex Clubs of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Their Rituals（East Lothian，Scotland：Tuckwell Press，2001），pp.69-93，98-99。本书交付排版以后，我才得以看到Stevenson的这部著作。

［182］ Goss and Co.，The Aegis of Life，23rd ed.（London，1840），p.59.Roy Porter认为，自18世纪始，庸医们通过宣传适当条件下的性交会带来快乐的观点给人们带来了对自慰的恐惧。见Health for Sale：Quackery in England，1660-185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9-179。Goss and Co.，Hygeiana：A non-med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laints Incidental to Females，20th ed.（London，1830），p.62。

［183］ John Quincy，Medicina Statica：Being the Aphorisms of Sanctorius（London，1712），箴言34、37。

［184］ 认为自慰是罪过的传统看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道德神学领域，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代。自慰是一种人们早已经熟知的异常恶行，一种淫秽方式，一种控制生育的方法，即，只为性交而性交而不以生殖为目的。历史上一直对其争论不断：例如在1665年，教皇Alexander VII认为不能因为自慰、鸡奸和兽奸都属于同类，就推断一个曾进行过鸡奸或兽奸的人就一定也要进行自慰。至于女人是否也像男人那样进行自慰则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讨论话题。总体上说，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女人没有精液，也就不存在射精的问题；因此，女人自慰不过是“猥亵的抚摸”。但这些都不是使自体性行为成为现代社会让人忧心忡忡焦点的关键。以上观点见Aloysius J.Welsh，The Scholastic Teaching Concerning the Specific Distinction of Sins in the Light of Moral Theology（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1942），pp.61-62;Julius Preuss，Biblical and Talmudic Medicine，Fred Rosner编译（New York：Sanhedrin Press，1978），pp.489-490;Cari Capellmann，Pastoral Medicine，William Dassel翻译（New York：Pustet，1879）。

［185］ S.A.D.Tissot，Onanism;or，A Treatise upon the Disorders Produced by Masturbation;or The Dangerous Effects of Secret and Excessive Venery，A.Hume翻译（London，1761），p.72。

［186］ 同上，p.32。

［187］ 有关脑电图记录与自慰高潮的论战，见Harvey D.Cohen et al.，“Electroencephalographic Laterality Changes During Human Orgasm，”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3（1976），pp.188-189，以及Benjamin Grabe等人“EEG During Masturbation and Ejaculation，”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4.6（1985）；有关那位41岁癫痫病人的情况，见Daniel E.Jacome，“Absence Status Manifested by Compulsive Masturbation，”Archives of Neurology 40（Aug.1983），pp.523-524。很显然，所谓的非癫痫良性突发症状（NEPE）或叫腹部疼痛是很平常的；然而把由自慰引起的战栗与由疾病引起的战栗区别开来却不容易，在儿童中尤其不易。一些儿科医生建议家长应该先了解自慰是正常又平常的事，它可以引起与某些严重疾病症状类似的体征表现。一旦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诊断程序。见“Masturbation Mimicking Abdominal Pain or Seizures in Young Girls，”Journal of Pediatrics 116.5（May 1990），pp.810-814;C.H.Wulff et al.，“Epileptic Fits or Infantile Masturbation，”Seizure 1.3（Sept.1992），pp.199-201;S.Livingston，“Masturbation Stimulating Masturbation，”Clinical Pediatrics 14（1975），pp.232-234。

［188］ “Epilepsy”出自A Referenc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Sciences，新改版，Albert H.Buck编，（New York：William Wood and Co.，1901）vol.3，p.849.现在有很多阐述自慰和各种发作所导致神经问题的文章，但是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89］ 该观点的有力阐述，见G.J.Barker-Benfield，The Horrors of the Half-Known Life：Male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nd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1976;New York：Routledge，2000）。

［190］ Roy Porter，“Sex and the Singular Man：The Seminal Ideas of James Graham，”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28（1984）.有关Isidore和Harvey，见Thomas Laqueur，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56，144。

［191］Tissot，Onanism，p.52;“semence，”见Encyclopédie，vol.16，p.939;Friedrich Hoffmann the Younger，Opera Omnia（1740），bk.2，cap.8，p.23：“Seminalis liquor delibatissiumus，quai flos sanguinis as liquidi nervorum est，hinc deligenter circumspiciendum，ne immoderate ejus excretion sanitatem offendat.”Hoffman在他所处时代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化学医学派代表人物。化学医学派认为，医学和生理学是可以用化学原理加以解释的学科。很难判断他和其他18世纪的医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到底如何理解精子。Hoffmann认为，有一种乙醚物质作用于神经系统，使肌肉和体液处于运动状态；这种物质使生命具有活力。有些时候好像精子就是这种物质。

［192］ Tissot，Onanism，p.2;Winfield Scott Hall，Jeannette Winter Hall协助，Sexual Knowledge（London：T.Werner，未注明出版日期;美国第一版，1913），pp.143-144。该文章发表于生理学新世纪论丛。Hall认为夜间性交射精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反正那些精子已经死掉了。他说的不错，夜间性爱后射出的精子大部分都会死掉，但是以其他方式射出的精子也是会死掉的，如果它们停留在体内超过48小时的话。总而言之，精子的寿命有限。

［193］Tissot的第六部分有9页，48-57，都是阐述“精液的重要性”。Thomas Cogan，The Hauen of health，chiefly made for the comfort of students，and consequently for all those that haue a care of their health，amplified vpon fiue wordes of Hippocrates，written Epid.6.Labour，meat，drinke，sleepe，Venus：Hereunto is added a preseruation from the pestilence：with a short censure of the late sicknesse at Oxford（London，1612），p.242;Cogan在Deanimalibus中引用的Canon是由Avicennade所著，现在可以找到很多早期的现代拉丁语版本及英语译本。

［194］ 见Albert Müller，Ueber unwillkürliche Samenverluste und ber functionelle Störungen der männlichen Geschlechtsorgane：Eine wissenschaftliche Abhanlung（Rorschah，1869）。该引文出自第一页。Müller在文中强调了手淫疾病在神经及摩擦方面的病因。问题在于，在两性性交中，摩擦刺激的程度取决于阴道。然而经过几次生产之后，阴道会变得松弛。于是，男人往往会对生过几个孩子的妻子不忠。而手淫过程中却完全可以控制力度，从而过度刺激性器官。精液流失不算问题。见Müller，pp.23-34。

［195］有关“精液”的更学术、更新的探讨，请参见Robert B.Todd，The 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London，1835-1859），vol.4，pt.1，pp.472-508中德国研究员Wagner和Leuckart的成果分析。书中大量谈及精子的形态，精液的化学构成以及精子形成的不同阶段，但是却没有提到有关精液是生命之源、精力之本或血液精华的论断。换句话说，有关精液的新发现与手淫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这种精液自然理论是由一位名叫Louis de la Caze的人提出来的，他的Idée de l’homme physique et moral，pour server d’introduction un traité de médicine（Paris，1755）一书深深的影响了为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手淫文章的作者。尽管据他的研究助手讲，Louis de la Caze已经痴癫疯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理论的威力。见Anne C.Villa，Enlightenment and Pathology：Sensibility in th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48-52。以上所有均在Tissot的Onanism pp.36-39提到。

［196］ Onania Examined and detected;or，The ignorance，error，impertinence，and contradiction of a book called Onania discovered and exposed...By Philo-Castitatis，2nd ed.（London，1724），pp.81-82.

［197］ G.Stanley Hall，Adolescence：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hysiology，Anth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and Education（1904;New York and London：D.Appleton，1924），vol.1，p.440.

［198］ Tissot，Onanisme，p.86.Michael Ryan，Lectures on Population，Marriage，and Divorce（London，1831），p.32.

［199］例如，Tissot，Onanism， p.19；名为《手淫》的文章出自Grand Dictio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Paris：Administration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1975），vol.14，pp.1320-1322。该文同时列出很多有用的18及19世纪关于这一主题的医学论文。另见Karl Heinz Bloch，Die Bekämpfung der Jugendmasturbation im 18.Jahrhundert：Ursache，Verlauf，Nachwirkungen（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Peter Lang，1998），pp.354-355。

［200］ Onania，p.43;Dictionnaire portatif de santé， 4th ed.（Paris，1771），vol.2，p.339;Tissot，Onanism，pp.41 and 41-48.J.G.Zimmermann，“Warnung an Elten，Erzieher und Kinderfreunde wegen der Selbst-befleckung，zumal bein ganz jungen madchen，”Deutsche Museum 1（1778），pp.453-454;P.J.C.Debreyne，Essai sur la théologie morale（Paris，1844），pp.111-135。书中提到很多血淋淋的例子。J.L.Doussin-Dubreuil的作品也谈及很多有关妇女及手淫的问题。见他的作品Des garemens secrets，ou，De l’onanisme chez les personnes du sexe（Paris，1830）。作品提供了插图，并以书信的形式向母亲们介绍拯救她们女儿不受手淫厄运影响的方法。他在Nouveau Manuel sur les dangers de l’onanisme，新版（Paris，1839）中的第8封信，特别是在p.125把胃、子宫及神经疾患归因于经常性的手淫。

［201］ Sigmund Freud，“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出自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James Strachey翻译（London：Hogarth，1953-74），vol.19，p.255。

［202］ O.S.Fowler，Amativeness;or Evils and Remedies of Excessive and Perverted Sexuality（Wortley，UK，c.1849），p.4;在其厚厚（1000多页）的教科书中，Fowler援引当时费城一位权威医生的观点，认为六分之五的妇女疾病是由手淫引起或导致恶化的。同时他还举出一位牙医年轻妻子的例子：她因早年手淫而成了“头脑简单，目光呆滞的笨蛋”。O.S.Fowler，Creative and Sexual Science：or，manhood & womanhood，and their mutual interrelations;love，its laws，power，etc...as taught by phrenology and physiology（Pittsburgh：E.F.Spyer and Co.，1875），pp.873-910令人恐怖的描述了“自我通奸”对身体的伤害，“比其他性罪恶坏20倍”。在pp.877-878，881和886，作者还特别引用了其他人的观点。Thomas Low Nichols，Esoteric Anthropology（The Mysteries of Man）：A comprehensive and confidential treatise on the structure，functions，passional attractions，and perversions...and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s of men and women（1853），pp.280-281.Nichols阐述道，尽管有些人认为精液损失是手淫疾病的主导原因，但很显然，实际上不是。Fowler还引用手淫问题专家Mary S.Gove Nichols（Nichols的妻子）的观点，因为她出版了若干有关妇女健康和解剖学的讲稿以及一些小说和文艺研究方面的文章。Copland的确是认为，“手淫在两性中造成的坏影响比大家想像的要严重”，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手淫；见James Copland，“insanity，”选自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London，1858），vol.2，sec.303.b.。有关精神病院的诊断，见Ann Goldberg，Sex，Religion，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Madness：The Eberbach Asylum and German Society，1815-184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88-89。真实性无从考证。Goldberg说的有一些道理：这一时期的德国医生认为男性手淫者成长迟缓、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直至最终疯狂，而女性手淫者会具有攻击性，最终变成色情狂。但是Goldberg也不都对：19世纪的医学界大体上就不这样认为了。Harry Oosterhuis，Stepchildren o Nature：Krafft-Ebing，Psychiatry，and the Making of Sexual Ident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153。Mary S.Gove [Nichols]，Lectures to Ladies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Boston，1842），pp.222-223，217-231更概括一些。Gove纵览了医学文献，列出一些男女都有同等机会得的病——从失明到舞蹈病，到心悸；当然，其他疾病，如月经不调或阳痿是针对某一性别的。

［203］ Zimmermann，“Warnung an Eltern，”p.455;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Über die heimlichen Sünden der Jugend（Frankfurt and Leipzig，1786），pp.10-11;“manstrupration，”出自Encyclopedie，vol.10，pp.51-53;Samuel Gottlieb Vogel医生将手淫对男女的危害分别列出，但同时在他1786年出版的Unterricht fur Eltern中提出，手淫对女孩的影响要大得多；他还专门撰文讲述一位妇女因进行了这种“秘密的邪恶”而自杀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献翻阅一遍，就会发现男孩手淫的数量远远高于女孩，讲述手淫对女性危害大的文章数量要远远多于讲述手淫对男性危害大的文章数量。

［204］Anastasia Verbitskaia，Moemu chitatelin（致读者）（Moscow，1908），pp.331-334.我感谢Hilda Hoogenbloom向我提供并翻译这个参考资料。有关沙皇时代晚期Verbitskaia在俄国所宣扬的性别主张见解，见Laura Engelstein，The Key to Happiness：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ècle Russ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p.399-403。Engelstein的文章题目取自Verbitskaia著名的小说标题。

［205］Tarczylo，Sexe et Liberté，ch.4.http：//jackfilm.8m.com/mp.html有时需要更新信息，该网站会“暂时不能访问”。

［206］有关道德生理学的精辟阐述，参见Anne Vila的Enlightenment and Pathology，特别是pp.43-107.

［207］ 读者在读Rousseau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后所写的读后感汇集到出版商Panckoucke那里，由Robert Darnton集中整理论述。见The Great Cat Massacre（New York：Vintage，1985），pp.243-247;S.A.D.Tissot，“Diseases Incidental to Literary and Sedentary Persons，”出自Three Essays：First，on the disorders of people of fashion;Second on diseases incidental to literary and sedentary Persons with proper rules for preventing their fatal consequences;Third，on Onanism...，Francis Bacon Lee，M.Danes，A.Hume翻译（Dublin，1772），p.15。

［208］Albert von Haller，A dissertation on the sensible and irritable parts of animals.By M.A.Haller，...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With a preface by M.Tissot，M.D.（De partibus corporis humani sensibilibus et irritabilibus）（London，1755），pp.iv和i-xx之间多处。没有英文翻译；英文前言由Tissot为Lausanne法语版本的前言翻印而来。

［209］同上。Vila，Enlightenment and Pathology，pp.21-28。当然，既然精液被理解为一种精华物质，男女身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精液也就又回到人们关注的视野中来。这样说来，它包含了最基本的例子，生命的夸克。从古希腊时代起，人们就认为神经与精液有着很亲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在没有损失任何精液的前提下，神经也会受到损伤。

［210］英国西部港口布里斯托尔的医师，Tabes dorsalis;or，the cause of consumption in young men and women，with an explication of its symptoms，precautions，and the method of cure...To which is added，a physical account of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venery，...By a physician of Bristol. 第六版（London，[1770？]），p.8。头三版都只涉及男人。作者把Santorius视为权威，并多处引用了他的名言。Santorius是16世纪晚期及17世纪早期意大利东北部帕多瓦的一位医学教授。他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试验：他把椅子和餐桌固定在一个秤上，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吃饭，试图量化"不易被人察觉的排汗"，从而解释新陈代谢中体重的消耗，即摄入与最后的体重是有出入的。尽管18世纪很多人在讨论手淫是最危险的一种性交这一话题时常常引用到Santorius的名言，但是那些名言并没有真正切入到手淫这个主题。因为正如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在1714年以前，手淫并不是什么问题。William Clark，A medical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the passions on human bodies;first published in Latin，at Leyden，on the 31st of July，1727，for acquiring the honour and privilege of doctor in physick...and now republished in English [Dissertatio medica inauguralis de viribus animi pathematum in corpus humanum]（London，1752），p.38;A practical essay upon the tabes dorsalis，in the way of aphorism and commentary：In which the history of that distemper is laid down，the rationale of its symptoms given，and the method of cure（London，1748）.p.6.

［211］Tissot，Onanism，pp.81-83 and 127-128;有关Sanctorius见John Quincy，Medicina Statica：Being the Aphorisms of Sanctorious（London，1712），第6部分，pp.242-243和248.

［212］Précis historique，physiologique et moral，des principaux objects...qui composent le museum de J-Fois Bertrand-Rival（Paris，1805），pp.344-345.

［213］见William Cullen的相关理论。William是格拉斯哥医学院的奠基人，是18世纪神经科最著名的临床医生。他提出，如果生命根本的神经活动失衡，就会导致疾病，而多数疾病与手淫有很大关系。不过，他并没有确切提到手淫是否就是疾病的直接原因，也并不认为体液流失就会导致疾病。Willian Cullen，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Physic with Supplementary Notes by Peter Reid（Brookfield，MA，1807），pp.574-579。该书于1777年首次出版，在1800年之前又再版10多次。

［214］Mary Scharlieb和F.Arthur Sibly，Youth and Sex：Its Dangers and Safeguards for Boys and Girls（London，c.1910），pp.44.Scharlieb对女孩的忠告并没有直接指向手淫问题；Sibly引用了大量他自己在1908年国际道德教育大会上的发言，明确地表示手淫是最迫切的问题。在很多方面，Sibly体现了很多研究手淫和道德贞洁方面专家的共同特点，他对每一个研究对象的手淫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还采用了当时很新颖的疗法——催眠。有关对Sibly的指责、Ernest Jones对他的批判（Ernest是弗洛伊德作品的翻译者，也是对手淫重新定义的主要人物）等情况，请参见Chris Water的论文"Onanism，Homosexuality，and the Adolescent Boy：The Case of Dr.Arthur Sibly and Dr.Ernest Jones."在此，对Chris表示感谢。

［215］Sigmund Freud，"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Love，"出自Complete Works，vol.9，p.182。

［216］The Crime of Onan（London，c.1724），p.iii（BL 1173 b.9/11）.这是由Anodyne-Necklace家族出版，与其他版本分页不同。

［217］Encyclopédie，vol.10，p.51;Denis Diderot，D' Alembert's Dream，出自Romeau's Nephew and Other works，Jacques Barqun和Ralph Bowen翻译，（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80），pp.169-170。

［218］Onania，p.90.当然儿童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欲望和快感，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以后的文中将有所提及。

［219］Tissot，Onanism，pp.88 and 155.

［220］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Die Kunst das menschliche Leben，3rd（Jena，1798），pt.2，pp.14-16.其英语译本在1797年版本基础上进行改写，并献给格言家、科学家、文人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于1854年在伦敦发行。而1797年的英译本是在1794年版本的基础上改写的。内容都是启蒙运动时期医学的中心话题。

［221］D.T.de Bienville，Nymphomania;or，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furor uterinus.Clearly and methodically explaining the beginning，progress，and different causes of that horrible distemper.To which are added，the methods of treating the several stages of it，and the most approved remedies.Written originally in French，trans.Edward Sloane Wilmot（London，1775）.

［222］Dictionnaire portatif de santé，vol.2，p.340."Pollution volontaire.""Spermatorrhea"和"Onanisme"出自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medicales，3rd ser.，vol.11;Mary Wood-Allen，What a Young Woman Ought to Know（Philadelphia：Vir Publishing Company，1899，1905），p.155.Wood-Allen是妇女基督节欲联合会贞洁部的负责人。她来自美国的声音在整个欧洲包括大英帝国都得到了响应。

［223］在此进行强调。A.P.Buchan，Venus sine concubitu（没有性爱的维纳斯）（London1818），pp.50-51和43-44。Alexander Peter Buchan是William Buchan的儿子和编辑。William的Domestic Medicine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行了十几版，他与Tissot在英语国家的声望势均力敌。A.P.不仅编辑了他父亲的作品，翻译了一些法语作品，还出版了一些有关性病、海水浴、小儿科疾病等著作；见他在威斯敏斯特医院的演讲。他说他在Venus一书中的观点是在15年前他与John Hunter（见下面注释52）争论中形成的。他提出，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忧郁症会破坏人的健康。例如，一个很健康的男孩，一直手淫，但身体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直到有一天他读了Tissot的文章，然后开始担心害怕，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p.68）。然而，他没有像Hunter及弗洛伊德的同僚们那样断定，导致疾病的原因就是手淫后的愧疚感，而不是手淫本身。

［224］Thomas Beddoes，Hygëia;or，Essays Moral and Medical（Bristol，UK，1802），p.48.

［225］John Hunter，A treatise on the Venereal Disease，1st ed.（London，1786），2nd ed.（London，1788），pp.199-200.见Isabel Hull，Sexuality，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1700-1815（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1-162，书中有一些18世纪晚期针对德国反手淫论著的强烈批判的篇章；与Hunter类似，有人争论道，如果手淫真的那么糟糕，"那整个人类早就该灭绝了"。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该问题与其说是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个道德问题。这种完全理性的分析一直到20世纪早期才产生一些影响，因为那时人们对性与自我潜在问题的理解和观念改变了。

［226］Hunter，Treatise on the Venereal Disease，1st，p.200.在第二版中，这一论断就被删掉了，在1810年的第三版，整个一部分都恢复成对手淫的传统攻击。见下面注释56。

［227］Sándor Ferenczi，"On Onanism，"in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trans.Ernest Jones（Boston：Richard G.Badger，c.1916），pp.157-163.

［228］Duncan Gordon，A Letter to John Hunter respecting His Treatise on the Venereal Disease...in Favour of Onanism or Masturbation（London，1786），pp.17-18及其他各处。Gordon阿谀奉承地肯定了Hunter的伟大及其性病方面研究成果的价值。

[229] John Hunter，A Treatise on the Venereal Disease enlarged with occasional comments by the editor...3rd，Everard Home编辑（London，1810），pp.214-215。Home不仅撰写了诸如枪伤、溃疡、尿道狭窄等方面的外科研究成果，还在比较解剖学领域有所建树。他在其研究的领域是佼佼者，并因此被授爵。

[230] “Pollution nocturne，”in Encyclopédie， vol.10，p.924，col.1;Pliny，Natural History 36.21-22;Leonard Barkan，“The Beholder's Tale：Ancient Sculpture，Renaissance Narratives，”Representations 44（Autumn，1993），pp.133-166;“masturbation，”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edicales（1819）.艺术会产生性兴奋的观点在有关手淫和性变态的著作中贯穿始终。一位19世纪晚期的美国医生在讨论女色情狂的话题时写道：“那些在博物馆或公园里看到裸体雕像的人中，性欲望丝毫没有被激起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一。”L.M.Philips，“Nymphomania-Reply to Questions，”Cincinnati Medical journal 10.7（1895），pp.467-468.

[231] William Farrer，A short treatise on onanism;or，The detestable vice of self-pollution.Describing the variety of nervous or other disorders，that are occasioned by that shameful practice，or too early and excessive venery，and directing the best method for their cure，By a physician in the country（London，1767），p.v.同年，该册子又至少出版印刷了一次。

[232] 在整部书中，我时而用“幻想”，时而用“想像”，而有关它们是否一回事的争论自古有之。Coleridge曾很好的区分两者。我关注的是我们幻想的潜能，即超越我们的感观而进行信息更新的能力。按理讲，这应该是幻想。但是我所引用的很多作者都用了“想像”一词。正如18、19世纪的作者们常将两者混杂起来用，我也是。有关两者的理性区分，见Wilma L.Kennedy，The English Heritage of Coleridge of Bristol，1798：The Basi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Thought for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Fan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Sigmund Freud，“A Discussion of Masturbation，”in Complete Works，vol.12;Anthony Frank Campagna，“The Function of Men's Erotic Fantasies During Masturbation，”博士论文，Yale University，1975。

[233] Frank Kermode的福音理解研究The Genesis of Secrecy：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阐述了最后一种秘密。

[234] Onania，p.11;Curse of Onan and Eronania 1173.b.9（London：Parker，1724），pt.2［页码分开］，pp.4，vii-viii.

[235] Tissot，Onanism，p.xi.

[236] Onania，17th ed.，p.98.

[237] Richard Carlile，Everywoman's Book，in M.L.Bush（编），What Is Love？ Richard Carlile's Philosophy of Sex（London：Verso，1998），pp.98-99，注释142-143。

[238] 我并不是说在秘密和隐私之前或范围之外就没有自我。推荐阅读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一书中Stephen Greenblatt对Spenser的阐述。

[239] 见Richard Rambuss Closet Devotion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06，121。The Puritan Divine和Oliver Heywood的Closet-Prayer都非常流行。在17世纪的英国，这种秘密祷告的作品无论是在清教徒还是在主流英国国教徒中都风靡一时。

[240] G.Giorgi and M.Siccardi，“Ultrasonic Observation of the Female Fetus’ Sexual Behavior in Utero，”in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75（Sept.1996），p.753.

[241] Zimmermann，“Warnung an Eltern，”p.453.此处Zimmermann指的是男孩；从他给的例子可以看出，女孩多数是自己学会手淫的：生殖器附近的蠕虫让人觉得痒痒的，从而产生快感，即没有刺激物的自我淫秽。其他医生则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女孩是从其他女孩那里学会手淫的。

[242] Jean-Mark-Gaspard Itard，The Wild Boy of Aveyron（Rapports et mémoires sur le sauvage de l’Aveyron， 1807），trans.George Humphrey and Muriel Humphrey，（New York：Century Co.，1932），pp.96-99.由于没有标题为The Wild Boy of Aveyron或Rapports et mémoires的法语原文，因此这个引文目录有些怪异。该文实为Itard作品Rapport fait son excellence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sur les nouveaux développements et l’état actuel du sauvage de l’Aveyron（Paris，1807）的英译。

[243] Tissot，Onanism，pp.77 and 44-45;Salzmann，Uber die heimlichen Sünden，p.239.

[244] Zimmermann，“Warnung an Eltern，”p.283.Sixt Karl Kapff，Warnung eines Jugendfreundes vor dem gef□hrlichsten jugendfeind;oder，Belehrung ber geheime Sünden，ihre Folgen，Heilung und Verhütung，durch Beispeile aus dem Leben erl□utert und der Jugend und ihren Erqiehern an's Herz gelegt，13th ed（Stuttgart：J.F.Steinkopf，1880）.August Strindberg，The Son of a Servant：The 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a Human Being， 1849-1867，Evert Sprinchorn翻译并作序（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6），pp.84-86;Max Hodann，History of Modern Morals，trans.Stella Browne（London：Heinemann，1937），pp.250-251，书中认为是Kapff让年轻的Strindberg意识到他自己身上的秘密。Kapff的作品跟其他很多在本书第一部分引用的作品一样，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它于1841年在德国问世，到1911年已经再版22次；当年的“秘密邪恶”已经出现在所有欧洲语言中。在美国印刷出版的几个德语版本，是为了迎合满足美籍德国移民的需求；Michael Neyer，Strindberg：A Biography（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85），pp.16-17，in Strindberg，Samlade skrifter，vol.18，pp.184-185.

[245] 很多18世纪德国的小册子明确地面向教师和家长，Tissot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文中的例子来自Mary Ries Melendy，Perfect Womanhood for Maidens，Wives，Mothers（K.T.Boland，1901）。Mary是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她创作了《家庭医疗指南》及一系列的向妇女宣传优生优育知识的书籍。

[246] Onania，17th，p.18;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in Complete Works，vol.7，pp.187，187-221.

[247] 我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来自Norbert Elias的经典作品The Civilizing Process，trans.Edmund Jephcott（New York：Urizen Books，1978）.

[248] Tissot，Onanism，pp.74，85，152.

[249] Tissot，Onanism，pp.44，85;Martin Bree，Observations on the Venereal Diseases，and Certain Disorders Incident to Either Sex，from the Pernicious Habits of Youth（1780？;London，1800），pp.78 and 80;Barkan，“The Beholder's Tale”;Nicholas Francis Cooke，Satan in Society（Cincinnati：G.F.Hovey，1882 [1870]，p.100.

[250] Edward O.Laumann，John H.Gagnon et 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81，564.

[251] Jean-Jacques Rousseau， Confessions， trans. J.M.Cohen（Baltimore： Penguin， 1963 [1957]）， p.109;Jacques Derrida巧妙地描述道：手淫之于性，就如同写作之于演说，想像之于现实。Of Grammatology，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翻译（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p.144-152。

[252] Onania，8th ed.，pp.11-12.

[253] Jeremy Bentham，“Essay on Pederasty，”Louis Compton编辑，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4（Summer 1978），4.1（Fall 1978）中再版，pt.2，pp.101-102及各处。

［254］没有给出页码是因为，Eronania和Curse of Onan的每一个版本的分页都不同。毕竟这些作品都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下的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研究作品。

［255］ 诸如此类的句子充斥着Tissot的作品和其他18、19世纪的作品里。巴塞尔的国务秘书写信给Tissot，赞扬他的手淫书籍，并声称，医生必须“帮助年轻人，使之不受过度欲望的驱使而做出过格的事”。Onanism，p.149;E.Littré，Dictionnaire de médicine，12th ed.（1865）.

［256］Onania，pp.60，149，and 173-74.另见Gorgias 493a-d.Complete Works，John M.Cooper编辑（Indianapolis，IN：Hackett Pub.，1997），p.836。

［257］Tissot，Onanism，pp.79，77，24.至于那个男孩是否真的在课堂上就进行自慰并且由于沉迷于自慰而悲惨地死去，则另当别论。

［258］Thomas Trotter，An Essay，Medical，Philosophical，and Chemical，on Drunkennes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London，1804），vol.2，pp.144 and 170.Trotter（1760-1832）是一位供职于海军的外科医生，出版过很多著作。此处Trotter所提到的时尚指的是越来越少的产妇进行母乳喂养，结果导致很多宝宝胃肠紊乱；医生用含酒精的药物进行治疗，会使患者酒精上瘾，导致恶性循环。

［259］“Manstrupration，”in Encyclopédie，vol.10，p.52;T.M.Caton，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Venereal Disease（London，1814），p.90;Goss and Co.，Aegis of Life，p.57.[R.J.] Brodie（顾问外科医生），The Secret Companion：A Medical Work on Onanism or Self-Pollution（c.1830）。Zeylanica精油——到底是什么无从得知——每瓶售价为4先令6便士——再加上提纯植物药片可以治疗这种酒精上瘾。说明书还提醒患者，如果药物不能立即起作用不要担心。

［260］V.Sazhin，“The Victor's Hand：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Belinsky and Mr.Bakunin，”Erotica in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Barkov to the Present [Erotika v russkoi literature ot Barkova do nashikh dnei]， Literary Review [Literaturnoe obozrenie] 的特刊，（Moscow，1992），p.39。

［261］“Abus，”in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médicine et de chirurgie， vol.1; Littré， Dictionnaire de médicine.

［262］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Jeffrey Masson编译（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87及注释78;Andre Lorulot，La Véritable Education sexuelle（Paris：Les Editions Georges-Anquetil，1926），p.241.书中痛斥独身生活，特别描述了牧师独身生活之苦，建议人们建立幸福浪漫的两性关系。

［263］Stopes Papers，Wellcome图书馆，A 228，229，220，128，117。其他很多书信中也体现了类似的意思。

［264］Referenc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Sciences（London，1923），vol.6，p.766.

［265］M.N.W.Buet，Dissertation sur la masturbation et les moyens propres y remédier（医学系答辩论文，Paris，1822年8月24日），pp.10-11。患者手淫这种“不端举止”让医生很尴尬，也在一家主要的教学实习医院中造成大量“没必要”的精神病会诊。有关这一点，见A.Kucharski and J.E.Groves，“The So-Called Inappropriate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Request on a Medical or Surgical War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 77.3（1976-1977）。

［266］有关这三个恐怖病例，见Jeffrey Masson，Comp.，A Dark Science：Women，Sexuality，and Psychia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 Jeffrey Masson and Marianne Loring（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1986）。

［267］ 一些19世纪晚期的医生认为抽动—秽语综合症患者的痉挛和非随意肌肉抽搐是由手淫导致的。有关抽动—秽语综合症及19世纪晚期的主流观点，见Howard I.Kushner，“From Gilles de la Tourette's Disease to Tourette Syndrome：A History，”CNS Spectrums 4.2（Feb.1999）；Howard I.Kushner，A Cursing Brain？ The Histories of Tourette Syndrom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弗洛伊德的学生兼同事Sándor Ferenczi的观点则基本与其相反。在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一书中（Ernest Jones翻译 [Boston：Richard G.Badger，1916]，pp.157-158），他认为抽搐与秽语是压抑手淫的结果；Joseph Zohar，Zeev Kaplan，Jonathan Benjamin，“Compulsive Exhibitionism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Flu-voxamine：A Controlled Case Stud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5.3（March 1994），pp.86-88;H.Nishimura，M.Suzuki et al.，“Efficacy of Lithium Carbonate on Public and Compulsive Masturbation：A Female Case with Mild Mental Disability，”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51.6（Dec.1997），pp.411-413.

［268］Simone Weil的经典论断：“我们还能用别的什么思考？”

［269］引自Michael Mason，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exualit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94。

［270］Jean Stengers and Anne van Neck，Histoire d'une grande peur，la masturbation（Institut Synthelabo，1998），pp.189-190。法国大革命前发动的一些农民起义叫grande peur，后来Georges Lefebvre以此命名他相关内容的历史书。这个名称本身看上去好像很有历史的沧桑，但是事实是Lefebvre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而编造了这个名字。Robert McDonald，“The Frightful Consequences of Onanism：Notes on the History of a Delus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8.3（July-Sept.1967），pp.431及423-431各处。书中写道，有关手淫疾病的谬见契合了19世纪性压抑的状况，但至于为何有关手淫疾病的谬见会发生在理性时代，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Michael Mason在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exuality一书中认为，手淫问题的兴衰与时尚的兴衰极其相似。

［271］ 这些是E.H.Hare在文章中的观点。见“Masturbatory Insanity：The History of an Idea”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08.452（Jan.1962），pp.1-25。Robert P.Neuman，“Masturbation，Madness，and the Modern Concept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8（Spring 1975）。Robert认为，由于人们早熟及中产阶级结婚年龄增大等原因，手淫发生的数量在增加。而这种社会历史变革与人们曾宣扬的勤俭节约的精神相悖。见Paula Bennett and Vernon A.Rosario II，“Introduction：The Politics of Solitary Pleasure，”in Solitary Pleasures：The Historical，Literary，and Artistic Discourses of Autoeroticism（New York：Routledge，1995），pp.1-17。文中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解释。

［272］见Arthur Gilbert，“Doctor，Patient，and Onanist Diseases in the Ni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30（1975）。文中涉及一些医学外行的观点；另见Gail Parsons，“Equal Treatment for All：American Medical Remedies for Male Sexual Problems，1850-190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32（1977）。

［273］有关精液与性经济相对应的论述，见G.J.Barker-Benfield，The Horrors of the Half-Known Life：Male Attitutdes Toward Women and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1976;New York：Routledge，2000）。

［274］有关19世纪对手淫的疾病解释，见H.Tristam Engelhardt Jr.，“The Disease of Masturbation：Values and the Concept of Disease，”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8.2（Summer 1974）。Stengers和van Neck在Histoire d'une grande peur中认为，手淫疾病是一个自承概念，尽管手淫人次的增加和减少的原因很难说清楚。

［275］ 有关新教徒愧疚心理的假说，见Hare，“Musturbatory Insanity，”and Rene Spitz，“Authority and Masturbation：Some Remarks on a Bibl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Yearbook of Psychoanalysis 9（1953）.Lawrence Stone总结道：“很难解释人们为何在18世纪早期及中期对青少年手淫越来越关注，因为这一时期正好也是成人性放纵流行期。而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大规模癔病却较容易解释，因为这个时期正好是福音教会大行布道，人们对性开始充满恐惧及羞愧的时期。”见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p.515及512-517。

［276］见Theo van der Meer，Sodoms zaad in Nederland.Het ontstaan van homoseksualiteit in de vroegmoderne tijd（Nijmegen：SUN，1995），app.I.在此为作者将稿子寄来表示感谢。另见Tim Hitchcook，English Sexualities，1700-180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p.60-62，及Arthur N.Gilbert，“Sodomy and the Law in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Societas 8.3（1978）;在此对Lund大学的Evaösterberg所提供的研究成果信息表示感谢。

［277］见Randolph Trumbach，Sex and the Gender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63-64及其他各处。

［278］George E.Haggerty，“'What Is This Secret Sin？'sexuality and Secrecy in the Writing of Horace Walpole，”in Maximillian E.Novak及Anne Mellor编辑的

Passionate Encounters in a Time of Sensibility（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0），pp.140及127-50。有关秘密的特质，见pp.222-235。

［279］Robert James，“Masturpratio or manustupration，”in A Medicinal Dictionary（London，1743-1745），vol.2.

［280］“Onanisme，”出自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écle（Paris，1875）;这一段文章推荐读者去阅读有关手淫的一个重要文献。

［281］George H.Napheys，The Transmission of Life：Counsels on the Nature and Hygiene of the Masculine Function，新版，（Philadelphia，1889），p.74.Napheys是位内科医生，他也写过一部面向妇女的类似作品。他把书献给John Todd牧师。Todd认为手淫是“弥漫整个心灵的腐败病症”。见The Student's Manual;designed，by specific directions，to aid in form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haracter and habits of the student，12th ed.（Northampton，1844）。

［282］Goss and Co.，Hygeiana：A Non-med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laints Incidental to Females，20th ed.，（London，1830），p.62.这是Goss家族出版的书，不断地重印，书的宗旨是向公众介绍公司所生产的药物可以治疗一些大众疾病。

［283］见Harry Oosterhuis，Stepchildren of Nature：Krafft-Ebing，Psychiatry，and the Making of Sexual Ident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ch.4;Richard von Krafft-Ebbing，Psychopathia sexualis，7th ed.，Charles Gilbert Chaddock翻译（Philadelphia：F.A.Davis，1908），pp.188-202及205-206。

［284］L.Thoinot，Medicolegal Aspects of Moral Offenses，Arthur W.Weysse翻译（Philadelphia：F.A.Davis，1911），pp.310-313及其他各处。

［285］见Ed Cohen，Talk on the Wilde Side（New York：Routledge，1993）。在英国学校中手淫是导致学生性焦虑的罪魁。见J.R.Honey，Tom Brown's Universe：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Public Scho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Quardrangle Books，1977），p.169.另见Oliver Buckton，Secret Selves：Confession and Same Sex Desire in Victorian Autobiography（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p.73。

［286］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 Jeffrey Masson编译（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1：A.P.Buchan，Venus sine concubitu（《没有性爱的维纳斯》）（London，1818），pp.96-98。

［287］ Charles Baudelaire，“Femmes Damnées”（poem III），in Les Fleurs du Mal（Paris：Fallimard，1972），p.150.见Vern L.Bullough and Martha Vought，“Homosexuality and Its Confusion with the Secret Sin in Pre-Freudian Americ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8.2（April 1973）。我随意引用了各处的例证，因为尽管18世纪以后的例证有不少地方特色，但是它们往往都很相似。

［288］除了以上提到的pp.148-151，见Patricia H.Labalme，“Sodomy and Venetian Justice in the Renaissance，”Tijdschrift voor Rechtsgeschiedenis 52.3（1984）。文章是英文的。

［289］ John Marten，Gonosologium Novum;or A New system of all the secret infirmities and diseases natural，accidental，and venereal in men and women（London，1709），pp.86，89.

［290］ S.A.D.Tissot，Onanism;or，A Treatise upon the Disorders Produced by Masturbation;or，The Dangerous Effects of Secret and Excessive Venery，trans.A.Hume，（London，1761），pp.80-81，149。引自Michael Stolberg，“An Unmanly Vice：Self-pollution，Anxiety，and the Bod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3.1（2000），p.15，是Fonds Tissot中的手稿信件。

［291］Tissot，Onanism，pp.40-46.

［292］Tissot，Onanism，p.46，此处错误地将“Ipsa Medullina fluctum cisantis adorat”引用为“…frictum cirsantis adorat”。

［293］见Laura Weigert，“Autonomy as Deviance：Sixteenth-Century Images of Witches and Prostitutes，”in Bennett和Rosari，Solitary Pleasures， pp.19-47。新教国家经常用宗教及性问题攻击天主教教义。

［294］ Bienville对他的前辈们大唱颂歌：他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无法接近触及L'Onanisme的经典解释，等等。有关19世纪叙述，见Carol Groneman，Nymphomania：A History（New York：W.W.Norton，2000），pp.16-17，29-30及其他各处。

［295］Auguste Forel，The Sexual Question：A Scientific，Psychological，Hygienic，and Sociological Study，C.F.Marshall（New York：Physicians and Surgeons Book Co.1906），p.233.Forel的确将手淫与同性恋联系起来，因为他认为有些人会放弃独自手淫而发展成与他人共同手淫，而异性恋者一有机会就会进行正常的两性性交。Ellice Hopkins，The White Cross Army（London，c.1880）出自《男人系列》;Clement Duke，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London，未注明日期，但获1884年统计学霍华德奖章），pp.145和150;Edward Lyttleton，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Immortality in Schools（London，1883），pp.8及15;Elizabeth Blackwell，The Human Element in Sex：Being a Medical E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of Sexual Physiology to Christian Morality（London，1885），p.29;Laura Engelstein认为19世纪晚期在德国也有类似情况。见她的The Keys to Happiness：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è-cle Russ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p.221-223。

［296］Nicholas Francis Cooke，Satan in Society（Cincinnati：G.F.Hovey，1882 [1870]），pp.114-115.

［297］Johann Peter Frank，System einer vollständigen medicinischen Polizey，11vol.in 5（Frankenthal，1791-1794），vol.6，pt.3，sec.14，pp.113-116.Frank认为，“龌龊的手淫”也是自杀的诱因，因此是政府的关注内容（vol.12，sec.8，p.147）。独身者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而他们的“秘密罪恶”——手淫就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P.J.C.Debreyne，Essai sur la theologie morale（Paris，1844），pp.71，70-81;Marc A.Weiner，Richard Wagner and the Anti-Semitic Imagin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pp.337-342.Weiner认为，犹太人与手淫者同属龌龊一类。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犹太人之类的人物也是一样：例如，The Mastersingers of Nuremberg中的Beckmeiser以及The Ring中的Hagan。

［298］Immanuel Kant，“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出自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Ted Humphrey翻译（Indianapolis：Hackett，1983），pp.41-43.本文首次于1784年12月刊登在Berliner Monatsschrift上，同期还刊登了4篇有关如何预防手淫的获奖文章。Kant认为，很难找到一个例子证明动机是纯净的。见Metaphysics of Morals， Mary J.Gregor翻译，作序并加注（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1），pt.1，sec.2，par.406。

［299］ Joachim Heinrich Campe编辑，Allgemeine Revision des gesammten Schulund Erziehungswesens/von einer Gesellschaft praktischer Erzieher， 16 vol.s（Hamburg，1785-1592）。Campe的政治观点引自Nicholas Boyle，Goethe：The Poet and the Age（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p.27-28，本书以与年轻的Wilhelm von Humboldt通信的形式写成。作者曾陪Humboldt一起去巴黎。有关Defoe作品人物的观点，见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88-204。

［300］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2nd.，trans.Alan Sheric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Foucault探讨了从关注身体转向关注心灵，即自我的问题；另见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1，trans.Robert Hurle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在Remarks on the two bills now before Parliament，entitled a Bill for Registering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 England;and a Bill for Marriages in England（London，1836）中，19世纪中叶的伦敦英国国教副主教William Hale也发表了类似Foucault的观点，认为如果国家可以控制这些知识领域，那就可以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

［301］ Jeremy Taylor，“On Chastity，”in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London，1651），p.80;Faucault，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1， pp.34-35，17-73;Onania， p.23.

［302］ Tissot，Onanism， p.viii;James Hodson，Medical Facts and Advertisements Submit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fflicted（London，1799），p.8;Brodie（R.J.）and Company，The Secret Companion（London：作者自费出版，1840），p.35。

[303] Frederick Arthur Sibly的论文首次出版于Papers on moral education，communica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ral Education Congress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eptember 25-29， 1908，Gustav Spiller编辑，（London：D.Nutt，1908）。文章代表一些专家的想法，试图控制现代人的心里。后被Lord Baden-Powell在Headquarters Gazette中再版，又被Sibly在其Youth and Sex：Its Dangers and Safeguards for Boys and Girls（London，c.1910）中大量引用。

[304] Foucault，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1;Bartholomew Parr，The London medical dictionary including...whatever relates to medicine in natural philosophy，chemistry，and natural history（Philadelphia，1819），vol.1，p.918.这部两卷的字典的第一卷于1809年在伦敦面世。

[305] 有关这些论述的新颖独到之处，见Foucault，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1， pp.104-105及103-131各处。

[306] 这种生命能量的观点首次在Discipline and Punish， pp.140，102中出现。Isabel Hull认为，1800年以前，德国有关手淫的空想已经破灭。但我所引用的19和20世纪时期德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我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监管在新的焦虑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在此感谢Michel Feher帮我理顺思路。

[307] 这个论断取自John Brewer的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x，1997），特别是pp.56-125。

[308] Montesquieu，Persian Letters， trans. C.J.Betts（Harmondsworth， UK：Penguin，1993），No.136.No.147所注明的日期为三年以后。

[309] Sir Richard Steele，The crisis of property：An argument proving that the annuitants for ninety-nine years，as such，are not in the condition of other subjects of Great Britain，but by compact with the legislature are exempt from any new direction relating to the said estates， 第2版（London，1720）。第三处引文出自The battle of the bubbles shewing their several constitutions，alliances，policies，and wars，from their first suddain rise to their late speedy decay（London，1720），p.10.定义与例子出自《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词条“bubble”。

[310] 有关私人欲望与公众利益相调和的观点，见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A History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尤见第15章。

[311] 18世纪有关痛风的记载，见George Cheyne，The English Malady， Roy Porter编辑并作序（1733;London and New York：Tavistock/Routledge，1991）。另见Michael Ignatieff 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stvan Hont及Michael Ignatieff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edicales（Paris，1819）;James Copland，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London，1858），vol.3，pt.2，p.1010.

[312] 有关此，参见pp.284-291。

[313] 参见pp.213。

[314] Hume的观点在其Political Essay， Knud Haakonssen编辑（1752;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中的两篇文章“Of Commerce”和“Of the Refinement of the Arts”里有非常清晰的阐述。见pp.99、105及其他各处。有关18世纪感情与经济的论述，参见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15]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1994）.

[316] Hume曾引用Mandeville的法国仿效者。伏尔泰在他的“Défense de Mondain”中赞扬Jean-François Melton的Essai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1734）。

[317] 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 Irwin Primer编辑并作序（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2）。1705年的诗在正文前：I.2，p.27;II.156-157.及166-168，p.31。

[318] 同上，pp.32，104，77。

[319] 同上，pp.77，110及110-113。

[320] Bernard Mandeville，A Modest Defense of Public Stews，Clark Memorial Library Publication 162（1724;Los Angeles：Augustan Reprint Society，1973），p.vi.文章抨击了主张道德改革的各种社会团体，即所谓邪恶团体；pp.iii-x。见Fable， pp.106-107。

[321] Mandeville，Fable of the Bees， pp.46，54，45-46.

[322] 同上，pp.64-70各处;II.241-408的“The Grumbling Hive”讲的是美德与经济崩溃的寓言；Mandeville，In Defense of Public Stews， p.74.

[323] Mandeville，In Defense of Public Stews， pp.vi，23，24-27;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 p.77.

[324] 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 pp.90-91及94。

[325]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obert M.Maclver作序（1944;Boston：Beacon Press，1957）。对法西斯兴起的描述十分精到，发人深省。

[326] Mandeville，In Defense of Public Stews， pp.30-31.

[327] Thomas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London，1798）.

[328] Jean-Jacques Rousseau，The Confession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trans.J.M.Cohen（Harmondsworth，UK，New York：Penguin Books，[1953] 1989），p.109.

[329] Wilhelm Stekel，Auto-erotism：A Psychiatric Study of Onanism and Neurosis， James S.Van Teslaar翻译（New York：Grove Press，1950），pp.56-58.

[330] 见J.G.A.Pocock 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另见Sandra Sherman，Finance and Fictionality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Accounting for Defo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54。

[331] 见Brewer，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p.39.Leslie Kurke，Coins，Bodies，Games，and Gold：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Archaic Gree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332] The Spectator，no.3（March 3，1711）（London：J.M.Dent，1951），pp.1，10-13.

[333] in Sherman，Finance and Fictionality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pp.17 and 187.Sherman的书是在所有有关信用/想像相对应的有关文章中最敏锐、学术气最浓的。Anthony Hammond，A modest apology，occasion'd by the late unhappy turn of affairs，with relation to publick credit/by a gentleman（London，1724），p.4.

[334]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2，58-59部分，R.H.Campbell和A.S.Skinner编辑（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1），vol.1，p.304；强调一点，Smith用了液压的类比，这对于医生应该不陌生：运转正常的信用应该像一个池塘，有小溪流经过它。只要流出的与流进的总量大体持平，就万事大吉，不管流出或流入的量到底是多少。引文中第二部分实际上在原书中先出现;Maria Edgeworth，“The Dun，”in Works of Maria Edgeworth，13 vols.（Boston，1822-1826），vol.5，p.276（1820）。感谢Catherine Gallagher所提供的建议和信息。

[335] J.G.Zimmermann，Solitude：To which are added The Life of the Author，notes...（London，1808），vol.1，pp.1，221及各处。也许我们应该读一下David Hume在他的自传中所提到的在法国三年独身生活的一段文字。在那期间，Hume写了the Treatise on Human Understanding，尽管没有出版，但是却阐明了独身生活对身体的危害。

[336] D.T.de Bienville，Nymphomania;or a，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furor uterinus.Clearly and methodically explaining the beginning，progress，and different causes of that horrible distemper.To which are added，the methods of treating the several stages of it，and the most approved remedies.原版为法文，Edward Sloane Wilmot翻译（London，1775），p.158。

[337] 这位医生在Patricia O'Brien的“The Kleptomania Diagnosis：Bourgeois Women and Theft in Late Nineteen-Century France”里被引用，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1（September，1983），p.73。过度手淫也被与男性偷盗癖联系起来，尽管男性偷盗癖要罕见得多。另见E.S.Abelson，“The Invention of Kleptomania”，Signs（September，1989）。此处我省略了另一个现代概念：“强迫式失常”这一范畴将偷盗癖与手淫（至少是过度手淫）联系了起来。治疗这两种病采用的是类似的药物：例如，氟伏沙明（fluvoxamine）。Joseph Zohar，Zeev Kaplan and Jonathan Benjamin，“Compulsive Exhibitionism Successful Treated with Fluvoxamine”，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5.3（March，1994）pp.86-88.一些论文报道了其在控制强迫式商店扒窃的使用；Otto Fenichel，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1946;London：Tavistock/Routledge，1990），p.371.

[338] Gregory M.Pfugfelder，Cartographies of Desire：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1600-195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72-173，pp.244-245;Timon Screech，Sex and the Floating World：Erotic Images in Japan，1700-182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p.31-38;Frühstück：“Debating Sex Education”，收录于Colonizing Sex：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339] Jane Gallop，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New York：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1988），p.18.

[340] Paul Ambramson，Steven Pinkerton，With Pleasure：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Sexu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4等。

[341] Rambler 89（January 22，1751），in Yal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vol.3.

[342] S.A.D.Tissot，An Essay on Diseases Lncidental to literary and Sedentary Persons（London，1768），pp.36-37，74-76.Anne Vila指出，Tissot对俄南行为的论述不过是Tissot对在另一领域独自，紧张地使用大脑所带来的危险的论述而已，我认为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见她的Enlightenment and Pathology：Sensibility in th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of Eighteen-Century Franc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101-102。Tissot，Onanism，p.52，pp.48-59.An essay on the disorders of people of fashion（Edinburgh/London：Alexander Donaldson，1772）一文也随这本谈文化人疾病的书一并印刷，该文的英语译文于1768年首次出版。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从未取得Onanism那样的吸引力，但也有其读者；18世纪，至少出过16个法文版本，7个德文版本，7个英文版本，4个意大利文版本，外加希腊文，西班牙文，波兰文版本各一种。据Antoinette Suzanne Emch-Dériaz，Tissot：Physician of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P.Lang，1992），331-332。

[343] Anthony Comstock，Traps for the Young，Robert Bremner编辑（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0-43，pp.168-184。

[344] Paul Saenger，Space Between Words：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8，256-257.另见Saenger的“Silent Reading：Its Impact on Late Medieval Script and Society”，载Viator 13（1982）。

[345] 关于私下里阅读的兴起及其与隐私的关系，我采用了Roger Chartier编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的基本描述，vol.3，Arthur Goldhammer译。尤其参照了Jean Marie Goulemot所写的“Literary Practices：Publicizing the Private”那一部分，pp.363-395。Chartier在其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Lydia G.Cochrane，（Princeton，NJ：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1987）中更加详细地描述了私下阅读的历史。另见选集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Guglirlmo Cavallo，Roger Chartier编，Lydia G.Cochrane译（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9）以及Paul Saenger，Space Between Words，pp.275-276。

[346] 阅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在Jean Starobinski著，Bernard C.Swift译的The Invention of Liberty，1700-1789（New York：Rizzoli，1987）中论证得非常清楚。另见Lisa Jardine，Worldly Goods：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London：Macmillan，1996），pp.135-180，pp.160-161。

[347] Paula Findlen，“Humanism，Politics and Pornography in Renaissance Italy”，in Lynn Hunt，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New York：Zone Books，1992），p.63.关于阿莱蒂诺，见Bette Talvacchia的穷尽式研究Taking Positions：On the Erotic in Renaissance Culture（Princeton，NJ：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1999），尤其是pp.viii，19。

[348] 关于这些画，见Kelly Dennis“Playing with Herself：Feminine Sexuality and Aesthetic Indifference”，载Bennett与Rosario，Solitary Pleasures。

[349] Max Hodann，History of Modern Morals，Stella Browne译（London：Heinemann），前置部分；Stopes Papers，A 244，Amrch 9，1923。作者的名字并非不详，但出于尊敬其后代的隐私，此处不引；A 65，FC，19/13/19。我未找到Alexanda Andrew Philip，H.R.Murray有标题为，Knowledge a Young Woman Should Have（London：Athletic Publications，1910至1920年间）的作品，或许这是性知识系列作品的一篇文章。作者也可能是指上述两位作者在同一出版社所出的Sexual Science。Tissot，Onanism，p.29。

[350] 这些例子取自Alberto Manguel，A History of Reading（New York：Viking，1996），149-150，153，159。

[351] The Inferno of Dante，trans.Robert Pinsk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4），第5章，英语译文II.107-122行，53，意大利语原文II.121-138行。

[352] A Practical Treatise upon the Treatment of Tables Dorsalis...（1747）;Tissot，Onanism，p.129;L'onanismo;ovvero，Dissertazione sopra le malattie cagionate dalle Polluzioni volontarie de Signor Tissot，3rd ed，（Venis，1785），pp.28-29，n.9.

[353] Herbert Maxwell，“The Craving for Novels”，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June，1893）;Alfred Austin，“The Vice of Reading”，Temple Bar Magazine 42（September，1874）。我感谢我的学生Susan Zieger，在我们一起进行的几次指导中，她为我找到了这些文献。她在其博士论文“Addictive Fictions：Medical Knowledge，Novelistic Form，and Habits of Mind in Britain，1860-1914”的第3章讨论了阅读与上瘾的问题，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2。更加普遍的论述见Kerry J.Mays，“The Disease Of Reading and Victorian Periodicals”，收录于John O.Jordan编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and Reading Practic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354] Isaac Ray，Mental Hygiene（1863;New York：Hafner，1968），pp.272-273，264-275 passium.另见Isabelle Lehuu，Carnival on the Page：Popular Print Media in Antebellum 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131 passium。

[355] Norah March，Toward Racial Health（London：Routledge，1915），p.85.

[356] （A.A.Brill），Psychoanalysis：Its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Philadelphia：W.B.Saunders，1922），p.149.

[357] Joseph Addison，“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or Fancy”，Spectator，411-412（June 21-23，1712）;Wilma L.Kennedy，The English Heritage of Coleridge of Bristols，1798：The Basis in Eighteen-Century English Thought for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Fan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p.1-19.关于18世纪之前人们对奥古斯丁及想像之历史的普遍看法，见J.M.Cockering，Imagination：A History of Ideas，Penelope Murray编辑并导读（London：Routeledge，1991），p.viii以及此书前四章，这是此话题中我所遇到过的最博学、最理性的论述。

[358] Spectator，vol.3，p.277等，Everyman Library.

[359] 雪莱引自Cockering，Imagination，p.vii;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Princeton，NJ：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1981）pt.1，ch.2，p.45。

[360] 关于约17世纪末以前的情况，见Cockering，Imagination，pp.1-101，141-195。关于洛克之后的情况，见Earnest Lee Tuveson，The Imagination as a Means of Gra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pp.72-91以及整本书；想像在休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尤其见于Treatise中。较为优秀的选读本，见Annete C.Baier，A Progress of Sentiments：Reflections on Hume's“Treati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7-15，257-258；每个人都会想到，Eva T.H.Brann论述想像力的浩繁，博学的纲要The World of Imagination：Sum and Substance（Savage，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1）中有一篇关于康德的简洁概述，p.505以及全书。关于康德把想像看做“积极能力”、“表示关联中的表象”、“在透明的认识统一体中发挥作用”的观点，见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115及以后。

[361] 我列出这张清单所依据的基础是Wolfgang Iser对问题的杰出研究成果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171及之后。

[362] 小说的人物塑造，我采用的观点来自Catherine Gallagher的Nobody's Story：The Vanishing Acts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Marketplace，1670-182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这本书在市场、小说、想像力等方面影响了我的想法，是绝非这一短短的引用所能表达的。

[363] 见Albert Ward，Book Production，Fiction，and the German Reading Public， 1740-18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尤其是第3章，论述了德国阅读群体的成长，pp.59-91，案例研究。此处的观点在整个西欧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此后不久，在欧洲的另一半亦是如此。

[364] Critical Review33（London：1772），p.327，以及其他引自James Raven观点。“From Promotion to Prescription：Arrangements for Reading and Eighteenth-Century Libraries”收录于James Raven，Helen Small，Naomi Tadmor编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9及各处。关于女性小说创作与妓女，见Gallagher的Nobody's Story。Colman的话引自G.J.Barker-Benfield，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27。在我撰写本书的后期，我碰到了这本书，关于阅读小说造成的性危险（尤其是对于女性），本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了很好的解释。巴克-本菲尔德简要地暗示了“过去，人们对解释手淫恐惧有过很多种猜测，不妨加上一点：手淫成了消费心理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其过去的文化含义何在”（p.330）。

[365] Jane Goldstein，Console and Classify：the French Psychiatri Profess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Human Knowledge，trans.Thomas Nugent（1756;Gainesville，FL：Scholars’ Facsimiles and Reprints，1971），pt.1，sec.2.

[366] 阅读小说具有肉体效应，这当然是Wilkie Collins及其追随者们的触觉小说的基础。关于这一点，见David Miller“‘Cage aux folles’：Sensation and Gender in Wilkie Collins's The Woman in White”，收录于Catherine Gallagher，Thoams Laqueur编The Making of Modern Body：Sex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107-136。Beddoes，Coleridge，Methodist Magazine的引文引自James Tinnon Taylor，Early Opposi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1943）中大量收集的反对小说的情感，pp.102-103，105-106。Beddoes只得到了间接引用，pp.107-108。Thomas Clarkson在其Portrait of Quakerism中称，“一位最显赫的内科医生”告诉过他人们在写小说时所面临的可怕效应。我们知道，这位医生就是拜多斯在其Hygeia：or，Essays，Moral and Medical，on the Causes Affecting the Personal State of our Middling and Affluent Classes（Bristol，1802-1803）中的展现。第3篇论文，p.77，p.76-80及各处。谢里丹引自Raven，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p.190。关于卢梭的读者，见Robert 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New York：Vintage，1985），pp.243-247。

[367] 此例引自Ladies Mercury（February 28，1693），pp.2-3，其实还可以引很多这样的例子。

[368] Onania...also the Sixth Supplement，15th ed.（1730），p.125。卡尔医生的故事在紧随其后的128页。Supplement接着还引用了其他的医学文献旨在建立阴蒂大小与色欲之间的联系，尤其引用了那篇经常重印，且经常遭盗印的署名为“德雷克医生”的文本。这个“德雷克医生”肯定就是James Drake，文本题目为Anthropologia nova;or，A new system of anatomy：describing the animal oeconomy，and a short rationale of many distempers incident to human bodies：in which are inserted divers anatomical discoveries，and medicinal observations，with the history of the parts：illustrated with above fourscore figures，drawn after life：and to every chapter a syllabus of the parts describ'd，for the instruction of young anatomists（London，1707），这份文本也的确说明了这一点。那位修女的故事当然是标准的新教及启蒙运动的反天主教会的比喻。关于“亚里士多德”，见Roy Porter“‘The Secrets of Generation Display'd’：Aristotle's Masterpie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收录于Robert Maccubbin编，Unauthorized Sexual Behavior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Williamsburg，VA：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1985）。色情作品与可接受的文学之间的界限是很细微的。我们知道医学或准医学书籍扮演了双重角色。关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见Peter Wagner，“The Discourse on Sex-or Sex as Discourse：Eighteenth-Century Medical and Paramedical Erotica”，收录于Roy Porter，George Rousseau编，Sexual Underworlds of the Enlightenment（Manchester，UK：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1987），以及Peter Wagner，“The Veil of Science and Morality：Some Por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Onania”载British Journal for th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6（1983）。

[369] Ludmilla Jordanova同意de Lignac对Tissot高水平的文学技能的称赞。她的论断见“The Popularization of Medicine：Tissot on Onanism”载Textual Practice 1.1（1897）。Louis-François de Lignac，De l’homme et de la femme considérés physiquement dans l’état du mariage（1772）;S.A.D.Tissot，Three Essays：First，on the disorders of people of fashion...，Francis Bacon Lee译（Dublin：1772），第iii。第二篇是关于文化人与独处者的疾病的，Danes译，第三篇则重印了休谟的Onanism。

[370] Bienville，Nyphomania，pp.76，161。

[371] 同上，p.32，Mary D.Sheriff在“Enthusiasm，Nymphomania，and the Imagined Tableau”中作了系统陈述，收录于Lawrence Klein，Anthony J.La Vopa编Enthusiasm and Enlightenment in Europe， 1650-1850（San Marino，CA：Huntington Library，1998）。

[372] Anthony J.La Vopa“The Philosopher and the Schwärmer”，收录于Lawrence Klein，Anthony J.La Vopa编Enthusiasm and Enlightenment in Europe，1650-1850。

[373] The Confessions of st.Augustine，John K.Ryan翻译并导读（NY：Garden City：Image Books/Doubleday，1960），vol.1，ch.13，p.56;vol.3，ch.2，p.78。反对戏剧式夸张的历史很久远，奥古斯丁和卢梭均如此，更不用说柏拉图，这一历史在Jonas A.Barish的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中有穷尽的论述。

[374] Johann Georg Heinzmann的话引自Reinhard Wittmann的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Munich：C.H.Beck，1991），pp.186-187。

[375] 关于性行为与反启蒙思想家传统，见Darrin M.McMahon，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8。潜在的手淫包括这样一个场景：雷斯比纳斯小姐很迷惑，为什么她看不到睡着的德·阿朗贝尔（D’Alembert）的手。此对话中德·阿朗贝尔代表着狄德罗的声音。通过这个睡梦中的人物，狄德罗想多激进就可以多激进。现实生活中的雷斯比纳斯小姐对此手稿大发雷霆，她让她的朋友德·阿朗贝尔找到狄德罗，坚持要求狄德罗当着她的面销毁手稿。狄德罗将手稿投入火中，并以为这是惟一的一份手稿。幸而一位德国记者手下的文书未经狄德罗的同意擅自抄了一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依据这个版本而印的。Dennis Diderot，Rameau's Nephew and Other Works，Jacques Barzun，Ralph Bowen译（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80），168-169。关于色情作品与现代主义关系的普遍论述，见Margaret Jacobs“The Materialist World pf Pornography”，收录于Lynn Hunt，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p.159以及pp.157-202各处。

[376] The Gladstone Diaries，vol.4，1848-1854，M.R.D.Foot，H.C.G.Mathew编辑（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1848年7月19日的日记，p.55。

[377] 关于色情文学与英国自由党激进派之间的联系，见Iain McCalman，Radical Underworld：Prophets，Revolutionaries，and Pornographers in London，1795-1840（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关于色情文学、启蒙运动、物质主义三者在法国的联系，特别参见Robert Darnton，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New York：W.W.Norton，1995），不过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受他的其他作品和学说的影响。关于狄德罗以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情况，见Angelica Goodden，The Complete Lover：Eros，Nature，and Artific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Novel（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211及各处。

[378] 此处的材料以及下一段中的材料取自John Cannon，“Memoirs of the Birth，Education，Life，and Death of Mr.John Cannon.Some time Officer of the Exercise and Writing Master at Mere Glastenbury and West Lyford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1684-1742”，Somerset Record Office，DD/SAS/C/1193/4，p.41（1700）。我再次感谢我先前的学生Tim Hitchcock为我送来了他的抄本。关于Aristotle's Masterpiece的大众化以及这一指南对旧书重印产业的普遍引导作用，见Porter，“The Secrets of Generation Display’d”，pp.5-7。18世纪至少出过20个英语版本。

[379] Onanism，8th ed.（1723），pp.17，vii and throughout.

[380] Tissot，Three Essays：...Second on Diseases Incidental to Literary and Sedentary Persons with proper Rules for preventing their full consequences...，trans.M.Danes，pp.31-35.

[381] Bienville，Nyphomania，pp.30，44.

[382] 18世纪，色情文学是小说的原型，与小说并无明显区别，这一论断是Jean Marie Goulemot的Forbidden Texts：Erotic Literature and Its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的中心论点。James Simpson译（Philade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4）。该书于1991年在法国初版，采用的题目取自卢梭的话：只用一只手来读的书（Ces Livres qu’on ne lit que d’une main）。Lynn Hunt在其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序言中指出，这一观点带有明显的性别倾向。Bernadette Fort的“Accessories of Desire：On Indecency in a Few Paintings by Jean-Baptiste Greuze”，载Yale French Studies（浪荡公子与现代主义专号）94（1998）。有人指出，格勒兹的画，如Lady Reading，以及很多更加露骨的画，表现了女人自我陶醉在文学中，是“妇女柔弱特质的无休止的象征”，“是挑逗性的符号”，“把男人置于解释、控制她的魅力的境地中”。另见Dennis，“Playing with Herself”。

[383] Darnton在一次讲座中说到，他曾在书上发现过证据，即他认定为精液的污迹。即便算不上证明，也算得上暗示：色情作品的确曾为18世纪的男人们用一只手读着。女人无法留下这样的痕迹，因此不能因为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就断定女人不读这类书。女人使用色情作品来激发手淫是色情文学自身的一个很大的题目。例如，见Darnton对特雷斯启蒙思想家（Thérèse philosophe）的讨论，收录于Robert Darnton，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New York：W.W.Norton，1993），pp.96，222。文献证据最起码表明，女人在色情作品中并非被动的性目标，而是积极的施动者，或许还会对女读者产生吸引。见Dorelies Kraakman，“Reading Pornography Anew：A Critical History of Sexual Knowledge for Girls in French Erotic Fiction，1750-1840”，载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4.4（1994）。关于卢梭、狄德罗所说的想像在看图中的重要性，见Goodden，The Complete Lover，155。

[384] 此段引文出自Brewer，Pleasures of Imagination，103。无法发现小说的男女读者比例、已婚未婚读者比例，尤其是脆弱的女读者的比例。最近的一份研究谨慎地下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小说有可观的女读者群，“18世纪的妇女并不像同时代的道德专家所宣称的那样对小说上瘾，没那么早，也没那么普遍”。见Jan Fergus，“Women Readers：A Case Study”，收录于Vivien Jones编，Women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1700-1800（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1-172。

[385] Bernard Mandeville，The Virgin Unmask’d;or，Female Dialogues Betwixt an Elderly Maiden Lady and Her Niece（1709，London，1724），引自Barker-Benfield，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p.327。Barker-Benfield显示了他的观点与Marshall的联系，并说Mandeville曾想支持一位像自己那样因散布女性手淫技巧而受到迫害的作家。我未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386] 这些图片、引文，以及我对荷兰美术中所表现的沉湎式阅读的看法，均来自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192-194，引文在194。

[387] 见Peter Wagner，Eros Revived：Erotica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and America（London：Martin and Secker，1988），pp.247，219。

[388] 关于多拉以及关于色情文字与图片之间关系的精彩讨论，见Philip Stewart，Engraven Desires：Eros，Image，and Text in the French Eighteenth Centu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p.100的图3.18;p.180的图6.4;p.286的图8.12;pp.98-99的图3.17。多拉的译文皆引自Stewart。关于Nerciat在色情文学库中的地位，见Patrick Kearney，A History of Erotic Literature（出版地不详：Dorset Press，1993），pp.83-86。

[389] 我感谢Michel Feher，他读了本章的初稿，对我的观点进行了修订。

[390] 羽太锐治《东京每日新闻》1913年11月12日，引自Frühstück-Colonizing Sex：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95。

[391] Jean Laplanche，J.B.Pontalis，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1967;London：Karnac Books，1988），446。全文如下：“因此，自体性行为并非固定于某一时间，而是时常重现的。起源于性行为与自然物相分离之刻，向幻想转移之刻。在这一进程中作为性行为而构建起来。”关于自恋，见弗洛伊德“Instincts”（1916-1917），载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0 Introductory Lectures，James Strachey译（London：Hogarth，1953-1974），p.227。

[392] 见Ed Cohen“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Political Body in Henry Maudsley's Nosology of‘Masturbatory Insanity’”，载Nineteenth-Centuty Context 11.2（1987），p.184;Arthur N.Gilbert，“Masturbation and Insanity：Henry Maudsley and the Ideology of Sexual Repression”Albion 12.3（1980）。

[393] Hugh Northcote，Christianity and Sexual Problems，修订第2版。（Philadelphia：F.A.Davis，1916），pp.35-36。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作品亦由F.A.Davis在美国出版。

[394] A.A.Brille，Psychoanalysis：Its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Philadephia：W.B.Saunders，1922），pp.146-147。

[395] 对于这种良性，参见Harry Oosterhuis，Stepchildren of Nature：Krafft-Ebing，Psychiatry，and the Making of Sexual Ident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我认为该书中还包括对发展的感知式解释，这一解释通常被解释得过于消极。

[396] 施莱伯的世界在William G.Niederland，The Schreber Case：Psychoanalytic Profile of a Paranoid Personality（New York：Quadrangle Books，1974）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Thomas Smith Clouston，Clinical Lectures on Mental Diseases也不例外，其第6版仍有众多读者（Philadelphia，New York：Lea Bros.，1904）。

[397] Cyril Bibby，Sexual Education：A Guide to Parents，Teachers，and Youth Leaders（New York：Emerson Books，1946）。在该书的最新版中他提及了这一点，我在John Thompson，Man and His Relations，including childhood，youth，manhood & married life，with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his reproductive organs，2 Vols，新增订版。（South Cliff，Scarborough，UK，1892？）。该书论调的确非常倒退，但据我推断毕比参照的是后来的一些偷梁换柱的流行说法。

[398] Sigmund Freud，“On the Grounds for Detaching a Particular Syndrome from Neurasthenia Under the Description‘Anxiety Neurosis’”，1895。收录于Complete Works vol.3。弗洛伊德对此问题的观点基于对一名叫Felix Makari的学生的采访，由100个连贯的病历组成。他由此发现手淫在维也纳精神病院中十分普遍。见Makari“Between Seduction and Libido”，p.643。

[399] Sigmund Freud，“A Discussion of Masturbation：Concluding Remarks”（1911-1913），收录于Complete Works vol.12。据雨果小说的英文编辑James Strachey

说，在雨果的小说中无此迹象。

[400] Dr.Pouillet，Essai medico-philosophique sur les formes，les causes，les signes，les consequences te les traitement de l'onanisme chez la femme（Paris：Adrien Delahaye，1876）。我不知道Pouillet是谁，但在此后的30年里，他常常被引用。

[401] Bernard S.Talmy，Woman：A Treatise on the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Emotions of Feminine Love（1904;New York：Practioners' Publishing Company，1908），pp.1172-1135。作者是纽约母婴医院的病理学家，他将两性的手淫均视为一种感觉过敏的形式; Iwan Bloch，Das Sexalleben unserer Yeit in seinen Beyiehungen yur modernen Kultur（berlin，1908）英译本422（New York：Falstaff，1937）。

[402] G.Stanley Hall，Life and Confession of a Psychologist（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924），132-134。Hall称，由于自己是研究青春期性行为的心理学家，他应当向读者叙述他自己当时的性问题。Tarnovski应该是指La Famille syphilitique et sa descendance;étude biologique（Clermont：Diax，1904）的作者Veniamin Mikailovich Tarnovski。简言之，Hall在把手淫与遗传性梅毒等同起来。

[403] G.Stanley Hall，Adolescence：Its Ph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and Education（1904;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924），vol.1，pp.432-453.

[404] John F.W.Meagher，A Study of Masturbation and the Psychosexual Life 3rd ed.，Smith Ely Jelliffe重新编辑、修订（Baltimore：W.Wood，1936），Jelliffe是位全球闻名的生物学家，是多数大中学的教科书的作者；Charles William Marchow，The Sexual Life：Embracing the Natural Sexual Impulse（Mosby：St.Louis，1923），pp.90-91;Charles William Marchow，The sexual life embracing the natural sexual impulse，normal sexual habits and propagation;together with sexual physiology and hygiene，7th ed.（St.Louis：Mosby，1931）.

[405] 关于这次论战，见下面的注释17。见Elizabeth Blackwell，The Human Element in Sex：Being a Medical E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of Sexual Physiology to Christian Morality（London：J.A.Churchill，1885），pp.26-27。

[406] 我衷心感谢维尔卡姆图书馆的Leslie Hall，她正在研究Stella Browne的传记，建议我研究这场论战，并向我介绍了这场论战的背景。见Hall，"'I Have Never Met the Normal Woman'：Stella Browne and the Politics of Womanhood"载Women's History Review 6.2（1996）。基本可参见Margaret Jackson，The Radical Facts of Life：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c.1850-1940（Bristol，PA：Taylor and Francis，1994）。这场论战持续进行于1912年上半年的几乎每一期Freewoman中；但关于精神错乱问题的特别论述，见7月11日和7月18日两期。

[407] 维尔卡姆图书馆的Stopes Collection，A 126，A 239，A 168。

[408] Bloch，Sexual Life of Our Time，411；Alan R.Mootnick，Elaine Baker，"Masturbation in Captive Hylobates（Gibbons）"载Zoo Biology 13.4（1994）;F.B.M.de Waal，转引自Paul Ambramson，Steven Pinkerton，With Pleasure：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sexu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5。

[409] Elie Metchnikoff，The Nature of Man：Studies in Optimistic Philosophy，P.Chalmers Mitchell（London：William Heineman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3），pp.95-99.

[410] 反对紧身衣的观点因Bernhart Christoph Faust的Wie der Geschlechtstieb der Menschen in Ordnung zu bringen（Braunschweig，1791）而得以流行。其导读作者为J.H.Camp，我们曾在前面遇到过此人。更加大众化的Health Catechism出过20多个版本。通过此书，福斯特的观点传遍西欧，北美各地。同代人对此观点的概述，见Havelock Ellis，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3rd ed.（Philadelphia：F.A.Davis，1920），vol.1，尤其是pp.166-277，尽管整个这部分谈论的是自体性行为问题。

[411] Ellis，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vol.1，pp.261，265-266，274，160-286各处。Ellis的6卷本著作1897年起陆续问世。

[412] Jones，Free Associations，pp.57，219.

[413] Auguste Forel，The Sexual Question：A Scientific，Psychological，Hygienic，and Sociological Study，trans C.F.Marshall（New York：Physicians and Surgeons Book Co.，1906），pp.228-234.

[414] Hermann Rohleder，Die Masturbation：Eine Monographie für Ärzte und Pädagogen（Berlin：1899）.

[415] 见Oosterhuis，Stepchildren of Nature，pp.70-71，131-133及各处。在克拉夫特-埃冰的很多病例报道中，手淫都被视为令人反感的危险行为；见Psychopathia Sexualis，7th ed.，Charles Gilbert Chaddock译，（Philadephia：F.A.Davis，1908），pp.188-89。

[416] 我此处引用的是Johannes Rutgers，How to Attain and Practice the Ideal Sex Life，Norman Haire译（New York：Cadillac，1940）。Margaret Sanger十分崇敬Rutgers。Rutgers是位内科医生，是尼德兰医学年鉴的编辑，写过很多关于节育的书和小册子，这些书和小册子被翻译成了所有欧洲语言，还被翻译成了世界语。

[417] 这幅画既表明了席勒的阉割恐惧与手淫罪恶，也表明了他的自我发现过程，作此解读的是Danielle Knafo，在Magdalena Dabrowski，Rudolf Leopard的Egon Schiele：The Leopard Collection（New York：现代艺术博物馆，1997），p.17。见该目录中的图9。这幅画并不是这位艺术家作品中惟一的手淫图，如果他确有代表作的话，我也不想把这幅画作为他在此问题上的代表作。这幅画中通过自体性行为所展现的女性力量以及自我占有是十分清楚的，尽管这一效应并没有名头。她用手指还会做点别的什么吗？我们从她的眼神里还能看出别的什么吗？

[418] 同上，图148，p.334。这幅画是关于自体性力量的，但显得十分直白。她用手指还能做点别的什么吗？

[419] 这话来自Joyce McDougall，Theatres of the Mind：Illusion and Truth on the Psychoanalytic Stage（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6），p.250。

[420] 我认为最初的论断是正确的，它表明了手淫是如何充当勾引与里比多的，这一理论为Makari在"Between Seduction and Libido"中所创。

[421] 这一观点源于Richard Wollheim的Sigmund Freud（New York：Viking，1971），p.20。

[422] Sigmund Freud，Studies on Hysteria，Complete Works vol.2，III，p.3.

[423]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Jeffery Masson翻译并编辑（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38-390，如Makari"Between Seduction and Libido"p.654所述。

[424] Makari，"Between Seduction and Libido"，661；这一切均来源于朵拉病例，Fragments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Complete Works vol.7。

[425] Sigmund Freud，General Theory of Neurosis，Complete Works vol.16，p.309.

[426] Sigmund Freud，"'Civilized'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1908）载Complete Works vol.9，p.187。此处他仍旧认为，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此

后，他更加重视超我（superego）的作用。在这两种模式中，手淫皆为升华作用的关键所在。

［427］ 同上，pp.187-189，198-199;Sigmund Freud，“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Love”，载Complete Works vol.11，p.182。“The Psychology of Love I：A Special Type of Object Choice Made by Men”，载Complete Works vol.9，p.172。

［428］ 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1905），Complete Works vol.7，pp.180-182，189-190，219-221，234.

［429］ 同上；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1932），Complete Works vol.22，pp.118-128。弗洛伊德有一段关于幼儿手淫遗忘的描述，这种遗忘是孩提遗忘的一种，它解释了为何神经症患者的罪咎感与某些手淫活动有关，也解释了手淫在歇斯底里、强迫症及其他神经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省略了这一段，因为在弗洛伊德描述从阴蒂到阴道的转换时，这一段对他所讲的元心理故事并无关键作用。对此问题更加普遍的论述，见拙著“Amor Veneris，vel Dulcedo Appeletur”，载Michel Feher，Ramona Naddaff，Nadia Tazi编Zone 5：Fragments for a Hisotry of the Human Body（New York：Zone Books，1989）。

［430］ Laura Hutton，The Single Woman and Her Emotional Problems（London：Baillière，Tindall and Cox，1937），pp.84-85.

［431］ André Green，On Private Madness（London：Karnac Books，1997），p.132.

［432］ D.M.Dunlop et al.，Textbook of Medical Treatment，2nd ed.（Edinburgh：E.and S.Livingston）。我已经查阅了若干种遵循此模式而编写的英文、德文的教科书，但是要想追溯人们对弗洛伊德观点的接受过程，则还需要作些更为细致的研究。此领域的发展或许并不平衡。例如，在Frederick W.Price编的A Textbook of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London：Henry Frowde and Hodder，1926）（此书为权威的Oxford医学系列出版物中的一种）的pp.1609-1610，就有这种惊人的组合：有的观点十分陈旧（或许措辞还算现代）：“源自生殖腺的自我毒害”，而有的观点则很现代：“揭示”阶段式失常，“心理分析有时可能会很有用”，尽管在这类失常转变为性失常之前，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要考虑。此系列中其他几种书也与邓洛普的观点有类似之处。例如，可参见Henry A.Christian，Psychiatry for Practition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pp.140-141。

［433］ 这类旧观念早在19世纪末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此方面情况，见Arthur Preuss， A Handbook of Moral Theology，3rd ed.（St.Louis/London：Herder，1928），73-77。我所能够找到的此书最早的蓝本是1905年Anton Koch著Lehrbuch der Moraltheologie。关于此话题的历史以及“当代观点”，见Charles E.Curran，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Moral Theology（Notre Dame，IN：Fides Publishers，1970），pp.161-176；把个性问题纳入其中的部分在p.176；关于“婚内俄南行为”即节育问题，见John C.Ford，Gerald Kerry，Marriage Questions（Westminster，MD：Newman Press，1964），pp.259-261，207-271及以后；John C.Ford，Gerald Kerry，Contemporary Moral Theology（Westminster，MD：Newman Press，1958），pp.230，233-239。紧随此问题的是一段有趣的探讨：牧师事务中，心理学在解决性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关于道德教育学，见Bernard Häring，The Law of Christ，trans.Edwin G.Kaiser（Westminster，MD：Newman Press，1966），p.304;Ernie Zimbelman，Human Sexuality and Evangelical Christian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306。

［434］ 见José Pierre编Investigating Sex：Surrealist Research，1928-1932，trans.Malcolm Imrie（London：Verso，1994），pp.6-7，22-23，29，33，103及各处。关于杜尚，见Amelia Jones，Postmodernism and the En-gendering of Marcel Duchamp（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96-198。

［435］ 这段充满希望的话语十分著名，出自福柯《性史》的前言的最后一段。

［436］ Joyce McDougall，Theatres of the Mind：Illusion and Truth on the Psychoanalytic Stage（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6），p.250;R.D.Hinselwood，A Dictionary of Klinean Thought（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中的“手淫幻想（Masturbation phantasies）”词条；Helen Deutsch，The Psychology of Women（New York：Gruen and Stratton，1944），vol.1，p.87。Deutsch还认为，与手淫相关联的罪恶感会抑制生育，会使观念变得更加难懂。见同上，vol.2，p.140。

［437］ Martha Shelley，“Lesbianism and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载Barbara A.Crow编Radical Feminism：A Documentary Read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307，最初发表于1970年。Morton Hunt，Sexual Behavior in the 1970s（New York：Playboy Press，1974），pp.100，172。

［438］ 关于“J”以及她的作品出版史，见Terry Garrity，John Garrity，The Story of“J”（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4）。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是The Sensuous Woman：The First How-To Book for the Female Who Yearns to Be All Woman（New York：L.Stuart，1969）。

［439］ 例如，Naomi McCormick的Sexual Salvation：Affirming Women's Sexual Rights and Pleasures.（Westport，CT：Praeger，1994）使这一点变得明显。

［440］ Anne Koedt，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载于Crow，Radical Feminism，pp.372-377；最初发表于1970年。

［441］ Lonnie Barbach，For Each Other：Sharing Sexual Intimacy（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83），pp.184-185。Betty Dodson，Liberating Masturbation：A Meditation on Self Love（New York：Bodysex Designs，1974）.在最终说服其模特摆出手淫姿势后，在说服美术馆拥有者展出由此产生的四幅画后，多德森写道：“在时尚的麦迪逊大街美术馆里，我有了拯救手淫的想法。”说服模特摆出这样的姿势，比让人们表演性交还要难。关于这次冒险，参见p.11。

［442］ Seneca，Letters to Lucilius，23.4，引自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The Care of the Self（New York：Pantheon，1986），pp.66-67。我感谢Michel Feher指出了这一联系。

［443］ Federation of Feminist Women's Health，A New View of a Woman's Body：A Fully Illustrated Guide，插图： Suzann Gage，Sylvia Morals（West Hollywood，CA：Feminist Health Press，1991）。

［444］ Rebecca Chalker，The Clitoral Truth：The Secret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0）.

［445］ 关于这一时期的女同性恋性政治，见Lillian Faderman，“The Return of Butch and Femme：A Phenomenon in Lesbian Sexuality of the 1980s and 1990s”，载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4（April，1992），尤其参见其中对On Our Backs性建议专栏原作者Susie Bright的采访，p.582。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一本奇特的小书，其作者自称是精神治疗医生，称从其病人的情况来看，若认为女人不会受到色情作品的挑动，简直是“荒唐可笑的想法”，“我从未遇见过不受其挑动的女人”。尽管她说她所碰到的多数是女同性恋者，但是她所谈到的色情作品本身却是关于异性恋的。见Yvonne Johanet，I，Lesbian（North Hollywood，CA：Brandon House，1964），p.34。此书为杜克大学（The Duke University）庞大的自由性行为藏书的一部分；此部分藏书的显著特征即第一人称的逼真的叙述。

［446］ 显然，这仅仅勾画了主题的轮廓。在任何一家书店，都有大量的供女人使用的色情书刊。我调查了杜克大学性行为藏书中可供借阅的每一期On Our Backs，但我的例子取自下列几期：1984年夏季号23；1987年夏季号12；将手淫场面作为施虐/受虐小说的一部分，选自1988年春季号35。

［447］ “Tate Modern”的标签上也是这么说的，里面以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艺术界为背景，讨论了Acconci的作品。

［448］ 我想感谢我的女儿Hannah Laqueur，是她第一个提醒我注意阿孔奇的。见Lucy Soutter，“Community vs.Context in the Reception of Eleanor Antin's Retrospective”，提交予Chicago第89界大学艺术协会会议，2001年2月28日至3月3日，见http：//web.ukonline.co.uk/n.paradoxa/2001panel4.htm.2001年2月2日的采访，见http：//www.kunst.no/kit2001/Kate_Fowle/kate_fowle.html.

［449］ 她的主页http：//www.gatesofheck.com/annie.她最近在与“性爱本能精神专家”，男性手淫指导者Joseph Kramer进行合作，如果这一合作有所暗示意义的话，或许她会转向更偏重于精神的方向。对她不平凡的人生的叙述，可以由她主页上的链接进入，或参见Annie Sprinkle，Post-Porn Modernist：My 25 Years as a Multimedia Whore，修订版（San Francisco：Cleis Press，1998）。

［450］ Amelia Jones，“Sexual Politics：Feminist Strategies，Feminist Conflicts，Feminist Histories”，p.32，Susan Kandel，“Under the Green Veil：The Body in/of New Feminist Art”，pp.191-192.载Amelia Jones编Sexual Politics：Judy Chicago's“Dinner Party”in Feminist Art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我感谢Elizabeth Dungan允许我使用并引用她于2002年1月13日对Zoe Leonard的未公开发表的采访。读者可通过http：//www.icca.ro/artelier/nr5/roxana_marcocia.html.了解Leonard的女性生殖器官系列照片是如何与18世纪的肖像画陈列在一起的。

［451］见Jean-Jacques Lebel，“Picasso's（Erotic）Gaze”，载Jean Clair编Picasso Erotique（New York：Prestel，2001），p.67及各处。我未看到其录像资料。庞大的塔特展览Surrealism：Desire Unbound中有好几幅图支持了这一断言。见目录Surrealism：Desire Unbound，Jennifer Mundy（London：T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1）。遗憾的是，该目录中未收录达利（Dalí）为乔治·于格奈（Georges Hugnet）的《俄南》（Onan）所作的那些揭示罪恶感的插图。

［452］关于本格里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东西是Cherie Caswell所写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该文写于1993年12月8日，是向Anne Wagner教授的研究生课程提交的期末作业。Caswell的论证中心是关于手淫的，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拉坎（Lacanian）式的阐释。

［453］John R.Burger，One-Handed Histories：The Eroto-Politics of Gay Male Video Pornography（New York：Haworth Press，1995），pp.x，30及各处。

［454］Joanie Blank编，First Person Sexual（San Francisco：Down There Press，1996）。

［455］Amy Scholder编，Fever：The Art of David Wojnarowicz（New York：Rizzoli，1999），pp.7，116-117及各处。Richard Marshall，Robert Mapplethovpe New York：Whitney Museum，1990，p.66。

［456］其实，Elder所关注的是笼罩着手淫问题讨论的无知与偏见，尽管此类讨论在她炮轰这些现象的那个年代并未公开化。在一篇题为“M-Word”（手淫［masturbate］的第一个字母为M，因而M-词即“手淫”。——译者注）的网上杂志采访/文章中，有人引述了她的话：她曾说过一位老年朋友曾致信谈到了她教孩子手淫的事。这位朋友在痛苦中度过童年，害怕会因自己的秘密行为而失明，但在考虑了一番之后，她觉得这么做不错，根本不用戒除。埃尔德则回答道，她的要求是告诉“孩子关于身体与性的真相”，许多人却惧怕这些事实。http：//www.nerve.com/Elder/mword.见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2，1994，A20;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2，1994;New York Times，December 18，1994，p.15。

［457］其概述见网站“Masturbation in Films”及其链接站点“Internet Movie Database”。芭芭莱拉不喜欢那位疯科学家的高潮机，并对这一机器极为恼火;《美国馅饼》中，捷克交流学生纳迪亚一边看着主人公的色情杂志，一边手淫，并无羞耻之感。但总的来说，手淫极少成为现代人谈论性行为的话题，成了最被遗忘的话题，成为令人不安的话题，只有在笑话的保护下才得以延展。倘若我们的文化中有禁忌的话题，那么手淫或许就是。

［458］http：//www.jackinworld.com

Table of Contents

导言 坦荡的性，文化的性

第一章 开篇综述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从一本《手淫》小册子至整个文明世界

第三章 《手淫》出版之前的手淫文化

第四章 手淫问题之所在

第五章 手淫缘何成为问题

第六章 20世纪的独自性行为

译名对照表